〔美〕夏洛特·索尔兹伯里 著

长征日记
——中国史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长征日记

——中国史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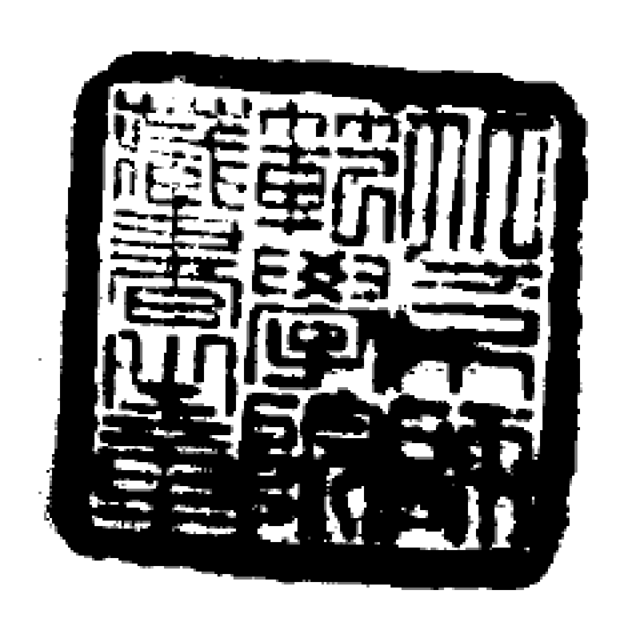
〔美〕夏洛特·索尔兹伯里 著

王之希 许丽霞 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一九八六年·北京



Charlotte Y. Salisbury
LONG MARCH DIARY:
CHINA EPIC

根据纽约 Walker and Company
1986年版译出

长征日记
——中国史诗

〔美〕夏洛特·索尔兹伯里 著
王之希 许丽霞 译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625 印张 186 千字
1987年 9 月第 1 版 1987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10345·019 定价：2.10 元
ISBN 7-80049-004-1/I·2



作 者 近 照



索尔兹伯里伉俪合影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夏洛特·索尔兹伯里于1984年和她的丈夫、美国著名作家和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一起，接受我国的邀请，来我国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进行实地采访。她不顾七十高龄，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了种种困难，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经历了万水千山，终于完成了她自己称之为自己进行的“长征”，并得到参加长征的老一辈革命家李先念、胡耀邦、杨尚昆等的接见，还采访了其他参加长征的“幸存者”。本书以日记的形式，详尽地记录了她在“长征”中的见闻和感受，成为描叙长征这部壮丽史诗的又一部很值得一读的著作。正如她的丈夫所说的，夏洛特是用妇女的眼睛、用妇女特有的观察事物的天才来观察世界的，本书也体现出这个特点。如读者能将此书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所写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参照阅读，还可以收相互补充之效。

作者进行这次“长征”是很有意义的。她说：“长征的意义，我是深刻地领会到了。如果不是沿着长征的路走一遍，没有见到那些开会的地方、战场、长征中跨越过的高山、草地、江

河，没有和一些幸存者交谈，决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不能每人都象作者一样也去作这样一次“长征”，但却能从读她的书来分享这一感受。

作者在本书中如实叙述了这次旅行的经历，转述了一些参加长征的老同志和他们的亲属所介绍的英雄事迹和具体情况，介绍了长征经过地区的过去和现在，也提出了自己的分析和看法。作者的看法显然带着自己的色彩，她所了解和记下的情况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是不言而喻的。尽管如此，长征的英雄儿女当年勇敢顽强地进行艰苦卓绝战斗的景象，中国人民在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打碎旧世界、建设新社会的历史征程，却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们眼前。长征的精神是我国人民的精神财富，也正如作者所说的，长征鼓舞着中国年轻的一代，使他们想着“他们要怎样生活才无愧于那些英雄，使英雄的精神永葆青春”，从而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参加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新长征。

原书系今年四月在美国出版。译者怀着对长征精神和革命先烈十分崇敬的精神，赶在纪念长征胜利五十周年之际将全书译完。由于时间仓促，加上水平有限，特别是由于不可能查对全部的有关情况（除原作个别明显的技术性差错作了校正外，均尽可能按原作译出），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谨希读者指正。

1986年10月

献给

参加我们 1984 年长征的同伴们：

我的丈夫哈里森

杰克·谢伟思

秦兴汉将军和

张援远

中文版序言

欣悉我写的《长征日记》一书正在译成中文，希望该书的翻译出版将为增进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有所裨益。

尽管我访问和游览过中国的许多地方，会见过众多的中国人，并把一些人当成我的好友，但我不会忘记我毕竟是一个美国人。我是以我自己的洞察力来看待事物的，这些看法受到自身的文化素养的影响。每一位中国人看起来似乎是自然和正常的事情，而对我来说也许是别扭和奇怪的。反过来，一位中国人到了美国，我相信情况也会如此，肯定会有很多使他大为惊异的事情。

1966 年，我同我的丈夫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一道第一次访问了东南亚，当时他任《纽约时报》的编辑和记者，我们沿着中国的周边地区旅行了近四万英里。那时美国和中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我们只能到达那些邻近中国的其他国家和地区——香港、柬埔寨、泰国、缅甸、老挝、锡金、印度、苏联和日本。

我们是在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历史性的访问之后不久于 1972 年首次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我们有幸会见了周恩来总理并同他进行了交谈。我记得他当时说过，最好让美国人既看看比较贫困的地区，也看看堪称典范的公社和工厂，这样就会使我们了解到已经取得了多大的成就，还有多少事

情有待完成。

我们第一次访华是在1972年；1977年又去过东北和内蒙古；1980年去了西北和西藏；1984年沿着毛泽东1934至35年的长征路线进行了参观访问。在所有这几次旅行中，我们都曾访问过外国人从未去过的地方。我们见过许多少数民族的人民。我们过着质朴的生活，不是作为旅游者，而是以观察员和记者的身份旅行的。

我们了解到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情况，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史。我保存了所有这几次旅行的日记并已出版成书。我力图将所见所闻以及我的反应和感受如实而准确地记录下来。我想我的这些书对美国人是有帮助的，因为这些书向其他美国人介绍了当代中国的现状。

我们两国之间是存在许多差别的。中国是享有世界最古老文化的国家之一；而美国则是一个建国不久的非常年轻的国家。我们两国的社会、风俗、习惯都不同，吃穿的方式也各异。因此，如果我对你们认为正常的事感到惊奇或者别扭，请不要介意，希望你们理解：我只不过写下我的感受并向其他美国人作些介绍，并非针对什么人和事提出批评。

我热爱中国，热爱和敬佩中国人民。我觉得，在经历了多少年来不平等、不公平的政治制度和地主、军阀和外国的欺凌之后，正如我们美国的一句成语所说的，你们已"名列前茅。"希望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继续发展，与日俱增。

夏洛特·索尔兹伯里

1986年12月7日于

美国康涅狄格州塔科尼克

序

关于过去20年里夏洛特和我一道在亚洲和俄国的穷乡僻壤所进行的多少万英里的旅行，我不可能完全都记录下来。我们结婚几年之后，从1966年起就开始了这种探索。我估计从那时以来，世界上谁也比不上我们，目睹了这么多的地方：西伯利亚草原，戈壁沙漠，蒙古，印度，喜马拉雅山区，新疆广袤的土地，以及从拉萨通向加德满都的崎岖小道。

然而所有这些旅行都无法同夏洛特在本书中所记载的长征相比。这本书是她描写我们远方旅行的第七本书。面对摆着她的许多著作的书架，她争辩说："我又不是作家，我喜欢的是栽花种草和收拾房子。"

本来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进攻面前所进行的跋涉6,000英里的一场历史上著名的退却。当时蒋介石把红军紧紧地围困在江西的南部一隅。1934年10月16日红军悄悄地开始转移了。经过一年的战斗，东冲西突、使用计谋，承受了极其巨大的损失和难以想象的牺牲，终于从围堵追击中保存了一部分力量，战士们最后到达陕西，在那里找到了落脚点。

在长征开始之前，毛泽东作为共产党人的领袖受到莫斯科支持的一派人的排挤。但是还不到两个月，由于得到那些在战斗中表现坚定的指挥员的支持，他又重新掌握了权力；从

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失去在中国共产党人中的领导地位。

正是这一历尽千辛万苦的英雄史诗，创造了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共产党人最终在中国夺取政权的业绩。在夏洛特和我于 1984 年沿着这条路进行七十天的旅行以前，50年来谁也没有踏上过这危险的征途。在我写的那本名为《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里，我第一次发表了关于这次长征的完整记录。在夏洛特的书里，她告诉人们，我们踏着中国红军的足迹旅行时有哪些经历和遭遇。

我们的几次旅行，从来都不是为了游乐，这次也不例外。有一次我们用了四个月的时间，沿着中国的周边地区，从东南亚饱经战祸的丛林到蒙古的沙漠和幽暗的黑龙江，行程数千英里。有一次我们到了中蒙边境，当时苏联军队蜂拥而入，用核战争威胁着毛泽东。我们曾交叉行进到达中国东北靠近苏联滨海省地区，视察了中国为对付苏联核武器而建造的地下城市。我们曾被热带季风雨围困在荒无人烟的喜玛拉雅山中。我们也曾被一场前所未有的洪水禁锢在乌兰巴托的旅馆里，那场大水使得整个城市停水停电，还断了粮。

1980年我们从一次远征归来，在那次征途中，我们沿着中国西北的沙漠行进，到达的地方差不多用肉眼可以看到苏联的哈萨克。然后又去拉萨，经过漫长而又艰险的沙石小径，几乎到了珠穆朗玛峰的脚下，并直达尼泊尔边境。在攀登最后几英里崩塌的巨石和岩层时，夏洛特声称："再也不干了！"我不能和她争辩。

1983年 8 月 17 日电话铃响了，一位中国官员来电话告诉我，如果我还想要去长征，可以作出安排（十年前我第一次提出了这一旅行的建议）。当然我愿意去。夏洛特激动得喘不

过气来，说她也要去。

她不但去了，而且沿着外国人从未走过的山间崎岖小道，在7400英里旅程中，每一步都是她伴随着我一起走过来的。在皎坪渡附近的火焰山周围，她轻易地骑着马，就象早年她还是个姑娘时在马萨诸塞州的韦斯顿的田野里骑着小马驰骋那样。我们在途中庆祝了她的七十岁寿辰，她用头顶地倒立，使中国人为之吃惊（每次来中国旅行她都这样），她进行这一表演时，不但轻而易举，而且姿态优美。当我生病时，她每晚都在医院陪床。中国人夸奖她是一位“模范妻子”。

在我为她以前的日记写序言时，我曾说过，她是用妇女的眼睛、用妇女特有的观察事物的天才来观察世界的。有人认为那是一种性别歧视的说法，而我却对此信守不移。夏洛特能觉察到那些最有意义的东西：周恩来衬衫上丢失的纽扣；萦绕延安大宝塔的烟雾；奔向稻田的活泼农村姑娘，脚上绣鞋闪闪发光。

夏洛特自己看来，她并非“作家”；可是没有一位美国妇女对今日中国的生活比她更有深邃的知识。谁能比她更了解中国从农奴和奴隶制的统治到发生共产主义的革命和从“文化大革命”到今天所称的“新长征”？这是漫长的、不断向上的进程。

她差不多见过中国革命的所有领导人，几乎见过所有至今还活着的有影响的长征老战士，不论他们是男是女。她也曾游历过另一个伟大的共产党国家俄国，交了一些俄国朋友；她不但能将中国同俄国进行对比，也能把中国同印度以及其它亚洲国家进行对比。

除了夏洛特的四部中国日记外，再也找不到关于中国现

实生活更好的指南了；而其中的这一部日记——长征日记——则是最深湛的。这是一幅全景画，既描绘了旧中国，也记录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成长起来、到1949年胜利夺取政权的异乎寻常的史诗。它使人们理解为什么这些共产党人现在能领导一个由十一亿人民组成的国家。

哈里森·E·索尔兹伯里

前　言

长征？经过中国的穷乡僻壤，行程6,000英里，沿着毛泽东及其领导的红军在1934—1935年用了一年的时间走过的崎岖小道长征？我的孩子们会说，你简直是在开玩笑！

当我丈夫哈里森接到中国大使馆的电话后，为这一喜讯（对他来说）高声欢叫。我当时就是这样对他说的。中国政府终于允许他进行这一难于想象的旅行。

长征！我们恐怕坚持不下来，我俩谁也不行。对这一点我是清楚的。七十年代初期，哈里森就开始谈到长征，谈到这将是一次非常伟大的旅行。多好的故事！多好的独家新闻！如果他能说服中国人让他去的话。自从那个时候起，多年来我一直害怕真的得到同意的信息。

我从来没有想到中国人会同意。但自1972年以来，哈里森一再向中国人做工作。正当我让自己轻松一下——相信事情不会发生的时候，意外的事情现在竟然发生了。

这太令人着迷了。但哈里森已经七十多岁了，我也快到七十了。这会是我们的归宿，一种很不舒服的归宿。长征！他怎么会这样精神错乱？这不行。我不能让他去。可是我却让他去了，而且我们一道去了。

在二十年代，作为一个生长在波士顿附近的孩子，即使在最荒唐的梦境里，我也从未想象过这样的事。我记得那时我

最远只是每年到巴泽兹湾旅行。从距波士顿十二英里开外的韦斯顿起，经瓦雷哈姆一直到科德角前，这样一次六十三英里的旅行差不多要花整整一天，而为这一次大行动要作几个星期的准备。清晨我们往一辆大卡车上装载动物——两匹马、两只小马驹、通常还有一只猫、一只山羊、几只兔子以及所有这些动物的用品。另一辆卡车则装满了大行李箱，箱内盛有供十四张床使用的卧具以及我们三个月停留期间所需的家用物品。我的叔叔和两位堂兄弟同我们一起度过夏季，总共三个大人，六个小孩。此外，还有一名厨师、二名女仆和我们在一起。

我的母亲和父亲各自驾驶一辆汽车。我们四个孩子分开乘车旅行，最小的同他的媬姆坐一辆车。女仆们乘坐装运家用物品的车，同司机一起坐在前排。我们的三只狗（我有一只西部高原的敏捷的小猎狗，从我两岁到十九岁我结婚以前，这只狗一直跟随我十七年）也同我们一道乘车。由于某种原因，这些狗总是晕车，因此大捆大捆的报纸是必备的，而且我记得总要停车两三次来照顾呕吐的狗。由于其它原因中途还得多次停歇。在当时，常常只能在离路边不远的地方找个灌木丛或小树林来歇歇脚，当时连不怎么吸引人的加油站休息室我们都未曾听说过。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处停车站是达克农场，那还不到行程的一半，我们在那里吃了我认为最美味的、油腻的烤鸭三明治。这种三明治现在有时还能吃到，我渴望再品尝它。

当我们长大一些，就进行更远一些的旅行，到阿迪朗达克的普特纳姆营地，这确实算不上一次长征，路上只要走两天一夜。既没乘卡车，也没带动物。这是在8月下旬的为期三周

的短程游览，旨在避开这段时间使我和姐姐难受的豚草。我们的眼睛发红、奇痒，并不断地咳嗽和打喷嚏。有一次我数了数，巴巴拉连续打了六十个喷嚏。没有什么治疗办法，但是到地势高一点的地方就会好些。所以从可以接受参加普特纳姆营地的年龄起(我想是10岁)，我们每年都去旅行。那是一所专为成年人及其循规蹈矩的孩子开办的私人家庭营地。我们必须能自己照顾自己。

我们家的朋友哈里·沙特克开着他的大型帕卡德旅行车，我母亲带着孩子们乘他的车。我父亲则随后乘火车去。沙特克先生从韦斯顿接我们上车。我们的旅行袋捆在汽车的踏板上。我母亲同沙特克先生坐在前排，我和两个姐妹坐在后边。

我们喜爱这种乘车旅行。我特别记得在莫霍克崎岖小道上的那些象发夹形的急弯，当我们到达山顶(大概并不很高，不过在我们看来是相当高了)并俯瞰我们刚才经过的地方时，那是多么令人激动呀!

一般我们在威廉斯敦过夜，我们同母亲住在一所旅店，而沙特克先生出于礼貌住在街的对面。

在营地里，我们爬山，甚至攀登阿迪朗达克最高的山——马西峰山；我们也到“妇女池”游泳，那是在一条冰凉的小溪里的一个天然池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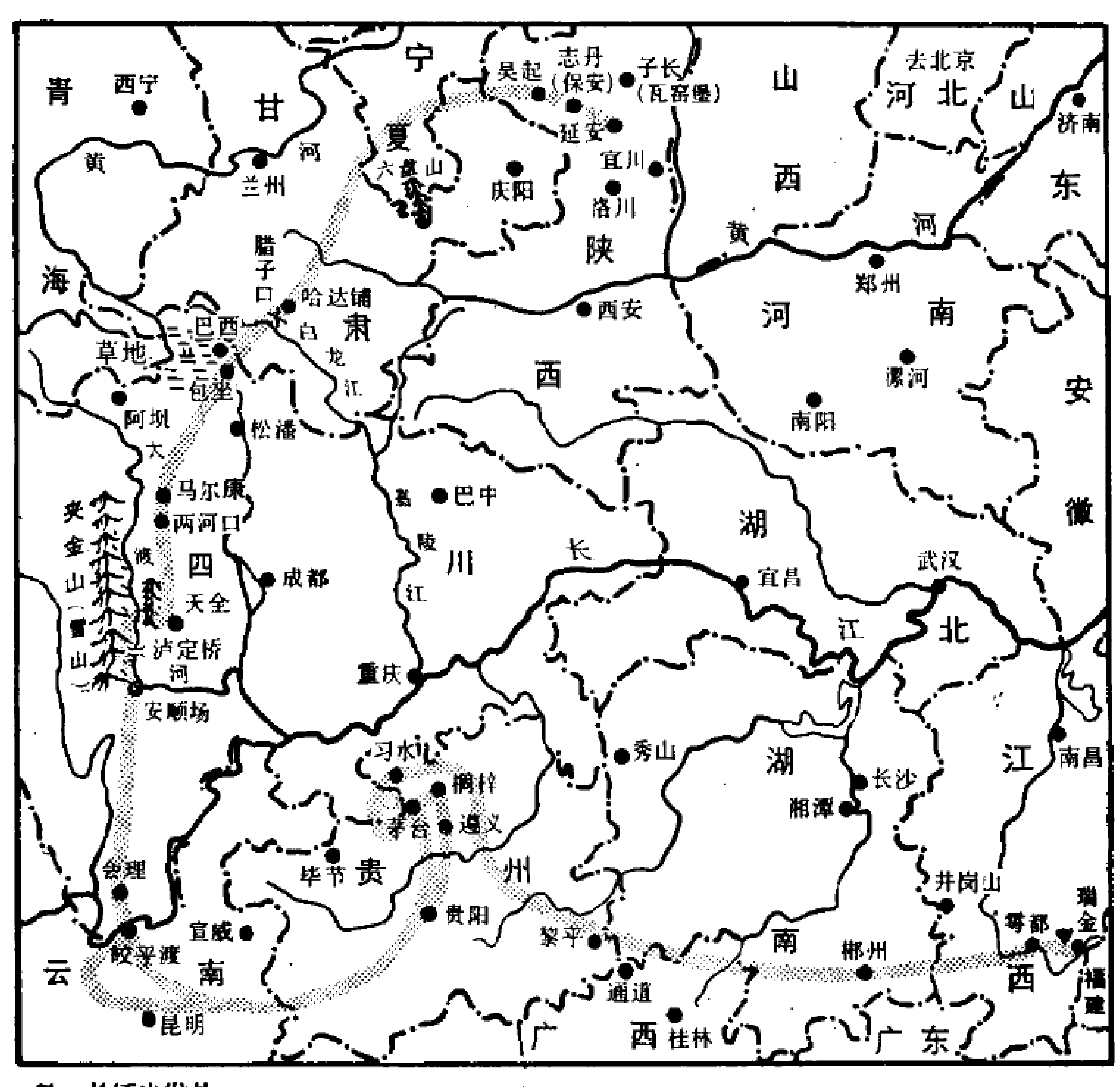
天晓得从那时以来，我和哈里森一道周游了世界多少地方！我到过中国的西藏等边远地区等，甚至在海拔6000英尺的地区颠簸而行，从拉萨到达尼泊尔。我既住过夯土地面的营房，也在有水泥地板的宾馆呆过。我几乎到了中国西北部同苏联哈萨克交界的边界；我曾在中国内蒙古和蒙古人民共和国

的蒙古包中吃过锡盆里的羊肉；我乘吉普车跳跃着穿过戈壁沙漠；我走遍了西伯利亚；并两次到过喜马拉雅山中的锡金。

是呀，我曾经远远离开过达克农场和莫霍克崎岖小道。可是长征呀！我当然知道它的重要意义；我知道它对哈里森来说意味着什么；我理解到这会是他的一生中最重要的旅行。可是我反复地思考着当我们要求到西藏去时中国人多年来对我们说的那些话："你们年纪太大了；要去的地方太高、太热、太冷，行程太困难了。"我从内心深处，我知道他会去的；我也不会让他一个人去，我必须同去；没有任何选择余地。可是我们会回来吗？

长 征 日 记

毛泽东领导的红军长征路线图



♥ 长征出发处

1984年2月29日

在去中国北京的飞机上

很难相信我又一次踏上了去中国的旅途。我们本来计划今年冬天去意大利，去罗马的美国学院。我们两人当时是打算去工作的；然而在意大利有那么多新奇的事要办，那么多精彩的东西要看。我看我办不了多少事儿。我爱意大利，有一次我在佛罗伦萨呆了六个月，而且还一直想再去；然而我们以后再也没有去过佛罗伦萨和罗马——也未去过伦敦和巴黎。我们去了蒙古的乌兰巴托，去了西伯利亚的边远地区，去了中国的一些人们听也没听说过的地方。现在我们计划再去中国，沿着三十年代红军为摆脱蒋介石进攻而进行的6000英里的长征的路线行进。

哈里森认为他能发现1936年埃德加·斯诺不曾发现过的东西，我不知他是怎么想的。毕竟，埃德加·斯诺曾经在陕西同毛泽东、周恩来等许多人谈过话，并获得了内幕消息。而这些人现在都逝世了，我看幸存者不会很多了。一想到要在中国呆三个月，其中至少有两个月要去非常原始的地区，就使我充满了忧郁。要是我们处在去罗马的途中就好了。

多年来，哈里森一直经常与杰克·谢伟思讨论这样一个行动计划。谢伟思出生在中国的一个传教士的家庭，在美国上完中学和大学之后又回到中国，最后成了美国国务院的一名

中国问题专家。在五十年代麦卡锡时期，他被解职了。他向法院起诉，官司打赢了，又重新任职。但这场官司历时数年，花了许多钱。在那几年里，他不得不去干所能找到的任何打零工的活计。复职以后，他被派到"西伯利亚"，即在英国担任一个小小的职务。退休以后，他就住在伯克利。

哈里森一直在往中国写信，要求允许我们进行这次旅行。但他却得不到肯定的答复。对此我倒是安心和高兴的。去年8月电话终于来了。这就是8月17日我在康涅狄格所写的日记：

正当哈里森外出时，中国使馆的一位先生来电话要同他讲话。他回电话时，那位先生说，中国人邀请我们沿着长征的路线旅行。

我简直不能相信会有这回事。早在1971年，哈里森就动过一次小手术。当他躺在车上从手术室推出来时，就含混不清地对医生说着去长征的事。他连做梦也一直想着要去，并和杰克·谢伟思多次讨论过此事。如今杰克犯了一次心脏病，他的妻子是不会让他去的。我也不想让哈里森去，但是我劝阻不了他，显然我得同去才行。

就在几天前，他从《中国日报》上获悉，一位71岁的前美联社记者（霍尔多·汉森）和他的妻子，曾经乘公共汽车、飞机和吉普车去过这条路线中的几段。因此，哈里森就给所有他在中国认识的人——驻华盛顿的大使以及他能想到的其它中国人——写信说，如果汉森先生能去，或许他也能去。他写的这些信还没有来得及寄到华盛顿，中国的答复就来了，这真是一种令人惊奇的巧合。

显然，他是非常兴高采烈的。他除了重读埃德加·斯诺的著作以外，别的什么也不考虑。他说他将在我们二月去意大利之前撰写回忆录第二卷和那本关于东线战争的书。看起来，我们似乎要按计划先前往意大利，在回家休息两星期之后，就去进行长征。

哈里森说，他意识到我并不象他那么热心!!然而他表示，如果我不去，他无论如何一个人也要去。他说："但是，我想不出有任何别的事情比同你一道去长征更新奇的了。"这决不是我的浪漫主义想法。

所以，我们从此将环绕半个世界去进行一次七千多英里的旅行，穿越荒僻地区，那里有危险的高山和布满沼泽的草地，还要跨过水流湍急的河川。哈里森七十五岁了，还带着起搏器；再过两星期我也年届七十；杰克·谢伟思（他的妻子让步了，但不与他同行）是七十四岁，虽然几年前犯过一次可怕的心脏病，也将与我们同行。我想我们是发了神经病，不管我们是否会活着回来。毛泽东在长征开始时才四十岁，差不多在参加长征的人中是年纪偏大的，而多数战士才十几岁或者二十出头。当然我们不会长途跋涉、风餐露宿，也不会去打仗，然而仍不能不说这是一次困难的旅行。

我们前次中国之行是在1980年，当时我曾多次生病，筋疲力竭。我对我所服用的药物有过敏反应；直到我回家以前，我一直咳得很厉害。咳嗽是由于中国西北部非常干燥的空气引起的。象我们那种走法，一天也不休息，如果我俩有一人生病，我们就不得不真正"拖着脚步"走。这是在我们上次旅行时关于我的现实主义的写照。那次我们走过丝绸之路的大部分路程，看了敦煌的佛教石窟和吐鲁番，几乎到达了亚洲心脏地区的苏联边界，穿越沙漠，经历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酷暑。我们回到西安，又从那里出发到成都和西藏，最后出境到尼泊尔。

但是这次，我做了对付任何疾病的准备，带了各种我可以接受的药品。我还带了一捆防烟雾、尘土的、随时可以使用的

口罩。我们也经常注意饮食安排。因此我应该能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哈里森很少生病，唯一令人担心的是他的心脏。他的心脏病没有发作过，但心跳太慢，而且心率不齐，所以近十年来他带着起搏器。然而他还是强壮和精力充沛的。虽然我不能一眼就看到光明在前面，但我必须强使自己去往好的方面着想，而不是去细想可能发生的（大概不会发生的）灾难。

首先，这是哈里森的一次很有意义的旅行。我从未看到有哪一项行动计划使他更激动、更入迷。和他去年 8 月所说的相反，他既没有动手写他的回忆录第二卷，也没有写那部关于战争的书。我们取消了意大利之行。除了睡觉以外，在工作时间内，他分秒必争地阅读有关长征的材料，晚上他梦见的很可能也是长征。他的热情也多少感染了我。我知道这次旅行对我也是很有意义的，但是中国革命并不能使我怎样激动。从形势上看，我相信中国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我也认为，除了"文化大革命"耽误的那几年外，中国人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教育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医治疟疾等多种疾病和消除吸毒、以及让普通老百姓过上美好的生活方面，都创造了奇迹。

展望我们即将进行的长征，用科尔·波特的话来说，"丝毫不使我激动"，而是使我感到惊恐。

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我心里多少是有点数的。不管个人生活如何困难，大概总不会比我们以前在蒙古和西北地区的遭遇更困难。有了良好的开端，就是成功的一半。1972 年我们第一次旅行时，从北京到西安，然后赴延安、安阳、林县、武汉、长沙、韶山，又回到北京、上海、广州，去的都是些大城镇。我们住的是旅馆和现代化的宾馆，只有参观个别公社或从一地到另一地的中途，我们才去过农村。我们大部分时间

乘火车、飞机旅行，偶尔才乘小型客车。

1977年的第二次旅行则大不相同。虽然在华旅行的开始阶段都一样：先在北京住上几天，会见重要人物和制订计划。我们先到东北参观大庆油田、哈尔滨；在内蒙古，我们访问了呼和浩特这个美丽的绿树成荫的首府，然后去锡林浩特，一直到达当年中国人允许我们去的最接近北方边界的地方。后来又到了上海、位于美丽的西子湖畔的杭州、广州，然后回国。在农村和在内蒙古，那些对我来说可谓"骇人听闻"的条件我们也习惯了。对所有这些不便之处我确实是毫不介意的。毕竟中国人总是给我们提供了比他们自己更好的生活条件。在所有这些地方，我们的享用都是当时最好的。

想到这一切，使我意识到，自 1966 年以来，全世界我去过的地方是够多的了——大概我在中国及其周边国家和在苏联所看到的，要比任何一位美国妇女要多。对一位生长在波士顿的人来说，纽约好象就是另一个世界，大不相同。我父亲当年就是那样。他只去过一次伦敦，七十年的时间去纽约也不过十次。去干什么？波士顿什么都有。我并不想要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世界旅行家。可哈里森却经常对我说，我是这样的旅行家。我愿意作为一位母亲、一位祖母、一名妻子和主妇，我喜欢所有这些身份。我从来不认为我有哪一点不如男人，但我也不认为照顾家庭不如在办公室工作或当银行总裁那么重要。我完全赞成妇女要有她们的事业，但是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无论怎样，我现在又增加了一个身份，那就是著作家的身份。但从根本上说，我是以家庭作为生活中心的。

我们将有一个月的时间在北京做准备工作。在此期间，我们希望会见一些高级人士，并尽可能地多会见长征的幸存

者。过去我们曾和周恩来一起进过餐，把孙逸仙夫人（宋庆龄）当成亲爱的朋友。我们同许多到过我国、来我家走访、同我们一起度过假日的中国人的关系都变得密切起来。

可是，我对到中国和苏联旅行已经感到厌倦了。如果我们就这样东跑西颠的话，我宁愿去意大利、法国和英国，住在豪华的旅馆里。再就是去我们俩都未曾到过的希腊。我不愿离家三、四个月。一想到春天我不能在自己的花园里养花种草，不能看到我们辛勤培植的黄水仙和牡丹开花，真令人沮丧。

不过，象我往常处事那样，当我不愿参加某种宴会而结果又过得极其愉快时，也许我会感到惊喜。

1984年3月2日
中国北京北京饭店

我们于昨晚中国时间十点半抵达北京。虽然我有些担心，还是受到外交部新闻司李湖明先生的迎接。我们顺利地过了海关，取出行李之后，马上坐上一辆适用于英国的右驾驶盘奔驰轿车。我们乘车到一个新的大型旅游饭店——燕京饭店。我们在一间非常漂亮的房间过夜。李先生一再道歉，说这家饭店只是供旅游团住的；明早他会安排我们搬到北京饭店去。他确实这样做了。不过我们两人都睡得很好；如果不是哈里森叫醒我，我会睡上一整天。早饭我们吃的是烤面包，配上味道鲜美的草莓酱。搬到北京饭店来后，我们住到一间阳光明媚的房间，打开了全部行装，原以为忘在纽约床上的钥匙也找

到了。

到目前为止，这里总的气氛似乎同任何地方的旅馆一样。看起来人人都感到轻松，而且许多人显出高兴的样子。中国的姑娘们或者留着马尾发，或者卷发，有的显得太蓬乱些。燕京饭店的服务员们身着别致的褐色制服，脚穿棕色带皮袢的高跟鞋——总之非常漂亮。

六点钟我们乘车来到宾馆区同钱其琛副外长共进晚餐。他定于本月十一日去莫斯科会谈。我们新认识的李先生和新闻司司长齐怀远出席作陪。这位高个子年轻人李先生是一名翻译，他很想陪我们一块去（钱先生说，年轻的和年纪大的，谁都想去）。所有在座的都会说英语，但在晚宴之前，钱先生说中国话，通过翻译交谈。他说我是一位很勇敢的妇女。

晚宴精美雅致；不敬菜。我没有样样菜都品尝（我做不到这点），对此主人并不介意。我不吃鲍鱼和海蜇一类的东西。女服务员动作麻利，一下子就把盘子收走了。我们刚吃完饭，钱先生就说：“你们旅途一定累了。”所以我们很快回到房间，又睡了足足十个小时。

3月3日　星期六

今天早晨我们去就餐的时间太晚，所有餐厅都关门了。我们就在1980年来访时通常就餐的大餐厅后面的“值班餐厅”用餐。现在在这里用餐的几乎全是日本人。餐厅供应自助餐，吃的是中国式早餐的美味食品——有鱼干、花生米、腐乳、泡菜等。各种蛋都是热的，还有烤面包、黄油、果酱和水果。

我们出门散步片刻，因为尘土太多，我只好把鼻子掩住。后来有几位中国朋友来看我们。

3月4日　星期日

今天我们参观了现在作为博物馆的宋庆龄故居。陪同我们去的是1972年给我们当翻译的姚伟。同大群的中国人一起走进那座红漆大门（仍然有几名战士守卫着大门），买了门票，然后同一大批普通老百姓一道进去，这是我们不曾经历过的，不象过去我们到那里参加宴会时那样。我们步行入内，我弄不清接待我的那位先生是谁，便问姚伟，姚伟说他现在是这所博物馆的负责人。他热情地迎接我们，带领我们大家参观展品，解释得很详尽。然后领我们上楼，到宋女士的私人住所。她的卧室是一间正方形的房间，里面摆着一架竖式钢琴。在钢琴坐凳上有几张乐谱——《国王和我》，《白毛女》中的一个乐章。在她的梳妆台上还摆着几瓶香水，一瓶是雷尔冯查利牌香水，其它几瓶是什么牌子的我看不清楚，没见到我1980年给她带的那瓶乔伊牌香水——但愿她曾经使用过而且喜爱那瓶香水。

盥洗室也很大，浴缸、抽水马桶和洗脸池都是浅绿色的。书房在盥洗室的另一侧。在书柜里，同其他书籍一起陈列的有《九百天》、《到北京以及远方》、《亚洲日记》、《中国日记》。有哈里森的著作陈列在那里，我并不感到奇怪，但一发现其中也有我写的两本书，则使我大为惊异和激动。

过去我们从未上过楼，也不曾白天来过。当年建造这所

宫殿的皇帝肯定住得舒适并欣赏了这里的美景。在春夏季节，庭院一定很幽美。院内有许多池塘和小桥，岩石堆成的假山和种植花卉的园地。

展品精心汇集了宋女士的生活照片；但也有一些她临去世前重病卧床的照片，鼻子里插着管子，身上还系上一些别的东西。我认为摆上这样的照片是很不合适的。同毛泽东一样，她也有一具大型的玻璃棺。

我们饶有兴趣地发现，由她监护的两个人约兰特和珍妮特的照片没有陈列在那里。

我们又一次步行到那条商业大街，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真是寸步难行。我对姚伟说，我简直无法越过这数以百万计的人群，他回答说："这同塔科尼克*是有点不一样。"

晚上，艾德勒夫妇——索尔和帕特——邀请我们到他们最喜爱的新侨饭店就餐。索尔出生在伦敦一个俄国犹太人的家庭，曾在伦敦经济学院上学，(罗斯福总统的)新政时期前不久到了美国。他是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在美国财政部工作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派到重庆任财政部驻那里的首席代表。战后他回到华盛顿，仍在财政部工作。在对共产党进行政治迫害的麦卡锡时期，他遭到控告和调查之后，决定到中国定居。象马海德和路易·艾黎那样，他也是一位外国友人(指的是那些同情中国革命——有些人甚至为中国革命而工作——以后在中国定居的外国人)。帕特是英国人。在《中国日记：毛泽东逝世之后》一书里，我曾写道："索尔是怪僻的英国人的化身——高高的个子，有点驼背，长头发，下边剪得整

---

* 美国佛蒙特州的一个山区——译者注

整齐齐；穿着宽松下垂的裤子。他一边说话一边不断地做手势。"现在一切依然如故。

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艾德勒夫妇在北京的住宅受到破坏，无法再住，曾在这个饭店里住了好几个月。他们现在住在鼓楼外边一所四合院里，占半个院子。

我们谈笑风生。他滔滔不绝地从一个话题转到另一个话题，饶有风趣。他曾经得了肺癌，部分切除肺后，伤口受到感染，一段时间情况很严重。他说，如果没有帕特，他已不在人世了。整个住院期间，帕特一直在医院陪住。她对我说，当时要求家属陪床照料病人。每层楼都有一间厨房，所以她带着家用搅拌器，特地为他做些他能吃的食品。她抱怨护理条件差(或者说，谈不上有什么护理)，就象我们自己搞护理那样。护士只是张罗张罗或者打打针而已——没有任何病床上的照顾。她说，护士根本不考虑怎样使病人舒适些。

3月5日　星期一
于北京饭店我们的房间里

哈里森正在就长征问题采访王愿坚。王先生生于1929年，长征时，大约只有5岁。他是一位作家，主要写关于长征的小说和电影剧本。《一个普通劳动者》是他的一本小说集，他创作的电影《四渡赤水》几个月前刚上映。

哈里森说，他弄不清为什么长征开始时毛泽东被迫"靠边站"(有点象软禁)。王先生说："说来话长咯！"然后格格地笑。哈里森说："是啊！不过这是很有兴趣的。"当时的情况似乎

是，共产党被一个名叫王明的年轻人所控制，此人当时住在莫斯科，从俄国的共产国际那里接受指令。共产国际被认为是促进世界革命的，斯大林却使之成为苏联军事和外交政策的工具。年轻的中国人不懂得这一点，共产国际当时在中国革命队伍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和权威。共产国际曾以提供经费和在军事、宣传方面提出顾问性意见的方式帮助过孙逸仙博士。共产国际也参与了创建广州黄埔军校。在早期的黄埔军校，蒋介石和周恩来曾并肩工作，共同反对中国的封建军阀。共产国际派了一位名叫奥托·布朗（中文名李德）的德国人来中国指导共产党的军事行动计划。不久，毛泽东就被强行靠边站，但在一段时间内，周恩来和朱德（他曾是毛泽东的左右手）附和过布朗和共产国际的政策。

可是，正如王先生向哈里森说明的那样，情况日益恶化。由于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红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毛泽东和朱德赢得的土地大半被丧失。而毛泽东的建议仍然得不到重视。他已经开始这样提出问题了：红军象个叫化子，而国军（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则是皇帝。

王先生说，仍然没有人重视毛泽东的意见，以致形势迅速逆转，红军别无其他选择，不得不撤出毛泽东创建于江西南部的中央苏区。为此制定了秘密计划，不让任何人知道。

例如，当时受伤住院的共产党伟大将领之一陈毅就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他只注意到有许多战士在庭院里齐步行进，便问周恩来这是怎么回事。周恩来告诉陈毅，他们不得不放弃根据地，从蒋介石的进攻面前撤退。他没有告诉陈毅这将会是一次“长征”，因为他和其他任何人都不曾料到这次退却竟会持续整整一年之久。

王先生说，周恩来得到一个对陈毅不利的消息，陈毅将不参加长征，而是留下来负责指挥中央苏区的后卫队。象一名伟大的战士，陈毅接受了这项使命。可是为时不久，他不得不带着少数战士逃进深山里。蒋军烧杀掳掠，洗劫了中央苏区。

仅仅约八万名男子（和少数妇女）撤出来参加长征。

哈里森问到那时毛泽东是否真的被软禁了。王先生说，没有。但是其他许多人仅仅因为他们是毛泽东的支持者而受到惩处，其中之一就是中国现在的领袖邓小平。他被解除了职务，送到农村去干体力活，在长征开始时没有给他配备马匹，他只好自己扛着行李。他被责令进行"自我批评"——在公众集会上承认自己的错误，他拒绝了。我很惊奇，这种事情早在那么多年前就发生过。显然，玩弄阴谋和运用欺诈手段争夺权力早就开始了，而且一直未停止过。

1934年11月在周恩来领导下，在湘江渡口进行了长征中第一次大的战斗之后，兵力大约丧失了一半，仅仅剩下三万人。听了哈里森和王先生交谈之后，我真不知道我能否弄清楚这么多军队的番号——一方面军、四方面军、三军团、五军团、九军团、三十军等等？弄清楚打过多少次仗？渡过多少条河？当然这只是第一次采访，也许以后我听得多了，读过更多的材料，实地看到那些战场、河流、草地、大山，我会更好地了解长征。哈里森认为长征是当代历史上最令人感兴趣的英雄故事，而迄今为止，对我来说却只不过是一堆杂乱无章、稀奇古怪的人名、地名和事件。

3月6日　星期二

今天上午8点45分我们到了军事博物馆。一个上午都在看图片、地图，听取三位专家对长征的介绍。李湖明因忙着安排我们的行程，由另一位年轻人郑先生陪同我们。他在檀香山杨伯翰大学学习过，也去过盐湖城的摩门教教堂。如果在1972年有谁提议干这种事情，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那时我问一些中国学生喜欢到哪些国家去访问，他们回答说，只希望到“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去，那指的是北朝鲜、北越和阿尔巴尼亚。

博物馆的馆长是一位英俊的将军，他就是同我们交谈的三位专家之一。因为当时红军忙于作战或者尽快赶路，几乎没有留下多少关于长征的档案。

在这里又听到一些使我引起混乱的名称：十九路军（又一个新的部队番号）、“碉堡”、“第五次围剿战役”。我们听到更多关于奥托·布朗的情况以及关于毛泽东重新取得领导权的遵义会议。这么多次战斗、这么多将军、军阀使我困惑不解。

3月7日　星期三

很难做到每天晚上都写日记。但我必须养成这种习惯。在家时，如果我累了，就往后拖。但这次旅行不能这样做。

李湖明说，今天是“自由活动日”。这一天过得真不错。上

午我给哈里森缝补袜子，学了一种新的编织法，并阅读埃德加·斯诺的作品。我们外出散步，天气真美。通常我们六点半或七点起床时，烟雾就令人不快。一些工厂和家庭都烧煤，车辆也比以往增加了不少，还有从戈壁沙漠吹来带尘土的风。我戴着一条将鼻子和嘴都捂住的头巾。许多中国人都带着口罩。

3月8日 星期四

上午一位新的李先生来见我们。我们步行到位于天安门广场一侧、人民大会堂对面的革命博物馆。1980年我们来过这里，记得我当时厌烦极了。现在的全部展品仍然是那些图片，同样是大渡河上铁索桥的那几段索链，同样的革命旗帜，同样的服装、炊具、食具，原始的战斗工具，以及从国民党手中缴获过来的枪枝等等，但这次因为我们集中注意力于长征，所以现在我对这些东西较有兴趣了。

午饭后我们步行到北京医院去拜访路易·艾黎。他因轻微的肺炎而住院，但这种病不需卧床休息。我们认为，他看起来是健康的而且非常活跃。他已经八十七岁了，经常给哈里森写信，给他寄去一本又一本关于长征的书。他深为我们的行动计划所激动，因为这项计划很符合他的心意。

路易·艾黎是以一位牧羊农民的身份在新西兰开始他的生涯的。二十年代羊毛市场跌到最低点时，他当上了海员。在上海登岸几天，他当时就被中国的风光吸引住了。除了去新西兰访问过一次以外，就再也没有回过老家。他长得胖墩墩的，

满头银发，说话非常温柔动听。直到最近，他每年总有半年时间是在旅行中度过的，这个广袤的国家的每一寸土地，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是一位诗人，为许多杂志写文章和拍照片，包括《东方地平线》和《中国建设》。他曾为中国孩子们创办了一所学校。有许多他过去的学生来看望他。

3月9日　星期五

为这次重要的旅行所订的计划似乎进展顺利。杰克·谢伟思定于3月16日到达，我们将于4月3日开始我们的长征。行程将持续两个月，因此至少在6月10日以前我们回不了家。我们肯定赶不上看所有早期盛开的花朵了。

今天上午我们乘车去军事科学院。在那里哈里森同长征的另一位参加者肖克将军谈话。该学院位于西山脚下，离颐和园不远，对许多人来说是不得进入的。外交部不得不为我们取得特别许可证。

我们受到三位彬彬有礼的军人的欢迎，其中一位用英语说："肖将军很抱歉不能来欢迎你们，因为他必须参加一个会。"我以为事情就这样了，他大概根本不会露面。可是我们在一间冰冷的房间里坐着时，他还是来了。那个房间布置着一些罩有棕色棉布椅套的扶手椅，旁边和前面摆着几张桌子，构成一个长方形。

肖将军是一位和蔼可亲、作风朴素的人。他没有佩戴徽章，穿着同其它人一样的制服，不论是军官还是普通士兵都一样，我喜欢这种做法。看到美国和欧洲的军官佩戴着肩章和

表示等级的条纹，前胸被勋章遮掉了一半，我很反感。

在交谈中他和哈里森发现，他们俩人都是1908年出生的。肖将军说，中国人认为同庚人之间有着特别的关系。他们交谈了两个多小时。当他对一个问题谈得兴高采烈的时候，他派人取来两幅大地图：一幅挂在架子上，另一幅放在他面前的桌上。他说，他出生于湖南省靠近与广东省交界的五岭山脉。他的家庭出身是“小知识分子”，他曾任驻扎在湖南的六军团军团长。1934年8月长征开始之前，他就出发去与贺龙和二军团会师。走了两个月才到达。开始时他手下有九千名战士，在10月以前，他虽然突破了国民党的封锁并与贺龙会师，但他的军团却因伤亡、逃跑、生病减员了五千人。

他说，开始时他的军团只有一张学校上地理课用的小地图，根本不知道自己到了什么地方。每到一个乡村，战士就去向老乡了解有关农村的情况，然后根据老乡所谈来制订第二天的计划。后来他们在一个教堂里找到一张法文地图，谁也看不懂。肖克将军和一位会中文的法国牧师整整一个晚上没有睡觉，把地图上的地名全部用中文写下来。我说，那位牧师一定是同情你们的事业的。肖将军笑着说：“你也许可以说，他是被软禁了，那位牧师听都没有听说过什么是红军”。

他说，当他们到达藏族人居住的地区时，人民友好且乐于帮忙。我们也听过和读过与此相反的另一种报道，说少数民族曾掠夺红军，不喜欢汉人。

肖克将军写过许多诗，以儒将著称。他送给我们几首诗，我们一定将这些诗翻译过来。

这位将军是经历过近代中国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惊险事业的英雄之一，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处于困境，被送到农村劳动

了两年。在归途中，我在车上说，我不能理解这样的事情：一位英雄军官竟然会受到这种对待。我们的翻译说，“很可能是因为他没有站在林彪一边。”自从“四人帮”的狂热过去以来，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中国人提到林彪的名字。

我们刚从马海德家参加晚宴归来。马海德是一位出生在纽约布法罗、原籍为黎巴嫩的美国人。三十年代作为一位年轻的医生来到中国。同许多其他外国人一样，他被卷入了革命，长征刚刚结束，他就到了保安，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部领导人，因而决定留下来，并给予帮助。他同一位中国女子苏菲（她今天比当年结婚时更漂亮）结了婚，并建立了中国式的家庭。

他坐了他那辆由司机驾驶的宽大的汽车来接我们。中国政府对待外国友人非常好，现在这些人年老多病，象艾德勒、路易·艾黎和马海德（他患有癌症，目前有好转），他们都有房子和汽车，生病时受到最好的治疗。我认为这是非常出色的。我不能想象美国政府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给那些担任过总统的人提供数以百万计的美元，和众多的保安人员，可是出自内心的关怀却什么也谈不上。

马海德住在一所很舒适的四合院，同宋庆龄的房子在同一条沿湖的街上，只相隔几个门户。他掏出钥匙开门让我们进入，走过一条大约 25 英尺的入门通道，上几级台阶之后，进入另一条狭窄的露天走道。他指着两尊小的雕像给我们看，其中一尊是明代的；两尊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破坏，我们还可以看到榔头的痕迹和新嵌入的石头的印记。向右拐我们走进一个大院子，内有四个花圃和菜圃，一只灰色的小皮毛兔在一个园圃里吃草，没有栏圈，也没有栅栏。所有的房间都

在院子周围。马海德说他一天能睡上十二小时。

他的漂亮的妻子不会说英语，小孩子、儿媳妇、儿子(那天他不在家)也都不会说。他给我斟上非常好的烈性白酒，这使我想起了有人说过中国白酒是世界上最好的。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饭。除了炸虾饼外，没有其他海味，蔬菜、肉和汽锅鸡汤的味道都很鲜美。虽然有点油腻，但很好吃。饭后马海德和哈里森在交谈，我看霍尔多·汉森著的一本书，书中收集了他在 1938 年至 1939 年担任美联社记者时在延安写的报道和拍摄的照片，这是一本令人神往的书。有些照片比我在出版物中或在这里的博物馆看到的照片都好。对当时这样一位年轻的新闻记者来说，那一定是一种令人激动和浪漫主义的时刻。

3 月 10 日　星期六

今天上午，外交部新闻司另一位很严肃的年轻人陪我们去参观一所 1974 年发现并在随后不久发掘的古墓。该墓位于北京西南约 7 至 8 英里处，是一所汉墓（年代约为公元前 211 年至公元 220 年)。除墓本身外，几乎没有保存什么其他东西。仅仅有几块金属，还有些刀子、铲子的尖端部分等。

乘车去这所古墓时，还没有走出城区就看到集约化的农田耕作，真有趣。在多数可耕地里到处是圆顶塑料大棚，一些为城里种植蔬菜的临时性的或冬季温室。草帘子复盖着大棚，朝南的一面卷起来让阳光照射，晚上再放下。当室外可以种植的季节到来，冬季作物收获之后，塑料布就收起来。这些

地块又重新施肥耕种。多数地块面积太小，不能使用拖拉机，因此作业还大体是手工操作。

即使离市中心不远的地方，也有许多人骑着自行车拖载货物。看不到什么动物——没有狗，没有猫，也没有牛；仅仅有几只鸡、一只鹅和几头猪。牛一定是圈养在什么别的地方了。现在大肆宣传要人民多喝牛奶。每天早饭时我都能喝上最美味的酸牛奶和热奶加咖啡。中国人不象我们那样喝牛奶，他们将牛奶加工出来供儿童食用。我不知道这种宣传喝牛奶的运动能取得多大效果。牛奶好象不大适合中国人的口味。

在一个角落，有一条大标语：“为治理农村出力——使农民致富”。当然是用中文写的。

刚吃完晚饭，黄华先生和夫人何理良来看我们。谈了许多关于长征的事，也谈到我们这次长征和哈里森所进行的采访。我没有参与谈话的全过程。1936年埃德加·斯诺在延安时，黄先生给他当翻译。黄华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当年很多人去延安都必须经过西安，驻在西安的少帅（张学良）表面上站在蒋介石一边，却同情和帮助共产党人。即使到处国民党军警密布，共产党人还是有办法让许多想去延安的人通过西安。士兵都穿一样的衣服，很难分清谁是谁。一次黄华住在一家旅店，正等待和人接头，突然两名国民党警察在前门驻守，还有两名跑到他的房间。他们要检查黄华的皮箱、文件，大声喧嚷，使得其他房客都跑到大厅里来看热闹。黄华说，旅店房间就是他的家，警察无权进入或检查他的行李。接着黄问警察是否知道某某小姐快结婚了；那位小姐正好是警察的朋友，所以他们就不再骚扰他了。然后，黄把警察请到他的房

间里，并说："我的皮箱就在床下，请看吧！"警察感到尴尬，觉得黄华是他们的朋友，便放过了他。

第二天上午黄告诉旅店经理，他打算去游览。离开了旅店，他同要会见的人接了头，然后坐上一辆军用卡车出城，从此就到延安去了。

我们谈到俄国人怎样错误理解中国革命，如何单纯从俄国人的观点来看待中国革命。他们不能想象农民革命会成功；而毛泽东知道这正是中国革命的道路。毛泽东被靠边站，由王明及 28 个布尔什维克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决定政策，这就是红军遭受损失的原因。

3月11日　星期日

今天上午《纽约时报》驻京记者克里斯托弗·雷恩和夫人杰奎琳开车接我们到贝聿铭设计的新旅馆香山饭店。如果没有那么多电线和电线杆影响视线，如果路边没有堆放那么多杂物，驱车旅行会是很惬意的。

这家饭店富丽堂皇，半遮半掩地建在山脚下——只是因为饭店太大，才没有全部被山林遮掩住。从树林中隐约可以看到山上的一些庙宇和古老的房屋。我对这家饭店感到失望，可是哈里森却不这样看。一旦人们驱车来到两边都是高墙的大门口，它既雅致又雄伟，给人印象深刻。我赞赏修建得十分漂亮的门庭，但我对右边那扇墙特别反感，它把山隔断了。虽然我知道这是中国式的做法，可是我仍希望在院内也能看到山。我想建筑师有时会妒嫉自然景色，总想把它锁住。人

们穿过那个大厅，往后走进花园，在那里当然可以看到山了。

室内就象华盛顿国家画廊的那幢新楼，广阔而比例匀称。对许多局部的细微末节的东西我是不喜欢的，特别不喜欢木头的那种浅淡的色调。室内陈设同我去过的许多亚洲旅馆差不多。如果采用深色的柚木或者红木那会更漂亮些。我也不喜欢那棕色的坐椅。楼上的餐厅我觉得沉闷而暗淡，因为它完全靠低矮的天花板上的人为灯光照明。那天天气是那么明媚可爱，我们却好象是坐在夜总会里吃午饭，这似乎太可笑了。在女洗盥室，既没有放手纸的轴架，也无处可放手纸，当然也就见不到手纸。我知道这里维修保养很差，中国人没有按建筑师所设想的旅馆那样来管理。不过我的批评主要还是针对设计方面的。

3月12日　星期一

今天是我的生日，七十大寿，这简直是不能使人相信的。正如《范妮和亚历山大》一书中的母亲和祖母说的：当她回顾年轻的时候，禁不住要问“韶华消逝何处？”我们当然十分清楚年华消逝到何处去了，只不过觉得消逝得太快罢了。

今天下午我们又去看望艾黎，这是一次很有意思的访问。他看起来还健康，唯一的问题似乎是低血压，不过这是有药可治的。他希望很快出院回家。我们到达时，还有一位客人在座。那位客人离开后，艾黎对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位先生日子很不好过，他的妻子受罪更大。有一段时间，她绝望到想用剪刀割喉，但被人发现了，又给打得个半死。那些折

磨她的人使她走投无路，那怕是那种痛苦的出路也不给。我们不断听到类似这样的情况，越听越觉得对那个时期难以理解。

我们整装外出吃晚饭。哈里森穿西装，我穿的是绸衬衫和裙子，乘出租车去马克西姆餐厅。皮尔·卡丹在巴黎经营一家著名的马克西姆餐厅，去年他在这里开了这家餐厅。因为哈里森和我都没有去过巴黎的马克西姆餐厅，我们也说不上这家餐馆是否同巴黎的一模一样，不过据说是如此，而且肯定是华丽和十分新奇的。看上去餐厅宽敞而空荡荡的，除了我们以外，有一位中国人独自一人在那里，他身着灰色毛衣，未穿正式上衣；另一桌有 4 个人；还有一桌坐着一个日本人和一名不认识的西方男子。餐厅主任和三名领班是法国人，多数服务员是经法国人培训得很好的中国人。我不知道卡丹先生在巴黎的餐馆是否赚钱，但这个餐厅他肯定连衬衫也赔进去了。也许游客多的时候，餐厅会坐得满些。我知道他在法国拥有八家工厂，也许他就用马克西姆餐厅来作广告和推销，可能是可以免税的。

我们晚饭吃得很好，有更象牛排那样的烤牛肉，各种美味的蔬菜。不管它好不好，每天吃中餐换换口味也是好的。一杯马丁尼酒就要 7.5 美元，半瓶最便宜的酒 18 美元。这是一种美好而又简单的庆祝我的生日的方式！！

3月13日　星期二

我们在这家饭店的生活已经形成一种固定的模式，每天差不多都一个样。早点在西餐厅吃，那里可以吃到水果、鸡

蛋、火腿或咸肉、薄煎饼、酸奶、烤面包加果酱、黄油、咖啡和牛奶。午饭总是在中餐厅吃，因为中餐很受欢迎。我们要嘛在正午之前去，要嘛等一批人吃完，12 点 45 分再去。我们差不多老是吃同样的菜。哈里森喜欢吃大碗的鸡丝汤面；我吃鸡丝炒豆芽、豆腐汤、喝啤酒。在家时我从来不喝啤酒，却喜爱这里的啤酒。有时我吃蒜苗炒鸡。可是哈里森说我嘴里有蒜味，所以逢上要外出参加宴会时，我就不吃这道菜。晚餐也是在中餐厅吃，一般吃猪肉、米饭和蔬菜，没有黄油，也没有甜食。我们饭后到大厅的酒吧间去，哈里森吃一客水果冰淇淋。菜单上有特约预定的菜——就是说要事先定菜——其中一种有趣的菜是西方雪果牛尾汤。

《中国日报》的一位年轻人来采访哈里森，他想写一篇介绍哈里森的文章。这位年轻人曾就读于夏威夷的东西方研究所，可是哈里森对此人知识的贫乏感到大为吃惊。这位年轻人对一个外国人竟然要撰写关于长征的事，觉得很奇怪，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和怎么会对此感兴趣。这位年轻的中国人本人对长征真是一无所知！

四点半我们同雷恩夫妇一道去拜访一对翻译家夫妇。夫人是传教士家庭出身的英国人，丈夫是中国人。他俩因同时在牛津大学学习而相识。他1934年至 1939 年在英国，正好于闪电战*之前离开了。他们现在住的是一套很大的单元房，实际上是两、三套房子打通成为一套的，地点就在外文出版社的后面。显然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受尽了折磨。两个女儿现在都在美国，一个在哈佛大学教英文，另一个在芝加哥，

* 指德国法西斯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和入侵。——译者注

她们都三十好几岁了——属于错过受教育的机会、也差不多错过其它一切机会的一代。两人都有家属在北京，都住在这一扩大了的单元房里。中国夫妇不在一块生活的真多。我们知道一些年轻人到美国去留学，在国内留下妻子和刚出生的婴孩。他们可能要呆两年。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痛苦，许多桩婚姻会难以维持下去。可是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次机会，大家都履行着义务。

我们刚到不久，女主人就表示歉意，说她想用很短的时间洗个澡，希望我们不要介意。因为热水不是天天供应，她洗完后又赶忙放满一浴缸热水，好让她丈夫在我们走后再用。

3月14日　星期三

我们在雷恩夫妇的公寓房里同一批外国记者共进午餐。我最喜欢的是那位在中国呆了十年的南斯拉夫记者。使我感兴趣的是：虽然来自另一个共产党国家，他对中国有关会客的规定和限制以及对其他个人自由的限制，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人们提到邮件是怎样被拆封的，有些人怎样收到信件的复制件而不是原信，寄信到英国去或从英国寄来的信只要四天，而其它国家却要长得多。

3点10分我们到人民大会堂采访前外长姬鹏飞。长征时他是卫生和军需部门的负责人。1980年以来，我们就没有来过人大会堂，那次我们是采访李先念主席。

姬先生现年七十三岁。长征时他才二十三、四岁。他瘦长的个子，戴一副玳瑁色的眼镜，已开始秃顶，但很少白发。开

始他似乎不想谈什么，但话题一展开，谈得还是很起劲。他说现在写关于长征的事比埃德加·斯诺写作时容易多了。博物馆里有不少收藏品，已经开展了对长征的研究工作，而且还在继续做。过去没有路的地方，路也修起来了，好多地方也容易去了。埃德加·斯诺在保安收集长征材料时只能靠采访，靠人家讲给他听；有关的那些重要地方，他一个也无法去看。

姬先生谈到由海拔12,000英尺以上的高原地势所造成的种种困难，许多战士受伤和生病。渡过金沙江，摆脱敌人以后，又要翻越一座雪山。爬那座雪山能在一天内完成。他们从南坡向上攀登，但从北面下山时，全是一片冰天雪地。他们抓住马尾巴，让马慢慢拽着人走。在山顶上休息的人，多数再也站不起来了。他们失去了许多同志，因为天气不好和缺氧，有的被冻死，有的呼吸困难而窒息死亡。在这种情况下。人死得非常快。还有人从山上滑下来造成骨折。姬先生说，当时也无法进行急救——天气太冷了，他们只能帮助还能走的人们往前走。有一支跟随在部队后面的特别分队负责收容掉队的人。据说他讲的情况不够真实，当时许多重伤员不得不被遗弃掉，有时也有些人在与国民党作战时被俘。既使在中央苏区设有医科学校，但也是条件很差的。没有多少真正的医生，也没有多少设备。用沸水来消毒、把理发剪子和刮胡刀用作手术刀。他们主要靠中草药及靠缴获来的药品和供应品。如果战士还活着又不能继续行军，就留下来住在农民家里。

我们耳闻最多的草地，是中国西部（四川和甘肃省）的沼泽平原，在那些适于居住的地方，主要居民是藏族人。他们的前辈为寻找更合适的气候条件，几个世纪以前就离开西藏到这一带来了。我们也要到这些地方去进行我们的长征。我真

有兴趣亲眼看看那里是什么样的。除了沼泽以外，听起来象蒙大拿州，只是地势高一些。

姬先生说，草地的气候离奇古怪，瞬息万变。一会儿晴天，一会儿下雨、下雪、雨夹雪。他们在草地呆了三、四天，很难找到一块坚实干燥的地方宿营。没有树木，只有些小灌木。没有吃的，身体极为虚弱，不少人在夜里死去。过草地比爬雪山损失更大。他说："每天早晨我们都数一下人数"。哈里森问他们当时吃什么？他说带了些麦子，把它们煮熟或炒熟来吃。但是有许多人因为当时无法做饭，吃了不能消化的生粮而致死。有些没有跟上部队而晚到的人不得不煮皮带汤喝，吃皮革充饥。

哈里森问姬先生真是一名医生吗？他笑着回答："业余医生成了专业医生。"哈里森说，他听说毛泽东也病了，是由别人抬着过雪山的。姬先生说，毛泽东没有生病，周恩来过草地时病得很重。哈里森还说，我们听说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在长征途中生过一个孩子。姬先生否认这种说法。不过他说，她当时生病，许多时间是坐担架的。

姬先生说，对他来说，长征中最困难的一件事情，是在泸定渡过大渡河。他是夺取泸定桥的先头部队中的一员。他步行了120公里，过桥时大火正在桥头燃烧。桥上的木板还没有重新铺上，看到下面湍急的流水，真令人害怕极了。

哈里森问他当时是否见到邓小平。坐在姬先生左边的那个人向他耳语几句，然后他回答说："我知道他，虽然我们不常见面。他当时是三军团政委，人们都知道他是负责宣传工作的。"

6 点15分，我们乘出租车到四川饭店，1977年黄华和何理

良曾带我们去过那里。那是一座旧军阀的大型官邸，有许多建筑物和庭院。没有花园，也未种花，但每个庭院都有些树木。他们为我们举行欢迎宴会，吃得非常好。我们坐在一个大房间的一侧，另一侧摆了一张大圆桌。除我们外，客人还有艾德勒夫妇、马海德夫妇；还有姚伟、军事博物馆负责人秦将军、上星期同哈里森相处较久的作家王愿坚、黄华任职的人大常委会的一位秘书阎明复；还有其它几位，包括爱泼斯坦和李湖明先生。

这次宴会象一次家宴。哈里森坐在黄华夫人的右边，我坐在黄华的右边。饭菜极其丰盛，菜一道接一道，为了开胃，汤就上了三次。用白萝卜雕成美丽的天鹅，安上蔬菜和水果薄片做成的翅膀，令人赞叹不已。米酒用小碗盛着放在热水上加温，还有白酒、啤酒、桔子水，至于茅台这种火辣辣的比一般葡萄酒度数高160%的中国国酒，更是没完没了地往杯里斟。

席间用三种语言——汉语、英语、俄语——讲了许多笑话并多次祝酒。阎先生俄语说得很好，在莫斯科时他当过毛泽东的翻译。爱泼斯坦和何女士也会讲（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以及五十年代，许多中国人到莫斯科去学习，所以不少人会说俄语）。这三位加上也会说俄语的哈里森被称之为“四人帮”、“俄国间谍”。

好多位客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都坐过牢。爱泼斯坦这位共产党的狂热的忠实同情者被单独囚禁达四年半之久。

这是一个美好愉快的夜晚。对这一切友好亲切之情我们是不会忘怀的。

3月15日　星期四

今天上午8时15分，我们到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总部与杨成武将军交谈。

他现年七十岁，但看起来不象那么大年纪。福建人，十七岁参加游击队，二十岁参加长征。用了一年另两天的时间，才到达陕西，那时他已经二十一岁了。在我们会见前，我曾在笔记本上写道："他是在林彪领导的军队中成长起来的；长征中率领过一个团；在反对蒋介石和以后的抗日战争中战功卓著。1959年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67年受到林彪排挤和打击。"有人曾告诉哈里森，在1967年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毛泽东和林彪都指责过杨成武。

哈里森说："我们虽系初次见面，但我还是很熟悉你的；我读过关于你在泸定桥上横渡大渡河的事迹。我想，这一定是整个长征中最困难的。"杨将军说："它在战略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是一个关键性的据点。当时形势非常危急。"哈里森说："如果你们当时没能渡过那座桥，你们很可能已经被消灭了。"杨将军说："是呀，蒋介石的飞机在那个地区散发传单。传单说，他们会象清王朝军队消灭太平天国最后的那位翼王石达开那样消灭我们。石达开所有的人都被杀了。"（哈里森告诉我，石达开被抓到成都凌迟碎剐至死。）"那种困难是我们根本无法设想的。"

杨将军的《长征回忆录》一书于1982年出版。他不仅力图如实地记载长征，而且如实地反映农民和农村的生活。他写

过一首描写攻克泸定桥那天夜晚情景的诗。

泸定桥过去和现在都是凌空高架于山间急流之上的吊桥之一。我曾渡过锡金北部的几座吊桥和中国成都附近著名灌溉工程都江堰的一座。泸定桥有十三条粗重的铁索拴在河岸两边的石头上；其中底下并排九条作为桥面，两侧各两条作为桥栏。（埃德加·斯诺写成十六条铁索，那是不对的。）原来桥面上铺着木板，但敌人将绝大多数木板搬到桥的一端远处烧毁了。第一批渡过去的是二十二名志愿队员。他们是废寝忘食连续行军120公里，赶在河对岸敌人增援部队到达前，才跑步抵达桥头的，渡桥于下午4时开始。这些年轻战士(路易·艾黎说，大多是十几岁或刚刚二十出头)在国民党军频频袭击下，手持步枪，腰缠手榴弹，胸部贴着铁索爬行，或一把一把地用手攀着过了桥。这一情景真令人提心吊胆。仅仅有三人牺牲。黄昏时，桥被占领，敌人溃逃了。

杨将军是这个先遣队的领导，也是在桥被占领后第一批过去的人员之一。午夜，他护送刘伯承到现场，刘说："啊，泸定桥！现在我们胜利了，但我们作出了多大的牺牲！"其后不久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都赞扬了这个团。杨将军说，他把这次攻击称为"飞夺泸定桥。"

哈里森问当时蒋介石是否用飞机轰炸，杨将军说："许多飞机扔了炸弹，但比其它地方少得多。"哈里森问到林彪时说："林彪未被提到过，我知道这是一个微妙的问题，但是在那些日子里他是否是个好的指挥官？"

杨将军1931年就认识林彪。1932年林彪任一军团的军团长。杨将军承认，林彪是有能力的，他说："我不能说他是个拙劣的指挥官，但他政治上不强，非常动摇。"

哈里森问他是否遇见过邓小平。是的，他是杨的司令官。“他个子不高，为人谦和。”哈里森问到周恩来是个好领导吗？杨讲：他是个很了不起的领导，他对创建红军作出了贡献，他有丰富的政治理论知识和实际经验，是一位在多方面有教养的人。很明显，杨将军非常敬佩周恩来：“他赢得我们所有人的高度崇敬，也受到热爱”。

当杨将军提到周恩来对下级人员如何平等相待时，我想起了1972年我们与他共进晚餐的情景。周恩来说：虽然他坐在餐桌旁，服务员服侍他，这只是他们的分工不同而已。饭后服务员和他一起出了大门后，大家是平等的。

哈里森说：他为周恩来在长征中的活动的书出版得如此之少感到惊奇。在每一次会见时，他一再提到这件事。我不知道我们是否会得到说明。

杨将军说：周恩来没有参谋长的头衔，但实际上他是参谋长。在过草地时他得了传染性肝炎。哈里森曾在什么地方听说毛泽东在长征中生过病。杨说：据他所知，毛泽东没有得过任何严重的病。杨本人得过伤寒，他病得那么厉害，以致每个人都来和他告别。但他还是康复了。他受过三次伤，两次是在长征途中。人家给了他两块耐洗的布做绷带，但没有消毒剂。

杨将军这样一位真正的红军英雄，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入狱七年。他被莫须有地指控为曾下令殴打江青。他说：“当然，这不是真的。”哈里森回答说，那倒是个好主意。这句话引起一阵笑声。

3月16日　星期五

我快读完《西行漫记》了，还读了几本很动人且富于人情味的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哈里森日夜用打字机打下他的笔记，而我将等回家后一下子打完这本日记。

今天上午我们又很早就去北京大学，和共产党党史专家向青教授交谈。他高高的个子，长得也俊秀。哈里森以为他才三十多岁，我认为他有五十岁了，可是与我们一起的一位中国人认为他已六十岁出头。大多数中国人的年龄并不象我们那样容易显出来，而是难予判断。

哈里森说：明年是长征五十周年，周恩来在长征中的作用仍没有文字记载。向教授说：当年边远地区没有报纸记载长征的细节。又说："我们现在的情况也是一样。"他也希望有些档案资料才好。

哈里森提到一位党的历史学家徐孟秋，1936年前后斯诺见过他。徐曾告诉斯诺他们说，他收集了七百多份有关长征的文件。但据哈里森所知，那些文件一份也没有人见过。哈里森总希望想方设法见到这批文件中的几份——怎样才能见到，我不能想象。向教授提醒说，徐先生已"背叛了革命"，是个叛徒，因而他和他的所有著作被清除了。

向教授计划七月份去芝加哥大学，在那里研究政治学六个月。

这次会见是在司徒雷登过去的住房内举行的，他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前，曾任燕京大学校长多年。燕京是1898年美国

人创建的一所教会大学，1949年后燕京大学由北京大学接管。但是他们给我们的小册子里并没有提到美国。司徒雷登博士任大使到 1949 年；直到 1979 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他是在大陆上的美国驻中国最后一任大使。

哈里森向每个人打听邓小平的情况——问及下述情况是否真实：他早在1934年就因为支持毛泽东而遇到过麻烦，被送到乡下，但他仍拒绝承认错误，坚持己见。所有人都说这是真的。哈里森喜欢这个故事。

午饭后我们又驱车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总部，与另一位年老的长征幸存者肖华将军交谈。我说这些人“年老”，他们中大多数人其实同我的年龄差不多，有些还年轻些。我们是都老了，由于他们经历过这么多事情，这些人似乎更老些。

肖华将军（1985 年 8 月他逝世了）矮胖、秃头，态度很友好。他是《红军不怕远征难》诗集的作者。这些诗被谱成歌曲，为千百万人所熟悉。《长征组歌》在学校演出，很多年轻人是从这些诗歌中了解长征的。“文化大革命”时，这些歌曲被禁。哈里森推想，作者也被监禁了。肖将军说：“是的，”他被监禁七年半。我们问，他在狱中能否唱他自己的这些歌，他答称：“那里有看守；我只能在心里唱。”1976年周恩来临死时，要求再听听这些歌曲，而“四人帮”拒绝了。竟然干出这样缺德的事！肖将军谈到他自己：“‘四人帮’千方百计企图置我于死地”。他说：“四人帮”没有参加过长征，这是真的，但同“四人帮”勾结在一起的林彪是参加过长征的。

他谈到了军阀，说他们有两支枪，一支是真枪，另一支是大烟枪。他的团曾经经过中国众多少数民族之一的彝族的聚

居地。彝族地区当时还处于落后的奴隶社会，部落之间经常互相械斗。他们常成为当地军阀的牺牲品，有时甚至被当地军阀消灭掉。彝族人当时仇恨汉人，他们对红军一无所知。彝族人认为红军是军阀的部队，不让红军进入他们的地区。他们衣不蔽体，光着脚，挥舞着弓、箭、长矛、刀子和岩石，构成一条可怕的封锁线。

由于没有一个人懂彝族语言，通信联络不得不通过当地的汉族商人来进行。彝族人索要"买路钱"，才让红军通过他们的地区。红军尽量向他们说明，红军是什么样的队伍，将如何帮助彝族，并给了他们一些银元。当时刘伯承将军说："我们只希望暂时向你们借用一条路。"

这导致了一个有名的仪式——刘伯承和漂亮的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结盟，宣誓结为兄弟。（彝族首领的名字与我们正会见的一位将军同名，把我们逗乐了。）他们砍了公鸡的头，将鲜血分洒在两个有水的大碗里。原应该用酒的，但那里没有酒。两人喝完了结盟酒，便结为"兄弟"（长征的展品中有这个结盟仪式的图片）。彝族帮助红军通过了他们的地区，由于有了这种血的盟誓，红军没有受到当地人民的袭击。

与我们交谈的这四位将军都参加过长征。他们是红军的英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英雄。这四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全都遭受过苦难。他们能活下来是幸运的。他们很少谈到他们的遭遇，只说他们或者"靠边站"、或者被关进监狱，或者送去劳动了。1980年我们在成都时，我们的主人在午宴上没谈任何关于他自己的事，但他让一位年轻人告诉我们关于他家庭和他本人受到的折磨。有朝一日，这些事将成为一个多么好的故事。在西方已有由一些中国人写的书，但还没有军人、

教授一类人写的作品。

杰克·谢伟思将于今晚到达，哈里森要去机场接他。

3月17日　星期六

杰克·谢伟思来这里太好了。虽然他和哈里森谈论着这一旅行已经好几年了，但今天早晨以前，我还从未见过他。他长得很俊秀，举止大方，瘦高个子，看起来很健康。

今天下午，我们和杰克一起去看路易·艾黎。我们谈到宋庆龄的儿童基金会，该会想使全世界的人知道它。在这个国家里，十四岁以下的孩子有三亿五千万，很多住在边远地区。

3月18日　星期日

我们从报上得知，美国东北部发生了一次自1888年暴风雪以来最猛烈的大风暴。我能想到的只是那些可怜的快饿死的鸟。哈里森和我逛了几条旧的胡同。伊斯雷尔·爱拨斯坦与我们共进晚餐。他是外国友人之一，有一位英国妻子，而他本人已是中国公民。他的父母出生于波兰的俄国人的家庭。他与父母是传教士的约翰·赫西一起在天津上过学。埃尔西·爱拨斯坦现在住院，已是癌症晚期。

3月19日　星期一

今天早晨哈里森和我以及杰克·谢伟思乘出租汽车到马海德家，他们谈了两个多小时。马海德是1936年同埃德加·斯诺一道去延安的，他看到了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长征到达那里(一方面军已先期抵达)。哈里森问他的印象如何，他说，最初的印象之一是惊奇地看到这么多怀孕妇女。在长征路上有生孩子的，孩子都留给村里的农民。据传毛泽东的第二个妻子在长征出发时已怀孕，后来在路途中将孩子交给别人抚养了。这些孩子再也找不到父母，也永远不能与父母团聚了。恐怕妇女们用了她们能采用的一切办法来避孕，但当她们到达延安时，似乎就不那么注意了。虽然马海德曾设想要做一名救护伤员的英雄医生，可是他却替很多孩子接了生。

马海德尽可能带去了一些医药用品。那时，还没有抗菌素类药物，虽然瑞士已发明某些注射用的磺胺类药物。条件是如此原始，他最初感到无法行医。那时在延安倒有了一个制药厂——100个人在窑洞里工作，医生在碎纸片上开处方。马海德意识到他是受到表面现象的影响，其实没有他用惯了的医疗器材也能做成很多事。于是他感到精力倍增，能担重担。那里只有十名上过医科学校的合格医生，没有实验室设备。但是，他们有一所地方医院，培养了一些人。他们用动物来进行解剖学教学，偶尔用一个人体作解剖。有些人很有天赋，能画出漂亮、准确的解剖图。有一位医生，名叫钱信忠，有两铁箱德文医学书，长征时一直带着学习。他是个外科医生，教给

马海德很多知识，马海德注视着他将一条断腿放在马海德称之为面粉筛子的厨房设备上正骨。不管它是什么东西，只要有几个木头把柄就可用作夹板。

长征期间，将写有医学问题和解剖图样的板子驮在前面的牲口背上，或由人背着，这样学医的人能边走边学。医务人员士气高昂，他们扛着自己的生活用品，还要服侍伤病员。马海德谈到一个头部受了重伤的战士，他怎么也不让医务人员给他治疗，直到政治指导员来后，他把枪交给了指导员，以便让另一个战士使用，这时他才肯接受治疗。马海德以前不曾体会到战士的士气如此之高，对毛泽东和红军的信仰如此强烈。

疟疾在发抖阶段用针灸治疗，能成功地使人站起来并继续行军或工作。在藏族地区，他们曾用藏文手稿卷帙作为绷带。

马海德和哈里森谈到毛泽东于 1942 年在延安发动的整风运动，以清除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他们都是到莫斯科学习过的中国人，相信俄国人的那种观念，即只能以城市和工厂为基地夺取革命胜利。然而，毛泽东却深信，如果让农民知道红军是支持他们的，如果能将他们组织起来，并加以教育，全国团结一致，共产党人一定能推翻旧的封建制度，也一定能打败日本侵略军。因为中国人民中 80% 是农民，这是有道理的。最后也证明这是正确的。

与此有关的一个悲剧是1944年罗斯福派帕·赫尔利来中国了解蒋介石和毛泽东团结抗日的可能性。在延安，赫尔利和毛泽东发表了一项关于国共团结，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他们的国家的声明。毛泽东一直要与美国保持某种关系；这是

他的一项明智的行动。然而，当赫尔利将声明送给蒋介石时，他拒绝签字。蒋介石和蒋夫人说服了赫尔利，使他倾向他们这一方。罗斯福再一次派赫尔利来中国，这次他路过莫斯科并见到斯大林。斯大林并不很关心中国共产党人；他告诉艾夫里尔·哈里曼，他们外表是红的，但里面是白的；并致函罗斯福说，在中国的内战中斯大林他本人是支持蒋介石的。

杰克定做了一个刻有马海德的名字和住地的橡皮图章，请我们尽可能多地从我们要去的地方寄明信片或信给他。他是一个热情的邮票和邮戳搜集者。我可不晓得有多少地方会有邮局！

哈里森不得不再多买些打字机用的色带。修理我们打字机的人曾给他一些于1945年为马格里特·伯克——怀特密封好的色带，并坚持说还可以用。当然，这些色带并不能用，因为都干掉了。所以，哈里森买了几盒中国生产的色带。因为他的旧雷米塔牌打字机比一般打字机的带盒要小，所以他不得不把色带取下来，切掉一部分后再重新卷到卷轴上去。

3月20日 星期二

哈里森和杰克一早出发，去找一位人民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胡华谈话。我没去，因为时间太早而且我感到很疲倦。不料昨晚通往阳台的门没关好，风穿缝而入，门虽没有砰砰作响，但呼啸声使得我难于睡着，所以我大半天都在休息。

中国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为杰克和我们举行晚宴。他曾任驻波兰大使，并在中美长期谈判中代表中国人。我们在较早

的一次旅行中就见过他。我们到过他的办公室，一座旧的意大利使馆，而且我还记得我们曾为这幢房子看上去如此破旧而感到惊讶。

今晚他和蔼可亲。哈里森坐在他左边，杰克坐在他右边。宴席座位按中国老式方法安排——男人们聚在一起，女人们也互相为邻。因为男宾多于女宾，我坐在陆璀和李先生中间。陆璀是位满头银发的漂亮女士，这种发式是我在这里不常见到的。实际上，我不知道中国妇女是否象意大利许多妇女那样不染头发。

陆璀英语讲得很纯正，我非常欣赏。1935年在北京一次学生抗日示威游行中，大学校门被锁上了，使游行的学生无法进去。陆璀从门洞里爬了进去，从里面将门打开。那时杰克·谢伟思在北京曾经见过她，他说：当年她个子很小，也很年轻。陆璀告诉我，那时她是一个被列入黑名单的人，警察要抓她。斯诺把她藏在自己住的公寓，并亲自带她去车站，送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她在延安呆过一段时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派到美国，而且见过罗斯福夫妇。

宴会有十二道菜并多次祝酒。最好的白葡萄酒名叫“王朝”，是法国和中国合资企业的产品。

李先生告诉我，我们不能到出产名酒而且更是长征途中的要地茅台县去，因为该处不对外国人开放；到其它地方去也有一些问题。我敢肯定这与那些地方官员的官僚主义有关，他们不理解哈里森要去做什么，而只按规章办事。

3月21日　星期三

某些地方官员说我们不能做这又不能干那，哈里森为此大发雷霆，他给新闻司写了一封信，反对这种种限制。

今天又是我们没有约会的一天。对此我不理解。我们在这里已经三个星期了，而我们见到的人还未到想见的一半。但我们肯定他们在北京。哈里森认为这是浪费时间。确是如此。所以我们坐在房间里写信和读书。我已读完《死亡迎接大主教》，要是我把威拉·卡瑟的书全部带来多好。她是一个如此令人喜爱的作家。

为了把我的鞋送去修理，我们出去走了走。在一个小修理铺，几个人正在修理各种东西。一个正在修理羽毛球拍的姑娘放下手中的活儿，拿起我的鞋，用小刀割开胶封，放进一块小补丁，又把它缝上，不到十分钟全部工作就完成了。付了人民币3角。物价涨了，在1972年补一只鞋只要几分钱。

晚上我们去军事博物馆看了关于长征的电影《四渡赤水》和许多战争的片断。片子演了三个小时，太长了，但真有趣，扮演毛泽东的演员演得维妙维肖。我觉得他象个女性。哈里森说，许多作家说毛泽东年轻的时候就是那样。

3月22日　星期四

今天上午我们见到了李一氓，他是一位作家，中国国际

交流协会主席，前驻布拉格、维也纳和缅甸大使。他大腹便便，总叼着一个烟斗，不时把烟丝往下压紧。女服务员过来帮他点烟，他挥手谢绝了。他自己点着烟斗，但很快就熄灭了，他根本没有抽，只是拿着玩。

李一氓所介绍的长征情况与我们从一些将军那里听到的不一样（后来，我们知道他讲的某些事实是不准确的，或者至少是有问题的）。他当时三十岁，在保安机构和未参加战斗的中央直属纵队工作。中央直属纵队也有司令员和政委，他们由战士保护。他当时也有一匹马驮运他的所有物品。看来他们许多人都没有骑马；只是用马来驮东西。

哈里森问：毛泽东怎么能够白天整天走路，晚上还整夜工作。李回答说：通信联络只能晚上有效。他们一宿营，无线电台就开始工作。各部队和各单位互相联系，报告进展情况，共同协调计划。那里没有来自上海的指令，也没有足够的无线电功率与莫斯科联络，但他们能够也确实同其他部队取得了联系。杰克·谢伟思谈到过“竹子电报”——从一个村到一个村的口传，是另一种通信方式。领导人当年都是年轻力壮的，他们养成了熬夜的习惯。当部队开始上路了，他们就抓紧两、三个小时睡觉。

哈里森问：中央直属纵队有没有妇女。李说：开始只有二十几个。哈里森问她们做些什么，李笑答：“无事可做”。“她们是不是照顾她们的丈夫？”“许多人还没有结婚。”“长征路上是否有许多人生孩子？”“没有。”哈里森说：他听说毛泽东的妻子在长征出发时怀了孕。李说：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他记不清了，长征前在井岗山她就受伤了；据他回忆，长征路上她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据他所知，毛泽东没有病过。周恩来得过一种伤寒症，而不是疟疾。周恩来的妻子一直与他在一起，她没有病。他说，他并不觉得雪山很高；人们一天就过去了（与我们以前听说的一样）。草地是藏民夏天的牧场，通过草地通常要带上两天半的食品。那里有可供宿营的干燥地方，但多数地方是潮湿的，象流沙一样。很多战士身体虚弱得赶不上队伍，有的倒下就站不起来了。牲口也是如此。他当时吃的是生谷粒，牙齿象是当磨子使用。

他说他与邓小平曾相处过相当一段时间，白天一起赶路，晚上一起聊天。说邓小平不得不自己携带自己的东西，这是不真实的。他也有一匹马。那时邓小平是军队报纸的编辑，在这种环境中出版报纸是不可能的，所以不能有所作为。

哈里森问李一氓当时是否感到张国焘想夺权。他说，最初没有，但当张开始在思想和判断上犯错误时，他意识到他有些问题了。

我们请一些中国作家吃饭。杰克没有来，因为他得了严重喉炎，不能说话，我们非常惦念着他。宴会上有七位不会讲英语的中国人，一名翻译，还有我们。交谈很困难，哈里森却不断地说话，翻译很辛苦。宴会有十五道菜，我并不想要那么多种不同味道的菜，一道接着一道——鱼、肉、蔬菜、汤、甜品，酸的、热的、凉的、辣的都有——我一辈子也不会习惯这种吃法。

这是一些很好的人，态度十分友好。10月份将在中国举行一次中美作家会议，哈里森告诉他们几位他认为会来的人的名字：比尔·斯蒂伦，弗朗辛·格雷，艾伦·金斯伯格，托尼·莫里森，沃克·珀西。我记不起还有谁，但届时来的人也

可能都变了。

3月23日　星期五

今天上午哈里森又上杰克房间和胡华教授交谈去了。杰克今天好一些，但我好象也有些嗓子痛，患上了哈里森曾经得过和杰克正患的感冒。我采取我所知道的一切予防措施。空气太干燥了，我觉得不能适应。

我们在这里已三个星期零两天了，在我看来是大大浪费时间和金钱。哈里森至今只会见了四位将军，两个历史学教授和马海德。我们曾到博物馆观看长征展品，参加多次宴请。我们曾碰到住在这里的一些有趣的人，但很多天是在没有安排会见的情况下白白地过去了。我们没能见到一位女的长征幸存者，虽然这里住着几位著名女士，包括毛泽东的第二个妻子和周恩来的妻子。

我对旅馆生活感到沮丧和厌烦。我觉得如果我不得不再多吃一些中国菜，不管菜多好，我也吃不下了。我对这次长征感到厌烦，讨厌这种生活，讨厌我的衣服，讨厌我自己。

上面这些话是今天上午我情绪异常低落的时刻写下来的。

丁玲女士是中国革命和文学上的伟大妇女之一。她住在一幢公寓的十层楼上，该楼座落在折除旧城墙后新建的高速公路旁。在这幢建筑物和街道之间有一排平房，是有卷门并上锁的汽车库。每个车库有一辆车。从任何标准看，她的住房是一套大公寓房。进门就是一条宽阔的通道，两侧各有两

个房间。两扇门关着，另两扇开着，屋里摆满了书报。起居室摆着一个沙发，前面有张桌子，几把坐椅，一个玻璃大柜整齐地放着书报，一架竖式钢琴，上面用布盖着。种着绿草和鲜花的花盆陈列在靠窗户的地板上。我们看到整个房间铺着黄色乙烯基砖面地板，每块约15平方英寸。非常别致，与很多公寓的水泥地相比，真是福气。

丁玲没有参加过长征。她 1936 年抵达延安，走的是和埃德加·斯诺、马海德、黄华同样的路线，先去西安，再到延安，一切都是秘密的。她在上海时同一位德国牙医在一起，这位牙医持反法西斯的观点，因遭追捕才从德国逃出来的。他有一条名叫希特勒的狗。他不大懂中国话，在一个已经戒严的晚上走出门，遭到了国民党士兵的射击。丁玲女士也被国民党关进过监狱，她的丈夫在严刑拷打后被杀害了，她自己于1936年获释，随后不久就去了延安。

她说长征中的妇女是坚强的——她们不能不坚强，否则她们是活不成的。大约有三十位妇女从江西步行到延安或陕西省。她们当时有句笑话，即骡子比丈夫好；骡子是不可缺少的，丈夫就不是那样。朱德的妻子康克清当时是一位政治指导员，以前是个乡下的农民，虽没机会受很多教育，但她是位热情的共产党人，能平易地与战士交谈。丁玲称毛泽东的第二个妻子贺子珍为小知识分子，说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是受过很好教育的。杨尚昆将军的妻子李伯钊曾在苏联学习，懂得俄国歌舞，她曾演过和教过俄国歌舞(哈里森要求在我们回国前能见见她)。我们问这些妻子干什么事——除休息时她们并不与丈夫在一起。丁玲讲，她们做宣传工作，组织当地妇女为战士编草鞋和其它必需品。有时，她们也参加斗地主、

分粮食的活动。宣传队要走在队伍前头，在悬崖峭壁上书写口号。丁玲说她们很忙，这与李一氓所讲“无事可做”是矛盾的。长征中和以后到延安的妇女都平易近人，同群众打成一片。她说，因为军民团结一致，共产党人才能取得胜利。

在第四方面军里有个妇女团，由一位名叫张琴秋的妇女领导。她们多数是农民的女儿，象正规军一样地生活和参加战斗。这个团几乎被国民党的回民部队消灭，那些没有被打死的都被关进监狱，被强奸，被屠杀。这是战争中对待妇女的“通常”处置，很可能对这些妇女更厉害，因为她们是士兵。

丁玲说：并不是许多妇女在长征途中都生了孩子。我们从其它途径听说，相当一些妇女生下孩子，而又不得不离开孩子。丁玲告诉我们一段很有意思的故事：一对夫妇接到去延安的命令，当时他们刚生了一个婴儿，由于他们必须秘密地接近和迂回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所以不能带着孩子走。于是，他们将孩子托给了农民。农民随后机智地将孩子伪装成包裹，一个村一个村地转递，因为国民党并不注意农民们日常的来往，所以没有引起怀疑。几经周折，孩子终于送到了延安，回到了他的父母的怀抱。

她谈到了“五老”，即五位在长征时年龄超过40岁的人。我对中国人常用数字来形容东西总觉得好笑。如：“四害”，“四人帮”，“四老”，“四条新闻”，“四个现代化”，“八宝饭”等。

丁玲说：由于长征时老走路，妇女的脚也走肿了，上厕所也成问题，她们如果停顿一下，就会掉队。她们不得不忍着直到宿营地——这是很痛苦的，对她们的身体是有害的。

哈里森问：参加长征的人和长征后去延安的人之间是否关系不好。丁玲说：仅仅偶尔有这种情况；新兵是尊重老兵

的。

丁玲说：延安精神是了不起的。“我们当时在延安都怀有那种感情。那里有民主，也有批评，比现在好多了。然而，我们不能使事物固定不变，我们不知道世界将朝那个方向发展。”她说：延安精神就是长征精神的继续。那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的，没有个人考虑，不是想着金钱，只有伟大的乐观情绪。很多知识分子到那里来，很多学生也来，那里“充满着学习空气——提高自己的气氛。”虽然当时很穷，还是建立了一些学习机构。他们没有教科书，没有桌椅，甚至连灯也没有。

那肯定是好极了——有长征的胜利；有战胜蒋介石和日本人的决心；有对新的开端和对胜利的激情；有乐观主义；还有青春活力。他们有那么多开展工作的条件。那一定是非常浪漫主义的。

与我们谈过话的人都希望丁玲写她的回忆录。她有那么丰富的经历，而且奇迹般地活下来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使她处境极为险恶，肖克的参谋长王震救了她，将她送到东北一个农场，在那里她住了十二年。她的第二个丈夫、今天我们遇到的那位沉默寡言的小人物，自愿陪着她。在那里她写了一本小说，可是当红卫兵最后找到她时却将小说烧了。她1976年回来，被认为是一座活着的革命纪念碑。

今晚我们到设在旧的意大利使馆院内的对外友协看了两部电影。第一部是关于路易·艾黎的纪录片，象他一样，是值得敬慕的，内有他在新西兰当牧童和成为英俊水手的照片，但绝大部份是记录他遍游中国期间被眉开眼笑的儿童包围的镜头。第二部是关于毛泽东的纪录片，不仅限于长征的内容，而

是从三十年代初到1971年中国进入联合国的全部事迹。犯严重错误的几段被删去了——“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这部有趣的好纪录片比以前那种偶像崇拜要合情合理和真实可信得多。

3月24日　星期六

今天又是一点活动也没有安排。我们谈论着旅行计划。哈里森对我们的日程不满意。一往一返太多；顺原路返回的安排也太多。每个省都是首先到省会，然后去我们要看的重要地方，几天后又回到省会，再去另一个省的省会。尽管我们在一个省的旅行已靠近另一省的边境，也还是要回到原来的省会去。这种安排近乎荒谬。他也担心我们得不到一位真正能胜任的向导，即一位长征问题的专家。我只希望整个事情不要失败就好。

3月25日　星期日

今天上午10时30分我们和杰克雇车去紫禁城北门，在那个华丽的地方走了两个小时。今天天气好极了，风和日丽，这样度过一个上午是再好也没有了。每年这个时候，旅游者不多，但中国人却不少。很多新的中国家庭都是由父、母和一个孩子组成。有一天我问一个年轻的中国父亲，他们是否和我们一样为孩子举行生日庆会。他回答说，一家一个孩子，对两

位双亲、祖父、母和外祖父母来说，也许每天都在为孩子举行生日庆会。看看这些孩子变成什么样子，将是很有趣的。我曾见过一些小孩跺着脚又哭又闹，这种情况以前我们在这里是从来见不到的。我不能想象，整个一代被过分溺爱和宠坏了的孩子，会服从中国人所要求的铁的纪律，特别是那些要担任重要职务的人所要求的铁的纪律。

我们同杰克和艾德勒夫妇在专门吃蒙古火锅的七层楼餐厅吃饭。这是一种中间使用炭火的小型圆柱体燃烧器，周围是开口容器，盛放着水或肉汤。任何食物都能放进去烹制，但是他们使用的是切成很薄的羊肉片和切成小块的蔬菜。

3月26日　星期一

我们与一些中国朋友在一家重新装修好的著名餐厅共进午餐。底下一、二层关着门，我们不得不绕到一个小后院，跨过煤堆、旧木板和乱七八糟的东西。登上堆满着水泥、沙子、石块和木头的楼梯。我倒不在乎那些。但一进去我们就看到一个男人往角落里吐痰。最高一层的两边，各有一间挂着门帘闭着门的房间，向前窥视那主楼，看起来那里好象刚爆炸过一枚炸弹！

我们进入右边的房间。中间放着一张桌子，褐色塑料面的椅子和沙发靠墙摆着。房间逗人喜爱，外面阳光照耀。三层楼不象街上灰尘多。窗户原来是开着的，温暖的空气可以进来。但一当我们进去，窗户就被关上了。北京除了有些特殊建筑物，如我们住的饭店和丁玲的住房外，不管气温如何，

暖气 3 月 15 日就停送，要到深秋时节才重放。我们吃饭的那间房很冷，我总想再把窗子打开，但没敢去开。一直到午宴结束时，我还在想，要是我穿上了我的长内衣和毛袜就好了。

菜很可口。我不知道在重修房子的环境下他们是怎么经营的。我问最近去过美国的一位客人，她是否喜欢美国饭菜。她说："我讨厌美国饭菜，只要有可能我就自己做饭。"所以我想，我不是每样中国菜都吃，对此就不用抱歉了。我还从未向中国人说过我讨厌他们的食物，虽然对有些菜我的确是讨厌的。

下午我们去音乐学院会见一些教授和听由学生演奏的音乐会。学院的一部份是一位满族亲王的宫庭遗址，只留下几座门和两幢漂亮的建筑物，但他们设计一个引人注目的大门。这些建筑与学院的另外几幢沉闷的、内外都是水泥的四层楼建筑形成强烈的对比。

十年"文化大革命"使音乐学院损失巨大。一半教室被强占了，还失去了很多教师。虽然没有明说，显然许多教师的时间都花在体力劳动上了。该院至今尚未达到以前的水平，恢复需要几年时间。需要增添更多的房屋和设备，而更重要的是需要教师。这里真正缺了一代人——应该"文化大革命"期间坚持学习的一代人。绝大多数教授已年逾花甲了，而年轻一些的一个也没有。他们都想退休，但必须等到他们培训出一批新人才能离开。

中国有八所音乐学院，都在为提高全民的欣赏水平而工作。少数民族的人迫切要求来学习；内蒙古送来三十来人，学了六年，回去后就组成了一个管弦乐队。前几年我们在内蒙时，听过一个小组的演奏——一批有造诣的音乐家在各地巡

回演出，给那些从未有机会欣赏音乐和接受教育的人提供娱乐和教育。

斯凯勒·蔡平和贝弗利·西尔斯1981年访问学院后，蔡平为《纽约时报》撰写了文章。他写道，房子都是昏暗的，钢琴几乎不大合调，而且学生的质量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样高。这些评论或许音乐学院的每个人都读过，他们很受刺激，说不能对这位作者表示很友好。我不责怪他们。如果人们转过来考虑一下八年以前是什么情况，这所音乐学院取得的成就应该说是十分惊人的。

音乐会在最高一层一间宽敞而明亮的房间内举行。开始我们听了两种中国传统乐器二胡和杨琴的演奏。后者象木琴；前者是弦乐器，直立在膝上，用琴弓演奏。接着一位年轻男高音歌手唱了一首里查德·斯特劳斯的歌曲和一首中国歌。再后，一个高高的瘦弱的象苦行者一样的十八岁钢琴演奏者，弹了一首肖邦的行板和波兰舞曲，它令人激动的程度是我听同类演奏时从未有过的，在我注视着他的时候，我想起了“文化大革命”和象他这样的艺术家的遭遇，禁不住流出眼泪。这里的教师经过那场狂暴的大灾难之后又重新开始教学，而且能教得如此之多，如此之快，这是多么令人惊奇啊！哈里森说，他想起了被红卫兵折断手指的那位年轻钢琴家。我们听说，他现在又开始演奏并举行音乐会，他如此铿锵有力地敲击着琴键，以致每次音乐会他都需要一架新钢琴。他的双手愈合很好，能运用自如，这真是奇迹。

余下的节目是：一个女孩自己用琵琶伴奏，演唱了一首彝族民歌，彝族是中国许多少数民族之一。我们将去彝族地区——参加长征的人在那个地区呆了不少时间。一个年轻人

演奏小提琴；另一个男中音歌手唱布拉姆斯和福莱的歌曲。一个小女孩唱《梦游女》咏叹调，她很可爱，声音清晰而纯真。我告诉她的老师，我前不久欣赏该首咏叹调时，演唱者是琼·萨瑟兰。

这次音乐会是动人心弦和令人鼓舞的。

一个英国四重奏演奏团正在这里教学和演出。他们将先后到武汉、上海去访问那些地方的音乐学院。

3月27日　星期二

今天没有安排活动。我们邀请冈孝共进午餐。上次我看到他是十多年前，他在东京为《纽约时报》工作。他现在则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到《纽约时报》之前也曾在现在的报社工作过。他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人，善于思考，很有才智，是位第一流的新闻工作者。我们谈到了去年秋天中国提出的反对"精神污染"问题，它引起了许多人的担心，因为在批评西方影响方面带有"文化大革命"的味道。我觉得这是可怕的。这里一定有许多人有类似"四人帮"那样的思想，我希望他们不会再控制这个国家——永远不会。每个人都说他们不会——"人民不允许这样做"。但反对精神污染的这种做法使人受惊，外国人和中国人都同样受惊。

3月28日　星期三

国际俱乐部是一座大建筑物，从我们住的饭店乘车沿大道东行，大约有十分钟的距离。它紧靠许多外国人居住的使馆区，外国新闻记者和外交官都住在这一带。清朝时期，外国使馆均设在靠近北京饭店的公使区。那些漂亮的建筑物现在都由中国人使用，而现在外国使馆均建在这个新的地区，建有围墙和大门，设有中国警卫。

国际俱乐部是个会议场所，有会客室、餐厅和一个电影放映厅，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可以使用。今天上午我们就坐的是一间阳光充足、舒适的、令人愉快的房间，铺着没有丝毫污渍的绿色地毯，摆着带红绒套的沙发和扶手椅。灯一直亮着，这在阳光灿烂的白天毫无必要。

我们会见了伍修权，它的发音是“Wu Shiuchuan。”我的头脑里根本弄不懂汉语拼音体系；相反地，威妥玛——贾尔斯拼音法倒很熟悉。威妥玛和贾尔斯是两个英国人，他们发明按字母拼音法，多年来一直在使用。几年前，中国人采用了汉语拼音法，并说这样更准确，更象中国字的发音。但是，说实在的，并没有多大意思。举周恩来作为例子，现在写成 Zhou Enlai，以前写法是 Chou En—Lai。而他的名字，对我来说，发音近乎“Joe”。

伍先生既是一位将军又是一位大使，长征一开始他就参加了，当时是李德（奥托·布朗）的翻译。

在这次旅行前，我从来没听说过奥托·布朗，现在我听到

哈里森每天都在问有关他的事。关于他的情况有几种说法，究竟他是奥地利人还是德国人，也是个问题。一种说法是：他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被俄国人俘虏后送到西伯利亚。1918年当俄国红军成立时，他参加了红军。后来他到苏联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另一种说法是：他在德国街头为德国共产党而战，被魏玛共和国投入监狱，1928年逃走，奉党的指示到了苏联。不管哪种说法是真实的，反正他受过革命的训练并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派到中国。当他第一次到中国时，只会讲德语、英语和俄语，而不会中国话。

伍修权在苏联呆了五年半，第一次是1925年与100名中国学生一起去的。他在莫斯科学习，精通俄语。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他和学生们被滞留在苏联。他们又上了军事学校，但要求回中国为国效力。最后，伍修权得到允许，开始向边境出发。当时许多中国人因同情共产党不同情蒋介石而被截堵、审讯和枪杀。伍修权运气不错，他与几个俄国人顺利地上了一辆货车，没有受到截堵。1931年7月他终于到达上海，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到了江西苏区。

他曾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1952年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了关于朝鲜问题的联合国会议，他批评美国——在一篇两万字的发言中——是朝鲜战争中的侵略者。

伍将军七十六岁，行动和讲话有点迟缓，但仍很机灵，精神抖擞。我注意到他左脸上有一道陷进去的长伤痕。这一定是被子弹击中过的伤疤。哈里森对此没有察觉到，因为他一直坐在伍将军的另一边。象许多其他人一样，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监禁八年。每当哈里森问到他这一点，他总报以困窘的微笑或者哈哈大笑。

他在国际俱乐部为我们举行一次讲究的午宴，除冷盘外还有十道菜，包括北京烤鸭。

晚上，新落成的长城饭店经理迪克·扬和他的妻子来约请我们，因为我们一共是五个人，按一辆小车不能超过四人的规定，象纽约一样，我们不得不雇两辆出租车。出租车开到我们与雷恩夫妇去过的那家餐厅，但我们装作从未去过。他们告诉我们，餐厅旁边的那个公园是个男女约会的场所。年轻男女要相互认识和交往是困难的，除非他们正好在同一个机构工作。不象美国人和其它外国人，中国人很少有社交活动。每星期只有一天，男的女的能在这里聚会，即俗话所说的“社交化”。这种安排已经得到社会的承认和接受，但是假如你参加三次还找不到合适的人，你就不能再去了。这真象打垒球——三次击不中，你得出局。

餐厅不挤，我们美餐了一顿。其后，我们雇车来到长城饭店。它离市中心太远了，我想作为旅馆是太远了。但是对有些使馆来说，只过一条街就到了。

这家饭店很大，玻璃门面和红色垂直的贴面。设计这家饭店的建筑师也在美国达拉斯设计过一家旅馆，两者正好一模一样。我不大了解中国这里的情况，不过扬先生似乎认为，将会有许多很富有的美国人和其他旅游者，每晚花 130 美元来住这家由美国或欧洲旅馆业专职人员经营的真正豪华的旅馆，房间舒适和雅致，大厅富有想象力地矗立着一些光亮的钢质大园柱，恰到好处地备有几处引人注目的座位，而不单是一个空荡荡的大房间。这里有很多鲜花盛开的植物。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六楼正厅的酒吧间，我们在那里吃了法国油酥面馅饼和水果。还将开设一个夜总会，一个法国餐厅，一个由三部

分组成的面积可以伸缩的舞厅，一个咖啡厅。蔬菜是专门种植的，不浇通常中国使用的粪便肥料。

工作人员是中国人。女的穿的是纽约设计香港定做的服装——非常漂亮，色彩丰富，款式时髦。她们笑脸相迎，彬彬有礼，如能经过训练提高效率，那就太好了。我猜想，这是能做到的；但也有可能变成贝聿铭设计的饭店那样，经营糟透了。哈里森认为，扬先生和他那一帮子人能维持下去。饭店目前仅部分开业——300 间客房。完全盖好时将有 1000 多间客房。四月份随里根总统来访的记者将住在这里。迪克·扬说，他不得不为他们保留 550 间房。假如这些房不能全部使用，饭店将赔钱。

3月29日　星期四

今天我们去天坛，三座美丽的建筑物座落在一个离市中心不远的公园里。我们前几次访问中国时，我们能从饭店的窗口清楚地看到这座大庙。现在我们只能穿过新盖的公寓楼群中间的空隙看到它的一小部分。

这里一度是欢庆和祈祷的地方。这座大庙，或称祈年殿，是园形的建筑，建造时没有用一个钉子或一块木楔。横梁和支柱安装在一起，油漆得金碧辉煌。从入口处石级的最高一级，人们从南面可以看到第二座略小一些的庙宇——皇穹宇。由皇穹宇再向南就是圜丘，那是一处三层汉白玉石台基，周围则是石头雕刻的栏干。一位中国人告诉我，历代帝王都来这里祭天和祈祷丰年。

上次我们来这里时，天坛正在维修，现在显得非常可爱。公园新种上了许多树木，走道平整干净，那里已经见不到革命的标语牌。但是在紧靠建筑物和公园的围墙边，有了很多旅游商店和货摊。

今晚我们观看了京剧。第一个节目很精彩，功架动作多，所以容易懂。情节是讲一个姑娘用一根棍棒与元帅搏斗并取胜。这是一场极妙的武打剧。第二个节目是一个姑娘被出卖当了妓女。她被送上县城法院审判，法官正好是她以前的男朋友。节目没完没了地往下演，剧场又没有暖气，使人冷得发颤，还没演完我们就离开了。

3月30日 星期五

今天上午我们去了卫生部，办公楼原是一座满族王公的旧宫殿。在靠湖的那条街上，战士们忙着砍倒一些老树，新种上雪松和松树。不知道这些四季常青的树木如何能顶住灰尘和干燥、严寒和酷暑而生存下来。必须对这些树木进行冲洗。沿街栽种的松树看来太干旱了。

我们与钱信忠、戴正启交谈。钱医生说个没完，但他很有风趣。当年在他的那支部队里，他是唯一真正的医生——其余都是临时培训的医务人员。1927年，他已成为一名共青团员，那时蒋介石正在屠杀共产党人——可能杀了一万，也许十万，没有确切的统计。

还是来谈长征。钱医生告诉我们，医疗补给品、仅有的一些药品以及简单手术器械都是用扁担挑运。当时没有抗菌

素，没有爱克司光设备，没有麻醉药。

在战场上采用的是保守治疗法。如果体内发现有子弹，一般能取出来。伤口会得到包扎，但不能输血。伤员分成三类：第一类是轻伤，可就地治疗；第二类是伤口经过治疗可望愈合、能行走的或仅需要坐几天轿子或担架的；第三类是重伤或快要死的，必须留下交给村里农民照应，要给农民一些钱，并匀出一些给养品给他们。

哈里森问到战士结婚问题。钱回答说：长征期间只有高级干部才允许结婚；一般战士是禁止结婚的。这一规定同当时多数战士才十多岁有些关系。

医疗队由几个女护士和几个男卫生员组成，一般随中央直属纵队行军。伤员从前线送到这里治疗。哈里森问，这些女护士中是否有人怀孕或有任何特殊的妇女问题。回答是"没有，她们多数都是十几岁，都很健壮，没有一个受伤或被打死的，她们那么忙，哪有时间怀孕。"对此我感到惊奇。

回过头来谈战斗中负伤的治疗。当时的子弹头是整块的，不象"经过处理的"弹头会把碎片留在身上，子弹常常直接穿入胳膊或大腿。疟疾、腹泻、感冒、伤口溃烂和脚痛是常见的疾病。还有雪山上和其它高地引起的雪盲。

哈里森总是问长征路上生的孩子，他向每一位同我们交谈的人都提这个同样的问题。回答却大不相同。戴医生说，九军团军团长的妻子在长征路上生了个孩子，毛泽东的妻子在渡大渡河前后也的确生过一个孩子。

钱医生长征时才二十三岁，戴医生十五岁。解放后戴医生被送到北京友谊医院学习。1954年以来他曾与马海德一起工作过。"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到批判，"被剥夺自由"达四

个月，而后被送到干校。

所有我们谈过话的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是被关进监狱、被软禁过，就是到养猪场劳动，受到侮辱、迫害、拷打。如果情况真是这样，我一直弄不明白，整个情况怎么会发展得如此粗暴和失去控制。杰克说，要想得到一个接近正确的死亡人数是不可能的，因为并没有正式执行死刑。有人被迫自杀；在很多派性斗争中，有人挨揍甚至被拷打致死。有些人说死了几千人；一、两百万也许更准确。所有这些老家伙（并不比我老）度过四年、十年到十二年的监狱生活，现在他们出来管理这个国家了，这真是异乎寻常的事情。他们抱怨吗？我们没有看到许多这样的迹象。但是整个居民中一定有很大部分人是非常抱怨的。

戴医生问他能不能叙述长征路上一天的生活情况。首先，吹哨起床，战士们归还他们向老乡借来的门板。中国的门板是用轴拴安上的，象美国的某些门板，很容易卸下，可以作床用。归还门板后用十五分钟时间洗脸刷牙，另外十五分钟吃早饭——米饭，有时吃白薯。作为卫生员和宣传队员的戴医生然后巡视一圈，看看是否有什么问题。

午餐时他们经常没有东西吃。侦察员或先遣队员们先抵村里，经常没有多少东西留给后进村的部队。一天中他们有十至二十分钟的休息时间。战士们学会了如何休息：如果行军时走得不是很快，他们就边走路边打瞌睡。可是戴医生没有休息时间，他必须视察一圈，看每个人防御敌机空袭的伪装是否搞好了，因为敌机飞得很低。

我们谈到过草地，他说那里的情况是长征中最惨的。首先，由于行军、作战、过雪山后，人人都精疲力尽了，缺盐也是

个大问题。战士们身体非常虚弱。“我们会看到一个正在走路的战士突然倒下。我们走到他身边，他会告诉你他的老家在何处，并请你转告几句话给他的家里，说完就死了。”戴医生谈到心理上的问题。草地既无村庄，也无农民，甚至连动物都没有，中国人对此很不习惯。常言道，中国人从不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去。战士们感到孤独。

国民党袭击村庄，肆意掠夺，对农民态度极坏，将农民捆绑在一起，硬拉着他们去为国民党打仗。红军拿东西付钱，尽量说明红军的任务是什么，征募农民参军，对他们参军不久就要离队回家也表示理解。这一切都是相当理想主义的，但整个来说肯定是真实的，否则革命就不会成功。

下午我们又驱车去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总部与程子华交谈。他当时是二十五军军长。他长着一副俊秀的面孔（当我们旅行结束时我们听到好多关于他的事迹，这使我对他的俊秀的脸又感到疑惑）。他照着写好的草稿念，哈里森要提问很困难。谈的是一个有关军队和战略的复杂故事，我没能全部听懂。

程的双手和双臂严重畸形。左手先受伤，而后是右手。子弹正好从双腕穿过。伤口感染，只好用刀将患部切除。草药是当时唯一的治疗办法。他在担架上躺了十一个月。他的副军长也受伤，后来第三把手也被打死。程是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的。

他说，他们当时与任何兄弟部队都联系不上；只能从村里得到的国民党报纸上才大体得知兄弟部队的去向。

象和我们谈过话的其他人一样，此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被关押了五年。

3月31日　星期六

上午我们又回到国际俱乐部，会见了长征时就参加工作的涂通今和孙益元两位医生。

涂医生谈得最多。他说，搞好医疗卫生和掌握医学知识是一项政治任务。必须对人们进行卫生教育。每个营、每个团都有一个医疗组。他们当时提出这样一些口号："小心穿好鞋子"；"别脱衣服以防感冒"；"只喝开水——水壶里要装满开水；如果没有开水，只喝流水，不喝死水。"还派出侦察员去动员农民为战士烧开水。只要能弄到，就用明矾来净化饮水。杰克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重庆时也用过明矾。

哈里森问到关于上厕所有何规定。涂医生说有规定，要在营地以外 30 至 50 米的地方挖深坑。离开时要把茅坑掩埋好。这听起来不大可能，因为当地农民会欣赏坑里的东西。

脚病是个大问题。许多战士脚上长水疱和脓疮。哈里森问道，我们听说战士用茅台酒洗脚可真有其事？涂医生说，他没听说过，不过人们习惯用酒和樟脑液洗脚来止痛消肿。孙医生插话说，真有此事。他看到过战士打开瓶子用白酒擦脚，好些酒流到地上，整个镇子都能闻到酒香。他们说，战士们从军阀那里学会用布绑腿包扎腿脚。这有助于防止茅草和带刺的植物划破和割伤腿脚。

除了战斗受伤和溃疡性脓肿以外，也有因夜行军跌倒和绊倒而受伤的。人和马都困倦、打瞌睡，一边走路就睡着了。

他们尽力照顾每一个受伤的和掉队的人。否则他们会被

敌人俘虏。涂医生说，他们设有一些特别收容队，每个收容队里一定要配备一名医务人员。要求农民接受伤员，常常得事先做“思想工作”，向农民说明红军及其宗旨，并留下金钱和给养品以帮助照料伤员。

雪盲和高山病是经常发生的。随着时间的过去，雪盲逐渐减少。注射樟脑和闻闻食盐有助于恢复呼吸。但也有不少人恢复不了，倒下来，永远躺在他们倒下去的地方了。那时人们还不知道高海拔会造成什么影响。不过有趣的是，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怕登高。1980 年到西藏时，我们的同伴经常患呕吐、头晕、呼吸困难的毛病。也许就是由这些可怕的长征故事造成的。

在草地上红军减员严重。涂医生说，他们告诉战士，哪些草可以吃，哪些不能吃，但是有些战士对此不理解，吃错了草。烤大麦和炒小麦是他们的主要食物。

孙大夫说，他原来为国民党工作，1933年第四次围剿战役时被红军俘虏。哈里森问他是怎么转变过来的，是不是被“改造”了？他答称，红军对他很好。红军希望受过专业训练的俘虏——医生、实习医生、电话员和报务员——都能得到改造，参加红军。不过愿意回家的，也可以回家。孙医生本人就是被革命精神“教育”过来的，从反对革命转变为参加革命。他当时在营级干部康复所工作，照料过很多重要的干部，包括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哈里森问邓颖超是否患了肺病。孙说，患肺病的是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在贵州贺子珍生了一个孩子。虽不是他接生的，但他听说生的是个男孩，给了农民。

哈里森问他给邓颖超看过什么病，孙大夫说，他没有给她看过病，她当时身体虚弱，行动不便。哈里森问：“过草地时

周恩来生病，她是否在那里照顾他”？孙说，是的，在经过藏族地区、过雪山草地时，周恩来得了肝炎。在回答毛泽东是否得了疟疾的问题时，孙大夫说，没有。

4月1日　星期日

今天我们和杰克到北京西南郊约三十多英里处参观了两座佛教寺庙。戒台寺是一所大寺庙，紧靠一座美丽的山峰。该寺似乎是面向北京的，不过由于山谷里工厂的烟雾和空气中的尘埃的影响，无法眺望远处。潭柘寺更为人们所熟悉，它半隐半现于山峰的缝隙之中，坐北朝南，比戒台寺更漂亮和更紧凑。这两所寺庙在“文化大革命”中都遭到严重的破坏，虽已部分修复，但还有许多待修整之处。这种寺庙，还有西藏和锡金的寺庙，因为气候的关系，需要经常油漆。

4月2日　星期一

今天下午四点钟我们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杨尚昆将军。我们在一间大会议室就坐，室内铺着棕色地毯，椅套是红色的，坐椅通常摆成半圆形。在座的有黄华、伍将军（他于28日曾设美味的午宴款待我们）、军事博物馆馆长秦将军、爱泼斯坦、杨将军的几位副官以及李先生。

杨将军热情地欢迎杰克，说有四十年没有见到他了，自从他本人在延安参加迪克西代表团时见面以来，就不曾再晤面。

杰克说，他上次到人大会堂时，杨将军当时还在狱中。杰克还说："我至少还没有被拘禁起来。"一提到他们那么多人经受过种种不公正待遇，总是引起一阵不好意思的笑声，而我则想要对这种愚蠢、偏执和残暴表示强烈的抗议。

杨将军个子不高，圆圆的脸，前额头发不多，笑容可掬。他出生于福建的一个农民家庭，十七岁参加游击队。他主要是靠共产党和军队培养教育出来的，在长征前后及长征期间他都在林彪手下工作。196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念日他被逮捕，直到1978年2月才获释——在狱中度过了十三年。他说：他在狱中的时间"比谁都长。"他被控里通外国，在迪克西代表团工作期间对美国人太友好，是一员"黑"将。他说，在那段时间他是受尽了折磨，但把它当一种"强制性休息"。

哈里森说，伍将军曾被指控为苏联和南斯拉夫特务，杨将军说他被指控为苏联和美国特务。接着哈里森说了一番很有趣的话："这里贯穿着同一条线——谢伟思先生因为与中国人关系甚密而遇到了麻烦，而你因为太接近美国也受到了折磨。我希望今后对美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友谊能加以肯定，而不是否定。"

杨将军说："我相信这样做的时候已经到来，决不能让那种事态重演。我相信'文化大革命'不会再出现；在美国发生的那种事也不会再发生。"杰克表示同意。

杨将军说："迪克西代表团中有三人今天在座：黄华、杰克和我本人。我国驻联合国大使凌青是另一名成员，马海德也是。"他建议这些人重新聚会，虽然政治上遇到过困难，但他们都过得很好。

哈里森问到他的妻子和家属。他的妻子李伯钊曾任延安

鲁迅艺术学校的校长，是一位著名的剧作家。第一次在舞台上描写毛泽东的剧本《长征》就是她创作的。最近她又写了一个名叫《北上》的剧本，描写了一、四方面军会师及朱德同张国焘之间的斗争。该剧曾由军队剧团在电视台演出过。“文化大革命”期间，她受到监护，让她擦整个一栋四层楼的地板并打扫厕所。她患高血压症，发展成血栓，导致一条腿半瘫。现在她仍住院，不过等我们旅行归来时，她将出院。我们希望能见到她。

象其它许多人一样，她也在莫斯科学习过。懂得俄国歌舞，并在中央苏区以后又在延安表演和教授过。

杨将军说，他很幸运，虽然他的几个孩子被强迫劳动，但没有受伤或被杀害的。那时确有许多人被杀害或受伤。他提到了邓小平的儿子，因重伤致残瘫痪了，只能坐着轮椅活动。杨将军有九年得不到家属的片言只字！我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忍受过来的。

杰克问杨尚昆的孩子是否有机会上学。他说，大儿子是一名军人，“文化大革命”前就大学毕业了。二儿子当时也即将大学毕业。只有女儿那时还是个中学生，未能继续上学。

他们开始谈到我们这次要走的路线，去江西、贵州、云南、四川、甘肃和陕西，哪些值得看，哪些可以不包括在行程内。杨将军说，我们得花两个月的时间，并问到我们的健康情况。我想要说：“我们目前是健康的，但谁知道这次旅行结束时会怎样！”他说，他安排秦将军同我们一道去。秦是一位长征问题专家，曾去过这条路线上的一些地方，能给哈里森很大帮助。同时他会是一路上与军方打交道的好联络员，有了他也便于同地方当局联系事情，因为地方当局也许对我们一行的任务不那么了解或者不那么热情支持。这样，加上担任翻译的张

援远先生，我们一行的核心成员将是五人。

就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和张国焘之间关于红军往那个方向进军的争论，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毛泽东主张北上到甘肃省；张国焘则主张往西或往南走。这场争论持续了两个月，直到最后，张勉强同意北上，虽然他不久背信了。对这段历史我可能没有全弄懂。

讨论结束之后，大圆桌推向房间的另一边，晚宴安排就绪。餐桌上转盘的中间摆着鲜花。黄华夫人和黄冰同我们一道就餐，但爱泼斯坦走了。象往常一样，菜肴极其丰盛，有好几道菜我根本没有吃，其他几道也没吃多少。我注意到中国人也是这样。

4月3日　星期二　晚上8时
于北京机场宾馆

今晚什么地方我都不去了。昨天我们就整好了行装，今晨6点起床，来到机场，一直等到下午1时30分，我们的航班取消了，改到明天。开始雾很大，但10点左右天气晴朗了，其他许多航班都已起飞，就我们的航班不飞，因为目的地南昌正下着雨。我们就住进这所汽车旅馆式的宾馆，既没有睡衣，也没有拖鞋。谢天谢地我带了化妆箱和需要服用的维生素丸。此后，不管到哪里去，我总随身带一套睡衣。在机场等候时，那里冷极了，脚冻得很。回到旅馆后，我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总算暖和过来了。我们吃了晚饭，预定明天下午1时30分起飞。如果我们还走不了，我将坚持把行李要回来。

4月4日　星期三　晚8时
于机场宾馆

昨晚我们9时15分穿着衣服上床睡觉，今早6时起床。尽管盥洗室肮脏得令人作呕，我们总算还能洗上一洗。哈里森冲了淋浴。我就在脸盆里洗了洗，再换上我穿着睡觉的那套衣服。早饭吃得很好，草莓酱味道可口。真奇怪，北京饭店除了李子酱或者苹果加李子酱以外，就没有什么别的果酱。我们坐在床上盖着被子（我还穿上外衣）等了足有三个小时，在正午又回到机场。一直等到2时30分，又不起飞了。虽然南昌天晴，但航班的终点站福州正下雨。我们坐在沉闷的候机室，我给一位中国妇女示范怎样织我手头织的那种花边的针法。她昨天就对这种针法很有兴趣，所以我把织法用英文写下来。今天我给她一张纸一支笔，一边织一边让她用中文把我的针法记下来。她的毛衣针太细了，用这种针织出来的东西会不象样子。我把我的织针指给她看，她摇摇头。我猜想大概这种大号针买不到，但她可以用木条或筷子做一副。我本想将我这副针送给她，但给了她，我这两个月又做什么呢？何况我兴许会对织毛衣着迷呢！

我们坚持要把行李拿回来，经过没完没了的唠叨，等了又等，总算找到了行李。这里出租汽车司机如果不愿去乘客要去的地方，可以拒绝拉客人。没有一个司机愿意送我们到就在这条街上的机场宾馆去，他们都想回城。因此，我们只好等，一直等到有一位司机被说服了，答应送我们到机场宾馆。

今天晚上，我们换了一间比较干净一点的双人床房间。

我冲了热水淋浴，洗了衣服，换上一套干净的衣服，感觉舒服多了。晚饭前，我们看了一个极为有趣的英语电视节目。许多人就这样学英语和其他语言。在这个节目里，一位英国女图书管理员向一位英国男子描述另一位象舍洛克·霍姆斯那种打扮的男子。他给了图书馆一本书，然后每天带着放大镜来看那本书是否还在。该书经常借出去了，他就慢吞吞地说："啊！有人在读这本书。"图书管理员把书放在柜台下面，他也就以为书是借出去了。节目中有一些英语语调的举例：两位操伦敦腔调的机械师在修一辆车；办公室里的一男一女；还有电影《简爱》的几个镜头，由乔治·斯科特扮演罗彻斯特。还有一些供背诵的短语："我不知道他结婚了没有；""他在干什么？"那位图书管理员和两位男子说的是漂亮而清晰的英国语调，一位不时出场的英文教员也是如此，还有一位中国男子将全部内容用中、英两种语言加以说明。

晚饭真吃得令人恶心。幸好今天我有了睡衣和拖鞋。一般宾馆每个房间都备有拖鞋，但我不愿用，谁知道是些什么人穿过的呢？我想天气这么干燥，不大会长脚气，不过还是不穿为妙。

4月5日　星期四
南昌

今天早上人们还在谈论班机是否第三次停飞。如果当初我们坐火车，星期三就到了。哈里森有些担忧，因为我们已经白白耽误了两天。这样一次长途旅行（最后实际上是 7400 英

里，还不算坐火车和飞机的里程），日程是相当紧的。谢天谢地，我们12时30分起飞，2时到达此间。

秦将军和张先生那两个晚上都能回家，不必呆在机场宾馆。中国民航（中国政府的航空公司）给我们补偿了房费，使我们大为惊讶。当然，他们应该偿付，可是有时他们就是不付。他们不肯付杰克头天晚上的房费，因为他没有留下收据。通常情况下杰克对任何事情都是很细致的，可这次他却把收据扔掉了，这倒使我们感到惊奇。我对旅馆没有暖气而且很脏写了一条尖锐的批评意见。杰克说，他用一条毛巾擦去窗户上的尘土，一看弄得那样脏，他赶快把毛巾洗净，否则旅馆的人以为他用毛巾擦皮鞋了。顺便说一句，这些房间每晚收我们50元人民币，而同样的房间只收中国人12元。这种作法使我很生气。别的国家不会这样对待他们的客人。尽管如此，至少我们有时间看很多书。我再次读完了《模仿鸟之死》，回过头来又看《红领章》。我对此书虽无兴趣，但我不曾读过。我带来的书大多是可以留在这里的，都是我引以自豪的那些美国作家的代表作。

这次飞行是平淡无事的。飞机快着陆时，就可看到嫩绿和黄色的田野和一片水乡——到处是河流、池塘、灌溉水渠。中国人用来榨油的名叫油菜的作物，很象我国的野芥菜。几乎没有美国人吃它或使用它，多数人把它当成野草。每年这个时候，田地里生长的是绿油油的饲料作物，开着紫色的花，看起来象苜蓿一类的植物，既可当牲口饲料，也可以翻到地下当肥料。

到达后约10分钟，我们去1927年八一起义博物馆。这次由周恩来领导的起义虽然没有成功，但建立了共产党领导

的一支独立的部队——红军，从此 8 月 1 日作为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而进行庆祝。共产党人当时接管了南昌，可是只坚持了两天。这里讲一点背景情况。1927 年初，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在内的革命者——蒋介石、周恩来、朱德以及其他现在很知名的人物——在推翻封建制度和取消外国租界的纲领下联合起来。他们由广州北伐，周恩来还到了上海准备起义。起义成功了，工人们等待着蒋介石和北伐军的到来。

蒋介石让工人们等了两个星期，此时他却与外国人和流氓勾结。在受到胜利的工人欢迎之后，蒋就转过头来对付他们，大规模地杀害他们。这是 1927 年 4 月的事。从此以后，两派进行着一场内战。

博物馆原来是江西旅馆，建于 1923 年。1927年共产党人将他们的总部设在那里时，这所建筑大概是很漂亮的。这是一幢四层高的建筑，中间有庭院。房间宽敞，当时可能明亮而通风，为防止阳光照射，现在把门窗都关上了。室内有股霉味，又脏又暗，展品陈列也引不起人们的兴趣。照片都是我们看过多次的，还有些报纸文章的复印件，同这座旅馆的照片以及其他建筑和乡村的照片陈列在一起。博物馆馆长对哈里森提出的问题一个也回答不了，只是神经紧张地走来走去，发出令人讨厌的嗒嗒的噪音；倒是那位女讲解员尽了她最大的努力。似乎谁也搞不清南昌起义过程中双方有多少伤亡。杰克说，共产党人伤亡很大，但从来不承认。如果我们去参观的每个地方都象这个地方那样缺乏知识，缺少历史文献，我看不出哈里森能收集足够的准确材料去写一本书。一个多小时看到的都是些令人厌倦的东西。

在机场迎接我们的，一位是当地的翻译，另一位是管些具

体事务的，他们派来了两辆轿车。中国人以为派这种车才适合我们的身份，可是这样一来，我们五个人就得分乘两辆车，不管怎么个分法，都不能令人满意。哈里森需要同杰克就近坐着，以便和他交谈——他是非常宝贵的；而他又需要从秦将军那里得到知识；没有张先生我们就寸步难行；还有省里新来的这两位也得一道乘车。哈里森说，如果我们不能都坐在一辆车上，那将是一场灾难。

在这家旅馆里，我们的住房和客厅都很宽敞，盥洗室也非常大，除了墙纸和木制花格子门窗外，房间很象俄国式的设计。晚餐不算太好，我吃了些米饭和蔬菜。

我们看到了日程，对我来说，日程似乎相当紧张。在14日回南昌以前，差不多每天都要到一个新地方过夜。

4月6日　星期五
井冈山附近

早晨7时30分刚过，我们就出发了。灾难倒是躲过去了，我们全都乘坐在一辆小型客车上。这样安排使得旅行非常舒适；交谈或不交谈都便当；而且有活动的余地，全部行李都放上车了。

我们离开南昌时，正在下雨，整天没有停，有时雨还很大。上山来到这个村庄，只见雾濛濛的，看来我们所到之处一定相当高了。我们攀登了很长一段路，几乎没有往下走。昨天半夜就雷鸣电闪不断，现在更厉害了。我们乘车一整天，沿途经过的地方都是最充分得到利用的肥沃田地，但田块不大。在

这样小块的田地里，连使用手扶拖拉机也可能是不行的。雨水太多了，连水牛也差不多被泥巴没过了前胸。今天看到的男人用水牛在稻田里耕作的情景，一定同三千年以前的情景差不多。小块的菜地和粮田，多数也同许多年前一样，常常成曲线形，一块接着一块，互相分割，而又连成一片。水从水渠流到菜地，然后依次流到稍低一点的地块。遍地金黄色的油菜花更使景色增辉。这里有多种果树，柑橘和桃树，正花满枝头。但没有柠檬，要再往南边一些才能看到。美丽的红色杜鹃花，开满山头。

在小一些的城镇里，到处有猪、鸡、鸭、鹅，还有不少难看的狗。这些狗到处逛荡，我怀疑是否有人喂养。它们象清洁工捡垃圾那样，能捡起一点什么就吃什么。多数既瘦又小，好象是猫、小狼和普通狗相配的杂种。我想这些狗是供人们宰来吃的，但没有哪一只狗身上有多少肉。

一种树上盛开着非常漂亮的白花，张先生说这叫梧桐，花朵就象我国的七叶树，不过这种树是先开花，后长叶子。这里也有许多樟树，我们曾路过有“中草药之乡”雅称的樟树镇。

我们在一所冰凉的宾馆停下来吃午饭。有人领着我们到一个套间，卧房有两个双人床，会客室摆着普通沙发和椅子，盥洗室内既有中式蹲坑，还有西式抽水马桶，尿池、浴盆、面盆，自来水一应俱全。饭后我们上床休息，把一切能盖的东西都盖在身上。

沿着整个公路，有许多标志牌，使我们回想起童年时代看到的缅甸牌刮胡刀广告。这些标志牌上写着（当然用中文）提醒司机的注意事项：

注意安全
不开英雄车
不开有毛病的车
文明驾驶
禁止骑车人攀扶卡车
禁止酒后开车
谨慎驾驶
不得与司机交谈
不得人货混载
遵守交通规则
不忘安全
祝您一路平安
小心路滑
不得随便停放车辆
宁停三分,不抢一秒
禁止开快车

在房屋上还写着几条"文化大革命"留下来的口号。还有一块标志牌上写着:"军爱民,民拥军"。这是"文化大革命"后的标语,旨在消除可能存在的反对军队的不良情绪。

给我们开车的是一位非常小心谨慎的好司机,一点也不象以前为我们开车的某些司机那样。他对车辆特别爱护,颠簸之处或遇上小坑,都减速行驶。按照规定,开车碰撞了一只鸡,只算一次事故;如果碰撞了一只鸭、鹅或者其他动物,就得赔偿。

我们在5点左右到达此地,天气真是沉闷得很。在习惯了北京的干燥气候之后,这里显得特别潮湿。我的衣服总感到又潮又冷,不管穿多少衣服,我总觉得冷。这里比我回忆到的

锡金的情况更不好。在锡金还有火炉子，而这里什么烤的也没有——因为烤火太花钱，而且这里燃料短缺。

我们刚到达不久，地区专员就设宴款待我们，作陪的有一位历史学家以及县里或镇上的其他代表。这位专员四十六岁，有五个孩子。他的年龄较大，当时还没有作出关于一家只生一个孩子的新规定。关于这个问题，大家讲了许多笑话。宴会共有二十道菜，冷盘做得非常别致，用萝卜雕成凤头，用蔬菜和肉片做成凤身和翅膀。每上一道菜就祝一次酒——为中国，为美国，为中国朋友，为美国朋友，为中美友谊，为未来干杯等等。中国宴会最大的优点就是开始得早，结束得也早。8时我们就回到了房间。

4月7日 星期六
井冈山

早餐时，我们喝了很好的热牛奶和咖啡。这个地区供应的是粗糖，我很喜欢吃；而北京象我们国内那样现在只有精制糖。

刚吃过早饭我们就登车启程，车子在浓雾中行进，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到达了毛泽东的红军曾经使用过的几个哨所。1927年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之后，他在这座山上呆了两年零五个月。在南昌起义的同时，毛泽东在长沙地区为组织另一次起义而辛勤工作。他发动的这次秋收起义也没有成功。起义的红军暂时被以前的同盟者国民党人所打败，就撤退到这个人烟稀少的险峻高山地区。

天下着倾盆大雨，云雾朦胧，几乎什么都看不见。偶尔乌云散开或被风吹走，有几分钟时间我们可以看见其它山峰。有时我们下车，身穿雨衣向瞭望哨所走去，但多数时间只能坐在车里。我们在茅坪停下来，在另一所阴郁的宾馆里吃午餐。

我们曾两次下车去参观一些结构非常精美的建筑物。两处都是为兴办学校而建起来的，每座建筑物都有一个美丽的中央庭院，房间就建在庭院四周。在第二座建筑物的顶层，陈列了毛泽东在这里使用过的床铺和书桌。屋顶装饰得非常漂亮，成曲线形的两侧绘有猪、鹅、树木、花草，真是可爱极了。

我们参观了一所祠堂，那是用围墙围起来的非常壮观的建筑的一部分。祠堂是举行宗族集会、祭祀祖先和安放死者灵位的地方。宗族是一种扩大了的家族，一般几百人，七、八十户。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建筑既没有被国民党破坏，也没有被红卫兵所摧毁。答案是国民党不会毁掉祠堂；换句话说，当时中国人谁也不会这么干。红卫兵崇拜毛泽东，崇拜井冈山这一特别地区，因为毛泽东在这两所房子里工作和休息过，所以红卫兵不会触动这些建筑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当年经常住在较好的地方。我想由于这个缘故，一定还保存下来许多漂亮的房屋，不过因年久失修，也许破旧不堪了。今天我们经过了一处设有栅栏的关卡，只有抬起栅栏才能让我们通过。这是一处检查站，以防止人们到山里非法砍伐树木。

杰克向我们谈到有关中国天主教会的一些趣闻。天主教是在1557年葡萄牙占领澳门后传入中国的。教会内部对是否应敬奉祖先，意见不一。多明我会① 修道士反对敬奉祖先，

---

① 多明我会 Dominican，是天主教中的一个教派——译者注

说这是偶像崇拜，并以此说服了教皇。耶稣教会把敬奉祖先看作是尊敬老人的延续，认为这不同于崇奉上帝。这一争论使中国教会的发展推后了200年。皇室不皈依教会，但与教会有许多文化和知识方面的联系。由于对这场争论感到厌烦，就同两派教会都断绝了关系。

4月8日 星期日
赣州

今天上午我们在井冈山同包括博物馆馆长在内的几位专家举行了一次“讨论会”。换句话说，进行了许多交谈以便弄清一些事实。在博物馆里保存有埃德加·斯诺描写的那两个土匪——王佐和袁文才的照片。不过我没有去参观那所博物馆。他们两人是以共产党员和重要人物的形象在那里出现的。埃德加·斯诺写道，他们参加了毛泽东的队伍，成为井冈山地区红军的一部分，不过1929年毛泽东离开后，王和袁又重新按土匪的方式行事。对哈里森一再追问所作的答复是：毛泽东第一次到井冈山时，王、袁二人都提防着他。毛泽东同袁见面后达成了一项协议：毛泽东出钱买下100枝枪，袁承诺为红军建一所医院（就是我们昨天看到的第一所学校所在的那幢建筑物）。显然这两人都拥有一些枪枝，各有200人左右的队伍，靠打家劫舍生活。

王佐不大愿意参加毛泽东的队伍。他说：“如果你把我的头号对手尹道一（其总部设在赣州）的脑袋拿来，我才承认你是当真的。”毛泽东派了一名顾问何长工同王一道工作，争取

他回心转意，颇有成效。但王反复提关于他的老对手的问题。最后，何长工领导的红军进攻了尹的总部，把尹活捉了。王的部下见到尹仇恨极了，一下把他的脑袋砍下来交给了王。这样才使王相信红军是真心诚意的，而且富有军事才干。王从此心悦诚服，投靠了红军。

在 1929 年 1 月毛泽东搬到瑞金以前，这两股力量是为共产党作战的。之后他们又恢复了土匪生涯。一部分共产党人请他们来开会，伏击了他们，并把袁杀了。王夺窗而出，跳上马逃跑，不知怎么搞的掉到一条河里淹死了。后来王佐的兄弟王云龙控制并占据着这座山，直到 1949 年共产党人在全国夺取胜利。真可谓一段故事，但不怎么优美。刚开会时，还没有听到上面这些情况，只是听那位博物馆长坚持说这些土匪是好人，我当时就在笔记本上写了下面一段话："也许人们正在为这些人写历史，在事隔多年之后，清除那种把他们当成土匪的看法，而且力图使他们成为英雄。"博物馆馆长说，把他们称作土匪是不恰当的，因为他们做了许多好事。哈里森问："那么为什么毛泽东把他们当成土匪呢？难道他不知道他们所做的好事吗？"没有得到答复。

哈里森问到 1927 年毛泽东来到之前以及他到达时井冈山的情况。当时这里有一位医生和一些私立学校。有钱的家庭合作开办学校，聘请教员给自己的子弟上课。而穷人的孩子则上不起学校。人民迷信鬼神、观音菩萨和龙王。

秦将军建议我们提前在 11 点 30 分吃午饭。他说今天路程遥远，而且道路不好。公路的许多地段都在修整，到处是石头，颠簸不平。山上的杜鹃花就长在岩石近旁，大多是浅紫色的，也有少数红色的。

我们经过许多村落。我在笔记本上写道："如果不是象我们今天这样亲眼看到这一切，任何人都难以想象过去这地方是多么贫穷，也不能理解毛泽东所创造的奇迹"。今天的贫困已够使我吃惊了，我简直不能想象以前这里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不理解人民在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种条件下生活怎么会不生病。然而他们已免于疾病之苦，不再患疟疾，也消灭了血吸虫病，也消灭了过去引起儿童死亡的肺结核、白喉、霍乱、伤寒。这里教育人民任何时候都喝开水。每个村庄都有赤脚医生（医务辅助人员）打预防针和看一般的病。以我这西方人的眼光来看，不管一切是多么原始，但人民群众是健康的。

在这远离公路的乡村，还保留着许多在较发达的地区不大看到的或已经过时的口号：

毛主席万岁
学习毛主席著作
中国共产党万岁
前进
备战、备荒、为人民
为人民服务
破四旧立四新
打倒旧世界——建立新世界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人民公社万岁
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
解放台湾

在山区的道路上，我们看到了许多公共汽车和卡车，其中还有运肉的冷藏车。每隔若干英里，就有黄色的压路机，配合以手工劳动为主的道路维修。在一块稻田里，一位男子正用黄牛耕田（中国人称多数干活的牛叫黄牛，实际上是棕色的牛）。虽然那头母牛在齐膝深的泥地里耕地，背上却披着防雨的塑料布。杰克说这就是个体农业所有制的证明。如果牛是属于公社所有的，他就不会对牛那么细心照料。一位妇女在河边洗衣服，她蹲在桥下以免被雨淋着。

我们本来要去兴国县，但因河水上涨，乘渡船过河不安全，所以我们又在赣州的宾馆住下。这种宾馆遍布整个中国各偏僻的地方，都是解放后建起来的，并非供旅游者而是供中国党的官员和高贵人物使用的，一般都用围墙或篱笆圈住，人们从大门进入，夜间门总是上锁的。我们住过的宾馆有一、二层的，也有三层的。在北京的大宾馆区，是一所风景优美的花园，许多幢房子分散建在其中，有小桥流水，奇花异木。本月下旬里根总统来中国时，就住在那里。

一般在宾馆的正中央是楼梯，登上一半再折向上一层楼。厕所有时在楼梯旁边，有的有自来水，有的没有。男女厕所总是分开的，但经常紧挨着，用低于天花板的间墙隔开。楼房中间有一条通道穿过整个建筑物，两边都是房间。在这个地区以及我们将要去的地区的宾馆里，多数房间没有盥洗室和自来水。即使在没有自来水的地方，我们也享受特权，总是安排住最好的房间。房间里热水瓶内常常有开水，这无疑是旅行者最大的奢侈，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冲牛肉汤或者沏茶、冲咖啡喝。茶叶是随时提供的。

迄今为止，在这次旅行中我们一直住的是套间——起居室、卧室和盥洗室。天花板约15英尺高或更高些。卧室内有两个大床，或者一个双人床和一个单人床。一块象台布那样的厚布盖在床垫上（床垫厚薄不一），一条丝棉被或棉被同厚毛毯卷在一起铺在床上。枕头略嫌硬实些，外面套上漂亮的绣花枕套，再盖上枕巾。除大城市的旅馆外，浴巾就象我们擦盘子用的毛巾那么大，薄薄的。中国人旅行时，一般把毛巾卷起来放在搪瓷杯里带着。这里我们来到了一个痰盂之国（客厅里摆了四个，卧室里二个，盛着半痰盂水），这使我讨厌极了，我把它们通通推到一边去了！

我看中国人大概是不付房钱的。对我们来说房费因地而异。有时一人付人民币25元，有时我们俩人付32元，有时则50元。价钱似乎同房间的质量无关，而是随便定价。

4月9日　星期一

兴国

上午我们乘车出发，大部分时间是沿河而行。景色不象昨天那么壮观，显得原始、贫困。在村子里，猪、鸡、狗、大人、小孩——都奇怪地挤在一片稻田里，据说他们平常并不这样。在每块田里，都有一个厕所用来积肥。田野一片青翠，作物生长茁壮。到处汪洋大水——河水已经淹没了一些农田。

这里是甘蔗产区。甘蔗收割后，蔗根挖出来放在路旁晾干当柴禾。短的蔗杆卖给人们当水果嚼着吃。我们一行中，有几位只要能买到也喜欢买些吃。

毛泽东曾经走遍这个地区的农村进行调查。他发现 24 万人中，地主、富农占 6 %，他们拥有 80%的土地。贫农租种地主的土地，向地主交 50%到 60%的地租；借钱索要 30%的利息；借粮 50%；借牛 75%；借盐 150%，借油 20—200%（我们还以为我国的利率很高呢！）。有八万人参加了共产党，包括少数富农。

毛泽东制定了法律作为改革的依据，对农民的生活也作了规定。土地分配给农民，甚至分给乞丐、娼妓和小偷。盲人和残疾人的田地实行代耕。人人都免于债务，都享有政治权利。不许抽鸦片，不得偷窃，做到了夜不闭户。这里他们提出了“四自”：自立、自尊、自爱、自重。

我们吃了一顿鲜美的午餐，但有些过饱了。在这里，杰克、哈里森和我三人另坐一桌用餐，屏风将我们与中国同伴隔开来了。杰克说得很清楚，我们只要三个菜，加上米饭，但吃的总是至少六菜一汤，外加馒头、水果。似乎没有什么办法，不管我们吃不吃，反正得全部付钱。还给我们上了一瓶当地出产的烈性酒，有点象茅台，对我们来说这酒是太凶了。

下午我们来到博物馆内一间冰冰凉的房间，和过去在天安门及其它所有地方一样，这里至今仍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照片。我们同一位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在这里呆过的小个子老头进行交谈。显然关于他本人的经历，他已经向人介绍过多次了，因而说得津津有味。他今年七十九岁，出身贫农家庭，当过石匠，妻子七十二岁，有五个儿女，八个孙儿、孙女，重孙辈也有六人，全家共有二十七口人。

他 1929 年入党，为地下组织联络、送信、张贴标语等。长征开始时，红军一离开，又来了国民党。凡是与共产党有关系

的人都要被处死，所以明智的做法是不承认与共产党有任何关系，同朋友订立攻守同盟。少数人被仇人出卖了，有些人逃进山里，但多数人还是呆下来了。他说，这个乡村 9,000 多人口中，大约有 2,000 人被杀害。

晚饭后，一位小个子妇女挑来两桶热水给我们洗澡用，由于负重，她步履蹒跚。这里虽不象井冈山那样湿淋淋的，也不那么冷得令人发抖，不过还是很潮很凉，床上不加加热，简直没法睡。谢天谢地我带了三个热水袋。尽管电灯时亮时灭，哈里森点着蜡烛，还在噼噼啪啪打字。

4 月 10 日　星期二

瑞金

上午 8 点离开兴国，我很高兴离开这里。在兴国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能闻出一股潮气、陈腐味、霉味——真是太可怕了。瑞金要好一些。我们的住房有一间宽敞的起居室，一间大卧室和一间令人恶心的盥洗间，至少算个厕所吧。有人告诉我们，晚饭后有热水，一位姑娘走进来，打开浴盆的水龙头，开始放出来的水中尽是铁锈。我和哈里森都洗了头，洗了澡，一拔开浴盆的塞子，就水流满地。这决非偶然，因为浴盆底下的边上有一个洞，中国的盥洗间的地面通常有一小排水沟。

这些盥洗间看上去象装有水泥地板和墙壁的旧牲口棚，浴盆安在大块水泥板上，抽水马桶支撑在另一块水泥板上。我这间盥洗室的设备是搪瓷的，其他房间的则是花岗石或深色石头的，我的这间比许多其他地方的盥洗室干净得多。但

是从整个来讲，这些东西是那么不吸引人，普通美国人见了也会吓一跳。我多要了一些毛巾来擦干头发，后来不得不用它来擦地板。不过，这还是离开北京以来我们住过的地方中通风条件好得多的一处，也是更能使人精神振奋的一处地方。

上午我们乘车经过一些景色秀丽的地方——大片由大小黑色石头组成的险峻山峰，有些象桂林的景色。大部分地方的土地是红色的，重新培植着密茂的小树林。过去国民党把这个地区的许多地方都烧光了，加上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在砍伐树木，将树林中的矮小灌木作燃料等用途，把山搞得光秃秃的，现在也还有一些山是光秃的。有几处地方，树木已成长起来了，如果能精心管理，这里能成为真正的森林。很多树木是新种的——树高最多只有两英尺左右。

我们看到了参加长征的人当年走过的小道（那时根本没有什么路），也看到了一些可爱的只能走人的旧桥，大小不一，但形状和建造方法相同，都是架在小河上的石头拱桥，两边都有石级。有些桥上的石级被磨平以便自行车和人力车通过，这样一来，其漂亮程度要逊色一半。

我们将当地人送给我们的白酒转送给中国同伴们，有一瓶在车上就溢出来了。那气味差不多同我们的衣服那股气味一样难闻。

我们在于都县吃午饭。国民党包围中央苏区时，毛泽东于 1934 年 10 月 18 日开始的长征，就是在这里出发的。我们参观了他临走前住的那所房子，也去看了他渡过的那条河，是小船搭连起来的浮桥上通过的。当时整个部队——大约 8 万人——在一个星期内全部渡过了河，有些地方水不太深，就涉水而过。

我们还参观了石云寺，一所建在小山上的美丽建筑物，也是毛泽东短期住过的另一所房子。他经常搬来搬去，因为这比长时间住在一个地方安全些。

在回来的路上我们在一所雄伟的旧祠堂停下来，听了一次典型的令人厌烦的情况介绍。再乘一段车，就回到了这里。我们的“套间”的窗户是开着的，虽然浴盆漏水，马桶抽不下水，我们总算一身干净了。

4月11日　星期三
瑞金

今天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去参观毛泽东过去的卧室、会议室和开调查会的地方。他喜欢挑选最好的地方，所以差不多所有他的总部所在地都是设在地主的房子、祠堂和寺庙里。然而我们看到的全都是令人害怕的形象——肮脏的白灰墙，硬邦邦的泥土地面，有时是石头地面；除了一张经常挂着蚊帐的床、一张粗糙的桌子和这位伟大人物当年坐着组织活动或者写诗用的凳子以外，别无他物可看。这些建筑物一度油漆粉刷得金壁辉煌，有些雕刻着动物花鸟的木制品真是好极了。1929年至1930年，共产党接管了这些地主的房子。

共产党人离开后差不多一个月，国民党就来了。那些没有被处决的地主又夺回了他们的财产。这些房屋大概是唯一没有被国民党毁掉的建筑物，“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未受到破坏，因为毛泽东在这些房子里住过，对红卫兵来说，他是神圣的。天晓得国民党回来后人民的遭遇如何，许多人被蒋介石

的士兵杀害了，其中在离瑞金不远的大柏地被活埋了100人，而幸存下来的人都被剥夺了一切。

虽然我对关于各种会议和起义的重复描绘已深感厌倦，我也被所有这些军队番号所困惑。但是我每时每刻所听到的是：毛泽东如何"动员"农民；如何同那些愚昧无知、受尽虐待凌辱、多少世纪一直照旧生活下来、似乎并无显著能力的人民一道，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在进行这些工作的同时，把军队团结起来，争取和保持对军队的领导，先后打败了蒋介石和日本人；……我越是想到一位卓越人物所作的这一切，就越觉得这是多么令人鼓舞和多么令人感动啊。

《时代》杂志曾对哈里森说，他们想为他这次旅行尽一臂之力，不知道能否派一位摄影记者来这里，对这次长征的开始部分拍些照片。但是所有我们去的这些地方都是不对外国人开放的，所以这是根本办不到的。我们一路都在拍照，等我们14日回到南昌以后，将寄一些照片到北京去，希望其中有些能派用场。

这里的市场到处都有个体户出售他们的产品——这就是我们听得很多的所谓私人企业或者"责任制"。市场上蔬菜多极了，梨、橘子、甘蔗也不少，小摊上还卖中国式"快餐"，热气腾腾的碗面和其他很快能做好的炒菜。

一路上都有私人建设的公用厕所，建造人得到粪便去浇菜地。有时一排三个厕所，我们不知道谁会去上中间那一个！

在当地主人为我们举行的宴会上，秦将军为毛泽东祝酒："如果没有他，今天我们谁也不可能围坐在这张桌子边。"这一想法很有意思。

4月12日　星期四
宁都

上午我们开了一次“座谈会”，从8时30分一直开到中午。会议室摆满了大沙发和椅子，沙发套和椅套都是用鲜艳的橘红色花锦缎做的。可惜这不很适合这里的气候；已经弄脏了，而且闻起来有股气味，似乎经常是潮乎乎的。面对哈里森提的许多问题，这位可怜的博物馆“历史档案主要负责人”难于对答，只好一再地说，他不知道。哈里森也为难，因为他不希望有谁面子上不好看，可是如果他的问题得不到答案，那么一路跋涉花费近四个月的时间来这里旅行，就没有多少意义了。在北京的那些人对他更有帮助些，也许他们知道的事更多。

哈里森说，对以下几方面的情况，他希望心里能有个轮廓：长征开始时的农村是什么样子；当时什么作物收割了，哪些作物还在田地里没有收获；1934年10月毛泽东离开时的天气怎么样等等。当年这个时候天气一般是好的（现在也是这样）；第二茬水稻还未收割；大豆已经拔下来——这里收获时将大豆连根拔掉——放在篱笆和屋顶上晾干；红辣椒已用线绳穿起来挂在房子里；有些瓜类已收割完了，但西瓜、豆类和红薯还在地里。当年不象现在这样种这么多甘蔗，仅仅少量种一点供食用，现在广泛用作工业制糖原料。当时这里也有鸡、鸭、鹅、水牛和黄牛。红军是在夜间离开的，那天很可能有月光。派了一支先遣队在前面探路，并一路留下人当向导。他

们都是夜间行军，白天荫蔽起来。

象人们告诉我们的那样，红军过河采用小船和用木板毛竹拼联起来的筏子，宽度可容两、三人并肩行进。我们又一次听说，八万人用了大约一个星期才渡过那条河。

哈里森说，他看过一份材料，里面讲到曾给李德建了一所房子。但这里的人说李德是住在一座庙里。看来是将一座庙改建成了李德的住所。杰克说，大概仅仅把一些偶像搬走。接着一位中国人说："搬进了另一个偶像。"这句话引起了一阵笑声。

今天午饭是在这个最吸引人的地方的最后一顿饭了，也是我们到中国以来吃得最好的一顿：有肉馅豆腐泡，鸡丁炒小豆荚，白菜心，面条，汤，还有柑橘。

午饭后不久我们就离开瑞金来到宁都。我们到达市区时，受到乘坐吉普的公安局长的欢迎。他领着我们穿过迂回曲折的狭窄街道，那里有卡车、大人、小孩、猪、大捆的常绿树枝、竹子等等；他急躁地向那些没有让开路的人摇晃着一面红旗。宾馆建在山上，可以俯瞰市区。我们住的是一间小房间，倒挺合我们的心意。床就是一块铺板，不过倒有一个可以使用的洗手间。在杰克的房间贴有 1982 年制定的一张住房规定：

"1. 夫妻同住一屋，须持有结婚证或单位证明信。

2. 尊重负责人的权威，出示经批准的旅行证件。

3. 严禁赌博、非法开业、不道德行为及其他非法活动。

4. 自觉遵守并协助负责人执行本规定。

5. 不遵守本规定者，要进行批评教育，或者勒令离

馆。特别严重违犯者要依法处理。”

4月13日　星期五
抚州

1931年，国民党的一个师在宁都起义并参加了共产党的队伍。今天上午我们参观了德国路德教传教士以前的住宅，上述事件就发生在这所房子里。这是按二十年代典型的军阀住房建造的，象一所南方的大厦，每边都有阳台，房间宽敞通风，比起一般的中国房子，既庞大又豪华。信奉上帝的人对物质条件那么讲究，真是怪事。我认为，过着简朴的生活去传播圣经会更便当些。

国民党的这个师当时驻扎在镇上最好的建筑物里，他们参加共产党的队伍以后，这所房子就改成红军的总部，现在是一所博物馆。

我没有想到在中国会有那么多传教士——显然有好几千人——或者说每个县城至少有一所大的基督教堂。就象他喜欢大房子一样，毛泽东也喜欢教堂，在教堂里召开过许多次会议。第一批来中国的传教士是意大利人，甚至在马可·波罗以前，这些人就当上了皇帝的顾问，将科学、数学、医学带到中国。后来，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的传教士也来了，其中多数是英美人。

1900年义和团起义期间，因为其宗旨是在中国消除所有外国人和西方的影响，许多传教士被杀害。三十年代，共产党人认为传教士是“外国帝国主义的特务”，他们中许多人逃到

了大城市，有些人被捕，被随意关押，也有被杀害的。

我从来不大赞成传教运动。在孩提时代，我记得教堂里就在为“不信教的中国人”募捐。一个不到300年历史的国家，却要去教训别人，特别是去教训象中国人这样具有古老文化的人民应该怎样思想和行动，当时对我们来说，这似乎就是自以为是和荒谬的，现在回想起来，更觉得确是如此。不过，传教士在这几个方面对中国也是有所帮助的：如：建了一些学校，大学和医院；在许多情况下，教会是美中友谊的基础——杰克·谢伟思就出生于一个传教士的家庭，我国驻北京的大使也是，他们两人都会说中国话，因为有这种背景，对中国的了解远比许多人强。约翰·赫西是另一位，还有卢斯家族——真是不胜枚举。

1931年起义那天晚上，国民党那个师的军官正在这所大房子的二楼举行晚宴，师长宣布，他们准备去参加共产党的队伍。有两名军官不同意，跑步离开宴会，从阳台上跳下去，但被包围这所房子的红军战士抓住。作为一所博物馆，同我们看过的许多博物馆一样，陈列的也是一些陈旧的图片，几面旗子，许多装上镜框的照片，拍摄的内容是命令和信件，偶尔有一张毛泽东、朱德或周恩来会见战士或召集会议的油画。这些画很少有署名的，而是由“一批艺术家同志”集体创作的。

我们提前吃完午饭后就离开宁都，乘车到抚州。路程很远而且颠簸。我们在抚州没有什么活动，只是远道乘车回南昌之前，在这里稍事休息。

4月14日　星期六
南昌

从抚州到南昌乘车大约两个半小时，沿途经过的地区土地极其肥沃，植被茂密。西面都是大山，另外有些荒秃多年的小山，也正在重新绿化。从松树和云杉粗大的树干来看，植树造林活动已经进行很长时间了。有些树龄已达二十年，有些则是新栽上的。红色杜鹃花遍地皆是。哈里森和中国同伴都认为杜鹃花是野生的；我看不出怎么会是野生的，因为这些花就长在树木刚刚开始生长的地方，而且我还看到了一所杜鹃花苗圃。我知道杜鹃花是一种自然野生植物，可是在这种树木被滥伐的地区，只有靠很大的外力推动才能生长。

在水田里我们看到了四台小型拖拉机，我倒认为水牛或黄牛会更优越些，因为牛可以耕到紧靠地块的边角，且不会被泥巴粘住，还可以生产肥料；而成本则差不多相同。

到处看到坟墓，包括一些新坟。我原以为这里禁止土葬，谁死了都得火化，但显然火葬并不是强制性的。坟墓占去了好地，有些甚至就葬在菜田中间。一些新坟上放着纸制大花圈；在小山上，我们看到一座坟上放着一种象三色画的花圈，这些用花花绿绿的印刷纸做成的花圈，象难看的糖果盒，真是俗不堪耐。

我们到达南昌时，正是一片阳光灿烂。住的还是原来的旅馆。午饭后会见了两位文质彬彬的教授，可是他们知道的事情还没有哈里森和杰克知道的多。哈里森想了解毛泽东离

开根据地以后这个城市所发生的情况。当时红军的外围根据地已经陷落，因此人们大概在猜测，蒋介石会将红军歼灭掉。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要进行长征，连毛泽东本人也不曾想到。他当时可能想，打几个胜仗，再回到红色根据地去。

经过几天到共产党老根据地旅行，听到许多关于当时围剿和反围剿的情况说明后，我终于开始对当时发生的情况有了一个较好的了解。大约从1931年开始，蒋介石就发动了多次大规模的战役来围歼共产党人。共产党人的主要根据地位于江西省的瑞金、于都及周围山区，即我们刚去过的那些地区。在第一、二、三次围剿中，国民党包围这些山区，企图迫使红军受歼或投降。在此期间，毛泽东负责指挥作战，他的有进有退、极力迷惑敌人的战术是成功的。共产党人在这三次围剿战役中都取得了胜利，从俘虏中补充了许多新的兵源，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

第四次围剿是在1933年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发生问题的时候发动的。如象周恩来在以后多次做过的那样，他力图把各种力量团结在一起，在这场反围剿斗争中，虽然共产党人从总体上说取得了胜利，但遭到了严重的损失。

第五次围剿是在毛泽东受到排挤之后进行的。博古和李德负责指挥，他们认为正面拒敌，坚守不退是最好的战略。这是一场灾难，受了一次决定性的打击。共产党人意识到他们不得不转移。

国民党人的基本战术是建立碉堡，那是一种钢筋水泥结构，每边都安有机枪。在他们认为红军会悄悄经过的地方，到处建有这种碉堡。共产党人只能用手榴弹攻击这些碉堡，多数情况下只能算计着如何绕过碉堡前进。

巧合的是，一方面是李德指挥共产党人作战，而另一方面是德国人冯·塞克特将军在蒋介石那边当顾问。碉堡战术就是后面这个德国人建议的，而国民党人最终却是以此取胜的。李德采用的同样是德国的办法，当然，对于由农民出身的战士组成而又没有足够的武器的红军来说，面对着装备精良的国民党部队，用这种办法想要取胜，那是行不通的。

共产党人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粮食和供应方面的困难。虽然农村里也有市场和商店，但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当时食盐、棉布和火柴都实行配给，手电筒用的电池需要量也很大。这就鼓励了走私贩子，凡是能设法通过碉堡的人，对货物都索要高价。有多种多样的走私办法，如在小船上装一层伪装的船底；大粪桶内藏货物，只是在上面装上薄薄的一层干粪。走私者只要在这里那里给一点点贿赂，就能出入国民党的封锁线。

我们参加了当地政要举行的宴会。饭菜可口，"烈性酒"饮料也很不错。

4月15日　星期日

南昌

上午我们会见了一些长征的幸存者。其中突出的一位是身材不过4英尺5英寸（也许还没有那么高）个子很小的妇女危秀英女士。她现年七十四岁，穿戴兰灰色制服和帽子，布鞋的跟有一英寸高。还带着一个用兰、白两色棉布手工缝制的提包。她表示有点害羞，希望别人先谈，但话匣子一打开，什

么也打不断她了。她出身于农民家庭，五、六岁时就被卖到小镇上一个商人家里，以奴婢的身份参加劳动；如果她愿意，最后可与那家的一个儿子结婚。在约定的时间里，那位商人派了一名男子来接她。这位男子把她背在背上，她就大闹一场，又踢、又叫，还咬了那个男子的耳朵，弄得他毫无办法，最后她的家人只好把她领回家去。

在自己家庭里她度过了十年，放牛、种菜、拾柴禾，叫她干什么，她就得干什么，还挨打受虐待。那时她对革命一无所知，但听说过红军，为了表示同情红军，她剪掉了头发，家里把她当成女土匪。她逃离家参加红军时才十六岁。同其他妇女一道，她照顾伤病员，但也经常带着枪。她说，她参加过吉安的一次战斗，当时一点也不害怕，“你要干革命，就不会害怕。”

我们得知，她是参加一方面军长征的三十位妇女之一，也是留下不多的幸存者之一。她和其他妇女一道从瑞金出发开始长征，任务是照顾伤员。她们离开的那天是一个晴朗的夜晚。白天她们用树叶和树枝伪装起来，如果没有敌机，就日夜兼程，她根本没有提到睡觉。她谈到了长征之前突破第一次围剿的情况和由于吃野菜得病的情况。她说，当时战士是那么年青和天真无邪，当某个妇女来月经把血沾到路上或河里时，就以为她是被枪击或受伤了。

在到达延安之前，她还不会看书写字，在延安她上了红军学校。她说，毛泽东常到班上来并阅看他们的作业。如果学生需要更多的帮助，他就坐下来，给他们上课。学生都围坐在他的身旁，用膝盖当课桌。学生爱戴他，就不足为奇了。

在一所博物馆里陈列着五位年青女战士傲然挺立于悬崖之上的照片。她们遭到国民党兵的追击，一直坚守到弹尽粮

竭，然后跳崖——都是些十多岁的姑娘。没有多少美国人能想象得到生活中的痛苦是如此骇人听闻，以致她们宁死也不向国民党兵屈服，宁死也不愿再过中国封建制度下的妇女的生活。经过在革命发源地的这段跋涉，使我对这一切有了比过去深切得多的了解。

另一位同我们谈话的幸存者是吴吉清。从1931年到1937年，他担任毛泽东的警卫员达六年之久。他向我们谈了关于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的一些引人注意的情况，我不知道他所谈的情况是否真实。他说，贺子珍和毛泽东是在1928年或1929年在井冈山结婚的。1929年他们离开井冈山时，她在福建省生了第一个女儿，当时把孩子交给了一个农民。1932年毛泽东回到该地区时，曾找过这个孩子，可是没有找到。吴说，“他当时匆忙得很。”1932年贺子珍在瑞金生了个男孩小毛。她的妹妹贺怡同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结了婚，长征开始后他们和其他一些人留在苏区。贺子珍把那个两岁的男孩交给了她的妹妹和一个保姆。国民党来了之后，贺怡把孩子留给了农民，她和毛泽覃企图逃走。毛泽覃被杀，她却逃脱了，最后到了延安。解放后贺怡找到了那个知道孩子所在的保姆。可是她们因车祸致死，孩子始终没有找到。1933年贺子珍还生了一个早产男孩，孩子夭折了。吴说，长征开始时，贺子珍又怀了孕。生下的这个女婴也留给了农民，同时还给了农民一些银元。后来这女孩也根本没有找到。

在延安，这位可怜的夫人又生了一个女孩李敏，现在还活着。我们还听说，长征结束后当她去莫斯科时，她又生了一个男孩，病死于护士学校。

贺子珍不仅仅怀过几次孕，还因掩护一位坐担架的干部

而受过伤，而那位干部的警卫被打死了。长征时贺子珍大部分时间也是坐在担架上让人抬过来的。

真是话从那里说起。回忆一下在北京，同我们交谈过的几个人都说，据他们所知，贺子珍在长征时根本没有生过孩子。对比起来倒是很有趣的。

吴吉清说，贺子珍是一位勇敢的妇女。

下午我们去省立图书馆，它在市中心靠近湖边的一所旧房子里。那里曾经几度是蒋介石的总部所在地，前后约三年之久。正是在这里，蒋介石指挥了第五次围剿，终于把共产党人赶出了这个地区。哈里森想了解当时有些什么新闻报导，那时中国的情况如何。他看了 1934 年 10 至 11 月期间的几份国民党报纸《民国日报》。他在笔记本上写道："那是一份每天十至十二页刊有许多广告的大报，多数广告登的是治妇女病和男性补肾的专卖药"。

报纸上所刊文章的主题都是关于"赤匪"的失败和退却，他们对士兵的残暴，缺乏食物，许多人投奔国民党；国民党人如何稳步前进；红军开小差或者投奔国民党军；全体人民如何兴高采烈等——无非是任何军队宣传敌军如何如何不好的那些内容。1934年 10 月 28 日那份报纸的头条新闻是国民党占领宁都——即我们刚刚去过的那个地方。

4 月 16 日　星期一
去贵阳的火车上

我们早晨 4 点起床，然后同那位服务周到的好司机和江

西省外事办公室的两位同伴一道乘小型客车，约一小时到了郊区一个地方。这次火车虽然在那里停车，但并非真正的车站。我们来得太早，而火车又晚点，所以等了45分钟，有的站着，有的在附近转转，有的做做操。秦将军的太极拳打得很好。我则善于向前屈体，能将双手平放在地上而膝盖不弯；这一动作使在场的每个人都为之惊异。

那天正好有一轮满月，快天亮时景色优美。许多人用自行车驮着大袋的粮食，奔向城里的市场。

我们和杰克同住一间包房，天气不算很热，听说进入贵州省之后，那里经常阴雨连绵。哈里森整天忙着打字，我则读完了我喜爱的《西奥菲勒斯·诺思》，又开始读威拉·卡瑟的短篇小说。

8点30分我们经过桂林，可以模模糊糊地看到形状奇异的岩石地层。我不知道确切的名称，杰克说这是受侵蚀的石灰岩。哈里森说象倒置的钟乳石洞穴。杰克认为，上面有一层绿色，说明并非坚硬的岩石。无论如何，我们至少对桂林的奇观异景，有所领略了——我不相信我们能找到任何能同它媲美的地方。

4月17日　星期二
贵阳

火车刚离开桂林，我们就提前上床，杰克睡在上铺。11点30分，新换班的列车员非常令人讨厌，不敲门就把我们的门打开，将一位西方人模样的高个子年轻人领到我们包房内的一

个空铺位。由于我们的提包和衣服都放在那里，杰克和哈里森不得不起来把全部物品搬到地板上或我们自己的铺位上。谢天谢地，这位年轻人并没有来这个包房，也许他认为同三位年老的美国人一起过夜并不那么趣味相投，不过，对于他不想再打扰我们，表现比列车员好，我是给予赞许的。

上午，我们首先经过的地区象桂林那样，可以见到黑色石头丘陵和悬崖峭壁。使我惊奇的是，上面却长了许多青翠的草木，有时在几乎难以看得见的岩石缝隙里，还真长出了一颗大树。这种景色持续约一小时，经过一段平川，又进入有许多隧道的山区。非常小的村庄显得十分贫困的样子——没有电，没有新房子，也没有高烟囱，烟从屋顶上往外冒。

在我们的车厢里，有几个面带愁容的人。一位二十一岁长得俊秀的年轻男子脑子里长了一个瘤，正处于昏迷状态。他躺在一个卧铺上，从脚踝处的静脉作葡萄糖或其他药物点滴，陪伴他的有他的父母(父亲是一家工厂的工程师)、厂的一位代表和一位背他的大力士。他曾到上海和广州去治疗过，医生都说不能作手术，因此只好回家。工厂支付全部费用。

一年以前肿瘤还只有一颗葡萄那么大，现在却要使他致命了，至少他已经不省人事，既不动弹也不说话。他的父母非常痛苦，还因为他是这家的独子，只有三个姐妹。每当听到这种说法，我意识到，在世界上许多地区，女孩仍然不如男孩使人称心如意。

在这列火车上还有十来名西方人：一位美国退役海军军官、几名从温哥华来的年轻人、几个头发金黄金黄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以及一位从海外归来不会说中国话的年轻中国妇女。后者在餐车上同服务员无法交谈，但早餐时能用筷子吃面条。

杰克说，这是中国最穷的省，可以称为中国的阿巴拉契亚山脉。从窗口往外看，只见茅草盖顶的房屋，大小山上土地贫瘠的梯田。

可是，我们第一次到了一个真正可爱的地方。宾馆依山而建，在迂回曲折的公路下边，一条河流蜿蜒流过。这里有一个瀑布，山的对面，在园田化的梯田里，种有葡萄和树木。也有一些岩石。公路边、河岸边，绿柳成荫，衬托出高山背景。这是一幅典型的中国风景画。前门外面，大朵大朵的浅红色牡丹花正在盛开。

我们的房间包括一间面积极大布置得很好的起居室，一间摆着书桌和单人床的小房间，哈里森把它当书房用。卧室则有两张超尺寸的双人床。盥洗室也很宽敞，设备齐全，厕所也有中国式蹲坑和西式抽水马桶可供选用，水龙头供应热水。

住地离车站约十公里，我们看不到城里是什么模样——仅仅路过许多污染严重的工厂，有水泥厂、卷烟厂、烤烟厂和发电厂。漂亮而年青的杨小姐陪同我们并担任翻译，另一位不会说英语的男子安排旅行具体事务。

我们盥洗之后，省长为我们举行宴会，也是第一次荣幸地由省长出面招待我们。省长不是汉人而是一位苗族人，是少数民族中第一位担任省长的。他精力充沛，很有风度，才智过人，富于幽默。整个晚宴中，几乎不停地说话。为我们的中国朋友，为他们的美国朋友，为中美友谊，为哈里森正在写作的这本书，为长征的英雄们干杯等等，不知道祝了多少次酒。有时我也祝祝酒，但今晚一次也没有祝。

这位省长决心使这个省摆脱贫困。他说，这里有许多未

开采的矿藏，工业发展需要专家。他希望各地都开展植树造林，建立畜牧业。他说的是养绵羊，可是我认为在这个石头山区养山羊更合适。他准备从新西兰得到谘询和帮助。我们喜爱上了这位省长，因为他对这里的贫困、缺乏工业技术、以及缺乏对旅游者的吸引力（在其他省这是生财之道），是那么开诚布公。

我坐在省长的左侧，哈里森坐在他右边，杨小姐靠着我的另一侧。我对她说，我很高兴她能坐在我的旁边，希望她不介意。她说："我愿经常在你身边。"我感觉非常自在，特别因为她并不比我吃得更多。

晚宴的安排和服务都很好，开始是冷盘，盘中的菜肴摆成象公鸡的形状，接着下来是九盘十碗，有极好的鲜蘑菇，带着头的鸭子，一碗接一碗的五花八门的菜，还有最后上来的火龙汤①。他们说，火龙一点也不能在受污染的水中生活，说明它是很干净的。即使他们这样推荐，我也无法克服对这种汤的不由自主的反感。

4月18日　星期三
贵阳

今天是我和哈里森结婚二十周年。在这么个奇特的地方度过结婚纪念之夜，当然不象在波士顿。

我们睡得很好，早上8点吃早餐——有粥、三只汤饺（杰

① Salamander 蝾螈，过去被认为能生活于火中。——译者注

克的放了红辣椒，我们的没放——给他这种优待是因为他出生在中国，可能认为我们不吃辣的）、吃粥用的蒜瓣、酱豆腐、还有两个炸鸡蛋、蛋糕、点心、热牛奶和咖啡。饭后，哈里森会见了一位军队的研究人员和当地博物馆馆长。我没有马上跟着去，而呆在舒适的房间里写信。有几封信等着我们回复，得到家中的消息是令人欣慰的。前几次到中国来旅行，一封信也没有收到，而这次却不断收到来信。

等到我去参加谈话时，他们正在谈论黎平会议和遵义会议的问题。1934 年 11 月和 12 月初，红军突破了蒋介石最后一道封锁线。但损失颇重，在红军到达贵州边境之前，留下的队伍已经残缺不全。显然李德和博古的那套战术是行不通的。干部和战士都在忧虑，希望尽早召开一次会议讨论以后的计划。李德和博古主张直接北上与六军团军团长肖克（在北京我们同他谈过话）和二军团军团长贺龙会师。这两个军团合并成第二方面军，但各自仍保持对自己军队的指挥权。他们两人是朋友，整个长征期间一直在一起。毛泽东主张向西走，进一步摆脱蒋介石的军队，最后与其他部队会师。12 月间在黎平举行了一次会议，这是毛泽东取得控制权的第一步。

不久，红军于 1935 年 1 月占领这个省的遵义城。当时有时间召开一次较大的会议，用较长的时间讨论红军的目标和战略。经过几天的讨论，毛泽东的意见取得了胜利。这标志着李德和博古领导地位的结束，毛泽东擢升为共产党的领袖，这是他最终成为全中国的领袖的开端。周恩来从此效忠于毛泽东，成为他的参谋长，并终生保持了这个地位。

参加我们在这里举行的座谈的有：哈里森、杰克、我自己、秦将军、张先生、省里的陪同以及我们向其提问的那些特殊人

物——长征幸存者、几所博物馆的馆长和一些历史专家。差不多每个人都做了笔记。座谈中谈到了毛泽东为什么曾考虑在贵州省建立根据地，这是因为蒋介石在这一地区力量薄弱。可是红军刚到达，站在蒋介石一边的军阀就向红军进攻，因此红军不得不继续转移，直到到达陕北以前，没有找到一块可以建立根据地的地方。

这些人士谈到了当年农民生活极端贫困的情况。农民常年欠地主的债，无力偿还，地主勒索太重了。据他们说，当时农民虽不鬻儿卖女，但有弃婴的。

下午我们同两位长征幸存者谈话。其中一位说，当他五岁时，五元钱就把他卖了。他说，当年绝大多数人是文盲，平均寿命只有三十岁左右，而现在平均寿命已接近七十岁。那时有40%至50%的婴儿夭折。县与县之间都不通公路。

这两位先生都记不清他们出发（后来成为长征）时的天气如何。他们当时对自己已开始进行的这样一次长途行军一无所知——也不知道他们实际上是从国民党的进攻面前退却。他们说，只有上级知道，他们自己还以为只是一种战术上的运动，还会回到根据地来。现在看来，甚至毛泽东本人当时也可能这么认为，或者认为他可以在邻近的湖南省另建一个根据地。

另一位幸存者长得象一个瘦瘦的不惹人喜欢的赫鲁晓夫。他说，长征时他二十四岁，是做群众工作的。对地主采取行动之前，他必须了解这些地主是否有劣绩，是否国民党员或同情分子。他不给富农和中农制造麻烦，也不没收他们的土地。在下令采取任何行动之前，他必须把情况弄得非常清楚。要是我当年在那里的话，我不会愿意当地主的，也不会愿意让这位

先生负责没收我的土地和财物，更不要说让他处置我的孩子或我自己了。我猜想，多数地主是被枪毙或被斩首了。粮食可以没收，但金银珠宝必须上交红军总部。照他这么说，红军和普通老百姓之间一切都是很好的。他说，部队买什么都付钱，只要能付得起，一定会付钱的。毕竟这是因为红军一路要召募新兵和同情者。

贵州曾经是个产鸦片的省，十五岁以上的男人当时都抽鸦片，所以这里不是招募士兵的好地方。没有人讲到妇女抽鸦片，我很想知道这方面的情况。解放以后鸦片的供应或者说来源没有了，凡生产和销售鸦片者均处以死刑，对有烟瘾的人制定了戒烟时间表并给予医疗戒治，由邻里互相帮助。在中国这些边远地区，我不相信以前在这里有什么医疗设施，多数人只是采用强忍的办法。不过，在全国消灭了吸毒，仍然是中国共产党取得的突出成就之一。西方国家在这方面曾对中国起了一种多么令人遗憾的作用。很难使我相信，我会属于那些人中间的一员：他们唯利是图，有意输入或种植使人上瘾的毒品，把它既卖给穷人，也卖给富人，来摧毁人们的生命。我看我太天真了，在美国现在还有许多人在干这种勾当呢！杰克告诉我们，过去每当罂粟花盛开的时候，农村的景色漂亮极了。这种花有白色的，也有浅粉红色的，现在不论哪种颜色的都没有了。

这位长征幸存者说，红军曾发布过命令，要尊重少数民族风俗，要想办法尽可能多招募一些战士，不得没收少数民族地主的财产。他还说，当他来到一个少数民族村子时，老百姓一般都跑到山里去了，把房子锁起来。“我们对老百姓的房子原封不动，如果我们从园子里拿了蔬菜，就留一张条子并把钱放

在门口。"有时他们写一个借条，以后偿还——甚至在解放后才偿还。既然他刚才说过，差不多每个人都是文盲，我不知道这些老百姓怎么弄明白条子上写的什么，留下的钱是干什么的。

另一位幸存者比前者好得多。1933年他十八岁（现在六十九岁了）时参加红军。他说，在国民党统治下生活太悲惨了。他两岁时丧父，母亲改嫁到另一个村子。我们认为她一定是先搬家后再结婚的，我不相信当年在他们这个村子里寡妇居然能改嫁。那时丈夫死了，媳妇还是婆婆的奴婢。这位先生是由祖父母抚养成人的，还有三位叔伯和一个姑姑，不住在一个村，但都在一座山上单过。

哈里森举行了为庆祝我俩结婚二十周年的宴会，也邀请这两位先生留下来参加。桌子中间摆着一个大蛋糕，上面有"双喜"字样，喝的是中国香槟酒，味道象姜汁啤酒，我看没有什么酒精成分，不过还是不错，而且冒着气泡。那位长得象赫鲁晓夫的先生茅台喝得太多，他一再叫那位女服务员斟满他的酒杯，直到当地的主人告诉她别再倒酒，他才没有再喝下去。另一位先生非常好，举杯祝我"长寿、幸福。"参加我俩结婚纪念宴会的都是一些很有风趣的人，他们多次向我俩祝酒，在切蛋糕时杰克还为我俩拍了一张①"拍立得"照片。拍这样一张照片要花人民币 1 元，三瓶香槟酒 3.98 元。这是一次很好的友好庆祝。

---

① Polaroid一种快速相机的商标名。——译者注

4月19日　星期四
凯里

上午我们同杨小姐和负责安排旅行的那位先生一道乘贵州的小型客车出发，途经一个市镇，看到该处正在上映的影片中，有一部是《孤胆骑警传》，该片系英语对白，但打上了中文字幕。

农村显得较贫困——没有新的建筑物；园子里的作物长得也稀疏。我们在龙里的邮局停下来，因杰克要给马海德投寄一个信封，其实信封里什么也没有，只不过是为马海德集邮而寄去的。

我们下午3点才到达凯里。车上我们听音乐，盒式录音带是杨小姐的。一个录音带有《卡门》、《胡桃夹子》选曲、贝多芬《第九交响乐》、门德尔松的《赞美曲》、勃拉姆斯的《摇篮曲》、《我的太阳》以及《乘客们请别……》的曲调，都是由有才华的音乐家演奏的。另一个带子有几首美国歌曲：《老黑奴》，《故乡的亲人》，《草原上的家园》，《红河谷》等等，先后用中文和英文演唱。

我们在镇上步行了一会，到了一个大的市场。我们有点象"花衣吹笛人"①，被人们跟着围观，不一会儿就有一百多人尾随在我们后面，有男有女，还有小孩。

---

① 据德国民间传说，1284年哈默林有鼠患，一走江湖魔术师自称能驱鼠，穿花衣吹笛，诱鼠至河中淹死；村民食言，拒给报酬，此人遂又吹笛，带走大批儿童。——译者注

这个下辖十六个县的地区专员设宴款待我们。他是苗族人，这个地区两大少数民族是侗族和苗族，但我们很难区分他们。妇女们穿着华丽，参加晚宴的一位侗族人肖先生长得很俊。不同民族之间有相互通婚的，我们了解到有些汉族人同少数民族结婚，这样一家可以有超过一个的孩子(少数民族允许生两个)。肖先生同一汉族人结婚，而介绍人则是一位同苗族结婚的汉人。中国人坚持说，他们要保护少数民族当地语言和风俗，可是学校里用汉文，又有互相通婚的机会，看来少数民族最终会被同化，他们的歌舞、服饰、风俗习惯只不过是表现而已。

4月20日　星期五
锦屏

我们今天乘车经过一些景色极为秀丽的农村，比我们昨天看到的地方也富裕得多。这里有许多雪松，有老树，也有新栽上的。有几处地方看上去象意大利。梯田式的菜园种植得非常好，有白菜和其他绿色蔬菜。草夹竹桃的花在田地里盛开，这种作物是要犁在泥土下沤成肥料的。靠近菜园的山旁挖了一些洞，既可避雨，也可储藏白薯和根类菜蔬，象地窖一样。

据说，一种正在开花的树名叫油桐树。开的是白色而中间呈桔红色的花。山上到处是开白花的灌木，样子象美国的绣线菊。一种头部和身体为棕色、翅膀为白色的大鸟在水田里飞来飞去，名叫鹭鸶，但腿并不长。

上午我们途经一座造纸厂，我第一次看到把污水或废物

直接排入一条美丽清澈的山间河流里。大堆大堆没有分解的白色废渣在两、三英里中都可以看到。过了那一段，即使表面上看不出来，河水仍然是受到污染的。我曾听说过，中国规定不解决污染问题，工厂就不许开工，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象这里的一些工厂那样，冒出这么脏的烟雾，也没有闻过这么难闻的气味。河里的那些废渣太可怕了，这种河水不但人根本不能喝，我看用来浇地也是不安全的，虽然有些地方已经净化了。我知道我们美国有类似的问题。在康涅狄格州豪萨汤尼克河上，捕到的鱼都只能让他们回河里去。在另外一些州里，渔民受到告戒，吃他们自己捕到的鱼，一周不能超过一次。我一直责怪那些自私贪婪的人，因为他们不肯支出必要的经费，没有将他们排放在大气和水域里的污秽物弄干净。而这里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方面的问题是有责任的。全世界有那么多人死于癌症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什么东西都被污染了！

我们的侗族朋友肖先生今天也一路同行，给我们介绍了许多关于侗族和苗族的情况。侗族喜欢居住在河岸边，而苗族爱住在山上，虽然在不少地方他们也住到河边了。有些苗族妇女穿裤子，有些穿裙子。她们的发式不同，有些侗族妇女把又长又厚的黑发很漂亮地缠在头顶，上面插着一朵花或一把梳子，前额留着稀疏的刘海。其他一些人头戴毛巾或缠头巾，或某种褶皱式或包头式的其他头饰。

侗族和苗族都有斗牛的习俗，不过他们用的是水牛，而且是牛与牛斗，不象西班牙或者墨西哥的斗牛有斗牛士。只是在牛不想斗时，有一个人在场鞭策牛继续斗下去。我想这是用尖东西去捅牛。肖先生说，侗族的斗牛最使人兴奋，他们一直让牛斗到死。苗族人斗牛时，只要看到一头牛已明显取胜就

把牛隔开。侗族和苗族也饲养斗鸡用的公鸡，欣赏斗鸡活动。

哈里森和我一直谈论着这个地方不少虐待动物的情况。我们得出结论，全世界的农民和农村老百姓都一样。猪就是猪，鸡就是鸡，总之并不认为这些动物有么什感情。我们看到把猪和羊四脚朝天地捆绑起来运到市场上去，鸡鸭也是捆得紧紧的，不能动弹。有的是在市场上卖活的家禽家畜，有的宰好再卖。鹅则是装在一个大筐里，只有上面几只才能呼吸，其他的被挤压在几层快窒息死的家禽下面。我想没有什么比吃肉更不好受的了。象现在这样，有时我奇怪我怎么能吃肉。不说这些了，还是回到侗族人的话题吧！

他们曾经是以打猎为生的，大约在1949年左右，汉人说服他们务农。现在根据政府的新政策，少数民族允许重新过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我们看见过五名带枪的男子，显然都是猎人，我没有见到有谁打到任何东西，但是有一天我的同伴们都看到一位男子的自行车上挂着三只小鹿。这个地区树木砍伐得这么厉害，我看不出有什么动物可供打猎的。肖先生说，这里有野猴、老虎、熊，但不能打来吃。肯定有兔子之类的小动物可以打来吃。在这个地区的十六个县当中，有七个县禁止打猎。我不知道这怎么进行管理，不过在中国好象每个人都知道别人在干什么，不管是去上厕所，还是在看书。

我们在一个山头停下来拍照，正好有几位侗族姑娘、一位老太太和四个男的走过来。肖先生提议姑娘们为我们唱歌，她们说，如果我先唱一首！她们一定唱。我唱了一首《常言说，真诚的爱情就是幸福》，她们也给我们唱了一支歌——不是一般的曲调，而是从喉嗓间发出的不象乐曲的声音。一位陪同说，他也听不懂歌词，她们是南侗，而他是北侗。然而中国同伴

暗暗使以眼色并发出咯咯笑声，我想这些姑娘一定是唱了些有伤风化的内容。

路上还遇上了一位新娘步行去参加婚礼，有十来个姑娘陪伴着。她们都穿着漂亮的兰色衣服，头饰也很讲究。新娘脖子上挂了一块华丽的银牌，正步行去会见新郎。新郎在半路上接她去他家举行婚礼。新娘在门口停下来喝一、两杯酒。肖先生告诉我们，如果你们访问侗族家庭，必须在进屋之前至少喝两杯酒，进屋之后还得不断地喝。他们好客之意就是尽可能让客人喝醉。

举行婚礼的房子用旗子和花朵装饰起来。新郎新娘先向双方父母鞠躬（过去是磕头），感谢双亲养育之恩；然后向祖父母鞠躬；最后两人互相行礼。除非自己有能力另建新房，新郎新娘一般住在男方父母家中。肖先生说还有少数包办婚姻，但大多数是自由恋爱的。以前有媒人帮助操办。姑娘一般十八、十九或二十岁结婚，这比中国政府关于妇女二十二岁以上的推荐结婚年龄低些。少数民族在许多方面得到特殊照顾（其中之一是一对夫妇可以生两个孩子。）不过从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情况判断，一定不只生两个孩子。到处都是婴孩和儿童；我经常看到一个年轻妇女手里抱一个，背上背一个，还有一个在她身旁，但都不到四个。

肖先生说，1949年以前这一带抽鸦片的不多，人民不能不辛勤劳动。在汉人中抽鸦片烟比在少数民族中更为流行。

这位肖先生是歌剧演员，他的妻子也是演员。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但没有说怎样受迫害的。当时他所在的歌剧团分成几派，不过还是允许他外出并举行音乐会。

我们晚饭吃得很好——感谢上帝没有举行宴会——饭

后，哈里森马上回房间打字，我和杰克、张先生外出散步。

中国城镇的人行道上，将报纸和公告张贴在玻璃框内。在一个重要路口，我们停下来看一大张关于最近犯罪情况的布告，上面还有罪犯的照片。罪犯差不多都是犯强奸罪的年轻男子，判处三至五年徒刑。我对此大为吃惊，我以为会判死刑。据说在北京判刑要严厉得多。

4月21日　星期六
锦屏

昨晚半夜两个青年人闹哄哄地在大厅里打羽毛球，他们一见到我，马上蹓回自己房间去了。我们睡在一张硬板双人床上，但睡得很好。我把一条棉被做垫被，盖上另一条，倒很合适。

我们乘车去黎平，这就是1934年12月召开那次重要会议的小城市。一路风景优美。车子一会儿上山，一会儿下山，山上长满了开白花的灌木，也看到了一些茶山，茶树一行紧挨着一行，象灌木组成的篱笆似的。

路上有人在卖手工做的洗衣板，根据不同尺寸，每块约60至90美分，菜墩子每块卖80至90美分。小椅子卖1.5美元。同样的东西，在北京要用三倍的价钱才能买到，我们一行人谁都想买点什么。可是这些东西不是过重就是太笨，不便带在车上同我们一道长途旅行。所以只有贵州当地人买了几个菜墩子——这是从树干上锯下来的又大又厚的圆东西——放在他们的座位下面。

当地人在山上伐木时采取一扫光的办法，然后地面用火一烧，再栽植新树，同时播种谷子。

在村里，看到小孩玩“踢房子”的游戏、跳绳、踩高跷。姑娘在门口编织和缝衣服。年轻男子好象全都吸烟，老一些的则抽小烟斗。

我们驱车经过黎平的老城，红军曾在这里住过，看到了红军当年经过的旧城门。在黎平吃午饭的地方，平常是当地政府办公楼，当地以为我们要在那里过夜，把办公室改成卧室，配备了新家具。对此，我们感到过意不去，不过我们对这些安排也无能为力。在楼梯旁边，还专为我们安装了一间盥洗室，有浴盆、洗脸盆、抽水马桶。地上有两英吋的水，因为水管与水箱连接处未安好，水就往外冒，成了一条水流不断的小溪，我不得不从车上把靴子拿下来穿上。

我们在一间通风良好的漂亮房间坐下来，室内有两张铺着粉红和兰白色漆布的长桌。家具上覆盖着橙色和粉红色的浴巾——这是一种明智的做法，不用丝绒和塑料布，使人有干燥的感觉。秦将军带来一束令人喜爱的杜鹃花，我在笔记本上写着：……“四个相机对着我们，使我感到似乎我就要被处决似的。到现在为止，我们三人在中国这个地区拍下的照片肯定有五百张了——三个头发灰白间金黄的高个子怪物”。

县文化局一位小个子侗族局长实际上不是在同我们谈话，而是从一本书里一个接一个地念了一些故事，都是关于红军的慷慨和恩情以及人民如何热爱红军的故事。红军给没有衣服的孩子发衣服，给缺钱的人发钱，还在着火的房子里救出一个老太太。他接着往下念道：根据人民的要求，斗争了地主，并把地主的财物分给老百姓。也是在人民的要求下，把土

匪处决了。可是我们听说，红军快要到达时，老百姓逃到山里去了；后来人是回来了，红军却未能说服任何一个人同他们一道去帮助别的侗族村庄。战士们不会说、也听不懂少数民族的语言，然而他们又非经过少数民族地区不可。

午饭后，我们到新修整的一间粉刷得最明亮的房子里稍事休息，然后驱车离开公路干线，在一条质量极差的路上摇摇晃晃地行走了50公里去参观一个佛教宝塔，据说那里有当年红军写下的标语。过河时把车子开到一艘简陋的人力推进的渡船上。这种渡船不过是一个边上有栏杆的平台而已。我无法描绘这艘渡船是怎么开过去的。哈里森说那是水流帮了忙，对这种说法我不理解。渡船的一侧由三、四个人拖着缆绳，渡过这条很窄的水流较急的小河，花了四分钟左右。因为许多人都想参加这次游览，我们的客车上增加了乘客，三辆吉普上乘满了摄影记者、各级官员以及许多随从人员。

过河之后，车子在山谷里行走，景色宜人。由于道路迂回曲折，白塔时显时隐。可是从近处看却使人失望。塔虽漂亮，但并不古老，只是1912年才建起来的。围墙的大部分以及除中央结构以外的其他部分均已倒塌或被毁，当年写标语的墙面也因前一个冬天下大雪而脱落了。这些情况除了我们以外谁都知道，所以这种绕道而行，即使很愉快，也是荒唐的。返回住地要走很远的路，天又黑了，在山上行车是令人害怕的。我事先告诉了杨小姐，盥洗室有扇玻璃窗对着大厅，我觉得不好，等我们回到宾馆后，玻璃上已贴了纸。

4月22日　星期日
施乘

今天是复活节，在这里过节是离家太远了。我老是在想着过去同孩子以及孙辈们一起过复活节时的情景，玩找鸡蛋的游戏，吃火腿夹面包的午餐。这儿农村风光还是那样美，下午我们在红军当年经过的镇远作短暂停留。镇远以拥有一座具有五百年历史的漂亮的桥和一座十六世纪建造的佛寺里龙寺而闻名。该寺近年来差不多全都毁坏了。清朝年间，这里苗族人举行暴动，派来了皇家军队进行镇压，寺庙受到破坏，后来曾重建过两次。“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幸免，所有的佛像和工艺品都受到破坏。我想起了成都江边靠近2000年前的水利工程处的那座寺庙，里龙寺也同样是依山而建，深入到了岩石之中。我们登上多层曲折的台阶，穿过一些房间、走廊，到达塔顶的了望台。奇怪的是那座桥基本保持完好，只是一侧的塔楼由于当年为阻止红军迅速前进，而被国民党烧毁了，还有两座拱门莫明其妙地被搬走了。

一路上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下面一段话：“我们看到许多装着大木料的卡车。卡车的保险杆上面漆着‘礼貌行车’的字样，可是我们见到了三次可怕的车祸。一辆卡车轮子朝天，翻倒在稻田里，驾驶室还浸在水里（我们感觉司机一定还在里面），有一堆人在旁边坐着。另一辆卡车直接撞上一块大石头，并把水泥隔拦撞坏，车也翻了。在另一处地方，一辆卡车不但翻了车，而且着了火。几次车祸都是在拐弯时发生的，哈里森

认为这是由于刹车失灵，我则认为是开得太快引起的。”

在一条河上，我们看到十四架又高又大的水轮机，每架之间相距约十英尺。许多竹槽绑在一起，高高悬在公路上，把山水引向稻田，同我们过去在柬埔寨看到的一模一样。这里能看到香蕉树，可是我们一个香蕉也没有吃过。在溪河上或者瀑布旁边有一些小型的粮食加工厂。

在我们经过的许多市镇里都有集市，道路很拥挤，人们从四面八方走来出售货物，把买到的东西运回家。商品种类繁多，数量充足，有五颜六色的塑料凉鞋、草鞋、中国布鞋、西式高跟皮鞋；有下地时戴的大草帽，小孩戴的无边圆形软帽和有遮檐的男帽；有各种颜色的上衣和裤子；有许多毛线，比美国的毛线细得多；还有棉布、化纤布和呢绒。多年来棉布是定量供应的，但从4月1日起不要布票就可购买了——这确实是经济情况改善的标志。

不论是在北京的还是在菜田里干活的姑娘和年轻妇女，穿着打扮大体差不多。她们穿着色彩鲜艳的夹克衫（这里时兴橘红色或粉红色，北京时兴淡紫色）。不少人穿半高跟皮鞋或人造革鞋，几乎全都卷发。听说在“理发店里”有电烫。我们的一位陪同认为烫发是可笑的，说如果他的妻子卷发，他会生气的。

陪同对我们说，1949年时有一首很流行的顺口溜：“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杜鲁门生了气，喝了瓶滴滴涕。”

杜鲁门总统在中国人中间是非常不得人心的。1949年10月共产党人取得政权时，英法及其他许多国家承认了他们的政府，而美国由于复杂的政治原因却不予承认。中国人认

为杜鲁门过去一直站在国民党一边。据我了解，杜鲁门一直在计划承认毛泽东的政府，考虑的是何时政治上可行，可是朝鲜战争一爆发，就把那个计划取消了。

在餐厅的一面墙上糊着中文报纸。杰克说，过去，美国的旧报纸运到中国来作房屋的糊墙纸，盖住墙上的裂缝。

在通道的尽头的男盥洗室有一盏电灯，而新装修的女厕所却没有灯。哈里森说，这是男性沙文主义的证明。

4月23日　星期一

遵义

我们很早就离开施秉，长途乘车来到遵义。就是在这里举行的那次著名的会议上，李德和博古从领导地位上被赶下来，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占了上风。我们在余庆停下来去取为我们定的午餐饭盒，由于车提前到达，饭盒还没有做好，我们就在广场上蹓跶，一会儿我们就受到围观。有一个人说，解放前曾经有一个美国人来过，以后没有哪一个象我们这样的人到过这里。人们态度友好，好奇是很自然的，妇女们跟着我走进室外的公共厕所，幸好有杨小姐给我当护卫。

这个地区许多妇女戴着白色或黑色的包头巾，男子有包头的，有戴小帽的，看上去更象穆斯林而不象汉人。妇女们有各种各样的装饰打扮，我认不出她们属于哪个少数民族。贵州省的少数民族包括侗、水、布依、彝等民族，虽然他们说没有民族混杂的情况，但我看肯定是混杂了。

我们路过一个名叫虾子场的集镇，今天有集市。杰克要

寄封信给马海德，可是坐上小型客车到不了邮局。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拥挤的人群，甚至在意大利过复活节也没有过。街上人挤得水泻不通，负责管我们一行具体事务的人下车去寄信，我们坐着车在广场上等候。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被人群围起来了，如果不是两边站有人，车子都会被推倒。有人盯着眼睛看我，使我觉得很不舒服——动物园的动物一定有这种感觉。张先生打开车窗说："走开吧，没有什么好看的。"杰克却对人群说："看一眼就走开，好让每个人都能看看。"

一个男子的提篮里放着一只捆起来的猫准备出售，人们不是买来吃，而是用来抓老鼠的。由于某种原因，我没有想到老鼠的事，也没见过一只。可是这里果皮、瓜子，还有那么多的小鸡和粮食，肯定是老鼠生长的理想地方。我们在两处集市上看到过灭鼠药的广告。

我们在路旁停下来吃野餐式的午饭，有煮鸡蛋、玉米松饼、中国人通常夹泡菜吃的大园馒头、鸡块、橘子汽水、还有柚子。哈里森和我从未见过这种水果，它有点象葡萄柚，但个头大得多、皮也厚，里面还有厚厚的白色衬瓤，掰成一瓣一瓣，只吃薄膜里面的部分。虽然籽很多，有点气味，但味道不错。杰克说，有时在加利福尼亚也能买到。

我们将空瓶和吃剩的杂物留在路旁，相信不到一小时，农民肯定会把瓶子拿走，残渣剩饭要不了多久也会被动物吃掉的。

现在我对红军的经历和他们取得奇迹般的成就有了真正的体会了。能把这么一个巨大的国家多种不同的成份团结起来，这是任何人都会认为不可能做出的功绩。显然，毛泽东的争取农村中的农民而不是试图夺取城市的战略是获得成功的

主要原因。过去我对所有关于"动员农民"、"武装人民群众"、"创建革命(根据地)"等等说法都听得厌烦了，而正是这些工作起了作用。当然要有适当的政治气候。军阀、地主的暴虐达到了使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国民党不把农民当人看待，只会对农民作威作福和肆意掠夺。在这种情况下，由一位理想主义者领导的、由青年男女以及男少年组成的军队，必然会取得成功。红军经过村庄时会对老百姓说："难道你们一辈子都愿意这样生活下去吗？参加红军吧！"红军尽可能对他们照顾周到，只要有时间就教他们看书写字。而国民党则强迫青年男子当兵，把他们捆绑起来带走。杰克说，他亲眼见过这种情况，这不仅仅是宣传。国民党对当兵的坏极了，不给吃饱，不关心士兵，所以共产党人有这么大的号召力就不足为奇了。毛泽东是精明能干的。可惜他活得太长了。如果他在"反右派运动"、"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一类荒谬的事情发生之前就去世了，他会是一位完美无缺的英雄。虽然如此，我相信他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伟大人物之一，也许是最伟大的人物。

从 1934 年 12 月到 1935 年 4 月，红军在贵州省内为了摆脱困境，一会儿前进，一会儿后退，走着之字形的道路；在这些高耸入云的山脉里，有时攀登，有时绕着走；反复渡过一些河流。红军在10月离开江西时，经常受到国民党的威胁。当时气候恶劣，又潮又冷，他们一直没有充足的被服。一天平均步行 20 至 30 英里，每人背 50 至 60 磅的装备——一袋大米，一条毯子或一些没有穿在身上的衣服，一支步枪，还有刀子，杯、碗等。炊事员背着供50人做饭的铁锅。伤病员还得用担架和轿子抬。开始时红军还带了印刷机和爱克司光设备，但很快

就扔掉了。因为部队要求迅速行动，而这些东西太笨重，拖了部队的后腿。

我们看到红军三次渡过的乌江，水流湍急，当时渡江一定非常困难。我们拍那座桥的照片时，一名卫兵拿着冲锋枪向我们走来。在这个时候，有秦将军陪同我们就起作用了。我们还从类似世界屋脊的地方一睹了湄潭河的景色。

4月24日　星期二
遵义

上午我们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那是由既是商人、又是军阀、并担任过师长的柏辉章在三十年代初建造的一所规模宏大的住宅。柏先生开始建的是一所较小巧的房子，当然比普通人的房子要豪华得多，后来他再加盖了这所大型建筑物，有点象我们在宁都见过的那所传教士的房子——两层楼，四周都有柱子和门廊。这种式样在本世纪初有钱的中国人中很流行。即使我很有钱，也不能设想为自己盖上一幢同普通老百姓的房子相比象王宫那样的房子。这所大房子正好建在市区的一条街上，周围都是些破的、荒废的木屋，因而对比十分鲜明。有些传教士也干这种缺德事，他们在贫困地区盖起庞大漂亮的住宅。

这座房子当年一定很吸引人。房间宽敞而且通风良好，木工精细。后边是一个大院子，地面现在已铺上一层水泥，但当年一定有果树和花园。1964年政府正式宣布此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拨款修复。

对于红军领袖们总是接管和占用最大最堂皇的房屋，我至今仍然感到惊奇。我猜想房主一定逃跑了，因为房子空起来了，把敌人最好的东西夺过来是恰当的，而且是象征性的。不过，我还是觉得，住在比较一般的地方，对他们来说更符合革命的要求。哈里森说，他注意到，军队将领们，不管他们属于哪一边，总是拿下能找到的最好的房子当营房。不管怎么样，这意味着这些房子将被保存下来，如果当年情况不是如此，房子肯定已经被毁或被烧了。

从遵义会议会址出来，我们来到当年向各级领导传达遵义会议结果——毛泽东战胜了李德和博古——的天主教堂。这所教堂是一所引人注目的中西合璧式的建筑：中国式的屋顶，高高的哥德式窗户，还有一扇巨大的可能装有彩画玻璃的窗子。教堂建在庭院的一端，几幢一层建筑的废墟形成一条街，围在中间的当年肯定是座花园。教堂是法国传教士建的——据杰克说，这一地区的传教士大多是法国人。原来建筑物的框架看起来好象是些单人房间，每间都有壁炉和烟囱。两个壁炉的面饰还存在，我真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在北京那些现在已由中国人使用的旧使馆建筑物里，我看见壁炉都被封住了，除了这里以外，我在中国从没见过其他地方有壁炉。当年房子里一定是烧煤，可能使用小炉子。建筑物的形状是非常引人入胜的。现在整个院子正按原来的面貌进行修复。

同一条街的对面是李德和博古住过的房子，也将进行修复，不过目前还有几户人家住在里面，因此，我们不能到里面去看。那是一所简朴未多加修饰的两层楼房。临街一边的附加建筑，破坏了这所楼房的观瞻，将要被拆除掉。所有这些修复工作完成之后，遵义将成为一个重要的旅游点，特别是中国

人的旅游点。

街上挂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解放思想——勇于开创新局面"，用简明的语言说，就是"自己独立思考"。不象早些时候的准则，要求人们追随经过批准的方针，一切事情都是大家一块办。

地委书记为我们举行了一次非正式的轻松的晚宴。我们自己夹菜，没有谁给我的盘子里塞满那些我不吃的东西，气氛非常友好。我向杨小姐祝酒，感谢她的好意和帮助，她向我祝酒时说，她永远不会忘记这一个星期。

4月25日　星期三
习水

上午离开遵义乘车去娄山关。遵义会议之后，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离开遵义以继续摆脱国民党的进攻。蒋介石的军队几乎立即占领遵义并尾随红军。红军经过迂回曲折的前进和后退，最后在娄山关与国民党部队遭遇，毛泽东取得他首次军事上真正的胜利。如果他这一仗打败了，红军又会处于严重的困境。竖立在那里的一块巨大的碑上保留着毛泽东在那次战斗后写的一首诗。今天娄山关看上去很平静，两面都是高山，似乎难以想象战士们曾在这里进行过浴血奋战。

我们在桐梓停下来，在另一所以前军阀的房子里吃午饭。这是一所三层楼房，二楼四周都有走廊。桐梓是一个产煤的城镇，毋需有人告诉你也能看得出来。什么东西都是黑的，我从未见过的特大煤块就堆在路旁或者用小马拉着的车运走。

许多建筑物都是青砖和木料结构的，而军阀的房子则刷了白灰。

我们乘车登上金字塔般的高山或者绕着这些山走，山的形状同娄山关的山相似。梯田都很窄小，许多地方土地看来比较贫瘠。妇女同男人干同样的活，如修路、砌砖、拉车，田里的活更不用说了。她们还要做饭、洗衣服。我们确实经常看到各种年纪的男子背着或抱着婴孩，可是我不曾见过有哪一个男子做饭、洗衣（唯一例外的是两名青年男子在河里洗澡，可能顺便把自己的衣服洗了洗，但我并未见到他们在搓洗）。我见到一个妇女在小孩的头发里找虱子，有些妇女在编结一种红褐色的东西，杰克称之为棕树纤维，这是用来制作供男人在田里干活时穿的蓑衣的。到处都可以看到正在晾晒的面条。在一所房子附近，摆着50个蜂箱。这里砖瓦窑也不少。为了利用阳光，不少缝纫机摆在各家各户的门口。在洗涤象被套这样大件时，妇女们把门板平放在锯木架上做洗刷板。一名老年男子提着一筐废纸和旧纸板，还有几名男女将灰土和垃圾收集起来倒在手推车里，据说是送到乡下去。即使不到三岁的小孩背上也背个筐，似乎他们也知道哪些草是要拔的。豌豆开着紫色、粉红和白色的花。在通往桐梓的公路上可以看到许多新卡车，沿途的商店里货物摆得满满的。

这是一所很大的宾馆。有许多中国人住在底层或在此临时住宿。我们住在二楼的那间房子，就是汉森夫妇去年沿长征的部分路线旅行时住过的，（汉森曾任美联社记者，三十年代末期到过延安。）我打开那25瓦的灯时，发现灯罩上有汉森的名字。

这间房子唯一不好之处，就是它同一些盥洗室都处在这

座房屋的同一侧，垃圾顺着一个未加盖的槽子直接倾倒在一块小田地里，臭味难闻。我不知道人们怎么会习惯闻这种气味的。杰克称之为中国的“国气”，到处都能闻到。人们把一桶一桶粪便运到田里去，由于肥料是流液状的，所以用桶挑。孩子们走到哪里就往地下乱坐，猪狗也如此。我觉得什么东西都有一股气味，不过哈里森对此不象我那么敏感。

4月26日　星期四
习水

我终于见到了一只老鼠。这里的厕所是在楼梯折转的地方，昨晚大厅里没有开灯，我就拿起手电筒。显然是有人看见我了，几乎在我关厕所门的同时，灯就亮了。没有窗帘的窗户是开着的，我生怕蝙蝠飞进来。蝙蝠倒没见到，一只深颜色毛绒绒的东西从墙边跳出来，从我的脚上飞跑过去，就不见了。我被吓得发出了尖叫声，不过可能谁也没有听到，否则整个习水的居民都会很快赶到这里来的。早几天我们在集市上看到的那只可怜的猫可以到这里派上用场了。

这一插曲使我回想起我与老鼠有关的一些经历和我听说过的关于老鼠的故事。最讨厌的是城市老鼠。我们住在纽约的一所房子里，曾对老鼠发动一次围攻。我们邻近的一些建筑物都拆掉了。由于某种原因，招来了鼠灾。这些老鼠没有钻进我们的房间里，却围着大门口转，吓得我都不敢出门。我给卫生部门提意见也不管用，最后用捕鼠夹子抓了不少。我要求卫生部门来弄走这些死老鼠，他们说，“扔到垃圾里就行

了。"

我的婆婆是一位艺术家，本世纪头几年里她在格拉梅塞公园设有一间画室。她的爱尔兰女仆对我说，那里老鼠多得很，"真吓人，从角落里钻出来就象一群狐狸一样"。不记得就是在这间画室，还是在另一间屋子，有一只特大的老鼠，想尽了一切办法也没能消灭它。一位朋友养了一只特大的猫，是个捕鼠能手，就借来在画室过夜。第二天早晨，既不见猫的影子，也不见老鼠的踪迹，以后两者都没有找见。

所有这些都和长征没有多少关系，只不过引起我的回想罢了。

上午我们参观了毛泽东当年指挥青岗坡战斗的那座小山。我对这些战役和来回渡河之所以混淆不清，原因之一是由于参观这些地方没有按照适当的先后顺序。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开始北上。林彪被派到茅台去选择一处便于渡过赤水河的地方，渡过赤水之后，红军就靠近扬子江一些，而渡过扬子江是至关重要的。川军有几个团尾随着红军，毛泽东误认为他们是抽鸦片的军阀部队，容易对付。结果在土城附近的青岗坡这一仗没打好，红军遭受重大损失。这从心理上对毛泽东不利，因为他刚刚接管战略战术指挥工作。于是命令林彪回师，红军经过四川一小块地方，偷渡赤水，进入了云南。在那里休整几天，医治创伤，整编部队。来回一共四渡赤水，以迷惑敌人，敌人真搞不清毛泽东是在干什么，甚至一些红军将领也弄不清。在回师遵义时，红军与敌人在娄山关遭遇，取得了第一次大胜利。

青岗坡战斗从来没有人报道或在书上描写过，哈里森、杰克也都未听说过。当时红军面临的情况是那么危急，以致朱

德亲临战场——对一位将军来说这是很不寻常的。

在土城我们又是在一座地主的房子里吃午饭。

土城刚刚发布一道命令，要把所有的狗处理掉，当然指的只是在城里，而不是在乡下。人们说，这里发现了狂犬病。再过一天，如果有谁还养着狗，不但把狗弄走，还要罚款3元。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宰他们养的狗吃。前几天在一个大集市上，杰克说他见到有人在出售四只小狗。我惊异地说了声"哎呀"，杰克说："我看你说得对，这些小狗胖极了。"

今天我们获悉，毛泽东的第二个妻子贺子珍4月19日在上海去世了，哈里森还一直想见见她呢！

日复一日，红军的伟大成就更多地印入了我们的脑海；同样美国的愚蠢也越来越变得明显——支持蒋介石，支持军阀、地主的封建制度，支持土匪和吸鸦片，甚至在四十年代还在这样做。

真是奇迹，找来一台电视机给我们安上，因此能看到正在北京访问的里根。图象太小，看不清楚，不过我们认为，他看上去显得有些不安的样子。后来我们到西安，听说里根曾处处博得好评。中国人喜欢"他那牛仔式的微笑"，对他七十三岁高龄还那么健康、敏捷表示佩服。

4月27日　星期五

茅台附近的仁怀

上午我们冒雨离开习水，乘车来到茅台。离京前哈里森终于说服了当局让我们来这里。这里出产著名的茅台酒，当

年红军在此地两渡赤水。沿途见到许多桑树；油菜已经收割，正在晾晒；小麦快要收割了；稻子、玉米、高粱和甘蔗正在田地里生长。在一所房子外边摆着一口棺材，这意味着有人病重，家里已作了准备。一具小孩的尸体包得严严的，放在一辆手推车上拉走。

1935年红军经过茅台时，这里的人口只有三、四千人。当时有几家酿酒厂，没有一家规模大的。商人靠经营酒、盐、鸦片生意发财，红军通过征收货物和银元而得到好处。今天住在茅台的大约有八千人。那家大酿酒厂从江的那边延伸过来，看上去约有一英哩长，也有一些较小的酒厂。

我们就是在当年红军渡河的地方过河的，乘的渡船大概也同红军用的船相似，只不过现在这条船外装推进马达，可以充充裕裕地容纳25个人。我们登上一处高高的岸边去参观一所纪念馆，从这里可以把这条河看得更清楚，也可俯瞰这个市镇的全貌，还能了解当年渡河的地点和如何完成几项渡河任务的情况。

在镇上散步时，我们想起在北京同我们谈话的孙大夫，他告诉我们，他见过战士用茅台酒擦脚，酒洒在地上，使得全镇酒味芬芳。可惜今天没有人用酒泡脚了，不是酒味芬芳，而是那种发酵的酒糟味笼罩在镇上。

哈里森很不高兴，因为不让我们参观那座真正的茅台酒厂。他们说没有外国人参观过，也不打算让我们第一个去。我真不理解，在北京外交部说我们可以去，而地方上却说不行。到底是谁说了算？也许是因为酒的制作过程令人恶心，还是不让人看到这种烈性酒里加进了什么东西为好。我们知道酿酒使用的是河水，而河水的颜色是呈棕褐色的。我们看过一

个小酿酒厂，那里尽是大桶大桶的颜色深暗的东西，气味很不好闻。大概那个大厂也就那个样子，不过气味更大些。

今晚在此过夜，明天也许坐上火车了，两、三天后将住进昆明一所真正的旅馆。

4月28日　星期六
赴昆明的火车上

今天我们长途乘车从怀仁去贵阳，在遵义稍停吃午饭。上火车之前，在一家庞大的餐厅吃晚饭。这家餐厅看上去象中央大车站，圆形的顶篷，有几层楼高。有三家人在那里举行结婚喜宴，喧闹的程度，酒菜之多，是我闻所未闻的。一家一户，包括婴幼孩提、祖父祖母、外公外婆、伯伯叔叔、七姑八姨，分别围坐在一个个大园桌旁，边吃边喝边交谈。三对新娘新郎，上衣插上不同的花以示区别，走到每个桌上去向那些贺喜的人祝酒。每一家婚宴至少摆上十桌，人人都有些醉意了，东摇西晃。一桌人离开，杯盘就收走了，骨头、剩菜之类的东西都扫到地板上；另一些人又高高兴兴地在满地垃圾的地方坐下来，对此毫不介意。新娘家不付这种喜宴的钱，每位客人各有各的办法付款。

在车站候车时，我录下了杨小姐唱的《红河谷》，这是她最喜欢的一首歌。要和贵州的朋友告别了，真令人惆怅，和杨小姐告别尤其如此。她是一位可爱的陪同，我什么时候需要她，她总是“在我的身旁”（就象她在头一次宴会上所说的那样），从来不随便闯进屋里来。十二天相处似乎使我们这一帮人更

亲密了，也不知道由于什么缘故，红军受的考验和取得的胜利——变得更真切了。

4月29日　星期日
昆明

大家在火车上都睡得不错，卧铺比前次乘坐的宽敞、舒适。因火车晚点，使我们没有能在早饭后到达，而推迟到下午差不多三点才到站。除此之外，这次乘火车旅行是很愉快的，还给了我们一点时间来消化已有的见闻。

许多中国火车是用烧煤的蒸气机车牵引的。在一些车站上，我们常常见到妇女走到车厢下，检拾掉在轨道上的煤块，起初我还猜不出她们是在干什么。

迎接我们的是这样的信息：今晚有一个宴会，明天早上8点出发，沿着红军的路线进行一个星期的飞速旅行。当时我气得要命。我一直计算着在这里至少停两天。哈里森和杰克也很恼火，因为安排对他们也不合适。

云南省外事办公室的李小姐将在省内陪同我们旅行，她很年轻，长得也秀丽。由她陪着哈里森和杰克到友谊商店买胶卷，并设法为我们找一大罐雀巢牌咖啡和一些杀虫药。

哈里森刚参加宴会回来，他说宴会很好，不那么正式，饭菜鲜美可口，服务周到，有一道过去没有吃过的菜叫炸蜜蜂，又香又脆，吃起来嘎巴作响。他给我带回一些水果和西瓜，这里的西瓜二月份就成熟了，瓜果都好吃极了。

4月30日　星期一
大理附近的下关市

还是睡在有床单枕套的真正的床铺上好。自从离开南昌以来，第一次吃早餐时有烤面包、黄油、果酱。这些细节虽不重要，但有时也显示出其意义来。

昆明是个吸引人的城市，我很高兴得知本周末前我们还要回来。各种花木逗人喜爱——夹竹桃在盛开；双瓣的蜀葵花真漂亮，但植株不如美国的高；还有中间带红的黄色唐菖蒲，也比美国的小。刚到市区的边缘就有菜园；许多人正在插稻秧，还象他们过去在公社劳动那样。听说各家各户都拥有自己的土地进行耕作。一到插秧季节，因为这种农活必须迅速完成，别的家庭也来帮忙大干，就象天气好时，美国农民互相帮助收回干草那样。我们看到许多用塑料袋装的化肥。我希望中国人不要放弃实践了几千年的理想耕作方法（使用天然肥料，将秸秆还田翻到地里，和种植肥田作物），而只看到化肥能很快起作用的好处。从长远来说，化肥会破坏自然界的平衡，使土壤耗尽肥力，一位威斯康辛的农民告诉我，那就象把钱白白地撒丢在地里。

昆明周围污染严重，致使那么大的西山都模糊不清。一家从煤中提取某种物质的工厂流出的污水，使得高山上流下来的一条溪水变成了黑色。

我们整天乘车在山里上上下下，沿着二次世界大战时修建的著名的滇缅公路前进，这条公路可由缅甸直达昆明。沿途

看到许多运大块木料的卡车，可是除了公路两旁种植的桉树外，见不到什么大树。尽管这里进行过重新造林，但见到的还是光秃秃的红色沙质小山。桉树并非中国土生土长的树木(也不生长在美国)；而是从澳大利亚引进后在这里繁茂起来的，如同加利福尼亚的桉树一样。

云南省有许多少数民族——彝、白、纳西、壮、藏、苗以及我不曾听说过的景颇、瑶、哈尼、拉祜、布朗等民族。他们比汉人养的家畜多，除了常见的猪以外，山羊、黄牛、水牛到处都是。麦子正在收割，如同我们以前见到过的，这里也是把麦子铺在公路上让汽车在上面奔驰来脱粒，然后摊开扬净。奇怪的是这样做并没有把麦子压碎。颗粒粗大的青豆也是这样处理的。这里劳动很艰苦，男女都一样，例如要把大桶大桶的东西搬上山。有时则见两头水牛拉一张犁；耙上安着一块平板，上面放几块石头和站上一个人，以便在这湿润的土地里耙得更深些。

彝族妇女一般都戴头巾，实际上所有少数民族妇女都要在头上戴些东西作装饰。她们戴着晃来晃去的银耳环，身穿束腰外衣和裤子。

在一些山顶上可以看到寺庙的废墟；土色是深红的。

我们之所以沿着这条路线走，是因为长征时肖克在1936年经过了这一地区。他是我们在北京会见的第一位将军。在此之前，1934年他率领六军团与贺龙的二军团会师。贺龙和肖克在湘、黔边境地区各自建立了苏区，自从1934年会师以来，两人一直在一起，成为忠实可靠的朋友。他们分别同一对漂亮的姐妹结了婚，他们的妻子在长征途中都生了一个孩子。肖克将军告诉哈里森，他的妻子是在草地上由战士修的一个

围栏里生孩子的。分娩很顺利，她当时年纪轻轻，身体强壮，两天之后就继续行军了。她生的是个男孩，取名“草地仔”。到延安后，这孩子被送回湖南的祖母家，后来死在那里，是日本细菌战的成千上万的受害者之一。

在毛泽东的长征部队到达陕北以前，肖克和贺龙没有离开这个地区。之后，他们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一块到达陕西。

“文化大革命”期间，同与我们谈过话的许多将军一样，肖克也被关进监狱，不过他们活下来了。关于贺龙的故事是骇人听闻的。他的妻子离开了他，后来在延安他又结了婚，同他结婚的是一位年轻得多的妇女，我们这次长征结束后曾见过她。“文化大革命”期间，贺龙因患糖尿病，生命垂危，需要经常使用胰岛素。开始他还要挨斗，后来看到他实在不行了，就提出所谓“医疗处置”。他住在一所有庭院的房子里，有卫兵看守。不给他水，他和他的妻子只好从屋檐上接一点点水来喝。给他使用了大剂量的葡萄糖（正好产生与胰岛素相反的效果），他就是这样被杀害的。

这里的宾馆真是出乎意料的好。床上铺着白色蝉翼纱的罩单，盥洗室很象样子，绿色的马桶，粉红色的盆子，还有干净的浴盆，并供应热水。饭菜清淡可口。

5月1日　星期二

丽江

今天上午下关的天气十分晴朗，气候象科罗拉多温泉一

样，海拔高度也近似（6,600 英尺）。我们从 8 点到下午 1 点多长途乘车来到丽江。看到了洱海，中国人希望在这里建成一个规模巨大的旅游点。许多白族妇女穿戴着漂亮的民族服装：有各种各样的长裤、袖口绣花的浅色长袖衬衣、鲜红或蓝色马甲、蓝色镶边的白色短围裙以及绣花和毛线编织的精致头饰。很多少数民族人民（汉人从不这样）头上还缠着顶篮子用的布带，象锡金人那样。一些树上有关于保护环境的字样，因为人们仍在砍伐树木，需要加以制止或进行教育。这个地区现在正处于旱季，雨季是在夏天；建有许多水坝，灌溉设施不少。

我们到这里吃午餐时已是午后了。这里空气真好，山势险峻。山顶上复盖着白雪，最高处达18,000 英尺。

哈里森会见了一位老战士，他给哈里森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在肖克的红军到来之前，丽江县县长曾与一位进士商量对策。可是当时红军已在向丽江进发。他们决定不与红军打仗。当地军阀与蒋介石的关系不和——实际上，湖南和云南两省的军阀关于采取什么对策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痛恨蒋介石，也害怕他会使用象在贵州所采用的办法来对待他们——赶走军阀，安插自己一伙人进来。县长召集了一次会议，指示人民欢迎红军战士，而他自己则跑进山里去了。人民列队街旁，尽力提供食物和用品。红军遇到的仅仅是装模作样的抵抗，仅有几场假的战斗，没有一人伤亡就安然通过了这个地区。红军经过之后，县长回来了，军阀继续保持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没有人责怪农民的行动，整个气氛是“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这位县长甚至到解放后还继续留任，现在仍活着，已经 84 岁了。

今天是全世界共产党的盛大节日，但这里与其他日子没有什么不同。

5月2日　星期三
仍在丽江

上午我们乘车去扬子江上游金沙江上的石鼓，到了肖克和贺龙领导的二方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的地方。那里江面宽阔，中间还有个采沙场。此处的渡口是必须控制的关键地方。江的上游还有其他几处渡口，如果这里的第一个渡口控制住了，敌人就无法到达其他渡口。1936年时江边树林茂密，足够18,000人躲避空袭。解除空袭的号角声吹响之后，队伍按五十人一批分批出来渡江。按照这一程序，全都安全渡过了，没有一名战士被敌人击毙，仅有十七人因骡马受惊翻了船而被淹死。

一路上矮小弯曲的松树使我想起了科德角。一簇簇白色杜鹃花满山遍野，看上去脆弱而漂亮的淡紫色灌木就象长在岩石缝里。小麦和稻谷是这里的两种主要作物，小麦是秋季种的，多数地方现在正在收割。

这里有白族和纳西族人，他们饲养着大群黑山羊、黑绵羊，甚至几头黑色母牛，猪也是黑的。新果园正开始建设。梨是这里收成最好的水果。果园旁是蜂箱或蜂房。

江上有一座小塔竖立在一块锣状大石上，那是1548年纳西族人战胜西藏人的纪念馆。我们通过了一个旧的居民区，从一条陡峭的石头小路走向江边。登塔下望，一个个屋顶紧

挨着，看起来好象一个七拐八弯的长屋顶覆盖在所有的房子上。我们在塔内吃了一顿野餐式的午饭，然后，访问了几个在红军经过这个城镇时有过几小时光荣历史的人。

访问的第一位是一名六十二岁的妇女，长征时她才十岁出头。我们去她家时，她正好背着一大捆蔬菜、小麦和芝麻从田里回来。她将东西往院子角落一放，热情地向我们问好。她之所以出名是由于有一位伤员在她的院子里住过。伤员病愈后，夜里她用马送他到江边，伤员将自己的蓑衣送给了她。这件蓑衣现在陈列在省博物馆。

在附近的一个城市大理，我们到了一个纳西族妇女家，她曾为在她家院子里过夜的六十名战士做过饭。她现年八十三岁，虽然高龄，牙也掉了，还是很美。很明显，她出身于一个有钱的上层家庭。她的那所房子很大，具有漂亮的木结构，并带精致的手工装饰。她与著名纳西族历史学家方国玉的外甥、美籍华人、太阳能研究员包宪有亲戚关系。年初这个外甥曾来这里向他已去世的舅父表示追悼。

她的儿子当时还是个婴孩，在那个著名的夜晚，她给红军做饭时，儿子就背在背上。亲朋好友和左邻右舍都帮着她，但她用的都是自己的蔬菜和大米，并亲自烹调。她告诉我们："战士们不希望吃任何油腻的东西。"她家原是糖商并开过一个餐馆，她的母亲在餐馆里教过她烹调。她在政府机关当过厨师，现已退休，只是在一些特殊场合还出来做做菜，如办红、白喜事。

我们在一家裁缝店（有很多这样的裁缝店）停下来。裁缝和他的儿子擅长做各种精致的带有镶饰的围裙。白族的围裙一般是蓝色的，并有几排镶边装饰，穿这种围裙时，上面还要

从前往后系一条稍小一点的白色镶边围裙。我们步行穿过一个典型中国式的农村厨房，面积约8平方英尺。炉灶是一个有炉膛的四方水泥台,上面挖有一个安放铁锅的大洞,很多人家都有这种炉灶。炉内还嵌入一个安有龙头的水罐，象一种美国煤气协会的炉灶，经常有热水。由于有通风装置，所以用一小点稻草就能点火,热得也很快。稻草、木柴和煤都在旁边堆成堆。

厨房和院子是通着的，所有房间都有门。菜园两旁是高高的墙。房子的女主人在小块地里种有两棵柿子树、蔬菜和草药,而取得额外收入。在菜园的尽头放着一个酿酒的大桶,他们说现在已不酿酒了。听说,这家比较富裕,但没有到那位纳西族女士家那样高的水平。所以，即使在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还是有差别、有等级之分。

我们步行经过那座方方正正的大理旧城。城的北门和南门还在，城中心有个长方形场地，相当一个城市的广场，还有一座宝塔，塔前的那块场地上有两棵大树，那就是集市所在地。妇女们在出售大批色彩鲜艳的绒线、葵瓜子、肉类以及其它零碎杂品。至今这个旧城没有受到破坏，还保持着原来的面貌。街道狭窄,高低不平地铺着石头,也没有新的建筑物。这是要我们相信，这座城作为民族的名胜古迹正在被保存下来，我希望这是真的。新市区建在旧城的外边。

我们在一位艺术家的屋前停下来，这所房子同我们今天见过的其他房子的形式相似——质量好,也是精致的木结构,还有种花种菜的园子。这所房子正在加建一层楼，房间里摆满了他心爱的中国题材的画——花鸟和山水。

这个地区的房子比我们以前在别处见过的要大。所有房

屋的前面都有院门和种着很多花、菜、果树的园子。看来人民比较富裕，衣着也较好。白族妇女的服装都很漂亮，看上去总是干干净净的。纳西族的服装是蓝色的，用白布带交叉地系在胸前，有时背上背着一种式样奇特的衬垫，以便在负重时能保护肩背，其形状象个十字架，每边伸展出一个象翅膀的东西。有时人们头上顶着一个筐，身上穿着兽皮披肩。大多数儿童看来很邋遢——流着鼻涕，一身脏衣服。然而，多数人穿着草鞋、凉鞋之类的鞋子，很少有几个是赤脚的。

晚饭后，哈里森遇见两个怪老头，各人也都有一段与红军相处过一、两天的故事。一位长相俊秀，健谈，出身于有钱人家。他说，在蒋介石统治下生活是可怕的：人民毫无发表意见的权利，人民对自己及其所作所为都不会有任何自豪感。当时的政府要拿走他们家拥有的财产，他的父亲和哥哥因抗拒被逮捕入狱。他自己当时离家外出在修路队工作。当他回来要求释放父亲和哥哥时，有人通知他须交付 50 元，他交不起。他大闹一场，咒骂警察是吸血鬼，并拿起板凳猛掷过去，因此，他也被关入监狱。他说，监狱里气味难闻极了(我不能想象怎么还有比我们闻到过的更难闻的气味)。一天只让他喝两顿象水似的稀粥，身体瘦得几乎不能站立，而且整天见不到阳光。后来他家变卖所有的东西，才将其父、兄救了出来，但他在狱中呆了六个月，直到 1935 年红军打开牢门才出狱。

他说，犯人被释放时，先给打开镣铐，并由一位红军向他们谈话，说明红军战士是工农的子弟，他们来这里是为了拯救受苦受难的人民，打蒋介石和日本鬼子。战士没收军阀和劣绅的财物之后，手边有了钱，他们向农民和城镇居民买东西时都付钱。

另一个人当年在他的一位岳叔开的药铺里工作，他们早先听说过关于污蔑红军烧杀的传说，也听说县里曾经作了同红军作战的准备；后来又听到县长欢迎红军的讲话。他的岳叔说："我们是医生；没有什么可怕的。"他们用了足足六个小时来为战士补充药物和生活用品。

5月3日　星期四
下关

又回到了有蝉翼纱罩单和粉红面盆的地方。由于昨天大理和丽江之行，今天每个人都觉得累了；我必须承认，此行真使我精疲力竭了。这里海拔 9,000 英尺，我们爬了山，还走了不少路。所以回程这一天只作为游览日，一路看看风景。今晚将在这里过夜。

大理是最近新向外国人开放的 129 个地方之一。阴历三月(阳历四月初)那里刚过了十二天白族独特的节日。上星期我们在火车上碰到个不列颠哥伦比亚人，他想来这里，但不知道怎样才能来。当我们描绘这个留胡子、穿短裤的男子时，向导说："是有那么个人，就在这里。"大理一家旅馆门上贴着一个用英文写的告示牌："里面专门供应安静房间"。也许他就住在那里。

我们看到了蝴蝶泉，因为每年春天很多个头很大的蝴蝶成群地聚集到这里而得名。池塘旁有棵大树，倾斜到了池塘上面，人们往池内投钱币祝福(这种无聊的消遣，在我们第一次访华时简直是不可想象的)。通往蝴蝶泉的路上，有几个白

族姑娘在卖小吃——汽水、葵瓜子、小烧饼等。有个姑娘告诉李小姐，她一天能挣二十元，比李小姐挣的多得多，但她必须纳税。正当我们离开时，我们见到两个穿蓝制服的人过来了。我们以为他们是当地的警察，而实际上他们是税收员。所以自由企业也要向政府交钱。

我们在一个白族餐厅共进午饭——我们三人、李小姐、张先生、秦将军、司机以及哈里森认为很象契诃夫的那位非常滑稽的当地小向导。他个子瘦小，有些神经质，还带副眼镜。因为一般人都认为美国人爱吃土豆，所以让我们吃了一盘现做的土豆片，味道很好；还吃了他们称作炸奶子之类的东西，这大概是牛奶、鸡蛋和面粉炸成的薄饼，脆而好吃；还有一道新鲜鱼，是刚从湖里打上来烹制的。

我们在“三塔寺”前停车，但那里已没有留下寺庙，早在清朝(1644—1911)年间就毁掉了。西边残墙中间的那扇门上有块告示：“禁止入内”。我朝里张望，见到一座哨亭，但没有哨兵，周围有铁丝网，还有营房。听说，这里是住房，但不知是供什么人住的。

然而，那三座塔还在。据中国人说，这些塔建于唐朝(619—907)。最大的一座在中间，有30英尺高，两旁两座小一些，但精致得多。大塔在几百年前的一次地震中遭到损坏，形成一条大裂缝，可巧最近一次小地震将裂缝弥合了。过去所有三座塔的四面都有出入口，人们能从里面爬到塔顶上。现在这些出入口都用水泥封住了，也许这样可以保护这些塔，以免因过多的人来往而损坏。人们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但也许是不让人们好奇的眼光去窥视墙内的东西。

我们参观了大理的大理石工厂的样品陈列室。中国人对

这种大理石很自豪；颜色呈灰色和白色，由于人们能从大理石的自然花纹中看到树木、花卉或某些联想的画面而著称。我当时想过要买一副石臼和杵，但太重了不好带。人们沿街出售一块块大理石，李小姐为买块镇纸和一座塔的小复制品与小贩讨价还价。我从未想到这个社会也有讨价还价的。

我们又一次睡上了干净舒适的床铺。我再也不会认为只有我家里的床铺是干净舒适的了。

5月4日　星期五
昆明

今天又是长途行车，沿星期一所走的同样路线往回走。这里一定产丝，不过没有人提到过。杰克说，聂斯托里教派的牧师将茧藏在一根手杖里从中国偷运出去，从此世界其他地方就有了蚕丝。

茶生长在大理北部的高山和干旱地区，以味美著称。我对此感到惊奇，因为我过去认为，茶只生长在潮湿和多雨的地方。

我们看到了很多复盖着残雪的高山；这个地区可以与瑞士媲美。

一路上可以看到神龛和为新年、婚礼装饰房子的福字、喜字和对联，红纸白字。但遇丧事时，则在门上贴用白纸写上黑字的挽联，慰吊亡魂。很多门上贴有守卫房子的两大张凶猛武士模样的门神画像。据说从前有一位患妄想狂的皇帝，在他宫殿的各层门口就派有武士守卫着，他的首相认为这样太

浪费人力，就改用画像代替。比较新一些的则是在门上贴红军战士的画像。

在广阔的麦田中央我们看到一个孤零零的浇水壶。很多农活都靠手工操作：如长距离挑水，除草，用镰刀或弯刀或砍刀割麦，捆好麦后，将麦捆背到脱粒场，再用连枷脱粒，用簸箕将麦粒扬净。

麦收或第一茬农作物收获之后，就播种绿肥。待它长到一、两英尺高时，就要为种下一茬作物作准备。先使用笨重的锄头翻地，让土晾干，然后灌水，进行犁、耙，最后由一头水牛或黄牛拉着一块坐上人的平板把地荡平，就可以插秧了。一切都用手工。没有一寸土地是荒芜的；即使拖拉机到不了的地角地边也种得很好。

有好多驮物牲口，小毛驴和马，在路上走着。

我们停车登上一座寺庙，一览昆明和滇池的奇异景色。一座有花园、果树和游泳池的诺曼底式的房子就在下面，它看起来似乎是属于法国的，或许是属于美国长岛的，原为军阀所建，现在归政府所有。滇池的好大一部份正在进行围垦。一所大的鱼苗繁殖场建在寺庙的下面。

三十年代谢伟思夫妇住在昆明时，外国侨民都喜欢在这里野餐。他们划船渡过滇池，登上这所寺庙，在那里午餐，似乎感到他们已到了世界的最高点。当年，这里没有任何烟雾。

5月5日　星期六

昆明

杰克有几天得了支气管炎。在丽江时两位医生给他看过病，今天他去医院作进一步检查。他服了几片新的日本产的抗菌素和新咳嗽药，看来似乎好了一些。没有医生给他量体温。

下午我们会见了肖友，他说他与肖克将军是亲戚。因为在这个近十亿人口的国家里大约只有136个姓氏，每人一定有很多堂兄弟。

肖友先生现年七十五岁，1928年参加革命工作，从事秘密地下活动。他曾帮助建立农民协会、儿童团和秘密政府，也组织过一支游击队。参加红军后，开始是政治指导员，然后到保卫局，并任五军团特别安全代表。

哈里森问他是否见过或遇到过毛泽东，或其他将军，他们给他的印象如何。他说，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毛泽东正骑着马，是个高高的瘦个子，彬彬有礼，甚至和一般战士谈话都很亲切，战士们常常不知道和他们谈话的是谁。毛泽东给人的印象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知识分子。

朱德看起来象一位军事指挥官，但没有任何架子，生活很简朴，能与群众打成一片，同群众一起打篮球，一起吃饭。彭德怀是三军团的军团长，态度严肃、庄重，体格健壮，给人印象是位坚强的指挥官，很少讲话。

他说，在通过湖南省与贵州接壤的地方时，他看到毛泽东

的妻子被人用担架抬着。在到延安前他没有见过朱德的妻子康克清。随身警卫被称作特别安全人员，要接受特种训练。他们到达延安后，保卫工作部门改称社会部。

哈里森问，遵义会议后李德和博古靠边站了，他们的战略也被取代，当时他们的处境如何？肖先生说，普通战士对他们很生气，觉得他们应对丢失苏区负责。可是毛泽东坚持要妥善地对待他们。

李小姐忙于作各种安排，她的办公室里的另一位姑娘陪我到百货商店买些"洗衣粉"。这个姑娘告诉我，她的父母都是干部，"文化大革命"期间分别被送到不同的地方，并受到"批判"，但她没有细说。她家有两个女孩和两个男孩，她当时只有十三岁，四个孩子成了联系人——每隔一段时间允许他们去看望一次他们的父母，给一方传达另一方的消息，同时，他们将国内发生什么事情的消息告诉父母。我们知道那时在狱中的很多人的情况都是这样的。如果不是因为有这些孩子，他们会与世隔绝。孩子们学会了自己谋生，有些则成帮结伙流落街头。

我们经过化妆品柜台时，我问谁用这些东西。陪同的姑娘说，每人都用一些。夏天她在脸上擦些胭脂，因为她感到脸色不大红润。她不用唇膏，因为嘴唇够红了。她不是用拔眉毛的工具而用脱毛剂去掉长得不整齐的眉毛。我感到可怕，并告她这样会弄瞎眼睛的，可是她坚持认为这是安全的。我要买一个指甲锉刀，她从未听说过有这种东西，认为锉刀这东西听起来有些危险。她用剪刀剪指甲，然后用剪刀口修光指甲。她还没有打算结婚。我们一致认为找一个好的男子是不容易的。她还年轻，因而可以等待。她说："我可以找任何人

结婚。”

我告诉她，北京有位妇女告诉我们，农村有人扼杀女婴，我们不相信。她说，这是事实，但是城里没有。杰克看到一张标语，告诫人们“不要虐待生了女婴的妇女”。

5月6日 星期日
渡口

我们到了第四个省——江西、贵州、云南，现在是四川，还要去两个省。

今天上午，我们经过昆明附近的富民，那是林彪指挥的一军团占领过的离昆明最近的城镇。二军团和六军团长征时也曾经过富民。

1935年4月29日，杰克和他的夫人卡罗琳正住在昆明，那时称云南府，是个有十五万人口的前哨城市，有一点法国气氛。当时英国、法国、美国和日本在这里设有领事馆。有几个法国商人，一些美国传教士，希腊旅馆业主，加上上述那些政府代表，组成这里的全体外国居民。杰克当时在美国领事馆工作，卡罗琳正怀着第一个孩子。

一度谣传“赤匪”快来了，计划撤退妇女和儿童。卡罗琳开始往大箱子里装她从蒙哥马利·沃德商场买来的婴儿服，她结婚的银器和杰克的金表。就在这一天的晚上，说得更确切些是早晨两点，一位通讯员砰砰敲门，递交了美国领事阿瑟·林沃尔特的一份通知，说3,000名共产党人已到达东城外约8英里的大板桥，后面还有更多的人。法国提供了将妇

女儿童从昆明送到东京(北越)的一列火车，火车于上午7时44分开车。

卡罗琳收拾完行装之后，将两只暹罗猫放在篮子里就上了火车。这两只猫是给她在上海的婆婆的，总算运到了那里，可那只金表再也没有找到。家属都走了，火车上人挤得满满的。留下的全是男人。

红军根本没有进入昆明，也从未打算占领它。红军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拿下昆明，因为那里只有500名地方保安队驻守着，没有正规部队。这是一个迷惑国民党的花招，诱使他们遣兵来保卫昆明，而红军则到别的地方去了。卡罗琳和其他一些人的妻子不久又都回来了，而红军则继续北上。

我们乘了一天的车，路程很长，车速又快，司机似乎相当累了。途中停了一次，在野外午餐，找到了一处恬静的而相当荫蔽的地方，这在中国是不多见的。此时这个地区正是水稻插秧的季节，每块稻田都插上了从秧田里取来的稻秧。长排长排的人，大多数是妇女，弯着腰，站在水深到膝盖的田里，整天插着秧。她们的腰背一定是非常强壮，否则会痛得难受的。

那里有许多桉树，荒芜的高山上也种上了松树。有些地方人们搞得不错，有些地方则不行。这是一项巨大的工作，即使土壤如此贫瘠，如果他们能使那些矮小的松树成长起来，土壤终究会得到改良，其它树木和灌木也自然会生长起来。

我们从一条位置较高的公路上看到了扬子江秀丽的景色。我原来以为四川会比云南更旱更穷，作了最坏的准备。使我们高兴而惊奇的是，这里土地看来很肥沃，有灌溉设施，而且植被很好。在这里我们还找到了一座漂亮的宾馆，哈里森认为那是当地专为我们安排的。不过也许是中国工程人员

和政府官员常来这里，因为这里有一家大钢铁厂，还有其它一些工业。以前渡口是个小镇，现在已成为八十万人口的城市，城区三十五万人，其余在郊区。这里海拔 4,030 英尺。这个大钢铁厂是在“文化大革命”前由专家、军人、工程师、建筑工人、科学家共同建造的，1971 年已部份建成。在那动乱的几年里，此处没有遭到毁坏。科学家以及与林彪和军队有关的任何事物都没有受影响。至于所有与我们交谈过的将军们之所以被监禁，是因为当时林彪主持军队，他要将这些将军排挤掉，以便他夺取最高权力。我相信有很多相当新型的重工业城市被人不知鬼不觉地隐藏了起来。

我们受到四川省里派来的一批人热情的接待，其中包括几位陪同。李小姐明天一早就要与司机一道回昆明去了，真使我依依惜别。她是完全值得敬重的，也是我们大家可爱的同伴。她希望有朝一日来美国学习［今年秋天我们收到她的来信，得知她在佐治亚一所学院学习］。

5月7日　星期一
通安

今天上午我们象昨天那样在类似的山区乘车上上下下，来到扬子江或称金沙江的另一边。我问到在这个人们无法进入的庞大地区如何进行再造林问题，有人告诉我，是用飞机播种的。哈里森不相信这种说法，因为山上狭窄的梯田显然是人工挖出来的，有了这种梯田，无论栽上什么，都不会被一场雨水冲走。假如是飞机播种的，就不会长得那么均匀，而是有

的密有的稀。在五十年或者更长的一些时间里，所有这些高山终将布满森林。

我们住在以前属于地主的一座非常漂亮的老式房子里，现在这里是当地政府、公安部门等的办公楼。由于天太黑，我们没有看到很多东西，但那里有很多庭院和房间。厕所离得很远，当我第一个朝那个方向走去时，五个姑娘面面相觑地走在我的前面。因此我在外边一直等到她们从厕所出来。我们的住房里有一个老式的黑漆便桶，无疑是过去地主留下来的，或者是模仿地主的用具做的。

明天，如果天气良好，我们将五点起床，步行约 9 英里到金沙江上的皎平渡。渡过金沙江是长征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虽然没有公路，只能步行，哈里森还是坚持要去那里看看。这个渡口离大理附近的那个渡口约 150 英里，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许多人都是在这里渡过金沙江的。我们要在谁也不晓得的地方过一夜，第二天再步行回到会理过夜。但愿这不会使我们吃不消。

5 月 10 日　星期四　上午 10 点
会理

关于这次旅行我一直害怕的事情发生了。哈里森的心律不齐，并感到非常精疲力竭，他说，他无法完成这次旅行了。我将回过头来叙述星期二早晨在通安的情况。

那天天气很好。五点就有人叫醒我们，五点半早餐，乘车到约一英里半的一个地方，从那里我们开始白痴似的步行。

和我们一起走的肯定有三、四十个当地人。我们是第一批到这个地区的外国人，人人都为我们这个旅行计划感到兴奋，陪同我们的人中，也没有一个人以前走过这条路。他们是从成都来的，或者从省里、县里和专区来的。

出发前，给了我们每人一顶草帽和一根坚固的手杖。首先我们攀登了1,000英尺。难怪这里有很多山羊，因为这正适合羊群生长。杰克爬起山来轻松自如，因为他每天在加利福尼亚的小山上走上走下，双腿和肌肉都是健壮的。哈里森和我进行一般的活动是没有事的，但不能应付象这次步行那样的情况。其他的人也有不适应的。每个人按自己的步伐走，杰克和张先生冲在最前头，所有其他的人与哈里森和我排成一列，而指定陪我们一起走的人渐渐地落在后头。

当我们抵达第一个高峰时，我本来应该说："够了，从这里往回走吧。"但是，我没有这么说。我们又走三英里多，到达火焰山的旁边。虽然往下看很可怕，至少那条小道还是相当平坦的。越过分水岭，正好是另一座阴暗和岩石重叠的大山。这使我想起了我在美国蒙大拿州骑马的情景，当时我不晓得万一马滑倒了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沿着"狮子头"——从对面看过来真象一个蹲着的狮子，头部轮廓很分明——往前攀登，然后往下走到了一块平地，当年在这里进行过一场激战。红军的先头部队从云南省渡过金沙江后（我们走的路线和红军行军的方向相反，到第二天才看到了他们走过的那个地带），顾不上休息片刻，又被派去清除盘据着这座山的敌人川军。敌人从300—400英尺高的有利据点，能清楚地看到行进中的红军战士。红军战士已相当劳累了；当他们拼命登上悬崖时，已完全处于敌人的视野中；他们武器也差。尽管有这些

不利条件，他们还是战胜了敌人。川军逃跑了。

这个战场给了我们深刻的印象，使我们真切地了解了当时这支由年轻男子组成的军队的所作所为。他们一定是怀着对军阀和地主政权的无比愤恨才能这样进行战斗的。

我们走过的和乘车经过的这个地区，比中国多数地区的人口要稀少得多，绝大部份都是山区——荒芜而岩石重叠，地势高而险峻。

对我俩来说，在平地上走路没问题，但是在那条尽是石头的小道上再从山上往下走 3,000 英尺，就非常吃力了。在家里就有时使我伤脑筋的左膝盖开始发痛，哈里森的双膝变得软弱无力。我们最后下到一个旧的河床旁，以为那里会有一条长满青草的小路，可是情况完全不是那样。我们又走了 2 英里多的岩石路。没有一处有草或任何软一点的东西。哈里森在我前面左右摇晃，而且重重地摔了一跤，正好扑在尖锐的灰色石头上。他说，这对他有好处——促使某些肾上腺素活跃，但看着他这样，也真是吓人。我的膝盖不能弯曲，必须摆动大腿僵直着走。这使我想起我的堂兄理查德·图德（他曾患小儿麻痹症），想起他支着拐杖行走时摆动着他那瘫痪了的腿那种样子。我特别想到他，他十六岁就死了，我当时该是十二、三岁，他还没有享受到真正的生活呢。

每个人都力图助我们一臂之力，但又帮不上忙。一个年轻人一直在说，“你们瘸了”，他说对了。我们继续这痛苦的行程，走了将近 7 个小时之后，最后拖着疲乏的身子到了金沙江上一所漂亮的通风良好的楼房里。这所房子的顶层有阳台，底层有宽阔的有台阶的庭院草地。我们能听到江水声；门前的树上的木瓜已经成熟了。我倒在床上说，必须有人把我抬

出门才行——哈里森也该如此。我们再也不能那样走了。

我整整睡了一下午，哈里森却到江边去了，会见了四十九年前把战士们渡过江去的那几名船夫。他们说，对他们说来，事情好象就发生在昨天一样。当时他们帮红军找来三十六艘船，渡江进行了九天九夜，没有丢失一个人，骡、马则是泅水过去的。皎坪渡是个转折点，对红军是一次很重要的考验。红军到那时已连续战斗了大约七个月，损失很大，人员减少到大约只有25.000 人。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出奇制胜，红军渡过了扬子江，摆脱了国民党的跟踪追击，士气大为高昂。虽然前面还有预想不到的困难和内部争执，但他们再也不会如此受到蒋介石的威胁了。

回过头来再叙述星期二发生的事情。虽然只有两天时间，看来好象过了二百天。我们在走廊上晚餐——中国的罐头猪肉，味道不错，还有刚从树上摘下的木瓜。饭后我们几乎立即上床，听着江上动听的声音就睡着了。第二天天未破晓就把我们叫醒了。沿阳台，点着一排蜡烛，看上去非常壮观。哈里森和我都僵直得不能动弹。正象我们说过的，我们不能走路回去了，因此安排我骑上那头前天驮行李用的小马，哈里森则由两个壮实的小伙子用担架抬着。我以为他不会同意，可是他说，参加长征的人受伤了就坐担架，所以他也可以这样。那匹小马的主人是一个年青人，由他牵着马，我只要坐在马背上就行了。奇怪的是我的膝盖并不痛，能弯着踩马镫。

杰克和张先生早已上路；相当多的人和我一起走，哈里森坐在担架上，和秦将军及其他一些人准备出发。我们走得很快，每当我回头看时，却看不见哈里森和秦将军。我们走过布满岩石的河床之后，就一等再等，最后一直等到看得见他们。

哈里森象前天那样东晃西歪地走着，两边各有一人陪着他走。我发火了，而且心乱如麻，不能想象又出什么事了。

原来是两个小伙子不够强壮，抬不动哈里森，担架的把手不够长，抬在后面的那个小伙子看不见路。

去皎坪渡的路上，我们一共带了三匹驮东西的牲口——我骑的那匹马，还有一头骡子和一头小驴。回程路上只需要那头小驴驮东西，因为我们将所带的食品都吃光喝光了，我们带去的东西没有多少要驮回来的。担架显然不能用了，于是找人传话出去，设法为走在我前面的那头骡子找一个鞍子。骡子由一个梳着辫子穿粉红色衬衣的姑娘牵着。天晓得话是怎么传的，正当我们在旧河床旁等候时，一个男子从山上带着一个鞍子下来。这鞍子是木头做的，马蹬很短，和蒙古人的马鞍一样。

哈里森被抬到骡子背上，虽然坐在上面并不舒服，至少他不必走路了。一个带着急救药箱的人跟着我们，我的马蹬带是用沙布绷带接的，哈里森的鞍子破了，也是用这种绷带绑扎的。这头骡子以前从来没有用过鞍子，也没有人骑过它，这次驮着哈里森，没有出事，真算是奇迹了。

在"狮子头"——战争的现场前面的那块平地上，大家都停下来休息。几列拥挤的火车过去了，大群山羊正被赶往高处的牧场。在回程中，小毛驴一路驮着我们的行李走在最前面，由一位至少七十岁的老头牵着，还有一个小男孩紧跟在后面。这位老人身体略向前倾，双手叉握在背后，象外交官那样，有力的腿从不改变步伐。他每天都这样行走。

最后1.000英尺的下山路程，即使坐在马上，也使人害怕。要是我再步行走这段路，那是根本办不到的。

这里的人平常不骑牲口，牲口是用来驮东西和拉车的。可是当我们回到住地，说完再见时，给我牵马的那个男孩子跳上他的小马，飞奔而去。我曾见到两匹配有马鞍的马，但没有人骑在上面。偶然，水牛被牵去喂草时，我见过孩子们两脚叉开坐在水牛背上。

杰克和张先生比我们早到两小时，秦将军走得很慢，几乎比我们晚到两小时。他现年五十九岁，我七十岁，杰克七十四岁，哈里森七十五岁，张三十五岁。杰克在这次旅行中比谁都轻松，甚至比张都轻松。

我们在一间满是苍蝇的房子里午餐，吃的又是罐头猪肉。饭后马上来到这里。两天来我们经受着酷热，满身是汗，而这间房子则又冷又潮。哈里森半夜有些发冷，这对他来说总是一种危险的信号。他服了阿斯匹林，喝了开水，我把房间里的所有毛毯都给他盖上。他出了汗，但虚弱不堪，精疲力竭，脉搏也不规律。我们等候着去看医生。

5月10日　星期四　同一天下午5点半
西昌

今天上午在会理，两位医生和一个护士给可怜的哈里森检查身体，作了心电图，说是有些心律不齐，那是我们早已知道的。决定上午让他休息，午饭后来西昌，这里有一所军队医院，医生也多些。我们一行乘着三辆小型客车，除了所有省里派来陪同我们的人外，还有两名医生。哈里森坐在前排位置上，免得左右晃动，我们乘了近4小时的车，车开得很慢。这

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有个名叫琼海的大湖，我们住进一座很别致的宾馆。一进宾馆，又来了三位医生，又做了一次心电图，为哈里森作更彻底全面的检查。他们感到也许他心脏有些毛病，但被心脏起搏器掩盖了。他们要验血以澄清某些疑点。

我们就在这里住了下来。哈里森穿着运动衫躺在床上，盖着一条被子睡觉。我真说不出我心里是什么滋味。我不让自己相信他是真的生病了，但我又不能不认为他是在生病。我希望我自己可不要垮下来。我感到四肢相当不灵活。虽然我基本上已从很僵直的状态下恢复过来了，跨步时我的膝盖还是有些痛，而且我的情绪也相当不安定。

我们根本就不该进行这次旅行。自从哈里森开始谈到要重踏长征的足迹以来，我反对他这样做已经十多年了。如果我们仅仅坐车，不去走那段可怕的路，也许我们还能应付。我没想到这次旅行会是这样困难，而商谈和制订行程时我都没有参加。我想哈里森更了解自己，可是我猜测他并没有意识到要去的地方实际上是什么样子——那里连一条公路也没有。我怪自己。当我们走过头半个峻峭的小山时，我应该说，不行，这样我们受不了。可是我并没这样说。谢谢上帝，好在有杰克和张先生在，好在还有似乎从天上降下来的医生。

5月11日　星期五　下午4点
西昌

一般我在夜里写日记，但最近几天一切都乱糟糟的，因此

什么时候能写就写。

昨夜医生从验血中得出结论，认为哈里森是心脏病发作了。和我们一起从会理来的两位医生在这里陪夜，她们轮班整夜坐在我们房子的门外。我们不得不开着灯，两位医生中的一人每隔半小时进来一次；如果她们听到哈里森咳嗽或翻身，进来的次数更频繁了。因为有些脱水，给他做葡萄糖点滴。中午四位医生（两位是军队医院的，另两位来自市立医院）带来一台很大的新式日本机器，给他又做了一次心电图。我们正等待结果。

正好我写到这里，张先生进来告诉我，今晚我们可以乘火车去成都。医生说没有问题，只需给哈里森再量一次血压。

经过这几天的焦虑，我不能相信这一说法。我也不知怎么办才好。我一直感到哈里森肯定是心脏紧张过度，完全精疲力竭和脱水了，至少需要卧床休息一个星期。因为都谈到他可能是心力衰竭和心肌劳损，我本希望能再呆一天。好吧！我们一上了火车，他能整夜睡着。到了成都我们还可以与他在纽约的医生通电话，而在这里没能办到。我们到成都以后，我将坚持要他卧床休息。当我本能地强烈反对某些事时，从现在起我再也不会让步了。

5月12日　星期六　上午9点15分
仍在西昌

我们未能按原来的安排启程。昨晚我们在房间里晚餐，然后与女医学博士杜医生和陈医生一起去车站，带着满满一

箱医药用品和一个氧气袋，自从我们那次去西藏以来还未见到过这些东西。9点刚过，我们坐在一个专用候车室里，火车很快就到。突然在我们中国同伴之间进行着一阵交谈。火车正在进站。大约离这里200公里的地方发生了可怕的事故——一列货车被隧道的塌方卡住了。站长赶忙通知工程师。他们没有告诉乘客，因为那会引起恐慌，人人要求下车，而西昌没有条件收容这么多人。没有新的乘客上去，也没有人下车，火车准时从车站嚓嘎嚓嘎地开走了。杰克观察了情况之后说，车上至少有一千人。事件发生在一个小镇的附近，我想这列火车抵达之前，已经做了某些安排，至少补充了食物和用水。感谢上帝，我们在上车前就发现了这一事故。否则，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将是一场可以想象到的恶梦。

我们定于1点钟飞往成都。一批地方官员计划乘飞机去那里开会，但"请求"他们将机票让给我们。他们将乘我们在省里用过的两辆客车，这样就不是飞行一个半钟头，而是要坐两天一夜的汽车。对这种安排我们没说什么，我得承认这样对我很合适。

所以我们回到旅馆再等候。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从金沙江回来的那个可怕的日子，天没有下雨。我们找到了两位当地最好的医生——也许与任何地方的医生相比都是最好的。她们专心致志和日夜守护，令人安心和鼓舞。昨晚，在上火车前几分钟发现那个不测事件，更是极大的幸运。

在西昌期间没有能出去看看，我感到可惜。这里自然景色很美，有一个大湖，气候也好，正在成为旅游者注目的场所。污染湖水的两家化工厂已经关闭了。这里是少数民族彝族的

中心，但彝族只占人口的三分之一。据说40%的官员必须是彝族人。我们一行中其它几个人曾游览了一些地方，他们看到很多穿着当地民族服装的彝族妇女，还有许多妇女穿长裤，没穿传统的裙子。

这里就是蒋介石逃往台湾时起飞的地方。另一位国民党将军是在解放军占领机场前10分钟离开这里的。

这里有军队的基地（因此有医生和良好的设备），一定是个空军基地。我们听到过几次超音速的爆炸声，或者叫做超越音障的噪音。哈里森说那些都是战斗机，他过去以为中国没有这种飞机。我看很可能他们现在什么都有了。

同一天　夜晚
成都

昨晚去火车站的同一车队今天去了机场，我们在那里等候约一小时。天象要下雨，飞机还未到，我在开始考虑航班会不会取消。可是异常的事没有发生。飞机来了，我们的行李箱（以及其他 48 位乘客的行李箱，其中有几个日本乘客，他们的行李箱总是比我们又多又大）由一个男子骑着三轮平板车运走，一趟又一趟，大概一共运了 8 趟。我们的手提行李逐个很快地无所障碍地检验通过，只有哈里森的打字机，使检查员大为迷惑，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象他的旧《雷米塔》牌打字机这样奇怪的机器。

飞机飞行了55分钟，我们现在住进锦江饭店（以这里一条江命名）一间美观而通风良好的房间，盥洗室内一切设备都正

常，整天有热水，真是一种享受。

在这个城市里，虽然没有看多少地方，但都比我们四年前看到的更吸引人得多。白夹竹桃、梧桐树、轻软的冷杉树一行行地种在街上，通向矗立着毛泽东的大型雕像（遗下不多的雕像之一）的林荫大道，确实景色优美。饭店周围布满了鲜花和灌木，从窗口下望能看到两个网球场。

我们刚进入房间，医生就来给哈里森量血压——血压还是太高。不过他仍然去餐厅吃了一点晚饭。

5月13日　星期日
成都

夜里没有人进来。哈里森整整睡了一夜，早餐时他感到饿了。早餐后量血压，终于正常了。医生说，心跳也正常了。但他仍有些咳嗽，要继续服用抗菌素药物。

到这里以前，我一直害怕检查身体——害怕如果我也有什么毛病，那样会使问题更复杂化了。但我安然无恙——脉搏和心音一切都正常。两位医生都说我是健康的，因为我能在那次艰难的步行后很快康复过来。我也认为我是健康的，但我记得我童年时代经常闹病，因此，我现在这样健康似乎是很不平常的，或许这是由于需要。医生给我作了一次相当全面的检查，而没有向我索要分文，我不禁想到，如果是纽约的医生，一定会给我送来一张至少75美元的账单。

午饭后另一位陈医生来给哈里森检查身体。这是一位女教授兼心脏病学家，会讲英语，不久前去过美国加里福尼亚大

学。病情似乎在慢慢好转，但她要求哈里森到她的医院观察几天。这样我们将于明天8时去该医院的高干病房，我也能在那里陪住。开始我很想让他去住院，现在则认为这是一个新的冒险。实际上我也别无选择。反正医院不远，也许我每天能回旅馆来休息片刻。

4点钟我们与丁甘茹将军会见一小时，他参加过长征。已有六十七岁，可是看起来很年轻。但心脏病也发作过两次。长征期间他在五军团后卫部队。他说，对他来说最困难的时候是过草地、爬雪山和经过少数民族地区。

占中国人口96%的汉族过去总感到比少数民族（藏、蒙、满、彝、苗和其他一些民族）优越。现在在多数地区可能仍有一些这种情况。几个世纪以来，汉人将这些部落从他们原来定居的地区赶到几乎无法生活的山区，而在国民党统治下，情况更日益恶化，贫困的程度实在令人毛骨悚然。关于红军是“红色魔鬼”的谣言使得少数民族象怀疑国民党一样也怀疑红军。他们袭击路过山谷的战士，并将食物和用品掩藏起来。丁将军说，当时苗人除了身前围着一条围裙外，全身是赤裸的，他们剥去掉队战士的衣服，战士就冻死了。这是个可靠的故事，可是杰克对此半信半疑。

他还谈到了“青岗坡”战斗，说朱德亲临战场是常有的事，还说毛泽东等人也常到前线阵地。

最困难的是当时一直没有足够的食物。在藏族地区他们有人违反了红军的民族政策，砸碎了塞满谷物的佛像。这些谷物是多年陈粮，吃起来味同嚼蜡，但他们吃了没有得病。他们还冲洗先头部队留下的粪便，拣出未消化的谷粒再煮熟吃。遵义会议以后，他们就没有新发制服，常常挨冻。在四渡赤水

之前，国民党还在穷追。此后，虽然他们内部有不少问题，但没有受到敌人很多骚扰。

部队最后过了雪山和草地，进入甘肃以后，生活有了好转。他们能够与人民交往；有了充足的食物，开始要求战士们节省着吃，但是不少人控制不住自己，因为吃得太多会撑死的。

我们和在纽约的哈里森的医生通话后感到宽慰了，他说中国医生的一切治疗都是对的，也认为去医院进行观察和休息是明智的。我们以后还要再给他打电话。

5月14日　星期一
在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

上午，哈里森、我、杰克、张先生以及一直陪着我们的从西昌来的杜、陈两位医生一起来到这所医院。又有几位医生给哈里森作检查，又做一次心电图，并处方规定一天三次输氧。明天还有一些心脏病专科医生来会诊。我们有一间卧房、一间起居室和盥洗室，我睡在靠近哈里森床旁的帆布床上。一位可爱的护士，会讲一点点英文，半夜里还要来量哈里森的脉搏。我看，他的病情肯定在好转。但愿我们呆在医院的时间不要超过两、三天。

5月18日　星期五

回到锦江饭店

直到今天上午才出院，我们在医院里呆了四天四夜。住院的第二天，七位心脏病专家给哈里森检查，查看了所有心电图记录，得出的结论是他并没有心力衰竭，心脏也未受任何损伤。由于疲劳和脱水，使得心脏缺血缺氧，只要输氧和服药就能治好。

每天都有几个人带着鲜花和水果来这里看望，我们与楼下的一位妇女交成了好朋友。当哈里森第一次到医院，就发现"一个美国病友"送来的一张欢迎他的纸条，告诉他一点也不要着急，他会得到最好的护理的。她并不知道新来的病人是谁，只是表示友好和安慰。原来她是玛格丽特·格雷厄姆，一位从小就住在中国的妇女，她认识杰克·谢伟思。她的父亲曾在这里一所学院教考古学和管理博物馆。此后，他为美国国家博物馆研究中国苗族达十二年。她是一个家住美国图森的寡妇，要求回中国教书，但有人说她太老了。因此，她告诉我，"我曾写信给一位年纪比我大，担任政府高级职务的四川老乡，诉说我的问题。"这位四川老乡就是邓小平。此后不久，她接到几个聘请，就选了这个地方。她在医学院教英文。有她在楼下住着多亲切啊！我和杰克都经常去看她。

我每天回饭店，洗个澡，吃顿午饭，还买点东西。有一次，逛完百货商店之后，杰克和我乘了一辆人力三轮车。现在还有三轮车使我感到惊奇。1966年我在柬埔寨坐过一次三轮

车，但在中国还从来没有坐过。由另一个人拉着或蹬着车子，真使人有一种奇怪的感觉，除了为拍那张逗乐的照片外，我实在不欣赏这个。这辆三轮车的坐位上有塑料套，看来很干净。我们坐上后，杰克说："你很可能沾惹上跳蚤。"

星期三，会理来的杜医生和陈医生来向我们告别。我们愉快地交谈了我们在一起时的感受，杜医生对我说了很多恭维话，我简直不敢当。她说我对丈夫的献身精神给她们印象深刻，又说我是一位模范妻子，堪称典范，她们都得向我学习。中国人说理想的夫妻关系就是相敬如宾，在她们看来，我们夫妻就是这样的。她们认为我们是一对"模范夫妻"。我不知道如何来回答这么多的赞美辞，我用中国人惯用的口气回答说："这是我的义务，我的责任。"每当我说我们多么感谢她们给予的一切关心和照料时，她们就是这样回答的。这对我们是一次难得的经历。我们美国的医生不这样。他们将病人交给住院医生或一些护士，留下一些医疗器械，就回家去了。这里有经验的医生则住在医院里，以便随叫随到，象我前面已经写过的，不是杜医生就是陈医生轮班整夜守候在哈里森住房外，每隔半小时查看一次。

她们起身告辞，我们相互道别，同杜医生告别时，我完全控制不住自己，抱住她突然哭了起来，她也哭了。我们相处以来，虽然没能真正互相谈心，然而我们的心灵和情感是相通的。我再也克制不住自己了，从上星期起就压抑着的感情一下子倾泻了出来。情绪恢复后，我说了一声再见，然后她们就走了。

她们救了哈里森，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假如她们不在会理，天晓得将会发生什么事。

有趣的是所有那些医生中，除杜医生外，不是姓陈就是姓王。一位王医生刚从巴黎回来，他在巴黎发表了一篇关于心脏问题和治疗的论文。我想起在1972年，我们问到中国医生，是否他们与别的国家的医生有任何接触和交往，回答是他们只阅读医学杂志。现在医生和教授都有机会出国，并与外国同行进行学术交流。

我们和杰克一起午餐。他一定很高兴，不再只是陪我一个人进餐了，虽然他一直是很礼貌地陪我吃饭。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会见一位四川的藏族人，天宝先生，藏语叫桑吉悦西。他不是地道的西藏人，而是出生在中国内地藏族聚居地区。四、五百年前就有些西藏人离开西藏，定居到比他们的故乡容易谋生得多的地方——不那么高，不那么冷，而适于放牧的广阔平原。

天宝长到六岁时连个名字也没有，后来他被送到一个喇嘛那里，他的名字是根据从一个罐子里抽的签而取下来的。他在寺院里一直呆到1935年春天红军到来。三个兄弟中，他和最小的弟弟当了喇嘛。他说，当时的规定是这样，不管有多少儿子，只能有一个留在家里，其余都得到寺院去。这个制度基本上是藏族的制度。除了偶尔有些商贩，那里没有汉人。那时没有什么政府，但有少数民族部落的土司，他们是有钱人，拥有土地，租地给穷人，就好象汉族地主。大多数家庭拥有供保卫用的枪枝和马匹。

天宝于1933年第一次听说红军，听说红军在四川北部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有消息说，穷人很高兴；地主和土司的财产被没收了；红军是一支好部队，是由一位凶猛的名叫“朱毛”的人领导的。他直到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两个人，朱德和毛泽东。

另一种谣传，可能是由国民党散布的，说红军要杀藏人，要吃他们的儿童。1935年当红军快要到来时，土司恐慌起来，命令所有的人反抗红军、保卫这个地区，非战斗人员都被送到山上去了。天宝和其他一些人离开寺院参加了共产党。他说，他们受到欢迎，并发了衣服和食物，他们帮助红军没收土司的物品。这时，红军没有遵守他们关于不动少数民族地主财产的规定。理由是一方面军刚通过，他们需要给养，不得不宰些牲口和拿走他们能找到的东西。四方面军在这一地区呆了几个月，有充分的时间做宣传工作，教导人民了解红军的宗旨。

他告诉我们，当时在山上的人决定下山来，看看他们听说的关于红军所做的一切好事是否真实，他们先派些老奶奶下山，只是在肯定她们得到优待后，其余的藏人才回来。我作为一名老奶奶，不欣赏这种做法，因为显然她们带有牺牲品的性质。

哈里森出院真是件极愉快的事。他很消瘦，但气色不错。医生说他必须小心，不要感冒或者太累。

5月19日　星期六
成都，锦江饭店

在这里醒来要比医院醒来愉快，尽管我们在那里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

上午我们参观了省博物馆里的“长征”那一部分，既没有新东西又不令人鼓舞。显然，那里过去曾有过范围广泛、内容丰富的展出，我们不理解是由于什么原因，展品减少了。看看

现有的那些东西，只需十五分钟就够了。然后我们对三位历史学家作了一次很好的采访。

哈里森试图弄清楚毛泽东和张国焘之间产生矛盾的原因。当时作为毛泽东的最大对手，张国焘领导四方面军在战场上已独立作战达五年之久，他的部下称他为“主席”。当1935年6月毛泽东和他在四川一个名叫抚边的村庄会面时，张国焘的部队比其他部队的人数多得多——他自称有十万人，实际上八万人。他的部队是完整无损，给养充足，兵强马壮。据见过张国焘的人说，他当时又白又胖，不那么健壮。毛泽东的一方面军减员到只剩下几千人，人人疲惫消瘦，衣衫褴褛。因为在实力上占有优势，张国焘就认为他应该当总司令，并说遵义会议的决定无效。虽然张国焘是政治局委员，但他的要求没有人支持。尽管部队受到损失，邋遢不堪，毛泽东却得到党的支持和干部、战士的热烈拥护。

两位司令员之间举行了一次会议，在一个寒冷的下雨天，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在一个薄薄的帐篷里等待张国焘的到来。他骑着一匹白马，由几个警卫员护卫着飞驰而来，溅得路旁的人满身是泥。毛泽东从帐篷出来，张国焘下了马，他们互相拥抱，手挽手地（根据张的回忆录）走到镇里去参加一个庆祝会。他们已经十二年没有见面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从来就不密切。他们有着很不相同的见解，关于军队朝那个方向走，意见就不一致，也一直没有达成协议。

张国焘以逮捕和处死他不信任的军官而闻名。接着又开了几次会议之后，朱德到了四方面军，据说当了司令员，张任政治委员。但张不愿让出他的领导权，据有些报道说，他把朱德当成事实上的囚犯。毛泽东和周恩来继续在一起，比四方

面军几乎早一年到达延安。

1938年张国焘离开共产党人和蒋介石合流，后来他逃到香港，他的家属也获准去那里与他团聚。

明天我们将朝西南方向出发，然后北上，参观发生上述这些事件的地方。

很遗憾，我没能在成都游览一些地方，或者再去看看我们上次来成都旅行时去过的那些地方。我特别想看看内格尔的《导游指南》称颂的独特的灌溉系统（灌县水坝，而北京外文出版社则称为都江堰）和座落在附近山上的二王庙。自公元前250年至今，二千多年以来，这座水坝一直在使用，灌溉面积达一百多万亩以上，使成都平原成为中国最肥沃的农业区。那里种植水稻、甘蔗、烟叶以及其他农作物，一年三熟是常事。

玛格丽特·格雷厄姆告诉我，一个已来过中国两次并为中国某项工程提供咨询的美国工程师，曾应邀来观看这个灌溉工程。他的反应是："当然，这不是中国人建造的，他们一定得到了欧洲人的帮助。"他似乎不懂得这是公元前就发展起来的，不记得除罗马人外，当时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居住的还都是一些互相敌对的小部落。即使他们中有人想到了这个伟大的计划，他如何能来到成都呢？

5月20日　星期日

青衣江上的雅安

雅安原来是一个名叫西康省的省会。后来西康省一分为二，一部份划归四川，一部份归西藏，所以，雅安现在只不过是

四川的一个城市，但看上去还是象个省会的样子。街道两旁大树林立，修剪得象欧洲的城市一样，流经这里的那条江宽阔而重要。当年从山上砍下的原木随着江水漂流而下，但现在没有这种迹象了。

我们午饭后立即离开成都，车开得很舒适平稳。平坦的稻田渐渐地为丘陵地区所取代。这里海拔高度3,000英尺。我们乘车经过百丈，这是1935年11月张国焘和国民党打过仗的城镇，张国焘遭到惨败，死伤超过一万人。他对他的部下说，他希望夺取成都去“吃大米”，正好同毛泽东关于放弃城市、集中力量于农村的战略相反。张撤退后，回头北上，没有试图再南下。

杰克看到一张标语，上面写着：“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光荣”。

5月21日　星期一

石棉

1951年这里发现了一个石棉矿，因此得名。上午8点30分左右我们分乘三辆车离开雅安。一辆吉普坐着当地的人员和一位医生在前面领路，哈里森、我、我们的女医生和张先生乘坐一辆丰田游览车。所有其他的人坐在最后一辆车上，其中包括杰克。另一位是郭先生，他从渡口起就一直陪同我们，是位很诚恳的人。在渡口我们告别了李小姐，就遇上了这批四川的接待人员。还有王先生，就是在那次剧烈步行中说我“瘸”了的青年。还有其他几位。

我们乘车经过的地方，都是我根本没有指望在四川省要去看的，潮湿、雾朦朦的，到处是山，象江西或贵州一样，山上还开着一些杜鹃花。我原以为四川一年到头是干燥和尘土飞扬的，但现在却是雨季刚开始。我们曾攀登到海拔 6,000 英尺的地方，现在又回到大渡河旁。关于大渡河我们听的、读的和谈论过的都很多了。

我看到了许多同美国的花相象的花——毛茛、夏枯草、野玫瑰和类似蔷薇的花。还有长在最高处的杜鹃花及其同类花，还有我们曾在贵州见过的淡紫色百合花。

我们到达这里时已是三点左右。稍事休息，即乘三辆客车和一辆吉普（我不了解其他那些人是谁）去参观太平天国最后一个将领翼王石达开的纪念碑。

以太平天国起义著称的宗教政治运动，是由广州附近小村庄里的一个教师发起的，他经过四次参加科举考试失败后，受一个美国传教士伊萨卡·罗伯茨所给的新约圣经某些内容的影响，他在梦幻中见到了“圣母”，相信他是耶稣基督的弟弟，访问了天堂，上帝命令他将世界从罪恶中解放出来。他争取了一个堂兄弟帮他宣传教义，很快得到很多信徒，他们走遍农村，宣传将人们从赌博、鸦片和满清恶魔的统治下拯救出来。

从 1850 年到 1864 年，太平军在全中国得到数百万支持者，控制了 18 个省中的 16 个省，并建都南京。他们有纪律严明的军队，实行天国制度，并提出土地改革的纲领，根据这个纲领，土地虽属于上帝所有，但分给农民使用。

但太平天国起义运动没能持久。领导人太不坚定，无法维持统治；他的追随者开始争吵、内讧。同时清朝军力增强，经

过在众神的末日①那天的烧杀之后，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了。

由石达开领导的太平军和清朝大军于1862年在紫打地（1902年的一次山崩将这个城镇冲走了）发生了一场剧烈的战斗。当时石达开的妻子刚生了一个孩子，部队忙于办喜庆。他们被敌人包围了，所有出路被封锁，翼王投降了。他手下的人有的自杀，有的被杀害投入大渡河。正如我前面写过的，石达开被送到成都，凌迟碎剐至死。

蒋介石要想使红军和太平军一样，扬言要把他们消灭在同一地方，但没有成功。

我们住在宾馆的二层楼，房间外边有一个长长的阳台。中国陪同也住在这里，但他们都在另一处吃饭。我们三人在一间没有摆床和面盆的卧房里吃。一个男子和一个年轻妇女，两人都穿着浆过的白色上衣，是派来为我们服务的，但我们没有什么事情要召唤他们。

5月22日　星期二
泸定

上午我们乘车去安顺场，离古镇紫打地不远。江边有座纪念年青红军战士的头像，是从一大块石头中雕刻出来的。这是一座现代的雕塑，强劲而又朴实，用栅栏将头像围在一个小方块里，底座周围种有美丽的鲜花。在我们今天走过的

① 喻世界大毁灭。据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以odin为首的善神和以Loki为首的恶神大战使世界毁灭，后来年轻一代的神活了下来，创造了新世界和新人类。——译者注

同一条路上，头像的雕塑者被一块掉下来的岩石砸死了，当时才三十二岁。并不是由于山崩造成的，不巧的是他从车里出来，正好一块岩石滚下来砸在他的头上。他永远也看不到他自己的这件不朽作品了。秦将军认识这位雕塑家。

1935 年红军必需渡过大渡河，当时除了离安顺场 90 英里的泸定有座桥外，其它地方都没有桥(今天在安顺场和泸定之间，我们数了一下，共有 15 座吊桥，两座可通行小汽车和卡车)。泸定桥建于 1701 年，悬架在河面上，长 370 英尺。9 条铁索拴在河岸两边的岩石上，作为桥面，上面铺着木板，两侧各有两条铁索作为桥栏。这条称之为“皇道”的从北京到拉萨的主要道路，把北京、西安、成都、泸定桥、康定、拉萨连接起来；当时尼泊尔到北京进贡也走这条路。

1908 年，谢伟思的父母在这个仍然是穷乡僻壤的地区作过一次徒步旅行和野营，当时他的母亲写道：“……只要看到铁索之间的空隙，看到参差不齐地铺在桥上的木板和联结两侧铁索的零零星星的木栅，看到整座桥好象轻轻地挂在翻滚的水面上，就不由得觉得这座桥建造得很不精细。然而，这里的地位重要，如果有人当场浮想连翩的话，他定能想象到百十年来在这条古老的贸易通道上曾经通过上千的有趣的车队。印度、西藏、尼泊尔和亚洲高原其他地方来的旅行者都从这人类智慧的产物——单薄得象蛛丝一样的桥上安全地渡过了这条汹涌的通河(大渡河的旧名)。它隐藏在中国这个偏僻的山谷里，充满了神秘的魅力。谢伟思的父母步行过桥，一个女伴坐着轿子，可是半路轿杆断了，因此，她走了余下的一段路。动物过桥要有人在前面领着，后面还得有一人稳住它。

显然，在只有三条船的情况下，红军渡河需要好几天，所以决定进行急行军。他们连续走了 90 英里，既没有吃饭，也没有休息，有时还得与偶然遭遇上的敌军进行小规模的战斗。战士们用绳子系在一起，以免万一边走路边睡着了，从峭壁上掉下去。在一处地方，红军发现了河对岸的国民党军正向桥头进发，这说明守桥敌军的增援部队已经来了。红军知道敌人的暗号，他们用一个号兵向敌人发出信号，声称他们是国民党的友邻部队，刚刚消灭了一股“赤匪”。晚上这股敌军士兵宿营，而红军则继续前进，拂晓时赶到泸定。经过一天的侦察，下午 4 点向泸定桥发动了猛烈进攻。二十二名志愿人员参加了突击，仅有三人牺牲，桥就被拿下来了。

我不明白他们是怎样想办法渡过去的。在吊桥上行走特别令人提心吊胆，它使人左右摇摆前后晃动，何况泸定桥是高高架在汹涌奔腾的河水上。虽然有自己一方的战士轰击桥头来对他们进行一定程度的掩护，但是他们手拉铁索，一把一把一颠一簸地往前移动时，还是遇到敌人的枪击，桥面上的木板已被撬走了，桥头燃烧着大火。哈里森认为也许是这场火掩护了正在发动进攻的战士，使他们得到一点隐蔽。

他们总算想办法渡过了河，夺取了桥头堡。没有投降的国民党军逃跑了。整个战斗历时两个小时。这又一次证明，那些年纪轻轻的战士决心要摆脱多少世纪来一直榨取着他们血汗的制度；决心要使他们的国家成为人民能生活、工作并有其他机遇的国家；而决不能让农民、工人象过去那样，永远忍受着完全不能表示意见、什么权利也没有的境遇，永远受地主和封建制度的驱使和虐待。现在在这里，我每天都遇到代表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省的男男女女；医生们都是训练有素和专

心致志于医学事业的；历史学家、博物馆馆长、军人、政府工作人员绝大多数都出身农民家庭，都那么自觉地进行工作；每当遇见这些人时，三十五年来所取得的成就都会再一次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乘车经过的一些村庄，与世界很多地方比，即使许多人都还比较穷困，人们工作辛苦，还过不上我这样的生活，但看来他们都健康而愉快。那里再没有传染病了；儿童种痘打防疫针，得到很好的照顾；老人也不会遭到遗弃或过孤独生活；孩子们穿得都很好，即使在最朴素的农村，多数姑娘与城市的姑娘穿着一样的衣服——漂亮合身的长裤和衬衣或夹克衫，常常穿高跟鞋。我所看到的妇女中至少有一半是卷发的。这些似乎无关紧要，但这是普通中国妇女心灵状态的象征。普通中国妇女希望使自己打扮得最漂亮，也就按她们认为能使自己漂亮的办法去做。就我个人来说，我喜欢她们天生的又厚又直的头发，但很明显，她们中有些人不喜欢。

张先生和秦将军同我们共进晚餐，我们过得非常愉快。菜肴真是太多了，喝了许多啤酒，开了不少玩笑，还有亲切的交谈。哈里森一直受到医生的关怀，每天都作心电图、量血压（他们现在也给杰克作这样的检查，使杰克很厌烦）。一位医生明天要离开我们，由另一位医生来陪同。我们又恢复同乘一辆客车，生活似乎在恢复正常。并非由于什么特殊原因，今天我感到舒服和愉快；我总担心，我一感到愉快，就要发生可怕的事了。

5月23日　星期三
丹巴，仍在大渡河上

今天我们乘坐的七辆汽车组成一个车队。我们激起了好奇心，为了欣赏新奇的事物，谁都希望同我们一道去。

我们一早就离开泸定，因道路太差，或者根本没有路，绕了一个大圈子。车子经过那些紧靠大渡河两岸的青翠的高山，样子就象我们在北京看过的关于毛泽东的电影中的高山。有时远处能看到有积雪的山峰，象红军走过的雪山，衬托着明朗的蓝天，美丽得很。在所有这些地势较高的地方，都有一些逗人喜爱的花朵，特别是一种低矮的灌木，长着厚实的小叶子，好似一株玉石做的植物，开着漂亮的紫色的花。在有些地方，这种灌木复盖着大片土地，远远看去，象石南属植物，茎干挺直而茂密，据说用来当柴烧，但不大好烧。一种名叫“迎春花”的黄色的花，看起来很象罂粟花，但叶子是百合花的叶子和美国野生的毛蕊花叶子的结合。陪同我们的人谁也说不上这些花的名字。很多种花同美国的一样——蒲公英、毛莨、野蝴蝶花，甚至还有小草莓一类生长在路旁沙土上的植物。我拍了一张黄色罂粟花的照片，表示不愿摘它而让它继续生长，拍照只是留个纪念。顷刻间这两朵花被别人摘了，我注意到许多卡车司机把这种花挂在车上。中国人没有充分受过爱护花草的教育（不比多数美国人受这方面的教育多）。有一些保护森林和严禁儿童玩火以及其他类似的标语，中国人在试图教育人民爱护树木，但花草就属于次要的了。

我们走过的乡村大都是藏族聚居的地方，这使我想起了锡金，不过锡金人看起来更脏更衣衫褴褛。有些妇女和女孩长得很美，也有不少看起来自由自在的男孩，还有一些牙也没有了的非常奇怪的老头，一般戴着一顶大毡帽，穿着一层又一层的衣服。房屋都是用石头建造的，就象在西藏一样。但这里是两层楼房，有漂亮的窗户和门框。实际上，这些房子象以前拉萨有钱人的房子。记得在西藏的那些房子，就象平顶的养兔场，每所房子都用围墙围起来，颇象一个村庄的缩影，一座迷宫。

我们在一个汽车站午餐，一间很大的厨房给乘客准备饭菜，象快餐店那种类型。最好的一道菜是黄豆芽肉丝汤。

在最高点折多山（海拔超过 14,000 英尺），前面开道的警车和我们的车子停了下来，因为我们看不到车队的其他车辆了。那几辆车又往上开了一段时间，每个人都下了车，问我们“是否听到了信号？”那辆蓝白色的车的引擎打不着火了。一辆吉普开回去帮忙，想办法把那辆出了毛病的车调过头来，从山上滑行到一处可以进行修理的地方。

我们同行的人中有几位感到有高山反应，头晕、恶心或者不正常地想睡觉。哈里森和我好象不大在乎，因为我们行动缓慢，也不打算做什么。

我们在一所寺院或者喇嘛寺前停下来，这座寺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破坏了。这是八世纪唐朝的公主去拉萨和松赞干布王结婚途经的地方之一。他同时与一位尼泊尔的公主结婚，历史故事说，他和两位公主一起住在他建造的一座宫殿里，那就是现在的布达拉宫。

当我们来到有更多藏民聚居的地区时，看到小桥的式样

变了。不是我们几乎在其他所有地方见到的那种拱形石桥，而是木制悬臂式平桥，远远不能同汉族地区的桥媲美。

到处都有做祷告用的白幡，中国人说这是插在坟上用的，但我们看见这种白幡缠绕在桥上、房子周围以及菜地的帐篷上。

过去这里土匪猖獗，二十年代一位名叫谢尔顿的医生就是被土匪杀害的，杰克的父母认识这位传教士。

这次真是长途乘车，在这种公路上一天走266公里实在太远了。不过最后一段路程经过的是高山之间的峡谷，中间溪流湍急，山间奇异的岩石结构上，开着杜鹃和其他灿烂的鲜花，这段行车给长途跋涉以充分的补偿，甚至还有过之。

宾馆很别致，我们从一个窗口可以看到大渡河的一小段。从成都派来的两位先生，为我们在四川省内已经和即将去参观的地方打过前站，一路上安排好接待我们。各地的住处都放着粉红色的卫生纸，家具也是新的，总安排一两个姑娘或一名领班的妇女照顾我们。每顿饭都是大摆筵席，不管我们喜不喜欢这些饭菜。人们为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对此我们确实很感激。

5月24日　星期日

马尔康(汉语)或巴尔甘(藏语)

有一点我永远无法习惯的就是中国的农村里缺乏个人的独处。杰克经常说："你难道没有上过寄宿学校吗？"我们学校也承认一个人单独活动的要求，即使在一间为整个楼层的女

孩共用的盥洗室里，厕所也有隔墙和门，淋浴有帘子隔开。今天一大早哈里森和我一起出去上厕所，在宾馆的门外有几级台阶，最上面那级台阶上有一堵墙。墙上和墙后面至少有75个人，男的女的还有小孩，等在那里看一看这些奇怪的头发灰白的客人。这真够使人难堪的。我走进女厕所，那里共有12个坑——背靠背的两排，每排有6个坑，两排之间有一段隔墙，但坑与坑之间却毫无遮隔——两位妇女紧挨着蹲在那里，非常友好的样子。我走到背后那一排，当时没有人，可是不一会儿就有人参加到我的行列里来了。我告诉杰克，我同两个汉族妇女，两个藏族妇女一起上厕所，还有一只母鸡走来走去。他握着我的手向我祝贺。我对这种文化有所领略了。

昨晚我们听到几声以为是雷鸣的巨响，今晨听说是附近一个矿里的爆炸声。这次爆炸在市中心桥的那边引起山崩，必须进行清除。

今天车队只有六辆车。警察在开道的吉普车上的两侧挥舞着红旗，让所有迎面来的卡车、吉普和面包车停在路旁让我们先通过。我们是在大渡河对岸的一条非常狭窄的路上行驶，这一段河名叫大金川。河上漂着木材，有的随着急流而下，更多是捆绑着固定在岩石上。我不相信这是把木料运出去的好办法。等到春雨到来，冰雪融化，水位上涨到又可漂流木材之前多数木材会被摔伤和渍烂的。（我根本没想到渍烂这词就来源于此。）

在第一个峡谷的整个路途，在高处的战略据点上都建有信号塔，有些现在仍保存完好。几百年来，直到不久以前，人们还是通过这些塔了解敌人的动向，然后用点火的方法向下一个塔发出信号，告诉部落的人准备保卫他们的领地。

我们还是在一个藏族自治州境内，但这里的房屋比昨天看到的要坚实得多，且多是三、四层楼房。上面儿层都有色彩鲜艳和装饰得很好的窗户，屋顶下面有一个空旷的地方用来晾干和储藏肉类、蔬菜和木料。所有的房屋都是石头建造的，有的刷着白灰，屋顶上还有奇特的曲线装饰。整个这个地区主要是牧场，但能种蔬菜和粮食的地区好象也都种上了。有些地方墙是用泥土或粪便筑的。

11点 30 分在大金川停下来，这个城镇和河流都是同一个名字，吃了点小吃——茶、橘子水、煮鸡蛋、一种爆玉米花糖块。县长和副县长虽说没有准备接受采访，还是回答了哈里森的问题。

这个县共有 7 万居民，县城 2 万人，其中汉族3.9 万人，藏族2.9 万人，羌族 2 百人。也有白族和苗族同这里的人结婚而定居下来的。梨占整个收入的三分之一，其他是林木、苹果、桃、石榴和桔子。春小麦、玉米、豆类、冬小麦和大麦收成也好，水稻因地势太高不宜种植。这里秋天播种小麦，在小麦收割后种玉米。地势较低的地区，一年两熟。实行新的“责任”制以后，农民赚钱多了。农村现在一年人均收入可达 290 元，以前只有40至50元。95%的村庄通了电。婴儿死亡率在藏民中较汉人为高。根据最近的人口普查，每户平均为 4.5 人。

我们原定在这里住两天三夜，我觉得作最坏的准备比较明智，可是情况并不是那样。在宾馆里有两个带标准盥洗室的套间，我们和杰克各住一套。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有一条可怜的绵羊正拴在我们窗子下面的柱子上，留给了它一些青草，它没有吃。很明显它将被宰杀——很可能为我们宰杀，我真不忍心。从我们一到这里，它就一直咩咩在叫，显然是孤单和

害怕。如果要宰它，为什么不让它在死去之前舒服一下呢？我倒很想能为它做点事情，可是做什么好呢？中国人一定以为动物没有什么感觉。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我看电视时，看到一个消灭狂犬的节目。有一只狗就是用棍棒打死后扔到坑里去的。还在一只狗脖子上套上绳索把它勒死。我再也看不下去了。为什么不开枪把狗打死呢？我不相信有那么多狂犬，我认为这是消灭狗的借口。

晚饭后，哈里森马上去打字了，我和杰克一块去散一会儿步，有一个保安人员一直跟着我们。每天早晨杰克想在早饭前去散步，差不多总是有人盯着他，要么同他一道走，要么跟在他后头。有时他出不了宾馆的大门，因为门给锁上了。有一天早晨在成都的饭店里，因为正下着雨，他只能在饭店周围转，偶然碰到有几个和尚在念经。我们猜测他们也是饭店里的宾客。

5月25日　星期五

马尔康

刚吃完早饭，杰克就乘另一辆丰田小客车去小金，同行的有王先生（省内为我们旅行进行安排的两位打前站的人员之一）、一位医生和另外两个人，坐另一辆小客车的有五人，包括警察、保安人员和县里的官员。他们将参观毛泽东与张国焘会面的地方以及1935年6月两人开会和商谈的其他地方。

和杰克告别后，我们去当地一个博物馆，再一次参观关于长征的展品。这里有些关于高山和农村的图片，是我们以前

不曾见过的，这些图片使我们对1935年的情况有更好的了解。在博物馆的办公室里，我们会见了一些当地的专家，在那间又冷又潮的房间里，开了一只通常用来烧大壶热水的电炉来取暖。哈里森还想了解更多关于张国焘和他的四方面军的情况。张国焘和毛泽东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会见以前，他控制了大片地区达九个月之久，称为西北联邦政府。在那个地区，他手下的八万人吃得很好，可是到了这里以后，情况就不同了。这个地区现在的人口才18,000人，1958年是1,500人，1935年更少。当时只有几所房子和寺庙，因此我们不知道四方面军当时吃什么。当地老百姓自己还不那么够吃，因此红军很快就断粮了。

在抚边初次会面之后，又进行了多次商谈和一些人事变动。张国焘被任命为政治委员，取代了周恩来的职务，朱德是总司令，毛泽东是总揽全局的领导。我没有弄明白为什么张国焘取代了周恩来的职务，或者周恩来当时担任了什么工作(总参谋长?)。政治——内部斗争，意见分歧，阴谋，领袖们被撤换、提升或者宽恕——是如此复杂，我不知是否能弄清楚。哈里森说，不要担心嘛，“谁也没有彻底弄清楚。”我必须说，我们每到一处，关于同一些事件，总是听到不同的说法。

哈里森问军队怎样对待喇嘛寺，答复同以前听到的一样，给军队下了命令，不得干涉人民的宗教活动。红军快到时，喇嘛就逃跑了，战士住在喇嘛寺里，但不许动任何东西。可是，过了不久，粮食紧张了，纪律也就松驰了，他们能找到什么就吃什么。因此，好的愿望并非永远能保持下去。

这里曾经是一个产鸦片的地区，我们坐着的地方，当年就是一个用鸦片同商人和商队交换粮食、衣服、布匹和钱币的市

场。鸦片是九月份收割，因此交易市场是在秋天营业。

红军当时也把鸦片当钱币来交换东西，鸦片是他们从地主那里没收来的。有时红军只能招募到有大烟瘾的人当兵，就把这些人先招下来，慢慢再给他们治疗。战士是禁止抽鸦片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任何一个战士抽鸦片的传说。有一位被四方面军请来的年老的中医有大烟瘾，因为他医术很高，所以他们满足了他的需要。

我问喇嘛是否抽鸦片，这个问题引起了中国人内部达五分钟的谈论。他们说，这是个难题。根据喇嘛教，是禁止抽的，但谁知道呢？他们的生活是祈祷，但他们是土地所有者，而且种鸦片，也许他们在后院抽一些。

附近的老年人记得，张国焘是高个子，又白又胖，脸上有块大疤。他经常骂人，粗暴得很。有时会议正在进行，就有人被拖出去杀了。博物馆的专家们说，也许这些人是“四方面军的犯罪分子。”

解放以前，就象1935年那样，这个地区仅仅有少数几所房屋和喇嘛寺。1953年建立了藏族自治州。

这里真是百废俱兴，包括大批建筑——每一寸土地都建有新公寓楼。有一所印刷书籍、教科书、笔记本等的印刷厂。自治州的报纸在另一家印刷厂印刷，每周三次用藏文和汉文出版。还有食品加工厂、制药厂、火柴厂、农机厂以及设在稍远的地方的木制鞋楦厂。木材是一笔大宗生意，有两个货车运输公司，一个是县办的，一个是独立的。工厂的规模不大，总共雇用1,000名工业工人（哈里森根据某种理由，认为只有500人左右）。政府工作人员有3,000人，包括医院的人员。其他是服务人员，商业人员和办事员等。我们发现附近有些兵

营，因为昨天我们乘车经过兵营的大门口时，一名青年战士开着吉普车突然出来，也不看看门外是否有车经过，差一点同我们猛烈相撞。我们的司机很镇定，向右边一闪，约差一英寸，没有撞上。我过去总认为，意大利人对发生事故或者对几乎要发生的事故，总爱怒气冲冲地喧闹一番，可是我还从未听到过象我们的陪同们为这件事引起那种骚动。张先生和司机从车上跳了下来；前面的保安人员也跟着下来；秦将军也下了车，他的出现一下子吓得那名开车的战士一句话也不敢说了。甚至那位温和的王先生也嚷嚷起来。那个军队的小伙子将会受到一次狠狠的申斥（他已经受了一次），还可能吊销他的驾驶执照三个月。

马尔康是我们参观过的按规定不对外国人开放的地方之一。这些地方似乎还在执行这一规定。

我们回到宾馆时，哈里森说："你说对了，那只绵羊不见了，那里有宰羊的痕迹。"满地都是血，供人们坐的木条凳上也有血——这条凳子放平当作了宰羊案板。我见过杀猪。这可怜的小东西，曾整夜地号叫，就这样结束了生命。我知道我是吃肉的，而且喜欢吃，但是我不能吃我怜悯的动物，或者是我认得出来的动物。有人告诉我们，今晚将去吃一顿西藏式的羊肉饭。反正我不去吃。

在附近公寓楼的一个阳台上，我看到将衣服用夹子夹起来吊在绳子上晾晒，这是我初次在中国见到。衣服和其他洗濯过的东西一般都是挂在绳子上或者用杆子穿着袖子晾晒。有一只象老鹰的大鸟纹丝不动地停在窗子外面，显然是老了。可是它正在太阳下面，一定会发出难闻的气味。

下午我们乘车走六公里到了卓克基。在两条小河会合处，

有一所房子，那是我们见过的房子中最宏伟的，虽然它很快要倒塌了。这房子当年是一位土司出巡时所使用的几处住所之一，或者是衙门。它是五层楼的结构，并有一信号塔，楼房矗立在一座石头山丘上——外面是石头砌的，里面是木结构，上面几层周围有阳台。（我们回家以后，哈里森发现了一些红军战士的回忆录，描写红军到达时这座房子的情形："柱子漆成红、绿、黑三色；木雕和珐琅镶有宝石。墙上有挂毯和藏文条幅，房间里陈设着华丽的躺椅、柚木床和螺钿镶嵌的桌子。里面还有一个藏有藏文和汉文经典著作的图书馆，周围方园数百里只有这里才有玻璃窗。"）

底层是厨房和炉灶。保安人员和商人住在那里。二层是仆人、士兵、保镖以及为侍候主人一家的其他人住的。主人全家住在舒适而豪华的第三层，来访的喇嘛住第四层。在阳台上面、高耸的屋顶下边，有两间形状奇特的房间，那是做祷告用的。底层的一侧是马厩，有一扇门直通墙外，不通院内。紧接着主人一家住的那一层房间外边，有一间用墙围起来的小屋子，更象一个阳台。从这里安了一个水槽通到底层的一块用围墙围起来的空地。这就是当时的厕所。我们在这个地区看到的更结实一些的老房子里，都建有这种从主建筑伸到外面的小屋。

阳台和门上的精美的木制品，有些还保留着，但大都被弄走，很可能被烧掉了。油漆和装饰全都没有了。至今还有一户人家住在这所房子的底层，但不久将搬出。如果不采取措施，那么留存下来的东西也将受到破坏。鸡和猪随便在那堂皇的庭院里漫步，鸟儿在上面几层筑巢。

秦将军与我们有同感，认为这幢很不平凡的建筑物应该

得到保护和修复。红军到来时，土司逃跑了，因为这是附近最华丽的房子，所以毛泽东在里面住了几天。这也许会成为保存这幢房子的推动力。虽然，这里的人民对他们拥有的这块宝石并不欣赏，因为他们无钱进行修复，看来得由北京某个单位出资才行。我们准备向我们认为能提供帮助的人写信。

我们访问了附近一户藏族农民家庭。他们的房子宽敞，盖得也不错，年收入四千元，这是直到最近还不曾听说过的，这个数目大概是许多政府工作人员的收入的几倍。收入这样悬殊必然会引起麻烦。有人告诉我们，农民赚那么多钱，买了自行车、电视机、收音机、钟、拖拉机（并非每个地方都用得上）之后，不知道拿这些钱干什么。他说，有一个人们爱听的传闻，两个农民口袋里装满了钱上北京，跑到马克西姆餐厅去吃午餐，花了180元。这个数目过去曾经是外交部工作人员三个月的工资。还有许多关于农民买飞机、买价钱昂贵的汽车、经营出租汽车的传闻，都是极力赞扬责任制。

晚饭时，桌上摆了一大盘羊肉和骨头，（感谢上帝）盘子用盖盖着。我们没有吃这道菜。我想从今以后我如果要吃肉，那就吃鸡算了。

5 月 26 日　星期六
马尔康

今天很轻松，上街购物时买了几件藏族特产——两条穿钱币的带子，几条腰带和一件头饰。同行的一位先生买了一个高压锅，就同我家里那个一样。阳光底下很暖和，出来走走

真不错，所以我们前往河边散步。马上派来一位女士陪伴我们，还有一位保安人员跟在后面走。那位女士领我们到了另一家商店，楼下出售工具、灯泡、钉子和收音机；楼上除了男女鞋类和少数几种化妆品外，其他就没有什么了。一间小小的特别房间里有毛线、衬衣和夹克衫。

杰克比我们预料的时间提前回来了——回来时刚刚吃过午饭。他给我带回一大束杜鹃花，可是谁也没有那么大的花瓶，因此我把这些花插在痰盂里，正好合适。我拿去给我们楼层办公室的妇女们看，对她们说，我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就地取材"找代用品"，"搞革新活动"，她们都笑了。

5点30分我们和自治州的两位藏族官员共进晚餐。他们穿着地道的藏服——一件中等身长的外衣，象蒙古的袍子或汉人的褂子，穿在衬衫和裤子外面，脚穿靴子，头戴大毡帽。其中一位在吃饭时也戴着帽子。另一位是我们的主人，三十五岁，长得那么俊秀，我几乎不相信他的年龄。他们说，他们与拉萨和西藏自治区没有任何关系，不过也认为达赖喇嘛应该回来。他们不信教，但他们的父母过去信过教。他们说，根据政策，男孩到了十八岁，就自己决定是否去当喇嘛。非经他们本人自愿，父母不能送他们去当喇嘛，喇嘛寺也不能要他们。不过，几天前，在丹巴附近，即唐朝公主去西藏同藏王结婚途中经过的那个喇嘛寺里，我们见到了三十多个喇嘛在隔壁那座寺里念经祷告，其中有几个男孩看起来最多不过十岁或十二岁。

晚宴很亲切——仅仅有两位藏族人、杰克、我俩、张先生、秦将军、郭先生和两名当地的官员参加。那两位当地官员中的一人到此地已二十年了，现在要回成都去，他为此感到很高

兴。我们一行中的其他人在另外一间屋里闹哄哄地欢宴作乐，秦将军不断地走出去向他们祝酒。他们也向我多次祝酒，使我深为感动。秦将军对我还说，他准备告诉他的妻子，她应该“向你学习”，正如毛泽东曾经说过的那样“向西方学习”。

在晚宴上，我们的主人把鱼刺和其他骨头吐在热毛巾里。我们在桌边就坐时，差不多总是给每个人传来这种热毛巾。一般情况下，人们擦完脸和手之后，毛巾就拿走了，今晚却都留在桌上。我们的主人想再擦擦手，他就把骨头抖在椅子后面的地板上。这比把骨头全都吐在台布上更为不妥，吐在台布上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下面的菜单是从中文直译出来的。共有十八道菜，不包括两个漂亮的大冷盘。冷盘之一是白萝卜雕刻成的一只大鸟，周围有绿色的东西衬托，绿叶中间还有一些小鸟和花朵。菜单如下：

1. 双凤戏牡丹
2. 金钩炒莴苣
3. 酱汁牛尾笋
4. 甜味烤鲜肉
5. 辣油凉鸡块
6. 佛手青菜卷
7. 腰花青豆丝
8. 葱白烧排骨
9. 珍珠丸子汤
10. 百鸟朝凤
11. 鱼香肉片

12. 脆胡桃鸭块
13. 凤尾莴苣汤
14. 五柳鱼
15. 清蒸贝母鸡
16. 炖牛肉
17. 三色白木耳
18. 麻辣肉花
19. 四川担担面
20. 蛋清山芋

有些菜名还能理解，有的则无法理解，木耳是蘑菇一类的东西，种类不同而颜色各异。我至今还弄不清“贝母鸡”是什么东西。用洋葱或小葱条包起来的菜豆，还有面条，味道都很好。龙须菜切成小块作为冷盘中的一样菜，但我们猜不出属于菜单中的哪一道。

宴会后我们看了一部很长的关于川北的影片，明天又要出发了，很可能未来的十天又是不舒适的。

5月27日　星期日
红原，海拔11,550英尺

上午和部分四川朋友告别，我们仅仅分乘三辆车离开这里。郭先生、王先生、两位司机、以及从成都起加入我们行列的那位医生还同我们一块走。随行人员中又新增了一位从上海来的女医生以及她的助手——一位姑娘。有她们同行是令

人放心的，不过我明白，哈里森现在完全康复了。他看起来健康，似乎一切都正常，也变得小心一些了。由于我们到达了这个海拔 11,500 英尺的地方，所以做什么都是动作慢慢的。

离开马尔康后，我们沿着大渡河的上游及其支流走。长征时一方面军的一部分就是走的这条路，其他部分稍为靠东边一些。那时没有什么界线，只知道这里主要是由藏族人占据的地方。红原这个县是1962年建立的，面积八千平方公里。现在人口为 27,000 人，有牲畜 50 万头。70％的人口是藏族；还有回族 200 人，羌族 150 人，其余是汉人。1935 年，这里没有路，没有人，没有粮食。天气可以在几分钟之内从温暖的晴天变成大风雪。中国人对高原较敏感，难怪战士们当年害怕高原之苦，而且一直身体颇感不适。

菜地里的马铃薯正开着花，人们用短把锄在除草。听说在夏天里，草地就象一张用鲜花铺成的神奇的地毯。现在季节还太早，但高山边上已经象瀑布一样布满了杜鹃花，较低的石山上也开着蓝色和黄色的花朵。看到接骨木的灌木丛更使我想起了我的家乡。这里的接骨木同我家乡的一样清香，不过略小一些。

牦牛和绵羊在广阔的平原上吃草。雪山的高峰映入眼帘，似乎耸入半空之中。有时看到牦牛上放着鞍子。牧场的围墙是用干粪砌成的。沿途每隔一段路，可看到佛龛上飘扬着祈祷用的白幡。

我们在一个藏族村庄停下来，吃野餐式的午饭，食品是专为我们带来的。太阳晒得灼热，就象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的中午一样，我们被领到一间阴暗凉爽的房间里，那里虽有一个炉灶，但发散的热量不多。又搬进来一些桌椅，我对杰

克说，我还是坐在外边吧。他对主人说了。于是将刚搬进来的那些放在桌上的东西，都搬了出去，再加上四把藤椅。在非常好的空气里每个人都吃了一顿称心的午饭。我们吃了圆面包夹肉、鸡蛋，还有各种饮料，如啤酒、崂山矿泉水、汽水、果汁，以及哈里森最喜欢的橘子罐头。可是午餐上最精彩的东西是藏民用牦牛奶做的酸奶，比我们习用的酸奶稠一些，倒进一些当地极好的粗制糖，一次吃了一升多。

在这个藏族地区，没有人请我们吃全羊，吃羊头或羊眼睛，我总算放心了。吃的一直不错，蔬菜不少。晚饭后我们看两部没完没了的影片，内容从跳舞的姑娘到牦牛、绵羊的繁殖，以至关于兔子的医学试验，什么都有——都是关于四川省的伟大成就。

5月28日　星期一

若尔盖

我们离开红原，乘车经过一个很象蒙古的地区。我感觉好象我又到了蒙古。同样是荒无人烟的高原，周围有青翠的高山环抱。同蒙古不一样，我们看到的地方，都有顶端积雪的高山作为背景，有时高山还为云雾所遮盖。

我们到藏族地区已经六天了。七百年前西藏人开始迁入这个地区，那时这里属于中国。在几个世纪里，开始中国强盛，后来西藏强盛。西藏人迁入这里时中国衰弱了。清朝年间，中国又强盛些，差不多藏族地区的一半并入中国版图，除了收些税，中国人继续让藏族土司管理，解放以后还没有怎么

去管他们。直到“文化大革命”这场大动乱发生以前，这里的生活方式基本上是西藏式的。“文革”期间，牲畜被宰杀，农业的变革也不考虑当地的气候条件，喇嘛寺被毁坏，喇嘛受到杀害。自从这个骇人听闻的时期结束，才逐渐恢复到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即藏族人一向熟悉的状况——牦牛、羊、马在这个高原地区生长；这里搞畜牧业比农业更适合；宜种大麦而不宜种稻谷，等等。此外，似乎也有了一些宗教信仰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在中国的宪法里一直是有规定的，但不是经常受到尊重。

在牧民的帐篷周围，在河边的小神龛上，在所有的小山上，到处有祈祷用的白幡。

我们在紧靠白河的一所喇嘛寺前停下来，进行礼节性拜访。白河流经草地后与黄河会合。大约有45位喇嘛用土灰色粗布做的哈达欢迎我们。多数喇嘛看起来年老驼背，身上很脏。我们坐在室内的地板上，喝热酥油茶或者装做喝茶的样子。从那没有洗净的身上、衣服上和牛油灯上发出的气味，比这个地区其他的怪味还难闻。我不记得在锡金的喇嘛寺有类似这种怪味。同几天前我们参观过的喇嘛寺一样，喇嘛中有些是不到18岁的男孩。确有人说过，如果碰巧一家有两、三个以上的孩子，多余的男孩年纪小一些也可以到喇嘛寺去。

我们步行到两条河的会合处，那里并无给人印象很深的地方，两条河的河水平静，差不多象池塘一样。早晨出发时，天色晴朗，太阳给人以炽热的感觉。可是天气突然变了，天色暗下来，开始下雨，狂风大作，又变成了雨夹雪。瞬息之间，天气又变了，开始出太阳，然后是暴风雨；当我们站在不太陡的河岸边观看两河相会时，又开始下雪了。我们领略到了当年

红军所遇到的天气的滋味。现在刚五月底，而这里一年只是在七月份有五天无霜期，所以一年到头任何时候都能下雪。

我们停下来午餐时，同我们会见的两位藏族县级官员正在这个县的县界上等候。象许多藏族男子一样，一位长得俊秀，穿着一件漂亮的绵羊裘皮上衣。我们一面交谈一面喝茶，然后由一位穿着三英寸高跟红皮鞋的美丽的高个子藏族姑娘领着，我们到了一间用石头和灰浆砌的正方形房子里，这房间通常是作牲畜厩的。我们在这里吃饭，又喝了一次很好的酸奶。哈里森一向讨厌喝酸奶，可是却爱喝这种酸奶。

若尔盖秀丽得象一座前哨小镇。多数藏民住在山上的帐篷里，放养他们的牲畜。他们骑着马，赶着牦牛到镇上来买日用品和食物。我们以为住的地方会很糟糕，可是又一次使我喜出望外。给我们安排了两个房间，室内有两张大床，两个取暖用的电炉，两个脸盆架，五个脸盆，三个痰盂、一张沙发，四把安乐椅，四把带垫子的折叠椅，两间屋里都有地毯，还摆了许多饮料。有好几种酒，崂山矿泉水，啤酒，两个热水瓶，一些茶杯，玻璃杯，还有一个电壶，我们可以自己烧开水。

在这个条件极差的地方，我们吃了一顿筵席似的晚饭。我们穿过庭院到了另一座房屋，走过一条长长的昏暗而阴湿的通道。通道两边都是房间，在宾馆及附近工作的人都住在这里。门都关得严严的，用大挂锁锁着。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锁，那么多插销，每个门上、车上、窗户上、大门上都有。通道尽头的一间房子作为餐厅，餐厅中间立着一个屏风，我们三人坐在一边，中国陪同坐在另一边。这里也开了一个取暖电炉。前几天有人告诉我们，这里的电费只有北京的十分之一。

5月29日　星期二
若尔盖

在这里过得很愉快又很舒适。上午我们去巴西，这是毛泽东同四方面军最后一次发生争执的地方，以后他就走自己的路了。当地陪同的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若尔盖有一家制肠衣的工厂，一家做皮革和裘皮服装的工厂，还有一座小发电厂。他指给我们看那平原上的一片建筑物，说那就是过去的村庄。因为靠喇嘛寺太近，所以搬到现在这个地方了。人们现在把这些建筑物当作屏障。这里用泥炭、煤、木头和干粪作燃料。我不能理解这里怎么会有木头，以为一定是从很远的地方运来的。我们离开这个长满青草的高原，乘车登上一个不很高的小山，突然之间，在山的那一边看到了一大片常绿树木和广阔的森林。这就是黄河和扬子江的分水岭，这个丘陵地带，呈现一片青翠。"文化大革命"中，树木被肆意砍伐，人们想拿什么就拿什么。现在政府制定了科学规划，不过要弥补这些损失还得很长一段时间。那里还保留了少数可以采伐的大树老树，庭院里也堆放着大块的木材。

当地一位历史学家说，本县的藏族人在这里已居住了1,200到2,000年了。他们过的是游牧生活，对这种生活汉人是完全不理解的。藏民埋葬死者的办法是将尸体放在河里，让鱼和鸟去处置。我们经过离河边不远的一块平地，周围插着做祷告用的白幡，那里正在举行埋葬死者的仪式。他们也有同西藏的藏民一样的做法——把尸体砍碎让动物和鸟类去

吃。如果木材充裕，他们也使用棺材，采取通常的土葬。母亲抱婴儿时，把孩子裹在奇特的衣服里。有时婴儿头朝下露出外面，一般婴儿都是光着身子。

哈里森和我没有去当年毛泽东向四方面军的几支部队作北上讲话的那座寺庙的遗址，因为路太陡，而且没有什么可看的。红卫兵不知道毛泽东曾到过这里，把庙给破坏了。毛泽东当时对战士说，他们可以自行选择——跟他北上或者同张国焘及四方面军的其他领导人南下。他们选择了往回走，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四方面军遭受了失败和损失，结果比毛泽东晚一年到达陕西。

王先生奉命陪着哈里森和我，他建议我们到庙下方的山谷里一座桥下面看看，在那里等候其他人。有一只牦牛的头挂在高出水面两英尺的地方。藏族人相信在这条河里有一水牛神（不是每条河里都有），如果不殷勤招待他，他就会对这座桥进行捣乱，例如桥可能被春天暴发的洪水冲掉。所以杀一只牦牛祭神，把牛头挂在桥下。

花儿真逗人喜爱，很难想象这里的花怎么会开得比其他地方更茂盛更美丽。有一种很小的深紫色的地被植物；一种浅蓝色象小兰花一样的花；一种漂亮极了的开粉红花的长刺的灌木；一种就要开花的黄色低矮植物；还有蝶须同美国的长得一模一样。

归途中我们在班佑停下来，红军曾在这里设过总部，毛泽东在附近住过。多数部队当时都去了巴西，因那里是一个村庄，有房子可住。在红军总部所在地，我们看到一种黄色的柳树（在海拔这样高的地方，只有这种树能生长）。到处堆着晒干成块的牦牛粪，可用来当燃料、盖房屋和围墙。狗多得很，

这种个头大而凶猛的动物，一定是看门狗。人们从不结实的房屋里或者从帐篷里走出来，观看我们这些白皮肤、模样奇特的客人，孩子们围上了我们。

那股气味真难闻极了，他们一定从来不换洗衣服。可是我也不怪他们，大多数时间天气太冷不能脱衣服。县长形容这里的气候是“持续的冬天”。

但是孩子们是很吸引人的，好奇而友好。这里有一所学校，开办一、二年级，所有儿童都必须去上学。学完两年之后，如果他们希望继续上学，就得到市镇里去，实际上没有什么人去，因为有相当一段路需要骑马去，而且就是最小的儿童，也得帮助家里干各种活计和看孩子。看来孩子不少，肯定超过允许少数民族一家生两个孩子的规定。

我们看到数以百计的祈祷用的白幡，显然这里喇嘛教正兴盛着。这里多数人信教，有80％到90％的人参加宗教节日活动。杰克将一封信在巴西邮局盖了邮戳。长征的时候，这里还没有邮政呢。

下午我们参观当地的博物馆。尽管展品有限，同其他博物馆看过的一样，但是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能有一所博物馆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在一所图书馆里，他们自称订了几百种报刊，有两间摆着桌椅的房间里供人们阅读。我们感到奇怪——那些杂志看起来好象从来没有人动过。

晚宴上我们向郭先生、王先生以及从成都来的司机告别，并同明天即将访问的甘肃省派来的人认识。他们开车越过省界来接我们，这是一种不寻常的姿态。四年前在兰州陪过我们的周小姐是甘肃接待组的组长。开始我们认不出她了，因为现在她烫了头发。不过她还是那样一位严肃的青年妇女。

虽然成都来的人还要陪我们到星期四，今天是正式的社交上的告别。

数不清有多少道菜，祝了多少次酒。今晚我也祝了几次：祝医生们健康；祝这位“不管我们在病中还是健康”都给我们无微不至关怀的郭先生健康；祝一路给我们安排、使我们过得很舒适的王先生健康，祝在成都为我们开车往返于医院的何先生健康；祝另一位司机李先生健康。杰克向王先生祝酒时说，毛泽东过草地一次，秦将军两次，四方面军三次，可是王先生离开我们后要四过草地。

5月30日 星期三
迭部

8点15分离开若尔盖时，正下着雨，天气寒冷，但没有象昨天那样下霜。由于从甘肃派来的接待小组同我们会合了，所以一共要乘六辆客车和吉普。我们乘车经过了县里最大的牧场——面积约1,600英亩。在濛濛的雾中，也许正是因为有雾，牧场好象永远没有尽头。草地里最低洼的地方正在挖排水沟，排干水后便能成为平整的牧场。红军经过时，草地的大部分就象今天条件最差的那些地方那样——大团的草浸在水中。他们不得不在这些草团上跳来跳去，要找一大块干地宿营几乎是不可能的。不那么潮湿的大块平地也有一些。过去也一向有这种平地，可是如果你不熟悉这个地区的情况，你就找不到路。看来，毛泽东当时没有花时间去选择最好的路线，哈里森认为，那是由于他当时急于摆脱张国焘。虽然有藏

族人做向导，不过这些向导从大片平原向前一看，就简单地沿着一条直线往前走。难怪对许多战士来说，这是最艰苦的一段——没有村庄，没有老百姓，没有牲畜，没有吃的东西，又潮又冷。唯一在困境中似乎找到好办法的人就是贺龙，他在沼泽池塘里抓到了鱼。

11月至5月之间，牲畜在冬季牧场放牧。今天许多牲畜正被赶往我们旅行的同一方向——东北方向，到夏季牧场去。两位牧民骑着马在后面驱赶着数以百计的牦牛，每人都是一手撑着大伞，一手握着缰绳。这里牲畜的头数不是在增加，不过经过播草，牧场正得到改良。种的一些牧草，主要是供幼畜用的。大麦是藏民的主食，还有牦牛奶及奶制品。肉类的销售量很大——一年二百万磅。宰杀在秋季进行，建有冷藏库。

我见到一名男子正骑上牦牛，我注意到他尽力把牦牛的头拉到一边，牦牛的鼻子上穿着一根绳子，就象给公牛的鼻子上套个环那样，上面还有一个笼头。因此，在人骑上去并把牛头放松之前，牦牛是动弹不得的。

在种植牧草的地区，都有围墙围起来的处所，以储备冬季饲料和圈养幼畜。围墙约有三英尺高，多数是干粪砌的，后来也见过一些用石头垒的。我们不知道，这种用干粪砌的墙怎么不会被大风刮坏，也许因为墙不太高。砌起来一段时间之后，墙上长出了花草，看起来十分漂亮。快到十点了，我们碰到了四十多位骑手，走在前头的就是我们那位俊秀的主人——当地的县长。他领着仪仗队来欢迎我们，并护送我们去观看壮观的表演。天下着瓢泼大雨，因此我们没有下车，仅仅停下来打个招呼，看了看仪仗队。我们的客车一发动，随着一阵刺

耳的喊叫声，骑手们在我们旁边急驰而去。我们在路上慢慢行进时，更多的骑手以同样的叫喊声欢迎我们，并在公路两旁骑马行进，最后给我们护卫的有近百名骑手。

我们折向一块宽阔平整的田地，受到一大群男女和儿童的欢迎，他们穿着用厚厚的毡子和裘皮或羊皮制做的衣服和靴子，在一所帐篷的两侧列队鼓掌欢迎。给我们献了白色的哈达（这次很干净，不象那些喇嘛献的），我们走进了帐篷。帐篷顶是用有花形图案的材料做成的，和我们家乡在颜色鲜艳的伞上以及在院子和阳台的布篷上见到的相似。地上铺着粗地毯，杰克、哈里森和我坐在入口处的对面，其他人坐在两边。帐篷中央的一张桌子上摆着藏族食物的样品：四大碗大麦、大麦面及两种其他面粉，从成百磅牛奶中提炼出的大块奶酪和酥油。我们喝了茶和酸奶，感谢上帝，没有让我们喝有哈喇味的酥茶，也没有吃那里传统的油腻的羊肉菜肴。哈里森认为，大概有人事先传了话，说我们不喜欢吃那些东西。不管是什么原因，这算解救了我们。

我们站在冰凉的雨里，观看了赛马。先是三位男骑手的对抗赛，然后是两位姑娘比赛，最后是两个年轻男孩之间的比赛。他们骑着马奔跑到一个设有标志的地方，然后折返。我们向获胜者献了哈达，将哈达系在他们的脖子上。看看这些长得英俊的马匹是很有意思的。这些马比蒙古马的个头还要大些，套着用银子装饰的笼头，优质皮革的马鞍和华丽的鞍垫。

我们没有留下来吃更多的点心就重新登程了。几乎立即来到了一个情况极不相同的地区。开始在两座大山之间攀登，到了山顶之后，前面突然是一些石头小山。那里只有少数

矮小的树木。山口的高度为11,550英尺。由于我们到达海拔这么高的地方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对此已经习惯了，用不着再服安眠药了。

我们下到一个小小的山谷，很快就见到了耕地，还见到了许多猪和少数几头牛，仅仅见到一头牦牛。妇女们在小麦或大麦地里劳动。他们是从事农业的藏民，同从事牧业的藏民有所不同。他们没有放牧的牲畜，不需要从一个牧场迁徙到另一个牧场，而是终年住在村里。房子看起来单薄和冷冰冰的，是用木头建造的，外边还竖立着一种奇特的木头篱笆和用大木杆搭起来的架子，那是用来晾晒肉类和皮革以及其他需要晾干的物品的。我们看了几座似乎很活跃的喇嘛寺和一家砖厂，而砖厂的围墙倒是用泥筑的。

我们向长得俊秀的县长告别，他在我们到达之前已经到了县界了；我们也向那些在多处险道上为我们开道的头戴蓝帽子的警察告别。

我们感觉，这里的藏民同西藏有某些直接的接触和关系，而在马尔康的藏民则没有。

同车的其他人为杰克立了一条规定，一天之内只让杰克下车拍几次照，而不是象他希望的那样每隔五分钟就停下来拍照。因此，他不得不利用其他机会下车拍照；诸如：车队中不时有人要方便一下；哈里森想要拍照；或者我想要去看一朵花。今天有一次我要方便一下，可是没有地方，除了公路以外，什么也没有，两边是陡坡，光秃秃的，尽是石头。我们终于到了一个有灌木丛的地方，我说我非停下来不可了。司机猛踩煞车。我们后边四辆车上所有的门都一下子开了，每个人都是为了同样的原因而跳下了车。我们回到客车上时，张先

生说："每人都感激你，别人谁也不敢说要停车。"我活到这么大年纪就有一点长处，当我非上厕所不可时，我敢说。

沿着白龙河前进，看到了几家小的粮食加工厂和一个电站。花朵和灌木还都是那些熟悉的样子。

我们于两点左右到达迭部。杰克、哈里森和我在我们的起居室里坐在小椅子上，围着一张小桌子，吃了些煮鸡蛋和面条。这些桌椅就象娃娃的家俱。三点我们会见了两位红军老战士，头一位六十八岁，牙齿全掉了，是位相当可以信赖的人。红军经过他老家云南的村庄之前，他从未听说过红军。红军在村里只呆了两天，他就参加了红军并随红军一道走了。他当时在一方面军的侦察队，所以他们有粮食。他是第一个说过雪山没有遇到困难的人。他打过许多次仗，不分白天和晚上。过泸定桥时他的手受伤了。过草地之后，他的臀部遭枪击，被留在一个藏族农民家里，由这家照顾他。国民党没有来到这里，由一名藏族土司统治这个地区。他在这里住过两年，现在住在麻牙。

另一位所谈的是不那么容易令人相信的，他出生于仪陇县一个贫农家庭，朱德也是在这个县出生的。他说，他十二岁就要求参加红军，人们说他不行，因为他还没有步枪高。显然他是随着部队行进的，1936 年负伤，先坐担架，然后被编入收容伤病员和掉队的收容队。过草地时他是被别人抬过来的。他说，当时曾下令将所有伤病员留下来，他同其他一百多名战士一道留下来了。问到他们当时是否有钱，是否有人帮助他们，他不置可否。我们都感觉他一定是个脱离队伍的人，当时这种人相当不少。1934 年红军整顿过纪律，那时没有掉队的或者脱离队伍的。一年以后，有些战士身体虚弱、生病、纪律

性差，因而有许多掉队者。

他们告诉我们的情况也就是我们听过的那些——听说红军快来了，老乡就逃跑，把锅及其他东西藏起来或埋起来。回来时发现一切东西都干干净净，院子也打扫了。战士用过的老乡的东西，经过清洗修整，比原来的情况更好。

晚宴是由一名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工作过的中国厨师做的。张先生不断地从我们桌上站起来帮助我们向另一桌敬酒。每次坐下时，他都碰撞着桌子的腿，把茅台和其他酒杯都碰倒了。有人说，酒神会对他生气的；我说，我看卖酒的人会高兴。秦将军喜欢听这样的俏皮话。

5月31日　星期四
甘肃岷县

向郭先生、王先生以及司机李先生亲切告别之后，于8点左右离开迭部，还是乘车沿着白龙江行进。

在这个狭谷里，森林茂密，许多地方竖有“保护树木”的标志牌。这是一个县政府直辖的地区。有一种紫色带粉红的灌木，我猜想是玫瑰，果然不错。周小姐说，只有这个狭谷里才长这种花。一种象美国的火草但略小一点的紫花，遍地都是；另一种象笑靥花的灌木，也是满山遍野。苹果和梨是这里的重要作物。蔬菜种在塑料棚里，树苗则用挂在柱子上的草垫子保护着，这种草垫子有些象藏族人的帐篷。

靠近河边有一个胶合板厂和一座大电站，电站旁有一条很长的溢洪道。在一座木桥下面，我们看到三个牲畜的头悬

挂在那里，那是用来抚慰水牛神的，其中一只是山羊头。还看到了许多活羊、活猪和活狗。

我们昨天在巴西见到的巴拉河，流经草地并在九龙峡与白龙江会合，该峡是在高山之间的一个狭长地带。一部分红军是沿着这条江走的，我们又一次弄不清为什么毛泽东选择这么困难的一条路。一般认为这是由于他想尽量摆脱国民党。当时这个地区的大部分由一个姓杨的藏族土司控制，他不但让红军通过，而且将粮食给了红军。听说在这个地区仅仅发生两件事故：一名战士的枪被夺走了；一名狙击兵向红军开了枪。

这个姓杨的家族大约相传有二十代了。明朝年间这个地区的土司去向皇帝磕头进贡，皇帝赐他姓杨，这被看作是一种荣誉。现在这位杨先生的父亲，就是当年让红军通过他的领地的土司，后来被国民党暗杀了。国民党想把他的儿子拉到他们一边，所以在他十七岁时就任命他为将军。可是他投奔了共产党，现在是省人大常委的副主任，住在兰州。

在这些峡谷的四周，有一些从岩石上开凿出来的狭窄小道——几乎走一个人都困难，在某些峡谷上加建了称之为“栈道”的通道。木头桩子被打进悬崖峭壁里，架上几根木料使小道扩宽一些，刚好可以通过一个人和一匹马，再多就不行了。在这种栈道上行走的人都要吹号，如果不吹号，对方过来的人有权将人和马扔到河里去。

在头一个山谷的尽头，我们开始看到真人一般大小（甚至更大些）的用稻草或木头做的凶险塑像，摆在村庄的入口处或大门口。这些塑像佩戴着真刀。以前它们是用来驱鬼降龙的，现在意味着：“如果你有传染病，切勿进村”。

正午以前，我们到了红军和国民党进行过一场激战的腊子口。离山口约四分之一英里的一块平地上，毛泽东在那里设立了总部并指挥攻夺腊子口的战斗，以便红军能继续北上。就在他制订战略的地方，支起了一个大帐篷，里面有花形图案，就象昨天见到的那个一样。我们从公路向腊子口走下去，山口是那么狭窄，差不多一下就可跳过去，两侧悬崖陡峭，无法攀登。当时国民党控制了两边的坡地。开始红军试图从一侧攀登，根本上不去。由一些苗族战士组成的小分队从后路包抄敌人，占领了第一个高地。另一边的国民党士兵看到这种情况，就逃跑了。从那以后，红军主要和自然（以及同他们自己）作斗争，直到他们到达我们今天下午去的那个引人注目的山谷。到了这里，他们可以用汉语同老百姓讲话了，而且找到了充足的食物。正如有一个人说过的，"对红军来说，甘肃省象是个加油站。他们象重新充上了电。"

我们仔细观察了腊子口，心想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真不知道红军是怎么把它攻夺下来的。然后，我们回到帐篷里，吃了些鸡蛋、肉食、奶酪、水果，喝了啤酒和茶。午餐时，一些藏族妇女为我们表演舞蹈——我们过去在锡金看过的那种初级的曳着脚步的舞蹈。她们只是站成一个圆圈，缓慢地向一侧移动，每隔一个短时间，人人向上跳跃，然后又重新曳着脚步向一侧移动。

午饭后我们继续乘车前进，汽车开过的第一个山口海拔为 11,000英尺。很快到了一个同我们去过的地方大不相同的地区——山上干干的，没有树，几乎看不到造林的成果，而山下的峡谷却是草木茂盛。峡谷里的河流由于冲刷着土壤而变得浑浊。

高高地装载着小块木料、树苗和小树的兽力车和人力车拥塞着公路。山是那么光秃秃的，看来从山上再也砍不下什么东西了。可是这里又没有象样的木柴，没有煤，用来作饭和取暖的其他燃料也没有。我不知道小车上的东西是从哪里找到的，它们一定是长在两座大山之间被侵蚀的峡谷里。

有些车子就象是车轮子上摆着一个大草筐，背后是敞开的，有点象带篷的马车，这种车子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多数车子是用毛驴拉着，也有的用牦牛、马或骡子，也有相当一些是人拉的。登上一个地势较高的山口时，见到一个男子睡在路旁的一条毯子上，还有一个人将头靠在膝盖上在路中间呼呼大睡。经常有一些孩子和牲畜站在路中间，我不理解这些人畜怎么没有被车子撞着或轧死，也许是我们没有见到。在山谷里长着一种很好看的树，树上开着羽毛状的红花。

我们注意到，一进入甘肃省之后，虽然在很长一段路程上主要居住着从事农业的藏族人，却几乎见不到做祈祷用的白幡。我们询问是否省里的政策不同，回答是没有不同。我看肯定有所不同。这里的村庄同其他藏族村庄一样，房子、围墙的布置也是相当零乱的，但却未见什么地方飘扬着白幡。这一点反倒是很突出的。

我们在哈达铺这个六千人口的市镇停下来，这六千人一定都出来迎接我们了。每条街上都有人排列成行，前后有十到二十排，有男有女，有儿童有婴孩，门口、台阶上、屋顶上都站着人。当然这是有计划安排的，而且有零零星星的警察在维持秩序，不过同时也有自发的。一张张好奇的面孔，露出高兴的表情。有人对我们说，我们是来哈达铺的第一批外国人。人们一定觉得我们是多么稀奇古怪：三个高个子白人，其中两

人长着蓝眼睛，穿着异样服装和奇形怪状的鞋子(哈里森和杰克的靴子经常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议论)。在众多的黑头发棕眼睛的中国人中间，我感觉自己象一条生长在石头缝里的苍白的虫子——每当我们面色苍白或者生病的时候，这是我的母亲喜欢用来描绘我们的说法之一。她喜欢让人们晒得黝黑的，因此童年时我们每年夏天都要到海边或船上度过一些日子。

夺取腊子口以后，红军经过我们所走的这条道上的大山，在哈达铺停留一个星期。当年这里的人口约有二千人，那时粮食看来很充裕。

我们步行穿过鼓掌欢迎的群众，来到周恩来住过的地方。有一间房子还保持原来的样子，房屋的木料是旧的，但天花板是用长长的幼树杆(象今天上午在兽力车上看到的那种)支撑着干草填料，新漆上了黑颜色。墙上刷的清漆还沾手，床上的罩单都是崭新的。哈里森认为，我们这次访问对保护领导人住过的房屋起了很大的作用。许多房屋进行了整理和粉刷，至少打扫干净了。

我们继续步行到毛泽东曾经住过的一所商人的房屋。这是一所构造坚实的房子，建在后街的一所精心种植的花园里。

我注意到几个小女孩穿了耳朵，戴着金耳环。我原以为人们一般不这样做了。除了在中国西北部的维吾尔族聚居的地区以外，我没有见过妇女或儿童戴手饰的。不过上次我们看到一份《中国日报》，哈里森念了一篇文章给我听，文中讲到，在上海人们把金手饰拿去重新设计花样，另一篇文章提到，这些天来有许多人去教堂作礼拜。他说："在中国我们可以戴上手饰，可以去教堂作礼拜了。"

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缠足的老年妇女。我也见过一个患白化病的中国儿童——一种奇异的景象。她一定是多么不舒服呀！可是有人说有这种毛病的人还为数不少。

在参观哈达铺时，我们听到几声巨响，比飞机超过音速时的声音还响。开始我们以为也许这是向我们致敬，后来知道是向云层发射火箭来驱散冰雹。冰雹是一个严重问题，下起来能毁坏成熟的庄稼。可是当我们离开时，冰雹下得很大，因此火箭并非都起作用。

岷县的宾馆相当郁闷。我们的房间是通向大会议室的，水泥地，角落里摆了一堆煤和劈柴，中间安了个小炉子。我们在一间大房间吃晚饭，同在迭部一样，也是坐在小椅子上和矮桌旁边用餐。我们问到为什么椅子那么小，有人告诉我们说，这是供许多人看电视用的，前面的人坐在小椅子上，后边的人也可看到。

我倒不是想提意见。我知道，为了我们，主人费了许多心思，照顾周到，也尽了很大的努力。前几个星期我们住过的房间，许多是特地为我们这次旅行而将办公室改成客房的。家俱不得不搬进搬出，有时还得购买或定做新的。比如在迭部，杰克和我们房间里的食橱都是新的，橱内角落里还留有刨花。在四川，每张床上的蚊帐都是新的，床沿还挂着绣花的帷布。我们都用上了热水和肥皂，还需要什么更多的东西呢？也可以说，我们还能期望什么更多的东西呢？

6月1日 星期五

定西

今天是全中国儿童的节日，学校停课，儿童穿上他们最好的衣服去参加游行、运动会和舞蹈会。在岷县，女孩子都打扮得很艳丽，头发上打着大蝴蝶结。节日一定也是举行集市的一种理由。我们经过的每个市镇，都挤满了购买和出售货物的人，还有许许多多牲畜和供出售的食品和货物。花生非常多，还有大个头的马铃薯、胡萝卜、白萝卜、洋葱，但青菜不象在其他地方见到的多，也许因为地势太高。还有红辣椒，使哈里森见了流口水的大炸面饼圈，以及十六英寸长的红色和白色棒糖。红色的糖果在北京不能出售，因为红色颜料有害健康。我猜想这里的人不明白这点。

在一个少数民族回民的村庄里，男人戴着白帽子，妇女围着搭到背上的黑色头饰。这里有许多马匹、牛羊。

又有一辆新的吉普车给我们当向导，车上坐着两名穿着非常干净的白上衣的警察。他们没有挥舞旗子，实际上也没有为我们或后面的客车开道。他们倚着车窗，告诉卡车靠边停下来。有时卡车这样做了，有时并不照办。实际上，常常是警察继续往前开车时，其他车辆却挤到了我们车队中间来了。我们的司机好极了，既能干又小心。只有去桐安那个下雨的晚上，一位司机不断猛踩煞车，其他所有的司机一直都开得很好。

我们的客车的一个轮胎漏气需要更换，警察的吉普车在

我们前面停下来，警察下了车就站在那里，根本没有想到走过来帮帮忙。其他司机都热情参加，多数男子也同样来帮忙。换了轮胎之后，还得用手压气筒打气。我问，如果轮胎里气打满了，没有测量计他们怎么会知道？回答是："啊！他们能辨别。"显然，他们是能辨别出来的。

今天大部分时间乘车上下于一些奇特的不毛的大山之间，山上水土流失严重，中国人正在种植树木来覆盖这些荒山。山的高处有一些窑洞，系用作临时蔽身之处或者储藏东西的，不是人的住所。许多山顶上有旧碉堡和城墙。这里过去有匪患时，老百姓尽可能带着东西搬到碉堡里去，以免被盗或被绑架。绑架后索取赎金曾是土匪取得收入的重要方式。

公路迂回曲折，盘旋通过一些大山。不管是石路、沙路、泥路或铺筑过的路，都修得精巧，而且经常有养路工人养护，这些工人一般都是汉人，即使在少数民族地区也如此。

乘车走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看到多少工业发展的迹象，可是到了中午我们见到了一座工厂，但谁也猜不出它是生产什么的。下午还看到有装卸机的粮仓。围墙有石头砌的，也有泥筑的。土壤是属于地质上所称的黄土——细粉末状的土，多少世纪以来从蒙古随风吹过来的沉积物，实际颜色是带点红色或者黄褐色的。最近我们过惯了一段下雨阴冷的天气以后，到了一个炎热干燥的地区，反而使人觉得很新奇。

在陇西吃午饭。这是一个还保留有三国时代的古城墙的小城市。听说香蜜瓜就出产在此地。这个地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六至七世纪，不过中国人在公元前 1760 年就来到了这里。海拔高度近8000英尺。甘肃省面积约 20 万平方英里，人口 2200 万，被认为是最穷最落后的省份之一。

亚麻已经收割，铺在路上让吉普车和卡车在上面压过去，以此法来脱粒。亚麻子是亚麻油的宝贵原料，可用于油漆。亚麻纤维可用以织布。

午饭后我们进入了另一个县，坐在吉普车里不起任何作用的警察也走了。现在我们跟在一辆挂着窗帘的浅蓝色“高级轿车”走，车内坐着这个县的县长。这里的造林看来搞得更成功些，树木真正开始发挥作用了。到处都种有速生的杨树，可是我不知道水从哪里来，目前河流完全干涸了。夏季可望下些雨，但也不会很多。我们注意到，无论大山小山，都从上到下种上了树。这有助于控制水土流失。

房屋是土坯盖的，除了鲜绿色的梯田和挣扎着活下来的树木以外，大部分景色和房子都是同样的颜色。院子里种了紫色的蝴蝶花。

今天下午我们第一次见到一头骆驼(整个旅行中也仅此一头)。有人牵着它在街上走，骆驼的头可以够着树，吃些枝叶。我一直在纳闷，为什么以前我们没有见过骆驼，在我看来，我们是进入了骆驼之乡。

在定西我们住在一家饭店里，其豪华程度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们有一张很舒适的床铺，盥洗室就在近处，在那四四方方的大房间里，每边有6个水槽，热水是用壶打来的。厕所在大厅下面，女厕所是中国式的，不但干净，而且是单间的。开了一辆蓝色轿车把我们送到一个浴室去洗澡，其实我们很容易就步行去了。在那里，哈里森和杰克洗了淋浴，我则在一个大浴盆里洗了一个痛快的热水澡。在同一座建筑物里有一个理发美容店，在我们去过的几处地方也都有专门的浴室，不过象这里的浴室一样，都是设在另一幢房子里，而且不是经常开

门。

6月2日　星期六
定西

今天我们乘车到达会宁。1936年四方面军去陕西同毛泽东会合时，途中曾在此地与一方面军的一部分会师。一方面军派了一支相当大的部队陪同四方面军去陕西，因为当时这里还是敌占区。

去会宁的途中，山上的造林搞得很引人注目。我可以预言，在一百年之内，或者更短些时间，将会有四季常青的森林，不再是沙漠里有一点儿杨树，而是真正的林木覆盖地面。树木也比昨天见到的长得更茁壮，可能因为这里水多一些。“也许有地下水”这是我经常得到的答复。

我们经过一个小镇，那里每隔三、五步路就能见到一头驴，公路上也不少。那天并不是赶集的日子，可是街道两旁都有个体商贩出售蔬菜、鸡蛋、动物皮革；出售短上衣、裤子、衬衫、夹克衫以及许多儿童服装。姑娘们都穿着色彩鲜艳的夹克衫。

乘车到会宁仅仅需要两个小时——我们10点30分就到了宾馆。宾馆由几幢平房组成，每幢有五、六间房，象兵营一样，但都有种上树木花草的花园。有人领着我们到一间房间，里面摆着床铺、沙发、两把大椅子和一张大写字台。写字台的一边有几个抽屉，下面有一个五英寸高的平台，使你的双脚不用踏在冰凉的砖地上。我想象不到此时这里天气会冷。甚至

夏天晚上都很凉爽，人们说冬天很冷。地面打扫得干干净净，家俱擦拭得一尘不染。写字台是刚刚油漆过的。

照常休息了一会和喝完茶之后，我们参观了古城的西门。人们告诉我们，城门是明代建造的，认真地进行了修复。不过现在城门上有了窗户，用作防御的城门通常是不开窗户的。我们见到了一张 1935 年末拍摄的城墙和城门的照片，画面上有一条很大的裂缝，砖头和墙泥正在脱落。作为长征的纪念物，把城门修复成当时的样子，而不是精心油漆和装饰成十四、五世纪的城门，似乎更合适些。不过，由于有了窗户，使光线能照进来，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红军留下的纪念品——一些碗、一把水壶、一盏提灯等等。那盏提灯是一位战士送给一个农民的，当时农民给他吃了一顿饭。一、四两个方面军实际上是在北门会师的，不过那座城门早已被毁了。

午餐后我们休息了较长的时间。醒来时，我给哈里森讲述了第二次大战期间我同三个儿童、两只狗在美国的全部行程——从康涅狄格到北卡罗利纳，到纽约市，到科罗拉多，到俄克拉何马，又回到科罗拉多，最后到达加利福尼亚。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的确如此——四十年了。

下午，我们采访了几位当地的历史学家、一位县长、六位长征老战士。哈里森查明，1936 年九、十月间两个方面军会师的那天早晨是下着霜的。当时成堆的小米正等待脱粒，玉米、马铃薯、荞麦、南瓜已经收割了，农民在地里耕地、撒肥、准备过冬了。

当时居民只有大约 2,000 人，一方面军的部队 1,000 人，四方面军 40,000 人。他们怎么能找到足够的食物呢？答复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他们没收地主劣绅的财物，向农民购

买食物。当时的价格是：5 元钱可以买一头一百磅重的猪，2 元钱买一只肥羊，1 元钱买五只鸡，5 角钱买一百磅蔬菜，1 角钱买十多个鸡蛋。两支部队全都会合时，举行了庆祝宴会——有鸡、羊肉、猪肉以及家庭酿制的烈性白酒。

采访的头一位老战士是杨先生，现年七十岁。他能用清晰的语言表达，记忆力很好，是一位很有意思的人。他出生于江西省万载县，1929 年他所在的县城解放时，他的父母已经去世，两个哥哥积极从事地下活动。虽然他当时年仅十四岁，却作为一名正式的战士参加了红军，由于当时没有其他武器了，就给他发了一把长矛。后来他被调到电话通讯部门，但也参加过战斗。1931 年时，他在红四军工作。1933 年调他去学习通讯，回到江西时，他担任技术员、修理工以及电话话务队队长。

仅仅在过草地时他才感到害怕，因为与少数民族语言不通，又没有多少吃的。他说，“那真是困境。”从江西出发的 150 名话务员，有 110 人过了草地。其他人在过雪山时呼吸遭到了很大困难。

当红军兵分两路前进时，他和 40 名话务员跟随朱德一道走。1936 年他们两次过草地，只有 8 人活下来。这 8 人中，7 人随一方面军继续前进，他本人则留在会宁。

他见过许多伟大的领导人。认为毛泽东是一位好领袖，经常关怀战士。朱德身体健壮，说话时“眼睛睁得很大。”他经常见到朱德的妻子康克清。她有一匹马和一头骡子，挎着两支手枪。她对战士和电话员很好，向他们讲述他们工作的重要性。她有自己的住处和职务，一般她和朱德分开住。使我奇怪的是，在中国有许多家庭，他们全家人通常都睡在一起。

周恩来有时也在那里，有时不在。杨先生认为，他是外出执行重要任务去了。

另一位老战士本人说是六十三岁，但看起来比其他几位都老。他于1933年7月因受“保卫家乡——北上抗日”宣传的影响而参加红军，那时他还是个小孩。他在师部工作，跑腿，打水。他参加过多次战斗，曾被敌机炸伤住院。后来他由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指挥员。他也谈到在少数民族地区时的困难情况，语言不通，天气很冷，下着大雪。他记得在一次战斗中，张国焘控制不住自己，惊慌失措，把草鞋也丢了。

另一位是陈女士，四川人。除杨先生外，其他几位也都是四川人。她现年六十八岁。当时她在红军一个医疗单位的妇女队工作，她们先在王坪工作一年，另一年在芦山县，然后参加长征。

她记得当时除了草根、野麦和野果以外，其他什么吃的也没有。到达会宁时，她成了一名掉队者——她解释说，并不是当了逃兵，而是因为生活太艰苦，无依无靠而离开了部队。一位在山上捡柴的老年妇女发现并收容了她。后来她结了婚，有儿女各二人。

她当年一定是一位大美人，因为现在尽管脸上已有许多皱纹，还长得十分秀丽。

另一位傅菊玉先生，七十三岁，象胡志明那样留着一束小胡子。1924年他参加农民暴动失败了。所有这几位老战士，除杨先生是电话员外，都曾和张国焘在一起，属于四方面军。

另一位老战士八岁时就参加革命。就是说，他们全家十一口，同许多老百姓一样，都跟着红军后面走。如果国民党知道或者怀疑一个家庭中有人做地下工作或参加红军，就进行

猖狂报复。他们被国民党吓怕了。这些跟随红军走的人都需要自带粮食。

开始时，他的父亲和姐姐就走散了，从此再也没有同家里的人见过面。一位叔父被藏族人杀了。弟弟病死——当时没有药品，也得不到护理。最后只剩下了他的哥哥、婶婶和他本人。他作为养子由另一个家庭抚养成人。

这些都是由出身最下层的一些人讲述的故事。我多么希望宋庆龄女士还活着。我希望同一位出身于富有家庭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交谈。这种人很多，可是我们似乎只同那些强调他们是农民出身的人交谈过。不是说这有什么不对——我只是希望能同某一位出身不同的人谈谈。

我们同县长一道参加愉快的晚宴之后，又回到这家舒适的饭店。

6月3日　星期日
兰州

早饭后离开定西。在这个北方地区，早餐吃的不一样。没有我们习惯吃的大米稀饭，而是一种用麦粒和象小扁豆那样的豆子煮的绿豆粥。哈里森和我都不喜欢那种味道。昨天早晨我们喝了豆浆，味道很好，今早喝的是牛奶，都是煮热后盛在碗里喝。中国人特别喜欢吃油条，把它泡在豆浆里吃。经常有两、三种泡菜。这里还有花生，哈里森很爱吃。

整天我们乘车经过更多的大山和干燥的沙漠地区，这些地方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造林绿化。林业、作物以及其他企

业都实行了责任制。一家可以承包八英亩山林。国家提供树苗，家庭负责种植。只要信守合同的规定，管好树木，他们可以利用这块土地而且可以继承。每一项工作都是手工操作——挖梯田、把树拖上山和栽种。树木株距为三英尺。

有人认为，这些山过去一度是森林，有些人认为不是。我相信，除了象戈壁那种真正的沙漠外，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以前都是有树木覆盖的。由于人口日益增加，需要盖房用的木料、燃料和饲料，又不知道重新造林和增加植被，所以简直把这个国家弄得光秃秃的。战争中，特别是在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内战中，地面上的东西被大量烧光。当人们想到中国人多少世纪来是如何精心地管好他们的耕地，在同一块土地上生产过多少粮食，现在还在生产许多粮食，就会对他们这么严重地破坏森林感到震惊。

油菜正在开花。我们经过许多块漂亮的鲜黄色田地。养蜂的家庭带着蜂箱在路边支着帐篷住宿。我们过去不知道中国人吃蜂蜜，可是在这次旅行中，见到装满蜂箱的卡车在公路上行驶，或者停在鲜花盛开的田边。蜂蜜用来增加八宝饭的香味，也给儿童吃，还大量地向波兰出口。

玉米已长到六英寸高了，我们还见到种植的菜花，路边上也堆放着一些菜花。

离兰州还有一小时左右的路程，就可以看到前面迷漫的烟雾。这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城市，是解放后从隋朝就建立起来的旧城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批的人是从沿海城市，特别是上海，派来这里工作的。当时，中国人希望把核工厂和工业尽可能建得离美国远一些。现在我们友好起来，而与俄国人关系不好。而所有建在此地的这些设施，都是在俄

国火箭的有效射程之内！我们都是多么神经错乱啊——拼命制造那些根本不能使用、要使用就得毁灭世界的武器；而且经常反复从这边转向另一边。

虽然有烟雾，这个河谷地带却土地肥沃，蔬菜长得茂密。黄河流经兰州的北面；来兰州的途中见到的旺河，离市区只约一小时路程。我们见到了一个很大的扬水站和一些灌溉管道。

在市区有些姑娘穿着套服或者上衣加裙子，鞋是高跟的，这种打扮改变了中国人美丽自然的风度和走路的姿势。我见到一位推着自行车的姑娘，脖子上戴着几条银项链，就象在纽约的姑娘一样。

我们住在很吸引人的宁卧庄宾馆。这里为我们提供真正的床单和热水。去下一站西安的火车，除了明天晚上外，近几天的票都卖完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只住一个晚上和一个白天。杰克在这里要住到5日或6日，然后按照他的要求，乘两天火车去北京。卡罗琳将在我们旅行结束之前到达。我想我们将会在12日回北京。

没有杰克在，那是多么不可思议呀！他总是固定坐在小客车的前排，身边放着全套摄影设备，一会儿跳下车来拍照，往深沟峡谷下爬，往陡峭的山峦上攀登，使得每个人都神经紧张。他对这个国家的了解是无法估价的。

6月4日　星期一
兰州

上午我们会见了三位长征老战士。开始见的两位是吴胜

先生和张仁世先生，他们原是属于二方面军的，贺龙是他们的司令。他们一定经常见面忆旧，因为他们记得的那些情况都是相同的。吴先生表情严肃，戴着一副镜框宽重的眼镜，不过有时也很风趣。他现年七十三岁，出生于湖北省一个贫农家庭。他和他的父亲都当过长工，这意味着他们要永久为一个地主工作。为了解放自己，他1931年参加红军。其他人也是象他一样来参军的。他说，当时许多年青人都参加了。他记得每天要打五、六次仗。1932年在第三次围剿中，他们被国民党紧紧围住，因此他们突围出来，在湘鄂川边区建立新的苏区。他记得，渡过金沙江（我们在大理附近见到这条江）是最危急的时刻。水流湍急，仅仅有一条象样的船，只好让妇女和驮着银元的牲口上船。他说，他们还有些木排和用动物皮做的船（哈里森对此表示怀疑）。

吴先生曾五次受伤，幸运的是他的伤口很快愈合，没有感染。第一次受伤后，曾坐过几天担架。另一次一颗子弹穿过他的肺部，从胃部出来。他被送到农民家里，用一条很长的绷带从伤口拉来拉去进行清洗。那疼痛实在难以忍受，不过三天之后他又能骑上马，带着他的装备前进了。这种处治使我想起了我在1938年作的那次急性耳后乳窦炎手术。那绷带有三英尺长，必须从我的耳朵里抽出来，然后再塞进去一块干净的。每天这样做，持续一个星期还多。头一次还上了正规的麻醉剂，后来就没上了。

吴先生在解放战争中还失去一个手指。

在草地里，他们煮野菜吃。他当时看过一本小册子，讲了什么野菜可以安全地吃，可是许多战士分不清，吃了毒草而死去了。他们还把牦牛皮做的帽子以及其他皮革煮来吃。如果

能找到一头牦牛，他们就宰杀，全部吃掉，甚至肠子、骨头也吃（一位英国朋友告诉过我，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英国，她家里能找到一只鸡时，总是连骨头也啃）。

他当年见过喇嘛寺，但红军不许进入。草地是一块很大的空旷地区——没有牲畜、没有鸟类也没有老百姓。土地象橡胶似的。他们能抓鱼，但他没有说抓到了什么鱼。在看过红军通过的草地的许多地段后，我猜想，那里会有些小鱼。对他所讲的连鸟都没有倒使我感到惊奇。根据其他报导，那里曾经有大群的鸟。

吴先生后来到了延安，在军队工作到1952年，而后他担任西北建筑工程局副局长，在西安住了十年。该局移到兰州以后，他任局长兼政委。“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有四年“处境困难”，在监狱呆了一年（“处境困难”一般意味着软禁；“挨斗”意味着受到折磨、在群众面前受批判、挨打——以及红卫兵想要采用的其他办法）。经过这段困境之后，1970年他重新被任命为甘肃省物资局局长。他有六个儿女，孙辈也是六个。

张仁世先生是一个农民家庭的独生子，四岁丧母，同父亲和叔父一起生活，他们都是当长工的。他十五岁时两位父辈都参加了红军。他现年六十七岁，长征时只有 132 磅，现在身材胖大——体重超过 200 磅，现在住院医治糖尿病。

他告诉我们，他所在的部队到达草地以前，由于疾病、寒冷、缺氧、饥饿，已减员 80%。他说，就象一把筛子，少数人幸存下来，其余的都被筛下去了。他当时存有一点原先谁也不要的炒豆面，在草地里没有其他吃的，就吃它。在村庄附近的打谷场上，战士找寻前一季留下的陈麦粒作食物。

张先生也曾五次负伤：两次是发生在与国民党作战中，两

次是打日本鬼子时，还有一次是在解放战争中。

他和吴先生谈到了贺龙和肖克。这两位将军将部队会合在一起组成二方面军，但还是各自指挥自己的部队。肖克当时三十一岁，部队里多数人都是十多岁。两位将军是好朋友，战士对此感到很高兴。贺龙当初还在国民党那边工作时就结了婚。不过，南昌起义之后，他加入了共产党，他的那位妻子没有跟他走。后来他与蹇先任结婚，她是肖克的妻子蹇先佛的姐姐。我们说，听说她们两人都很漂亮，可是吴先生和张先生都说她们“长得只是一般”。

他们还告诉我们，贺龙经常同政委关向应玩跳棋，赌注就是他们的胡子。贺龙的胡子特别多。有时他输了，战士就会问：“你的胡子哪里去了？”不过胡子长得很快。

我们问，贺龙是否亲临战场，他们说，他经常在前线出现，只是没有受伤。不过在抗日战争中，他中过毒气。

贺龙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思想是忠实的，甚至在三年中没有无线电联络的那段时间里，他仍能尽力很好地执行毛泽东的路线。他的部队在敌机不能起飞的雨天，特别能战斗。

由于生病，肖克既消瘦又秃了头。战士一见他那光秃秃的头，就觉得好笑。开始他对别人笑他并不在乎，可是过了一阵他却介意起来了。他的部队以打硬仗而著称。国民党了解这一点，告诉他们的士兵：“任何时候你们听说肖克来了，你们跑掉为好。”

第三位老战士是六十八岁的张盛基，江西人。他父亲是一名红军警卫队队员，在一次夺取地主村庄时牺牲。张先生于 1931 年参加共产党。在一方面军的后卫队，他不了解当时发生的情况，只不过跟着战士们走。1934 年 9 月一方面军开

始转移，他不知道什么围剿，只听说他们要去湖南创建新的苏区。部队士气很高，他们夜里行军，白天隐蔽。他记得，当时江西天气还很热，并回忆到将重型装备丢弃到江里的情景。过雪山时，他在一方面军的最后一支部队。有人叫他们轻轻地传话，因为地势太高，还是尽量不要说话为好。他们也是最后一批过草地的。

下午我们乘车游览市容，到了城北边界的黄河。那座漂亮的铁桥是 1907 年修建的，桥由一系列的钢铁拱门组成。钢材可能来自武汉，当时武汉还生产钢铁。不过五十年代以前，这里没有铁路。全部钢材都是兽力车拖来的。把那些部件运到这里再组装起来，一定是很浩大、很困难的工作。

我们参观了一所别致的有庭院的旧房子，八路军联络处曾经设在这里。该处始建于1937年，大约持续到 1943 年。那是一处公认的与苏联的联络点，也是地下活动的基地。

我们买了航空标签和邮票以便发出写好的 44 张明信片。然后同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共进晚餐。省长原来准备宴请我们，但他在成都开会还没有回来。

这位外办副主任是位有趣的人物。我们还举行了另一次告别宴会——这次是向杰克告别，虽然我们一星期左右还会见到他。我们相互祝酒，相当动感情。秦将军向我祝酒，说我使得每个人都高兴。我不相信哈里森也这样认为。我从来不善于使他情绪兴奋，或者使他消除怨气。哈里森向杰克祝酒，杰克也回敬他。我向每个人都祝了酒。特别向周小姐祝酒，她对我们帮助太大了，为我们做了那么多工作。

我们都准备好在 11 点钟上火车。杰克坚持要来挥手告别，在省内陪同我们的每一位也要这样做——医生、周小姐、

党史学家，还有一位教授。几分钟之内，我们就要结束这次漫长、劳累、饶有兴趣、独一无二的旅行的最后阶段。

6月5日 星期二
西安人民大厦

我们于下午较晚的时间到达，分乘两辆汽车，迎接我们的有三个人——一位女医生、一位干事和当地一名翻译，都姓王。在火车上就听说，昨天这里气温是摄氏 38 度。但是感谢上帝，下了一场雨，气温凉下来了。我们还是住在以前两次住过的饭店，不过这次住的那一部分是重新装修过的。象其他任何地方的饭店一样，有一点中国风味。我们的房间里有两张舒适的单人床，再一次铺着真正象样的罩单。还有一张写字台、两把扶手椅、一张桌子和一间很大的盥洗室。床头上有供看书用的灯，写字台上也有灯。在别的地方，哈里森总得去临时要一盏灯。我们住过的那些宾馆的管理人员，从来没听说过有那么一种怪诞行为——一位特殊的外国人，深更半夜还在打字。

盥洗室不只是勉强可用，而是很够水平，甚至连脚盆也有。地面是精致的瓷砖铺的，铺设的工艺也很好。抽水马桶很好用，不漏水。

看起来似乎陕西省的人不知道我们此行的旨趣何在。没有为哈里森作任何安排。他们不断建议一些文娱节目和观光，这些当然很好，但不是我们此次来中国的目的。

6月6日　星期三
西安

由于没有事先为我们作计划安排，今天上午我们都用来看书和写东西。我开始从头看我的日记，看看读起来怎么样。关于所有我们的旅行，我只是准备为一家杂志写点东西，从未想到把我写的东西拿来出书。然而我出书了——出了六次。也许我这次又能出一本书。不过我写得太多了——已经是六个大笔记本。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编好这本书。

我们步行到那座大楼吃饭，能自己点菜吃真是太好了。昨天晚上我们就要了两个菜和米饭；今天早餐吃了水果、烤面包、果酱以及咖啡加热奶。

这里游客多得很，我们为那些美国人感到非常尴尬。他们那么肥胖，那么邋遢。男人看上去比女人更糟，穿着运动衫，一半塞在裤子里，下身穿着短裤，露出毛茸茸的大腿，许多人还留着蓬松的胡须。在家时，我不大注意他们，可是在这个男人胡须刮得干干净净的国度里，这些美国人难看极了。旅行时要保持整洁是困难的——谁也不会比我对此更有体会。不过穿上朴素的服装，不要引起人们侧目而视，还是可能的。

下午我们乘车去参观1974年发现的那些著名的陶俑。秦将军和女医生乘一辆车，哈里森和我与一位新来的年青人乘另一辆车。我们经过那条熟悉的道路，不过自从我们上次到此处访问以来，已经有了很多变化。绿化搞得更好了，四年来树长高了，周围的山上因为种树种草而显得更漂亮了。新

建的楼房多得很，特别是公寓房。我听中国人说，如果出生率还在增长，到了2000年他们就无法养活全国人民。既然如此，我对占用农田盖房更感到疑惑不解。除了看到这些房屋之外，我们还经过几家水泥厂。即使盖了这么些楼房，还是有许多石榴果园，枝头开满红色的花朵，鲜艳夺目。我们以前曾见过零零落落的少数树木，但不象现在这样多。这里的河名叫白河，流入渭河，渭河又流入黄河。

这是一片肥沃的平原。有了灌溉，就能生产充足的农产品。我们了解到，这里实行了责任制，给精力旺盛的农民带来了好处，他们现在可以使用土地并传给孩子们。如果农民勤奋耕作，管好土地，产量就会很高，他将深受其益。实行责任制，使生产的质量比以前好了许多。一个农民一个月可赚200元，他能买拖拉机、摩托车、甚至汽车。一个大学毕业生到政府工作，一个月才收入48元，每隔几年可以增加5元，所以一名政府工作人员到60岁时，每月可以收入150元左右。我们的一位陪同谈到他的一位在政府工作的朋友，月薪48元，已经有了对象，还没有结婚。他的爱人是一位教师，薪金和他一样，他们结婚以后，将住在男方父母公寓的一间房子里——大约有十平方米。父母将为他们购置家俱。这位陪同认为这不是一种好的方式，我也有同感。

当然，在美国蓝领工人一般比教员赚钱多，政治家则老是抱怨钱不够，说只有到政府工作才能富一些。

这位年青人在4月间见过来西安参观陶俑的里根总统。他对里根“可爱的牛仔式的微笑”和他那同一般人那样的随和的性格，留下了印象，说里根对谁都有说有笑，甚至对记者也如此。

我们谈了一点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他那时很年轻，他的父母怕他同红卫兵混在一起或者参加红卫兵，所以把他送到祖母那里去住。他的父母都是工程师，派他们到哪里去工作都得去。当时西安街头的武斗太可怕了。

这座博物馆还是四年前那个样子，不过在圆顶覆盖的大坑里有更多的兵俑，又进行了新的发掘。在公元前 221 年，新兴的地主阶级的政治家秦始皇，结束了战国时期的争夺，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多民族的封建国家。他统一了地方行政机构，把地主和农民的私有制合法化，制定了标准的法律。皇帝或者君王死了，习惯于把他们在阴间需要的东西，从食品到炊具、衣服、珠宝甚至兵马都要安放在坟墓里，兵马则用活埋的方式。作为开明的统治者，秦始皇则采用了和真人真马一样大的陶制兵马俑，估计共埋葬有六千个兵马俑，列成队形，守卫他的坟墓。原来的兵马俑上了釉，佩戴着真正的武器。故事还说：一位造秦始皇反的国王，在秦始皇死后，打开这个墓地，把全部武器都偷走了，打碎了许多兵马俑，而且放了一把火。人们以此来解释为什么有些展出的兵马俑是黑色的。

这一惊人的发现是在 1974年工人为一项水利工程挖沟时“偶然碰到的”。

发掘工作整年都在进行，不过在旅游季节里，那些最近刚发掘出来的陶俑碎片，搬到邻近一幢房子里去粘合；那些还没有完全发掘出来的陶俑在土里零散地放着——这里一个头，那里几只手，断头缺臂的躯干竖立在那里。

1980 年 12 月，在离兵马俑坑有一段距离的真正的陵墓附近，发现了两辆铜制马车，各有一名驭手和四匹马。陵墓是

一个小山丘，上面长着草木，还没有发掘。有文献描绘内部的情况是：里面宫殿的天花板上，有珍珠制作的星星，地面上是一幅中国实体地图，河里流着的是水银。我看经过多少年的掠夺，这些可能都不存在了。〔1985年中国人宣布，有理由相信该墓仍然完整无损，没有被偷盗过，条件成熟时，将进行发掘。〕

有一辆马车，包括马匹和一名坐着的驭手，已经修复，放在一个玻璃罩子里面。它比真车真马的尺寸要小一些，是按照原来的工艺进行的精美的复原，极其美观可爱。靠近实物来进行观赏真是一种乐趣，我都不愿意离开那里。另一辆马车正在工作室里安装。

我们和一位省里的官员共进晚餐。我不喜欢此人。我很少对别人有这样的反应，可是这个人以自我为中心，傲慢而粗鲁。我坐在他旁边，他转过身去同哈里森谈话，对我连一句话也不说。他好象对我们进行长征感到不高兴，暗示出这样的意思：外国人不能写关于长征的书，如果这位外国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能写。

6月7日　星期四

延安

我们长途乘车行进 370 公里，全都累了。我总觉得坐汽车是使人疲倦的，虽然我们运气不错碰上了好天气，但有些路段正在翻修，非常颠簸。我们这次坐的小型客车是至今乘坐过的最大、最宽敞、装璜最好的一辆，而且大家坐在一起，气氛

当然不一样。这次我们的四位陪同都姓王——医生、干事、年青的翻译和司机。现在我们一行由四位姓王的、秦将军、张先生和索尔兹伯里夫妇组成。我想念杰克。他对中国的了解，懂中国语言，以及他特有的幽默，都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在西安的主要街道上，大盆的玫瑰花摆在马路中间作为车道的分隔线。这些花很逗人喜爱，好象谁也没有碰撞它们。

昨天下雨，打掉了许多麦粒。今天麦子正在收割，收割工具是一种切割用的捞网，象镰刀的一端加了一个网状的东西。看起来比用一般的镰刀割麦更实用。这样一把把割下来的麦子，掉入网兜里，容易翻倒出来摆成一行一行。我见到几个妇女在割倒的一行行麦子中间和沿着地边行走，拾起少数未归堆的麦秆。

我见到村里出售编成长辫的大蒜。公共汽车停在河床上进行洗刷。砖房和围墙刷得鲜红的。同甘肃一样，山上有些碉堡和少数烽火台。过去这里土匪很多——山谷狭窄，公路上边就是悬崖峭壁，很适合土匪攻击和逃跑。

从水泥厂散发出的烟雾真是惊人，尤其是在耀县和铜川市。烟囱冒出浓浓的黄烟，气味令人厌恶。他们生产的水泥一定足以供应全世界。我们碰到许多装煤的卡车，有些带着拖斗车，也是装得满满的。不过我们没有见到一个煤矿，也看不到在何处可能有煤矿。这里曾开始兴建过铁路，但施工已经推迟，或者可能取消了。

我们在黄陵停下来吃午饭——黄陵是因黄帝而命名的，黄帝是象亚瑟王① 那样一位神话式的人物，传说他生长在5,000多年以前，是所有中国人的祖先。他是位善良的人，老

① 传说中的六世纪前后英国国王。——译者注

百姓都爱戴他。他快死的时候，有一条龙要把他带到天堂去，老百姓力图不让带走，拼命把他拉住。据说，老百姓手中留有几块从他的衣服上扯下的碎布，埋葬在位于黄陵的大墓中。

我们在传说由黄帝种植的雪松附近野餐。我们还在一座寺庙前停下来，那里树木茂密，牡丹和玫瑰花正在怒放。我一直在想着我们家里养的那些花——它们也许正含苞待放，也许已经盛开了，就看天气如何。

我多次听过布谷鸟的叫声，今天总算看到了一只。在美国，布谷鸟有两、三种，但我不曾见过，只是在意大利听过它们的鸣声。

每年有一个特定的日子，中国人要到庙堂里去向祖先致敬并献花圈。

我们不能避而不谈延安发生的变化。十二年前延安还是一个差不多完全奉献于毛泽东和红军历史的小城市，今天成了有十万人口的一个熙熙攘攘、凌乱、不吸引人的工业城市。这样太不好了。我倒认为，他们可以把所有这些工业迁到别处，使延安成为一个真正的红军博物馆城。我们已经找不到我们1972年住过的那家又热又脏的砖砌的旅馆——谁也不知道是推倒重盖了还是彻底装修了。省里派来的陪同对于一、两年以前的事情似乎都不知道。

6月8日 星期五
吴起镇

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到达这里时，长征就算结束了。

毛泽东最终到达陕北，完全是出于偶然。和张国焘分手后，他往北走。在哈达铺，他从报纸上看到，一支由刘志丹领导的共产党部队，仍在陕北的一个苏区活动。所以毛泽东决定去到那里，以保安作为根据地。此地地处边陲，相对说来享有较多的自由。

1936年蒋介石被少帅（张学良）扣压，这场危机导致了一场国际上的喧嚷，导致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在日本侵略威胁面前，国共之间就没有再打仗了。

不久毛泽东将根据地迁到延安，从此就没有离开。部队派到了东部地区和日本人作战。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失败，内战又重新爆发，这是后来的历史。

我们沿着长征的路线走过来了，但是要完成我们的长征，还有许多路程。我们希望在北京进行更多的采访，然后还有遥远的归程。我们两人都要利用一年中较好的季节来写我们的书。

我们于8点左右乘车离开延安，首先去保安。保安现在叫志丹，是纪念在东征中牺牲的一位将领刘志丹而命名的。行程约两小时多一点，每前进一步，沿途经过的高山峡谷就变得更棕黄，更加干燥。这里进行了一些造林活动，事实上有些大山和丘陵上种植的树木已有十二年左右了。那些没有植树的地方，即使是在大山顶上，也种上了小麦，麦子长得稀稀拉拉，看到人们这样辛勤劳动，而成果却如此微薄，真是悲惨。地势太高无法进行灌溉。一位中国人说，“他们只能靠天老爷下雨”。（与1972年比确实有了变化，那时我们一提到上帝、宗教、或者神话，就会得到回答：“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不讲这些迷信。”）也许这些大山终究有一天会用飞机送水来浇灌。

看着小山上贫瘠的小地块，省里来的一位陪同说，你可以看到，人们多么渴望有更多的土地。中央政府要求把所有这些丘陵都进行造林，并且告诉老百姓，如果他们改变原来的老办法，政府将给他们提供粮食。也许政府能说服他们，也许这种变革必须强制执行。

在很高的地方也种上了谷子、荞麦和某些薯类。我见到一位男子坐在他的菜地里抽着长长的中国旱烟斗。这种烟斗一路上我见过几次，大约有十八英寸长，烟锅很小。许多省都种植烟叶，中国人过去抽烟很厉害。在我们一行中，只有秦将军抽烟，有些半路上参加我们旅行的省里和地方上来的人也抽，不过看起来不象以前那么普遍了。在公路上劳动的年轻男子嘴上经常叼着一支香烟，象是成了固定的习惯，人们坐在路旁的树下休息或者下棋玩牌时，也喜欢抽烟。我只见过一个年龄较大的乡村妇女吸烟。有人对我说，对妇女吸烟，人们还是皱眉头的。

在志丹我们又采访了两位老战士。头一位是江西人，1930年参加红军。他说，他参加了所有五次围剿战役。哈里森问他，是否有一段同彝族打交道的经历。他说，有一群彝族人大喊大叫，向他和五名左右的其他战士突然袭击，夺走他们的武器，剥下他们的衣服。他当时是机枪手，彝族人没有能够夺走他的枪，因为太重了。他说，彝族人穿的是长袍。另外有些人告诉我们说，彝人是光着身子的，似乎已证明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在过草地时，有八天时间，除了他们自己以外，连一个人影也没有见到。他说，到了马尔康之后，他们宰杀了上千头牦牛。

他在长征中没受过伤，可是在抗日战争中失去一只眼睛。1941年从部队退役，结婚后就在这里定居。我问他是否怀念江西，江西同这里区别太大了。他说："是的，那里多美啊！"在1941年，战士除了有特别任务要迁移到别处外，当时的条件是无法迁移的，所以他就定居下来了。

第二位老战士现年六十五岁，秃发，门牙也没有了。他十五岁参加红军，不久当了传令兵，后来任通信员，最后担任一位师长的警卫员。听说红军中人人平等，战士和将军吃同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他受这些关于红军的传说影响很大。他参军那天，有三十多人入伍。他当时属于四方面军，曾三次过草地，这是因为张国焘想往南走到成都去，以为攻下成都可以获得充足的粮饷。正如我们所了解的，这一想法被证明是灾难性的。哈里森问他，战士们对张国焘怎么看法。他说，张表面上对士兵很好，但大家都知道，他脾气很怪，经常杀人。他说，朱德有一次处境困难，曾受到屈辱，让他给部队挑了三天水（我们听说此话不确，朱德只是被剥夺了权力）。他参加了当年一、四方面军的会师，见到张国焘和另一位听说姓毛的人。他见到他们时，两人正牵着马步行。

为我们两人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午餐——14个菜，汤、米饭、馒头还不计算在内。吃完饭又休息十分钟后，我们去参观刘志丹墓。

在一条陡峭的小道的尽头，中间耸立着一座塔，两侧还各有两个小塔。几个人正在将大块的石头凿成台阶，看来要几个月才能完成，修好后将便于行走。

在中央的那座塔上，有几块碑上刻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以及其他许多将领题写的赞扬刘志丹功绩的碑文，围墙上

还有更多的碑文。上了一段楼梯，进入一个房间，上面覆盖一面红旗的刘的棺材就安放在这里。房内别无其他陈设。祭祀的地方设在简朴的花园里，走道两旁种着玫瑰和牡丹。

这座墓地建于1942年，曾遭到国民党破坏，后来进行了修复。“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又来破坏，把许多碑刻都砸了。不过在这次亵渎之后，又重新修复了碑刻。

刘志丹出身于地主家庭，但从小就是一位革命者。1925年参加共产党，同年进入黄埔军校。他公开不同意家庭的作法，而站在农民一边。他在这个地区组织起义并建立了苏区，是一位孚众望的英雄，受到战士的爱戴。他曾任红二十六军军长，但在1932年受到杜衡（王明和莫斯科的追随者）的诬陷，如人们所说的暂时被“靠边站。”

从刘志丹墓的祭坛乘车来到吴起，沿途经过许多杨树苗圃。有一处地方，沿河修建的高出地面6英尺的公路被水冲坏了，因此我们的汽车在河床里开了差不多一英里。河床一般都比较宽，两边都是沙子、泥土或石头，中间仅仅是一条又小又浅的溪流。在山的一侧，修路工人正在峭壁上凿石块，石块被抬到另一人的背上，后者象背小孩那样，抓住石块的底部，身体躬屈到差不多接近地面，把石块背过公路，再由另一人帮他将石块装在卡车的拖斗上。

在一个小镇里，正举行牲畜交易会，马、骡、牛、绵羊、山羊拴在河床里。人们从四面八方走来，一个巡回剧团在临时搭的台上表演京剧。我们没有停车，因为那会打断演出。

在长征结束后毛泽东住过的一所房子跟前，我们停了一会儿。这所房子建在一座小山上，保存完好。在院子里，我拍了一张哈里森同秦将军斗剑的照片来纪念长征的结束（这张

照片拍得很好，刊印在他写的那本书的包封上)。接着我们乘车西行，用望远镜观看山顶的一块平地，在长征结束后的次日，毛泽东在那里指挥了当时同国民党进行的最后一场战斗。那里长了一颗树——代替原来的树。

然后我们乘车去宾馆。一位个性强的妇女照管我们，她不断地走进我们的房间里来，还指着牙刷牙膏要我们刷牙。我有一种感觉，不管我做什么，都不会顺她的眼。我们一行人喝茶时，有一杯茶还剩下一点，本需要斟满，但她却把茶叶茶水全都倒在砖地上。这里空气特别干燥，倒在地上的水几秒种就没有了。

晚饭前还有一点时间和另一位老战士袁耀秀交谈。他现年七十七岁，就是吴起镇人。哈里森主要向他询问关于刘志丹的情况。袁先生说，刘志丹身材瘦小，步履稳健，脸色红润，声音宏亮，对上千人讲话，每人都可听清他的话。他很健谈，可以不拿提纲，侃侃地谈它几个小时。他深受战士和老百姓的爱戴。谁都知道他家很富有（他父亲是地主），但他不按家里希望的那样生活。1929年发生了一次严重的旱灾，导致连续几年的饥荒（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死亡和捐税"一章中对此有过生动的描述）。在这极其困难的时刻，刘志丹从学校回来，他家里要他书写催收欠租欠税的通知，他拒绝了，并到雇农中去，对他们说："你们还要照这样生活下去多长时间？参加革命吧！"

根据斯诺的描写，他是一位罗宾汉①式的人物——将从富人那里拿来的钱，甚至没收他自己家里的财产，分给穷人。

① 英国中古传说中的绿林好汉。——译者注

罗宾汉是我成长过程中很喜爱的英雄，在我们已经听说的人物中，对我来说，刘志丹比任何人更富有吸引力。要是我能见到他多好。我对老一套的口头禅"出身贫农家庭"有点厌烦了。我希望能够会见更多出身地主家庭的人，即虽然本人要失去某种东西，但仍然参加革命的人。我们认识一些这样的人——周恩来、宋庆龄以及在北京的某些将军。但是我希望同更多这样的人交谈。农民会从革命中得到一切好处。本身较富有但却认识到社会制度的腐败和残暴，自愿牺牲一切来改变这种制度，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

该县县长是一位修长而俊秀的男子，象许多中国北方人一样，高高的鼻梁，长得有点象美国的印第安人。有一位男子胳臂上戴着上面有白字的黑纱，这说明他的父母或岳父母中有一位去世了。

6月9日　星期六

回到延安

早晨8时离开吴起镇，大家都醒得很早，天气晴朗、凉爽而干燥。

乘车途中，我们注意到绵羊刚刚剪了毛，样子有点难看，就象每年夏天我们把家里的狗带到科德角之前，把毛剪光那样。这里有许多灰白色的鸽子，大多成双成对。在中国，我对看到的任何野生的东西都感到惊奇，不论是花、鸟还是别的动物，不过我相信，鸟类的数目是在增长着。

我们在上次见到的那个举办牲口交易市场的集镇停了下

来。和昨天一样，数以百计的人从四面八方向镇里走来。他们并非出卖什么东西，只不过来玩玩，也许买一只动物或者去看一场戏。年轻的妈妈们带着婴孩或幼童，全都穿着红衣服。京剧演员在舞台后边闲逛。因此我们并没有打扰谁，不过我们仅仅下车几分钟，就有一大堆好奇的人跟了上来。

在一处地方，公路上栽种了三排或者三层杨树。土地是那么坚硬而干燥，杨树好象是从水泥地里长出来的。使我们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在河床里或者紧挨着河床旁边种了那么多的树木。我想底下的土地会是肥沃的农田，不过也许容易被洪水冲走，而树木可以保住土壤。

我们在枣园停下来，这里有一系列吸引人的窑洞和庭院，以前是属于地主的。自然毛泽东把它接管过来了。他和周恩来、朱德以及不少其他人在这里住过一年多。枣园建在城边的一个山头上。庭院里长着枣树、梨树和丁香，中间有一座本色木结构宝塔。山脚下有一条小水渠，更象一条水流急促的溪流，这是当年那些将军们住在这里时修建的，目的是“把水引向远处的农民”。过去那边的农民一直没有水。

我们到达延安吃午饭时已经是午后了。饭后参观了一所庞大的博物馆，我以为我们都会走不出来了。我们乘车游览了市容，参观了迪克西代表团的总部所在地，现在那里无人居住，已经支离破碎了。木工作的一些制品已经损坏，窗户上糊的纸和玻璃也破碎了。前面的那块空地成了存放自行车的场地。

然后，我们乘车去找我们前次住过的旅馆。可是我们比前几天更加感到震惊和伤感。延安这个红军的故乡，红军的心脏所在地，竟然变成另一个迅速发展的工业城市。楼房鳞次节比，街道拥挤，烟雾如此之浓，若不是刮大风，我们都看不见

那著名的宝塔。最糟的是，对于不久前就在这里发生的历史事件，人们一无所知。许多知名的革命者在这里居住过多年，可是现在看不到任何有关他们的痕迹，谁也不知道他们住过的窑洞在哪里，只有枣园保留着。在原来周恩来的住房前堆着砖石，好象计划要修个围墙似的。

有人说，过去官方的想法是："延安是我们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地方，必须要有工厂和工业"——这就是当年认为最重要的一切。这真是一种悲剧。在美国，我们天天都毁灭我们的过去，可是，在延安发生的事情，就更象拆毁费城的独立大厦或者本杰明·富兰克林图书馆一样，或者象在葛底斯堡战场上建一座工厂一样。

6月10日　星期日

回到西安

今晨离开延安时，烟雾如此之浓，人们简直可以用刀子去切。虽然是星期天，多数工厂似乎还是上班。还有一件新奇的事，听说这些工厂都不太大，产品质量不高。一家用西安出产的零部件组装手表的工厂关闭了，因为手表生产太多，没有销路。那些把延安毁了的工业似乎得不偿失。

在延安我们见到了用四头牲口拉的车子，一头在中间，三头在前面，这也是这次旅行中第一次见到。一般前面的三头牲口较小，后面一头牲口较大，是骡子或马。看到一个男子用铲子狠狠地打一头骡子，使我真不好受。在一辆卡车上面，挤满了出去郊游的男孩女孩。他们都穿着我们可以称之为"星

期日盛装”。女孩戴着遮阳帽。男孩站在前面靠近驾驶室，女孩则分隔在后半部。我们见到蒙上眼睛的毛驴拉着碾子围着一个小圈子转。我想，即使蒙上眼睛，毛驴也会晕得要命。我们看到了还没有完全修好的铁路，这条铁路是为了运煤而修建的（现在用卡车运煤）。我们经过一辆卡车的拖斗车旁边，拖斗车轮子没有了，倒在一边，路上洒满了煤。一位可能是卡车司机的男子在等待警察过来。一支由五名身着运动衫的自行车运动员组成的队伍，后面跟着一辆带斗的摩托车。这是省里的自行车队在练习。

使我惊奇的是各种野花都在同时盛开——毛茛、蒲公英、勿忘草、蓟花、丑陋的酸模草，还有牵牛花虽然还没有全开，可是俏丽的蔓枝已经很厉害地缠住了所有周围的东西。刺槐树正花满枝头。

一位陪同提醒我们注意坐在树下的一对男女青年。他说：“瞧，多么罗曼蒂克”。我们谈到了男人、妇女以及他们的行为和习俗。那位陪同对我们说，有些地方人们太保守了，夫妇在公开场合都不能说话。他还说，在他老家全村1000户，过去没有地主，只有二、三户富农，其他都是中等收入的农民，也没有贫农。他们交租纳税，但不明白交给谁。

我们乘车经过一些地势较高的平原，看起来土地非常肥沃，植被很好。什么地方一定有水源可供灌溉，但我们不曾见到管道，也没有见到水库。

路旁聚集了许多流动养蜂的人。他们早春季节从河南出发，最后到达内蒙，秋天再返回。他们带着50个或更多的蜂箱，住在帐篷里，每到一处呆上两、三天，一般就住在路边，这种生活一定很新奇。他们提取蜂蜜之后，收拾行装又继续前

进。有时我们也见到一些蜜蜂——那些没有及时回巢的蜜蜂——跟着卡车飞翔。现在正是野花盛开的时节，等他们从内蒙归来，听说荞麦也将开花了。我们对这些家庭的儿童感到疑惑（因为我们见到相当多的儿童，肯定一家不只一个孩子）——他们是否上学，是否养蜂季节或多或少只算他们的暑假。

在到达西安之前的那几处大平原上，人们都在趁天气干燥时尽快收割小麦，把它铺在公路上让汽车和卡车来脱粒。在沿途各处都有告示牌写着不许这样做，但是谁也不理会。这样做是危险的。不过这是一种能将麦粒与桔杆分离而不花钱的办法，比用单人驾驶的拖拉机带着滚子在上面碾压省工，也比用手摇脱粒机或者把麦子往椅子靠背上使劲甩打省工。在这广阔的田地里，全部工作都是手工操作或使用牲口——黄牛、骡子，有时也用马匹。每一寸土地都充分利用了——即使用拖拉机耕种留下的边边角角也都不荒废。

我们还是住在那家饭店的同一幢楼，不过房间换了。哈里森对这个省里的招待不周感到生气和心烦意乱。我们认为，这与我们到达这里的头一天晚上设宴招待我们的那位主人有关，那位先生说，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就写不了关于长征的书。陪同我们的人是殷勤友好的，但他们本身对我们此行的目的了解不多，把我们当旅游者对待了。

6月11日　星期一
西安

今天对哈里森来说是完全的失败，白白浪费时间。不过对

我来说还是挺好的，不要到外边去上厕所，不要用盆子洗脸。期待着返回北京和在一处地方住上一星期也是不坏的。尤其不错的是想着要回家了。

我们又采访了两位老战士，从他们那里哈里森没有了解到多少新情况。头一位是钟先生，1919年出生于江西省。他说，他的家庭都是“穷人”，一年之中有四个月吃不饱肚子。朱德和他率领的部队曾两次来到他的家乡，给人留下了好印象。士兵不抢老百姓的东西，官兵关系融洽。他十二岁参加革命，一年之后参加红军。当时他年纪太轻不能发给步枪，所以要他做宣传工作，张贴标语和宣传画。后来他在医院工作。

哈里森问，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时他在哪里。他当时在瑞金的医院里，从瑞金到了于都。他记得，出发的那天，正下着雨，路很滑，不得不点上火把。但多数同我们谈过话的老战士告诉我们，当时天气干旱，月光明朗。

钟先生说，红军里的年轻人，同年纪较大的战士有所不同，感到困难不是那么艰巨，因此他们恢复得也快。由于年轻，他们想得也不多，想到的仅仅是吃的和他们从事的伟大而惊险的活动。这种说法倒是第一次听到。他过雪山时没有什么困难，并不感到呼吸短促。对他来说，在草地上过河是长征中他经历的最危险的一段，因为他年纪太小，很容易被淹死。干部们骑着马来回渡河，年轻的男孩们抓住马尾巴以免被水冲走。

另一位是叶英利先生，1916年出生于湖北省。他家也很穷，从小给地主放牛。他曾经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这是一种青年人的地下活动组织。1930年他的家乡还没有解放，到处是国民党士兵。不过在1931年红军消灭了地主及地主制

度，因而叶在十五岁参了军，这大概是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

他曾在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的通讯部门工作。他说，张确实脾气很坏，如果不顺着他，他就大发雷霆。不过叶先生对张国焘杀人的说法表示怀疑。哈里森问，他是否听说过张国焘对毛泽东很生气，他回答说，"没有"。不过他确曾听说张国焘和朱德之间的一场斗争——话说得很难听。这是发生在张国焘要南下去成都，而朱德要跟随毛泽东北上的时刻。他说，战士们对这一分歧都是清楚的。

这一天的其他时间，我们用来写明信片、兑取支票、去邮局、买丝巾作礼品。气温达摄氏 38 度上下。晚饭后获悉，我们明天还将采访"一位不错的人"，并于下午 3 点 30 分飞北京。起飞的确切时间就看中国民航了，这是我碰到过的最不可靠、最无法预测的一家航空公司。我们的起飞时间已经变了三次了。

6月12日　星期二　下午3点
从西安去北京的飞机上

早上在西安时我在笔记本上写着："同鸟一道起床，除非我听不到鸟鸣"。现在的确鸟不太多，但比 1972 年时还是多了一些。早饭后我们立即去参观王医生所在的医院。这所军医大学及其附属医院，是一个规模巨大的综合医疗机构。这所医院，还有其他三个单位，早在二次大战期间就作为八路军下面的一个机构，在陕西建立起来，1949年以后迁到西安。

副院长陈华教授现年八十二岁，但看上去年轻得多。他出

面迎接我们并陪我们就座，而由一位发言人介绍情况。

这里培训的医生有三类：一般医生；为陆军和空军基地培训的专门医生；肠胃病专科医生。全校设有 54 个专业，其中36个专业可以培训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还有三个附属医院。全校有 150 位教授、副教授，400 余位讲师，学生 2,800 名。学制为 5 至 6 年，开 34 至 40 门课程。每年治疗病人超过 100 万人。

学生来自两个方面：有些是医学院录取时参军的优秀高中毕业生，其余是部队的战士。男生占 80%以上。这个百分比使我感到惊奇，因为自 1972 年以来我们在中国见到过许许多多女医生。也许由于这是一所部队的医院。在三年制的护士学校，95%的学生是女生。

他们同外国的医学院和医院有交流。例如，陈教授（又一位陈医生）去过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许多医生去美国参加过会议，矫形医院院长去过衣阿华和威斯康辛，会说英语。

去几座楼里参观之前，我说，我们有幸能有王医生陪同我们，她是这样一位具有真才实学的好医生。我猜到了回答是什么："她只不过做了她应该做的事。"

在矫形医院里，我们见到了被切断或被压碎的肢体的照片和医生们精心修复肢体的照片。还请一些病人将再植后的断指和断手给我们看。一个姑娘的胳臂从肩部就被切断，再植后，虽然现在还用悬带吊着，但已经能活动这个胳臂，医生说，她最终还能使用这个胳臂。这种事故多数是由工厂里的机器造成的。对工人要注意安全一定教育不够，也许是安全设施不够完备。1972年我们在上海见过这种手术的病例，看来他们的知识和专业技术水平是大大提高了。

我们看到了一个奇特的整形外科病例。一个女孩出生后脸部还分成两部分，就象我们一般人在子宫里开始生长时那样。她的头特别大，两只眼睛之间的间隔很宽，嘴部上面的鼻子也分成两半——两半之间空出一大块地方。在十二岁时，经过一系列的手术，我也说不清是多少次手术，她的脸部整好了。从她的脸部中间切开，将鼻子的两半合成一个整体，两眼之间的距离也正常了。她的头盖骨的中间部位被切除了几块，把脸的两半合在一起。现在她的头部和脸部都正常了。医生们说她的脑子没有受到影响。

我从来没有想象过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国家的医生可能也做这类手术，但我不曾听说过，也不曾见过，而且我怀疑如果不为金钱报酬，是否会有许多美国医生肯花那么多的时间来做这种手术。

这个医疗综合体比 250 英亩的紫禁城还大。楼房不太高，各处都有一些漂亮的花园，树木种得不少。真是一处美丽的校园和医院，非常令人鼓舞。

参观医院之后，我们会见了两位党史学家和一位教授。党史学家回避所有哈里森提出的问题，那位教授则嗯嗯呃呃，看起来正谈得不切题的时候，“一位好心人”由她的丈夫陪同走进来了，她就是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她是一位瘦小腼腆的妇女，现年五十三岁，面带惹人喜爱的微笑。她身穿一件蓝白格子花衬衫，咖啡色裤子，拎着一个小手提包。开始她显得有点紧张，老是摸弄提包上的拉链，不过过了一会儿，她就轻松下来谈吐自如了。她是一位医生。

她的丈夫张光是西安一家报纸的编辑，身材高大，友好而健谈，看来说话坦率。他们来了以后，两位党史学家和那位教

授再也不吭一声，解脱了窘境。奇怪的是，志丹县有一个祭祀的地方，又重新以刘志丹命名，虽然他是一位受人爱戴的英雄，人们却似乎不愿谈到他。

从他的女儿和女婿那里，我们听到了更多关于这位令人着迷的刘志丹的情况。如象我曾写过的，他在他家乡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起过杰出的作用。他领导的约五千人的部队曾经控制了陕西和甘肃北部的二十个县。在三十多个县里指挥着游击队，这支不大的部队牵制了20万国民党军队，如果不是因为这种牵制，这些国民党军队对进行长征的部队会造成很大的威胁。

诬陷刘志丹的杜衡，当时是党的省委书记，他排挤了刘，并亲手接管了红二十六军。在离西安几公里的地方，刘志丹的红军曾遭到严重失败，但刘志丹脱了险，北上建立了一支新的部队。

他遭到的麻烦来自那些莫斯科路线的追随者，这些人的思想和毛泽东的思想是完全对立的。虽然当时刘志丹并未同毛泽东取得联系，然而他们的理论都是相同的。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北上到达陕西，我们三月间在北京见过的将领之一的程子华（他的手和胳臂都受过重伤）任该军政委。程子华和红二十五军的一些负责人反对刘志丹。刘志丹领导下的部队在劳山打了一场胜仗之后，在这个部队中工作的几乎所有团以上的指挥员都被捕了，高级军官受到审讯，许多人被杀害。当时，刘力贞还是个小女孩，不过她记得，挖了一个大坑，准备将包括她父亲在内的军官活埋掉。

幸而在这个紧要关头毛泽东到了吴起镇，听到这一杀人的计划，他说，“一个也不要杀”。他派了两名代表和一个连的

战士去制止。

哈里森问，那些负责捕人和杀人的是否受到处分。他们说，只是撤了他们的职，一个也没有被捕，一个也没有被杀掉。

刘志丹当时戴过手铐脚镣，因此在他获释之后，有一段时间走路困难。刘力贞说，她父亲刚回家时，她感到陌生，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她才感到自在。她说她父母相处很好，不过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1936年刘志丹在战斗中受了致命的重伤。

刘志丹去世时，力贞的母亲因患伤寒住院，因而未能参加刘的葬礼。1943年刘志丹的棺材迁到现在的墓地，刘力贞当时十三岁，她记得农民跪在路旁焚香致奠。她的母亲让人打开棺材，见到刘志丹身穿她母亲亲手缝制的军服。刘志丹留下的东西只有他的手枪和一匹马。她母亲将这两件东西送给了需要的人。

刘力贞说，他父亲唯一的遗产就是他的精神。虽然他去世时，女儿才八岁，她却珍惜对父亲的怀念。甚至到现在，每当她母亲会见老朋友时，她们还失声痛哭。他们永远不会忘记刘志丹为革命所做的工作和奉献。

“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力贞和她的母亲以及家庭所有成员都被弄到农村去了。她的丈夫在一个公社的生产队劳动，她在一所县医院工作。她母亲说：“‘文化大革命’就象1935年的清洗，没有什么新东西。我们只不过是又一次受到迫害，这次是从‘左’的方面来的迫害。”林彪死后，全家搬回了西安。

午饭后我们收拾好全部东西，准备3点30分离开，刘志丹的遗孀顺便来访。她上午曾在医院做检查。她名叫仝桂荣，七十九岁，人们称她与邓小平“同庚”，意思是同一年出生的。

她个子不高，比她女儿更瘦小些，活跃而有风趣，走路时拄着一根手杖。哈里森问她在什么地方认识她丈夫的，她回答说："那是包办婚姻。我本不想承认这个，怕你们会笑话我。"不过，她继续说，当时多数婚姻都是包办的。刘志丹出身于"有钱"的家庭，她也是如此，虽然她女儿说，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很富裕，只不过是收支相抵罢了。她重复地说："那是一个很穷的县，现在还很穷。"

仝桂荣说，早在她还在母亲怀抱中吃奶时，她父母就许了这门亲。她与刘志丹结婚时，她十七岁，刘十八岁。显然这是产生于一个传奇的、激动人心的而又危险的时代的一种爱情关系。

因此，同这位"好心人"见面成了我们进行过的最好的会见之一，哈里森对此很高兴。

6月13日　星期三
北京

我们住在北京饭店的中楼，也就是最老的那座楼，房间较小，房顶较高，有精美的木工的作品，正象我记忆中那样可爱。现在这座楼经过彻底重新装修，它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也可跻身于时髦的饭店之列。卧房非常宽敞，巨大的盥洗室干净别致。我们见过谢伟思夫妇后，打开行李住下来，安排了很好的为时四天的日程。我们要会见三位伟大的妇女、李先念主席和胡耀邦总书记。

4点我们去人民大会堂会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陈丕显副委员长，主要目的是谈关于陈毅的事。1934年长征开始时陈毅留在江西。在以前的采访中，我曾写过，陈毅当时住在医院，从窗口看到部队在行动，因此“他把周恩来找来，问他发生了什么事。”陈丕显说，陈毅受伤不能行军，但他对这个地区比谁都了解，他留下来会鼓舞士气，使留在根据地的人更有信心。因此他受命留下并组织抵抗。这个决定事先并未征求他本人的意见。周恩来到医院去看他，将这个计划告诉了他。哈里森认为，也许博古和李德不希望陈毅同他们在一起，在遵义会议之前，当时他们还是掌权的。陈丕显说，他当时很年轻，对于高层发生的事情不了解；不过他说：“我倾向于同意你的看法。”哈里森还认为，也许陈毅对于要他留下来，又不同他商量，感到不高兴；因为没有别的选择，他还是同意了。

陈毅住院是由于臀部伤口愈合不了。陈丕显说，我们听到的情况是确实的；陈毅把自己绑在一棵树上，让一名警卫员把感染物挤出来，在伤口上擦上万金油。经过那次处置，伤口真是愈合了。

在三年游击活动的大部分时间里，陈丕显和陈毅在一起，显然他对陈毅非常敬仰。他告诉我们，国民党是那么害怕陈毅，因而为陈毅的首级悬赏六万元。共产党人进入山区以后，就象躲避狩猎的动物一样生活，森林里能找到什么就吃什么，住在山洞里或用枝叶搭起来的帐篷里。正如我们从其他幸存者那里听到的，他们白天躲起来，晚上经常化装下山到村子里去从农民那里得到食物，组织会议和进行地下活动。任何人如被怀疑同共产党人有关系就被杀掉，数以千计的人牺

牲了。他还告诉我们，有一天晚上有几个战士爬到一个洞穴里睡觉，早晨他们醒来时，一只老虎从洞穴的深处走出来，没有理他们，继续从洞口往外走，干它自己的事去了。他们根本不知道在他们爬进洞穴时，老虎是原来就在里面，还是后来进去的。

杰克在四十年代同陈毅见面时，陈毅说："其他的人会告诉你，他们怎样是无产者或者出身贫农家庭。我不和你讲那些，我手下有人是来自宽裕家庭的，我出身于资产阶级。"我要是能见过这些人中的一位就好了。

林彪仇恨陈毅，他知道只要陈毅在，他就控制不了军队。陈毅受到攻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迫害，都是林彪的责任。陈毅虽未被关进监狱，但被斗争、骚扰和受监视，他的妻子也是这样。他的妻子在比他晚些时候也去世了，他俩都是由于受到迫害所造成的心理影响而致死的。

虽然听到关于这位杰出人物的这种悲惨的故事，今天晚上过得还是很有价值和令人愉快的。我们见过的陈毅的几个孩子，都是可爱而友好的。陈丕显是一位热情好客的主人。

6月14日　星期四

上午8点30分我们会见了张闻天的遗孀刘英，张又名洛甫，是长征队伍中唯一的一位对美国有第一手知识的人。他在加利福尼亚住过一年，在伯克利的大学图书馆和旧金山唐人街的一家报社工作过。

刘女士1908年出生，穿着一身整齐的灰色西装，留着还

是很黑的短发，戴眼镜，对我们友好而随和。她是我们见过的人中个子最矮小的，海伦·斯诺在延安见到刘英时，她说，她不知道当年刘英为何没有被风吹跑。哈里森说，他认为，虽然她那么矮小，但什么东西也不能把她吹跑。她在莫斯科学习过三年，1933年回国，到了江西的苏区。她在共青团中央工作，第五次围剿时，即从1934年初开始到长征开始之前，她在瑞金担任宣传部长。由于红军减员很多，她到农村去扩充兵员。她记得，长征开始时，天气晴好，他们在于都过河时，是个有月光的夜晚。她是特别挑选出来的三十名女干部中的一员，这些人中，现在还有十五人健在。她当时的任务是做政治工作和保护装备。在特别困难的山区，挑夫一个晚上只能走两公里半。他们的全部财物，从枪支、饭锅到供给品，都是用肩挑；一部印刷机要六个人扛。挑夫的肩和脚都肿了。红军采用一个村一个村接力的办法来征用挑夫，要说服村民派挑夫，经常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担心，如果国民党发现他们帮助共产党的话就会杀害他们。

由于要挑运全部装备，道路又窄又滑，许多战士从悬崖上掉下去摔死了。刘女士记不得是在什么时候把重型装备扔掉的，不过她说，在遵义会议之后，剩下来的多数装备都掩埋了。埋的地方作了标记，以便日后能找出来。

她说，长征开始时毛泽东没有患疟疾。在这之前由于傅连璋医生的治疗，他早已恢复了健康，但身体虚弱，用担架抬着走。在整个长征途中，由于他通宵工作，需要一点休息，所以经常用担架抬着他，他在担架上睡觉。

哈里森问她是何时与洛甫结婚的。她说，到陕北以后她才和他一起生活，不过她在中央直属队工作，在长征中经常见

到洛甫。洛甫教她如何作会议记录，在工作中给她以帮助。她说，她不想在长征时结婚，不想受孩子的拖累。例如贺子珍，长征开始就怀了孕，后来不得不离开她的婴儿。她说，那些有婴儿的妇女，要么将孩子留给农民，要么干脆“扔掉”，就象扔掉过多的装备那样。别无其他选择，革命利益第一。

她谈到了贺子珍。说她沉默寡言，看起来随和，但容易发脾气。她并不总是能理解毛泽东的思想。长征结束时她病了，并去苏联治疗。毛泽东同意她去，因为考虑到她孩子生得太多，也不曾有过受教育的机会，这次也许是一次学习的机会，也可提高她的政治思想水平。她当时已怀孕五个月了。孩子生在莫斯科，就是那个在幼儿园生病死去的男孩。这对贺子珍是个严重的打击，她病倒了，很可能是精神崩溃，从此再也没有恢复到她过去的样子。

哈里森问刘英女士，贺子珍去莫斯科是否与江青有关。答复是否定的。江青是1937年末到延安的，而贺子珍 1936 年就去莫斯科了。而作家丁玲告诉我们，江青，她利用机会填补了空缺。

对和他结过婚的几位妇女来说，毛泽东并没有给她们带来很大的幸福。他最初的婚事是包办的，根本说不上圆满，在履历上未予记载。人们知道的第一次是他与杨开慧结婚，生了三个孩子。秋收起义时，杨开慧留在长沙，1930年与六岁的男孩一道被国民党逮捕。她受到拷打并被枪杀。孩子交给了保姆，后来曾流落在上海街头求乞，后来好不容易与父亲团聚了，最后在朝鲜战争中牺牲。

毛泽东与贺子珍在井岗山结了婚，在一起生活，以后贺子珍去了莫斯科，江青插手进来，毛泽东经党中央批准离婚并同

江青结婚。但有些中央委员反对。传说，批准同江青结婚有一个附带条件，就是江青不得干预政治。全世界都知道有关她的故事。

由于二次世界大战，贺子珍被滞留莫斯科，直到1948年才回国。毛泽东同江青结婚是对她的又一次打击。她得不到允许去北京，大部分时间住在上海，毛泽东逝世时，她要求去北京表示悼念，当她坐着轮椅来到灵堂时，不禁潸然泪下。一批长征女战士看望了她。“她记性不好了，但还认识我们这些一道参加长征的人。”晚年她半身不遂，因中风去世。

我们听到的故事中，多数是悲惨的，我认为尤其这位妇女的一生最惨——最可怜、最困难、最徒劳无益、最没有得到报偿。

洛甫夫人说，她丈夫的灾难始于1959年的庐山会议，他被指控参加了一个“反党集团”，撤销了他在外交部的职务，调到了经济研究所。他写了一些关于中国经济的报告和论文。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称为“修正主义者”、“走资派”，并因为上述“反党集团”问题而受到攻击和斗争。1968年5月洛甫还被加上里通外国的罪名而关进监狱。经过一年的调查，这些罪名都查不到证据，于是他被送到广东省交军队监护，在那里他度过了六个年头。当时他享有一些自由，可以读书、写东西，他继续关心经济问题。可是他的健康恶化了——得了心脏病和高血压，他要求到北京治病，得不到批准。江青不喜欢他，因为洛甫反对她和毛泽东结婚。他要求回上海附近那个县的老家去，也遭到拒绝。最后他被送到一个医疗条件不好的小地方，于1976年7月1日逝世。

在向我们讲述这段经历时，这位可怜的夫人一边说一边

擦着眼泪。她还说，当时没有任何追悼活动，也不让她到墓地去。后来洛甫得到了平反昭雪，举行过追悼会。

哈里森问到她本人的遭遇。她说，1959 年她的丈夫遇到麻烦时，人们叫她揭发她丈夫里通外国的情况，她说她不能，因此被指责为与丈夫划不清界线，于是也从外交部调到一个文化机构。"文化大革命"中，洛甫被关进监狱时，她受到了迫害，叫她写洛甫同外国关系的材料。那些人说："你一定得写，""这是为党贡献力量。"

她坚持不能为了讨好那些人而编造事实。她说，毛泽东相信"实事求是"。她同洛甫一道去了广州，帮助他做些文字工作，生病时照料他。那时只发给他们很少一点生活费，谈不上有象样的医疗。

1976年 9 月毛泽东逝世后，她被批准回到北京，她的问题也弄清楚了，并得到平反。现在是中纪委委员。

4 点，我们去中南海和党的总书记胡耀邦谈话，他被认为是邓小平的接班人。中南海位于紫禁城旁边，是领导人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外人是不被邀请去那里的，我国的大使，甚至里根总统都没有去过。能到这里对哈里森和杰克都是巨大荣誉。

我们快到达高高的红色大门时，两名战士急忙采取立正姿势。门内还有两名战士，一名给我们指路，姿势象芭蕾舞演员那么优美。这个地区过去是一所公园，位于市内几个湖的最南边，许多建筑是当代的，不过只有一层，用青砖修建，和景色协调，不显得突出。

我们的主人欢迎我们时，我本能地感觉到，这位非凡的人物显得精力充沛，情绪高涨。同绝大多数美国人相比，他个子

矮小，但充满着活力，使气氛变得热烈。

在一间宽敞、光线充足、通风良好的接待室里，我们在一排半圆形的椅子上就坐。壁上挂着一幅华丽的玻璃浮雕花鸟画。两位姑娘给我们上茶，她们穿着漂亮的、一尘不染、裁剪合身的咖啡色裤子和上衣。着的是棕色高跟鞋，烫了头发。现在多数姑娘都卷发，想留什么发型都行——长发、短发、不长不短、后面系带、或者盘在头上的都有。1972 年，我们只见过两种发型：辫子（姑娘和年轻妇女）和圆盖碗式的剪发。

我们从长征谈起。长征开始时胡耀邦才十八岁，被任命为共青团中央秘书长。他说，团中央委员由三十二人组成，只有十四人还是十五人到了延安。今天仅仅五、六人还在世。

到哈达铺之后，从瑞金和于都出发的红军由八万人减到一万人。当时要胡耀邦负责一支收容掉队人员的部队，因为大军准备急行军去陕北。他说，部队走得太快，每天都有上千人掉队。这些掉队的人就可组成一个军。由于掉队的人数众多，他们再也不怕受处分，许多人都不肯跟着走了。

哈里森说，这倒说明了一个使他疑惑不解的问题。他听说一方面军到达陕北时，只剩下六千人，他一直弄不清所有这些战士的情况。

胡耀邦说，红军的政策是要从国民党那边争取有技术的人——医生、电话员、能掌握机关枪的人。投奔红军的电话员教他们使用国民党的密码暗号。王彬原是国民党的医生，被俘后参加了共产党人的队伍。周恩来患肝炎病重时，就是王照顾他。

胡耀邦说，国民党得不到老百姓的同情，开始时装备也不

好。如果不是这样，长征就不会胜利。过去谁也没有这样说过。我一直弄不懂为什么国民党对老百姓那么凶恶，那么残忍。如果他们想要取胜，为什么不去讨好农民，把农民争取到他们一边来呢？

红军的通讯人员早在1930年就在上海和苏联进行培训，周恩来当时负责这项工作。

胡耀邦说，长征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是一种鼓舞。当他们了解到这一壮举所表现出的勇敢、力量、信心和智慧，长征会给他们以巨大的精神上的激励。

他要求我们每个人谈谈这次旅行的观感，哈里森一直在谈他的观感。我说，我认为这次旅行是一种动人的经历，我觉得我对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的了解比过去大为增进。他问我，是否发现那些地方的条件非常原始落后——是否比其他国家尤有过之。提这个问题时，他咯咯作笑。我回答说，我去过的其他国家的边远地区并不多，难于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我认为，不管我们到达何处，不管条件如何，我们的主人把他们最好的东西给了我们，尽了力所能及的一切来使我们过得舒适。

我提到了马尔康附近卓克基那座土司官，我们认为一定要保护那座奇特的建筑物，不要让它倒塌了。他向坐在他左边的一位先生示意，那位先生把我的建议记了下来，因此可能要采取某些措施。

我说，计划生育似乎在农村行不通。他说，妇女们那么坚决地要生孩子，有时她们跑到另一个村，另一个省去生小孩。即使城市里节制生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中国的人口每年还增加1100万。受过教育的人、政府工作人员、干部只生一个小

孩，即使他们中有人想再生一个，也显得太突出了。不过这一政策在边远地区很难执行。全世界的情况都是如此。是那些受教育不多的人使地球上的人口大增。

杰克说，除非人们了解旧中国，就不可能感受到新中国所产生的奇迹。我想这种说法是对的，不过，我们虽然不了解旧中国，还是深有感受。杰克提到了在公路、铁路、通讯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他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关系的改善是显著的，不过他遗憾地看到喇嘛教在复活——他认为这是一种落后的社会制度，是反对进步和现代化的。

我们步行到牡丹和玫瑰正芬芳吐艳的花园里，在一张小桌子周围的凳子上坐下来拍照。晚宴在隔壁房间里举行，一张可坐八个人的长桌，两边各坐四人。施小姐（中国人第一次来到联合国时我们见到的那位女士）、哈里森、胡耀邦和我坐在一边；张先生、卡罗琳、杰克和齐先生（新闻司司长）坐在另一边。部长助理周南先生没有参加晚宴，因为今天是女王生日，他要去英国使馆。在通向配餐间的门口站着一位男子；宴会厅的入口处站着一位穿着地道中国衣服——衬衣和长裤的妇女；另一位男子站在通向花园的门口。

餐桌上没有摆花，但中间有两个华丽的彩饰烛台，上面各插有六、七枝蜡烛，还有一个塞满龙虾色拉的大龙虾壳。一直到收拾桌子上的甜食时，龙虾还原封未动。

事先有人告诉我们晚宴是西式的，的确如此，不过更象法国式的而不是美国式的。菜的道数几乎同中餐一样多，不过是采用西方式的上菜法，用的是刀叉，而不用筷子。（后来，胡耀邦建议中国人不用筷子，开始用叉子，还说这样更卫生。这样整个上菜和吃饭的方式都得改，我看即使中国人接受这种

办法，也维持不了多久。）

宴会上有面包、黄油和两种酒。几个身穿从膝盖部位开叉的深红色服装的姑娘侍候我们。菜单上的第一道菜是龙虾色拉。第二道是鹅肝冬菇丝汤，盛在带盖的汤碗里，每人一份。与汤一块上的还有奶油松饼，酥松而味美——真是举世无双。接着是奶油蒜汁蜗牛，女服务员熟练地向每位客人表演如何使用这种特殊的钳子和叉子，似乎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稀奇的东西。她们还把一小篮子切片面包（法国式的用裸麦作的，颜色较深）和卷子递过来。然后就上鱼了，这是一大块白色的鱼片，加了芒果汁。还有小小的胡萝卜和花椰菜，蔬菜的上法同马克西姆餐厅一样。

吃完那一道菜以后，给我们每人上了一块炸得嗞嗞作响的牛排，周围有一些蘑菇片，牛排盛在金属盘子里，底下还垫着一个木质浅盘。下一道菜是巴黎色拉，有莴苣、苹果和核桃。尽管我对每道菜都只尝那么一点儿，我已经相当饱了。可是又上了三种不同的奶酪（法国布里的咸味白奶酪、洛克福的羊奶干酪和另一种一般的黄色奶酪）和饼干。最后我们吃了香草冰淇淋和鲜草莓，张先生说，“这是我们一路上经常谈论的一种食品。”

法国和中国合资开办的王朝公司出产的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真是好极了。哈里森感到，他们安排这么一顿丰盛的饭菜，是为了显示他们能与任何人媲美，甚至在外国烹饪方面也不逊色。

宴会过程中一直在谈着话，我们的主人不时从他的坐椅上跃起，用手势来描绘他所谈的内容。有一位女服务员差不多一直站在他的背后，以防他从椅子上掉下来，或者在他跃起

坐下时没有坐到椅子上。她把椅子向这边和那边挪动，以保证椅子正对着他下坐的位置。

胡耀邦是一位非凡的人。有一位中国人对我们说："一切事情都靠他——他非常好，他是我们的希望。"他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情况很熟悉（在这方面我不能经常恭维美国的政治家）。他博览群书，包括美国和欧洲出版的书籍的中译本。他读过尼克松写的书，喜欢卡夫卡①的著作。

6月15日　星期五

上午9点30分我们去人民大会堂，同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见。到人大会堂，其实我们可以从容地步行走去。我们以前见过李先念两次。本以为他年迈体衰。可是他老是老了一些，恐怕80岁出头了，不过看起来比前两次见到他时都好。我感觉他有一点步履蹒跚。我把这一看法向一位中国人说了，他说："这就是美国和中国的一个大不同之处，我们尊敬老人。"不过，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也许他年纪太大了，不宜担任重要决策的职务。他的工作似乎更多是礼宾方面的。去年冬天他出国作了一次长时间的旅行，他会见许多来访者②。不管怎么样，今天他提供的有关长征

---

① 全名为弗朗兹·卡夫卡(1883—1924)奥地利小说家，作品多用梦幻和神秘的手法，描绘现实世界的荒诞和不合理，是现代派奠基人之一。——译者注

② 他于1985年7月来到美国，我们在白宫同他一道吃过晚饭。他当时看起来身体很好。——原注

的史实是有充分事实根据和详尽的。

他同我们打招呼之后，对哈里森说："你和我都是快退出舞台的人了"。这是多么爽快的想法。

我们坐在摆成半圆形的一排椅子上，随即开始对长征进行了非常具体的讨论，谈到了一些部队的情况，犯过的错误，错误路线，多少个师被歼灭，打了多少次胜仗，小规模战斗的失败，指挥员发生的争执，还谈到了许多关于张国焘及其与毛泽东的分歧的情况。李先念当时是三十军的政委，属于四方面军，多数时间同张国焘在一起。他谈到了1936年被派去参加西征的事，那完全是一场灾难。当时是张国焘下的命令，但实际上这道命令出自毛泽东，并得到莫斯科的同意。他们受到马家兄弟领导的国民党回族骑兵的攻击——这是一支凶猛剽悍的戴白帽子的重骑兵。一支妇女小分队惨遭酷刑、强奸，然后被杀害或被当作奴隶卖掉。数以千计的战士牺牲了，冲过封锁的人到了戈壁沙漠。李先念幸免于难，后来乘友军的一架飞机，飞回延安，幸存的战士花了一年的时间才走回来。

下午3点我们在国际俱乐部会见了杨尚昆将军的夫人李伯钊女士。他身材不高，体态丰满，象许多中国人一样，留着梳理得整齐的短发，头发灰白但牙齿很好。她身穿咖啡色裤子、褶边的白色短外衣、棕色皮鞋。她向我们表示欢迎："看到来自远方的朋友们，特别是有一位知名的作家来中国参观并考察长征，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我愿意向你们介绍我的那些经历，并详细谈谈。长征是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划时代的事件。我想谈谈关于我三次过草地的情况。"

她1910年生于一个革命家庭。她父亲是一位县长和学者，母亲爱好绘画、读书和写作。她六、七岁时父亲就去世了，

不久母亲也相继去世。李伯钊就读于一所师范学校，受到老师的影响，开始对共产主义青年团产生了兴趣。党组织派她到上海，她原打算去那里上大学，后来给她的任务是教工厂女工学文化，因为当时许多女工都是文盲。在蒋介石向共产党人发动突然袭击，屠杀成千上万的人的那个白色恐怖时期，她被捕入狱。共青团的主席收买了监狱里的卫兵，让她出狱，她到了莫斯科。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她在一个艺术团体里写剧本，学习俄国歌舞。1929年她和杨尚昆将军在那里结婚。

1930年她回到中国，当时谁不同情蒋介石都是危险的。她装扮成一个“天真无邪的姑娘”，留着长辫子，穿着农民的服装。她到达上海时，党组织认为她留在上海有危险，把她送到了共产党领导的江西苏区。开始时她在红军学校任教。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布成立，她被任命为瑞金《红色中华》报社的编辑兼校对。

她说，在那里她同毛泽东有更多的接触，“学到了很多东西。”她与周恩来领导下的两位地下工作人员朱隶和钱壮飞合作，写了一个名叫《为谁牺牲，为谁战斗》的剧本。他们在一所正规的剧院上演戏剧节目。她本人还写了两个剧本，一个名叫《我们一定要胜利》。她担任高尔基艺术剧院院长，在那里上演过《低层的深渊》的片断。她说，培训不识字的农民演出这个剧本是困难的，但她坚韧不拔，等他们学到了一些技巧，这个剧本就给战士们演出了。

长征开始时，她在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做宣传工作，同这支部队一道第一次过草地。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她被派到四方面军去培训文化工作人员。当张国焘和毛泽东的争论更

趋剧烈，她从她丈夫那里获悉，毛泽东和一方面军将北上，要她也一道去。可是她离不开，从此又有一年没有见过她丈夫。她随四方面军南下时第二次过草地。后来她被调到二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她说，她是唯一的在三支红军部队都教过文化的人。

她谈到了长征路上"三十名女同志"中的一些人的情况。一位是蔡畅，出身于革命家庭，她哥哥是早期的著名的革命家。象周恩来、邓小平以及其他许多人一样，他们兄妹也去法国勤工俭学。蔡畅靠担任家庭画师维持自己的生活。她意志坚强。在苏区时，任党的省委委员，在陕西时担任党的纪律督察员。长征期间，她和我们昨天见过的刘英一道行军。她当时备有一匹马，但还是经常步行。她"受到所有同志的爱戴和崇敬"。可惜现在她双目失明了。

李伯钊女士说，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长征时有病。朱德的妻子康克清是渔民的女儿。她年纪很轻时在共青团里参加红军的。她是一位好射手，百发百中。结婚以前，她带领着一支战斗小分队。同朱德结婚后，她成为一名政治指导员。

李坚贞曾在农民和老乡中间进行工作，也做过军队工作。她是最能干的女同志之一，现在担任着广东省的省委书记。李伯钊说，她们都是杰出的妇女，坚强而多才多艺，能胜任许多种不同的专业工作。

康克清说过长征就象每天步行走路一样。哈里森问李伯钊对此怎么看。她回答说，走路并不太难，我们那时年轻，不论是下雨还是天晴，都精力充沛，但是麻烦的是敌人的轰炸。

关于"文化大革命"和她在那段时间的经历她一句也没有说，我们也没有问她。我们知道，她当时"受到监视"，被强迫

去打扫大厅和厕所；她患高血压，腿部长了血栓，至今仍感到不适。我们知道她丈夫在狱中呆了十三年，有九年她连丈夫的去向都茫茫然，不知他是死是活。

很难想象这位穿着整齐、沉着自信、态度友好的小个子妇女会有过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一段生活经历。她受到的对待是刺向文明人类的心脏的一把匕首。〔李伯钊女士于1985年4月去世。〕

前外交部长、现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华和他的妻子何理良设晚宴款待我们夫妇、谢伟思夫妇和格雷·戴蒙德医生(一位美国心脏病专家，从1971年以来每年都到中国访问)。晚宴在北京城郊的一座宾馆里举行，那是政府人员款待宾客和供外国要人居住的一所大院落。那也是江青在她掌权的鼎盛时期拿来作寓所的地方。钓鱼台我们去过，前几次都是在不同的楼里，不过从来没有到这个特别雅致的地方。我们走过溪流上的一座小桥，进入花园，所有的客人都在那里聚合了。客人除了我们一行外，还有马海德医生和他的妻子苏菲，秦将军以及其他几位。中国人在宴会前不喝酒，许多人都如此。饭前见面交谈时，他们就坐下来喝茶。上菜时饭桌上供应茅台酒、葡萄酒、啤酒、橘子水、矿泉水等。

在隔壁一间向外敞开的房间里，我们围坐在一个长桌旁用餐——差不多象在花园里一样。哈里森和杰克分别坐在女主人的旁边，戴蒙德和我坐在主人旁边。晚宴多少有点西方式的味道。女服务员穿着和中南海胡耀邦宴会上那些服务员一样的红衣服。菜单印制的式样也类似。钓鱼台有一套为政府举办宴会的设施，为有影响的人提供膳食和服务。他们大概是从法国马克西姆餐厅学来的。

这是一个难得的友好的夜晚，大家多次为最近一次进行长征的幸存者祝酒。我向我的四位陪同先生祝了一次酒："没有你们，我根本不可能完成这次长征之行"。我一再想起，在我们出发进行这次极其成功的旅行的前夕，主人也为我们举行过友好的宴会，现在旅行已经完成了，我是多么感到轻松呀！哈里森再也不可能梦想去其他穷乡僻壤的地方去访问了。可是，几天以前，又有人建议他沿着越南的胡志明小道走走。

6月16日　星期六

再次在国际俱乐部，采访了贺龙的遗孀薛明。

比起我们见过和谈过话的其他几位高贵的妇女，薛明女士比较年轻（她1916年出生）和健壮，可是却拄着手杖。她穿一件白衬衫和绿色的长裤。满头黑发做成一个圆髻。陪同她的有她的漂亮的女儿（杰克说，她女儿长得很象贺龙）和另一位她介绍为"我的同事"的男子。她说："我知道你们计划写一本关于长征的书。大家都期待着这本书的问世。正如你们所知的，我没有参加过长征，不过贺龙告诉过我一些关于长征的情况。"

她出身于贫苦家庭，年轻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是一名裁缝。她母亲除了她自己之外，别无依靠，还因为没有丈夫而受到歧视。许多人，甚至包括亲戚都不理她。奇怪的是这种封建思想在不久以前还存在。正象我们在三月间看到的一部电影中描写的一位年青寡妇的情况，如果她和一个男人说话，人

们都躲着她，把她当成邪恶看待。

由于母亲养活不了她和她的妹妹，薛女士长时间同祖父母住在一起。她上了学，勤奋工作，帮着干家务劳动。当她逐渐长大时，她思考的一切就是，要是她是个男孩就好了。她向往着和男人有平等的地位，可是她当时就知道，这种平等是不存在的。

她到天津三八女子学校读书，生活的严酷现实使她开了眼界。她看到外国租界对中国人民作威作福。许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有些自杀了，有些人成了乞丐。她想她还是做点什么事情为好，因此成为一个革命者。1935 年她是北京学生运动地下组织的成员之一。

薛明提到了林彪的老婆叶群，她也参加了学生运动，但表现“很坏”。她同国民党官员有暧昧关系，一直到后来党才知道这一情况。薛女士认为，叶群到延安时，可能已经是国民党的特务。

薛本人于1938年八、九月间到了延安。她早就听说过贺龙，是她心目中的英雄之一。她说，贺龙身材魁梧，象貌堂堂，声音宏亮，给她留下很好的印象，她对他非常敬佩。

她被派到贺龙身边工作，“我承认，当时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他。”但她年轻得多，人们向她建议，“女学生别和那么大年纪的人结婚。”有一句口头禅，“老同志虽好，但不是好的爱人。”

薛女士没有告诉我们而我们听说的情况是，贺龙的前妻是一位很美貌的妇女，肖克妻子的姐妹。长征时她和贺龙在一起，她是在长征途中生了小孩的妇女之一。他们到了延安以后，贺龙很长时间外出打日本去了，他的妻子向一个年轻得多的意中人求婚。这样一来，一位男子填补了空位。

薛明说，虽然她和贺龙的经历不同，虽然为革命作战和工作是那么辛苦，但他们还是有着“美满的婚姻生活”。他们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结婚以后我们过得很愉快，”她补充说。

她向我们介绍了贺龙的一些事迹。他1896年出生于湖南省的一个贫农家庭，排行第四，有三个姐姐，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他父亲是一名裁缝，家里土地很少。他的大姐是那个地区的游击队长。贺龙上过小学之后，就回家种田，但赚不了什么钱。因此他在湘、鄂、川、黔边界地区开设了一家商队旅店，为过往人员提供食宿。他经常捉摸怎样能过好一些的生活，想着人民必须要有枪杆子。1916年他用菜刀作武器领导了一次起义，捣毁了盐务局，缴获了一些枪。这样他就有可能组织起一支队伍。1920年以前，他就以“杀富济贫”闻名，军阀都害怕他。后来他懂得了社会主义、苏联和共产主义，开始相信这就是中国要走的道路。

哈里森说，他想听听“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她说，“对于‘文化大革命’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精神上没有准备。”毛泽东深信在党内有许多走资派，林彪和江青发现这一理论对他们很有用。许多人受到指控。由于贺龙在军队中的权力，他会成为一种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林彪就诬陷他。周恩来曾提醒贺龙夫妇不要再住在家里，他们就搬到了西山。不过后来周恩来对林彪也无能为力了。当时他们那些人认为贺龙这个人很难斗，而采取“医疗的办法”会更有效。

我前面写过，他们被关在一所有院落的房子里，受到严密监视，甚至不许出门到院子里去，也不给水喝。贺龙患有糖尿病，需要喝水和注射胰岛素，可是既不给水，也不给胰岛素，反而给他注射葡萄糖，就这样杀害了他。贺龙去世后，薛明被关

在监狱里达六年之久。然后，她被送去贵州强制劳动。她最小的女儿同她一起去了贵州，其他孩子被赶出家门，关进了监狱。

在贵州期间，任何人都不知道她是何许人。让她使用几个不同的名字，称她为山里奇怪的老太婆。1971 年林彪坠机身亡之后，她的流放生活才结束，不过周恩来费了好些时间才找到她。

6 月 17 日　星期日

我们的采访结束了，我也差不多整好了行装，哈里森还在打字，我们定于后天离开。不过时间似乎过得很慢，动身的时刻会到来吗？

6 月 18 日　星期一

这是我们在中国度过的最后一个夜晚。我们明天上午10点动身，大约 20 个小时以后就到家了。连续飞行中间也不休息一下，真是太可怕了。我倒愿意在东京过一夜。不过我们渴望回家，因此我想我们能忍受住这种长途连续飞行。

在日坛公园的一家餐厅里，我们同谢伟思夫妇、张先生以及他的妻子吃了一顿美味的告别晚餐。我们到达时，许多人正在院子里用餐。桌子上边吊着灯笼，很有点节日气氛。我们被领着经过一堆乱糟糟的铁丝和管子，走进一间很蹩脚的

房间，里面尽是焚香的气味，墙纸装饰也很糟，一张大餐桌可以坐十四个人。外面条件那么好，我们不愿坐在那种闷气的房间里。我们颇费唇舌去说服那位经理。在他看来，那房间才是贵宾吃饭的地方，在院子里就坐只适合那些不那么高贵的客人。最后，虽然他仍然明显地表示不同意，但还是给我们在院子里收拾了一张桌子。

因为我们是事先订座的，我们就得吃一顿高档的晚餐——吃的东西多得不得了，各种不同做法的虾就有许多道。不是我们去要，连米饭也不上。

不过这次晚宴是一次标志着这次旅行结束的欢乐而有趣的聚会。公园里绿树成荫，鲜花争艳，显得非常可爱。快吃完饭时，天下起雨来了。等我们回到饭店时，北京附近下了一场大雷雨。我感觉好象又回到了江西似的。

6月19日　星期二
在离开北京的飞机上

不管我们多么渴望回家，同我们相处差不多四个月的同伴们却依依难舍。我们那么亲密地一块生活，从事伟大的冒险的经历，对事实和真理的探索，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谢伟思夫妇在饭店门口向我们挥手告别，中国朋友则到机场送行。我们现在登上飞机了。我们的长征已经完成，我们坚持下来了。我们将在今天晚上10点 30 分回到家里，虽然对我们俩来说将是明天上午了。

后　记

现在，这次旅行是过去了。我们回到了家，身体都好。我们坚持下来了，我的感觉如何呢？

我很高兴我还是去了，为能有这样一次冒险的行动感到满意。这是为探索历史、为寻求知识、为增进友谊而进行的冒险。我从来不曾相信我会说这样的话，不过在我们这次长征中，我是过得愉快的。即使在中国最偏僻的地区颠簸的七十天，似乎不象是有乐趣的，有时候的确没有乐趣，不过，总的来说，我们的日子过得不错。唯一不好的时刻就是哈里森生病那一阵，即使那一段经历也是有收获的。我们与同伴们相处很好，由于共同的追求而变得关系密切。我不记得有任何人脾气不好，不好打交道，令人不愉快或是情绪不好。(除了我以外)每个人都先后生过病，然而谁也没有要求享受特别的待遇，或者由于他的情绪而增加别人的负担。我们是一个兴致勃勃的集体，对我们所进行的工作都有着执着的兴趣。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不寻常。

我从第一手材料了解到中国过去曾经是什么样子，了解到封建制度的不平等和令人绝望之处，了解到是怎样推翻封建制度而从新开始的。我了解到战士们以及我们见过的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住了那种种磨难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刚毅和坚韧不拔的精神。那些正派的、爱国的、献身于他

们国家的男男女女，在年轻的时候就致力于改变国家的面貌；现在他们年老了，又在为保卫这些成果而工作，不让他们的国家再次失去控制。

长征的意义，我是深切地领会到了。如果不是沿着长征的路走一遍，没有见到那些开会的地方、战场、长征中跨越的高山、草地、江河，没有和一些幸存者交谈，决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我现在理解到：长征如何鼓舞着中国人中年轻的一代，他们要怎样生活才无愧于那些英雄，使英雄们的精神永葆青春。长征区分了善与恶，区分哪些人是要为国出力，哪些人要的仅仅是权势。

参加长征的妇女们是尤其令人感动的。那肯定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经历，那是一种多么异乎寻常的生活方式，多少个月她们与丈夫一道打仗，在战斗中就在田野里和沼泽地里生小孩。我们会见过的多数妇女，在"文化大革命"中同他们的丈夫一道受尽折磨，现在正在奉献她们的晚年以纪念她们英勇的丈夫。她们对中国、对革命、对她们的丈夫的忠诚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

她们的孩子们看来也在专心致志地弄清"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事件，澄清所发生的一切，给他们的父母所受的磨难以荣誉，并保证这种动乱不再发生。

我对毛泽东有了深入的了解。如果没有他，中国就不可能从地主制度中获得解放，至少要推迟更长的时间，才能获得解放。我认为，他是当时唯一能影响和教育中国的穷苦老百姓的人。他理解农民，了解他们的潜在力量，知道怎样组织和培植这种力量。如象我以前说过的，我现在能容易地理解所有那些称颂毛泽东的口号，如赞扬他英明、他热爱人民、他愿

意忍受苦难来实现必需进行的变革等。如果他在五十年代后期之前，在“大跃进”之前，在发起人民公社制度之前，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退出舞台，那就好了。显然他后来走迷了路，而且为他最后那位妻子及其他人所利用。他们疯狂地夺取权力，使中国笼罩着迫害的恐怖气氛，妄图使中国蜕变到已被推翻的那种可怕的制度中去。

最令人困扰的是关于周恩来的情况。在一路上进行的谈话和采访中，我们很少听到有人谈到他。人们谈到毛泽东、朱德、李德、张国焘以及其他一些人，除了偶尔提到以外，没有谈到周恩来。我们知道，从遵义会议到长征结束，他是毛泽东的参谋长；我们也知道，“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力图帮助那些受害者，可是在当时，正如有些人告诉我们的，“他无能为力。”然而，对全世界来说，他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的老练的发言人。从二十年代的起义到长征，到延安，到抗日战争，到内战那些年代，一开始他就参与其事。他是毛泽东的左右手。对那些假革命之名所犯的可怕的罪过他知道多少呢？他是否感到处在他那种情况下能做更多的好事吗？在他的晚年，他也受到“四人帮”的攻击，甚至在他临终前住医院时，都不让他听他希望听的音乐。我们能弄清关于周恩来的真实情况吗？对我来说，这是最重要的没有解决的问题。